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法]埃里克·德纳塞 等/著　王朔 周谭豪/译

“阿拉伯之春”是
彻头彻尾的大骗局

阿拉伯“革命”是由境外推动
并导演的涉及多国的“离岸革命”



孔丹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理事长

张维为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院长

强世功
北京大学
教授

鼎力推荐

中信出版集团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法]埃里克·德纳塞 著

王朔 周谭豪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代序 阿拉伯“革命”的幻象

第一部分 分析与解构各国的“革命”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缘由和目的
突尼斯：再伊斯兰化的实验室
利比亚：前途未卜
利比亚：西方同伊斯兰主义者的临时联盟
“清除”卡扎菲的真正原因
“埃及之春”的起源与现实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
附件1 会见人员名单
附件2 部分历史参考资料
叙利亚：牌局内幕
巴林：改革以保持平衡

第二部分 外国参与者的主要角色

美国、石油君主国和阿拉伯“革命”
“阿拉伯之春”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非政府组织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
阿拉伯“革命”中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交网站
“危机弧”与媒体：媒体对“阿拉伯之春”的解读

第三部分 “阿拉伯之春”的国际影响

利比亚危机对马里北部安全局势的影响
重提“撒哈拉身份认同”问题：“阿拉伯之春”的次效应
走出萨赫勒危机：应重建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关系

“基地”组织：阿拉伯“革命”的大赢家
从“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之冬”
作者简介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简介
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简介

“文化交锋”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孔丹

编委会执行主任： 季红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绍光 王湘穗 刘仰 李希光 吴玫 汪晖 张桐 罗林 郑若麟 高梁 潘维

丛书执行主编： 刘仰

执行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晓泉 田文林 张翔

代序

阿拉伯“革命”的幻象

> 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
> ——亚伯拉罕·林肯

从2011年隆冬开始，民众抗议运动自北非起，波及近东和中东部分国家，这也折射出民众对民主的渴望，对独裁腐朽、任人唯亲政权的厌恶。抗议运动引发一系列政权倒台，结束了21世纪的民众无法再容忍的一些状态。

大部分国际舆论认为，这似乎是“阿拉伯之春”及诸多“革命”的丰功伟绩。但是，这似乎结局圆满的故事以及英雄与烈士背后，却隐藏着迥异的现实。这一点，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及时地看出来，并且勇于向世人揭示。

其实，“阿拉伯之春”的故事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局。其情节的设置、演员的选择与场面的调度，堪比好莱坞大师级编剧和导演的作品。在整个事件中，那些才华横溢的煽动者向当地民众和境外观察家奉献了一台让他们自己在好几个月里一直屏气凝神的大戏。在戏中，情节的起伏仿佛均是天意，结局看上去也很美好……至少，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只不过，这一切仅仅是由几个不择手段的政治化装师操刀的“蒙太奇”。绝大多数人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这场大戏，对自己是第一批被操

控者这一点浑然不觉。这场闹剧的“目标大众”既有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有走上街头的抗议者。行动空前成功，超出了设计者的预期。听风便是雨的抗议者们确信，自始至终他们自己是发起者，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完全由不得自己，此可谓全面幻觉。

席卷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风波爆发18个月后，我们已经可以更清晰地辨别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这部故事片的演员、编剧、导演和制片人。但很多人当时甚至现在仍然对该片深信不疑。

经深入分析，我们捋出四大因素，让我们摒除人为制造出来的强加给我们的观点来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这四个因素是：社会不满确实存在，但被利用；境外势力指引、导演了“革命”，以便推进其国家利益；运用了屡试不爽的操纵乌合之众和颠覆政权的技术；恶果已经产生，后遗症日益显现。

发生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系列事件是真真切切的“傻子革命”，梅兹里·哈达德说得更好，称这是“招摇撞骗”。我们最好仅限于谈论“阿拉伯之春”而不是什么“革命”，这种说法丝毫不会影响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挫败感及其抗争的能量。

社会不满确实存在，但被利用

正如所有完美的毒化运动一样，起初确实存在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并据此来制造“蒙太奇”。这个事实就是专制腐朽、任人唯亲的政权在民主演进进程中裹足不前，致使民众极度不满，民众渴望有更多自由；面对经济困境，他们饱受挫折。但此现象并非始于2011年。

近20年来，北非、中东国家屡发民众或学生抗议事件，每次都被军队、警察镇压下去。而国际媒体几乎保持缄默。

数年来，突尼斯就时常爆发抗议运动。《中东》杂志2011年4—6月刊中文章称，“2008年起在中西部矿藏丰富的加夫萨盆地的一些赤贫

地区，2009年在该国东南部的本盖尔丹地区，2010年12月在以农业为主的西迪布济德地区及在中西部的卡塞林地区都爆发过起义”。[1]运动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在本·阿里的专制统治下史无前例。这些运动的起因是民众对腐败和失业问题不满。

我们注意到，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罹患癌症，几乎没有精力问政，也未解决继任者问题，数年来一直是其妻子莱拉·特拉布勒西这个危险人物在领导突尼斯。特拉布勒西家族贪得无厌，不少企业家不得不“出让”自家生意以求平安，这令该国的政经两界精英早已无法忍受（2010年初，就有传言称即将发生军事政变）。民众也忍受不了，特别是在突尼斯经济增长乏力之时。然而，他们表达不满的行动几乎是无组织的，与反对党和工会（亲政权的突尼斯劳动者总联盟，UGTT）脱节。虽然此时整个国家正经历经济困难，但与媒体所描述的灾难性场景也相去甚远。就北非地区经济形势而言，突尼斯是最好的地区之一。

埃及的经济、社会问题比突尼斯更加严重。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的10年，埃及进行的宏观经济调整曾引发多次罢工、抗议，而当时境外媒体并未关心。[2]特别是2004年启动私有化之时，埃及也曾经历了一段抗议高发期，显露出社会运动的苗头。那时抗议的诉求涉及穆巴拉克家族腐败、私吞国财等问题。2008年，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大迈哈莱的纺织厂工人开展抗议活动，他们首次与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联合行动，随后成立了两个独立工会，有7万成员。[3]但这次抗议风潮与此前一样，因组织不力而惨遭镇压。

因此，2011年之前，在这两个国家，“抗议只是地区性、行业性的，是孤立的，只要当局予以镇压或适当妥协，就能把这些零星爆发的运动拖死”。

2010年冬天和2011年春天发生的事件，可视为这些抗议运动的延续。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抗议运动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组织能力，汇集了不同阶层，而他们以前从未统一行动过，有的甚至都没有上街

抗议过。2011年抗议运动动员的人数之多，组织之井然有序，这也是前些年无法相比的。

此次抗议运动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军队首次未与警察共进退，拒绝对民众实施镇压（突尼斯和埃及都一样）。此后，抗议运动如火如荼，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注意。

此次抗议运动还有一点很重要，即爆发运动的前几周，这两个国家的军方最高层均赴华盛顿，显然，后者为前者搞颠覆行动开了绿灯。两国的军人已不能再忍受当权者小圈子的巧取豪夺：在突尼斯，特拉布勒西家族的鲸吞行为已严重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在埃及，美国提供的国防预算援助越来越多地被穆巴拉克集团挪作私用。军方领导人决定采取行动。但是，因为五角大楼是这两国军队的主要金主，所以军方在取得大金主首肯前是不肯行动的。因此，这些阿拉伯“革命”归根结底只能说是静悄悄的军事政变，在很大程度上隐藏在被引导的民众起义的幕后。

在埃及，军队完美地控制着运动。所有抗议运动都在解放广场及其周边、在全世界的相机镜头前展开，没有一次真正失控。埃及有着强大的伊斯兰势力和反以色列情感，在解放广场的抗议运动中，却听不到一句反以的口号。这显然是一场有管控的“革命”。如果是一场真正自发的运动，绝对不会不揭露《戴维营协议》的内容，民众也不会不去加沙边界，让“国门大开”。

还应注意的是，对于那些有军队效忠的政权，和平“革命”注定是失败的。巴林是如此，其王室调动军队向抗议人群开火，当武力镇压不再管用之时，又求助于沙特阿拉伯军队。也门和叙利亚是如此，利比亚也是如此，只是那里的民众运动迅速演变为武装暴动。

与突尼斯和埃及不同，利比亚没有社会和经济难题。其经济充满了活力，民众享受着部分石油收入的再分配，虽然不是平均分配，却是实实在在的分配。还有350万国外劳动力为利比亚经济发展出力。当然，无人否认1969年以来就应予以挞伐的卡扎菲独裁统治的性质。面

对如此情势，没有什么比民众渴望更多自由民主更合理合法的了。然而，起义的爆发点却是在其他地方：该国东部昔兰尼加的部落40多年来一直不服从的黎波里政权，经常发动针对卡扎菲的起义或未遂政变。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确定，利比亚“革命”的原因，既不是搞民主，也不是解决（并不存在的）经济难题，而是东部的武装意欲复仇和分立。2011年利比亚东部部落的起义与海外利比亚人的行动汇合，后者是由华盛顿和所谓促进人权的非政府组织支持的民主活动，这些活动分子借着“阿拉伯之春”的东风，为起义者获得国际支持提供了极大便利。

叙利亚的事件远非一场全面起义。该国有一批由世俗派、民主派组成的精英，他们长期以来反对政府，但也只是要求改革，不是要革命。他们完全拒绝像其他“阿拉伯之春”国家那样在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外国势力影响下爆发混乱不堪的“革命”。叙利亚的少数族群很多，他们和大城市里的逊尼派资产阶级和军人一样，惧怕伊斯兰主义者上台，因此比较效忠现政权。[4]虽然巴沙尔政权并不符合西方民主的标准，但巴沙尔不是一些媒体所描述的暴君独裁者，他甚至还试图搞自由化，虽然持续时间不长。叙利亚“革命”已持续了18个月。其根源，与其说是国内反对派的最初行动（他们更多求助于非暴力运动，而非城市恐怖主义），不如说是境外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及“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协同行动。

因此，通过对一系列事件及其演进和结果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说，无论哪个国家，用“革命”一词来概括其抗议运动的性质皆有不妥。1979年的伊朗和1991年的苏联经历了真正的革命，人物、机构、内部关系、国际关系等一切都改变了，国运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阿拉伯之春”中的众多事件可都不是这样。

2011年春，在埃及，参谋总长和旧政权的情报部门首脑组成的新班子接替穆巴拉克掌权。一开始，统治阶层甚至没有一点变化，直到2012年年中举行总统选举，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当选。“新团队”（埃

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甫一处理政务，便立即重申要遵守之前签订的国际承诺，包括被相当一部分埃及民众仇视的《戴维营协议》。这看似是好消息，也仅仅只是继承中的小变化。而“新政权”掌权后，立即向其国际“赞助商”做出保证。

因此，对某些国家而言，阿拉伯“革命”的结果只是换了领导阶层，而新领导层在华盛顿的首肯下，搞了一场“柔性”政变。其间，新领导层借助民众的抗议浪潮，任其发展并善加引导利用。街头抗议行动的确是整场运动的重要源头，但突尼斯和埃及的起义只是被紧紧管控的假革命。其他国家（如利比亚和叙利亚），是现政权被武力推翻，造反者得到境外大量且坚决的支持，“土著”只起到次要作用。

由境外推动并一手导演的“革命”

与其他观察人士一样，我们也相信民众有挫败感，渴望获得更多自由，面对滥权异常愤怒以及想要结束这种状态。

尽管可以拿上述因素与军队（充满私下盘算的）中立来解释抗议运动的产生和成功，但冲击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此起彼伏，它们的“自发性”、同时性和来自国外的迅速坚定的支持令人起疑。我们回顾不同国家的事件，会发现种种有计划、有协调行动的迹象，这显示出国外的影响似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自2000年年中起，一些国外专家注意到不断有抗议运动发生。他们善于觉察民众的不满和期待，知道这可以为己所用，其手段就是操纵民意，让民众产生“不满和期待‘革命’”，而实际上民众的挫败感被用于达到其他目的。这一系列事件的爆发虽未经过精确计划，但已经酝酿、持续了数年。

对于这些“革命”的发生、发展和成功，美国、海湾君主国、欧洲都起到了主要作用。美国和海湾君主国有着明确的战略，欧洲只是追

随。

美国的战略

从传统意义上说，冷战结束后，华盛顿的北非、中东战略有四大基础：控制石油资源；确保地区市场；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主义和颠覆令武器扩散的伊朗政权。小布什总统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是第五个，也是最新的一个基础。

“9·11”事件后，美国惊讶地发现，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大部分民众对美国怀有刻骨仇恨，便试图了解个中缘由。众多研究成果给出了答案，其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第一点是美国无限支持以色列；第二点是美国支持腐败专制的阿拉伯政权，以阻止伊斯兰势力上台。

美国不可能在第一点上让步，但决定在第二点上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如果此举能够减缓恐怖势力对美国的利益损害及其侨民的伤害。于是，华盛顿不再反对伊斯兰势力执政，甚至帮助他们推翻北非、中东任人唯亲的腐朽政权。但伊斯兰势力必须答应美国的条件，遵照美国的安排，即如果伤害到以色列、海湾产油君主国的利益，则一切免谈。这是因为自1945年《昆西协议》后，海湾君主国一直确保着美国的能源供应稳定。为了换取美国的支持，伊斯兰政权保证与恐怖势力决裂，承认以色列，融入全球自由经济，为美国企业进入当地市场提供便利。

华盛顿的新立场被概括为：“如果阿拉伯人足够愚蠢，愿意生活在伊斯兰政权之下，那么好吧，我们就去帮助他们，如果这样有利于我们的安全与生意的话。”换一个更明确的表述，加上确信无疑的不屑，就是“给他们伊斯兰教法，我们拿石油！”。

华盛顿的另一个条件是确保军人在阿拉伯社会的作用。数年以来，美国鼓励并支持北非、中东国家的军队向“土耳其式”角色演变，

即军队不掌握政权（特殊情况除外），但需充任国家稳定担保人的角色，制衡伊斯兰势力，还要致力于地区稳定，不向以色列显示敌意。

该战略的优势因21世纪前10年的那场经济危机而得到了加强。对华盛顿而言，最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刺激经济，削弱对手（主要是欧洲）的竞争力，特别是在与中国日益明显的战略竞争中，绝对控制中东油源，可以减缓油气资源消耗大户——中国的经济和军工的发展势头。

于是，此战略被运用于北非，从摩洛哥到埃及，还运用于也门、叙利亚（敌视华盛顿，伊朗盟国，有一处俄罗斯的重要海军基地）。

让我们再看看巴林和沙特阿拉伯，两国油气储藏丰富，均有美国的军事设施，华盛顿对两国政府负有义务。两国的骚乱均遭严厉镇压，西方媒体也没有表现得大惊小怪。“阿拉伯之春”从未降临到起来造反的什叶派头上。在华盛顿的许可下，沙特阿拉伯应巴林之邀，派兵数千进行镇压。谁都没觉得有什么可指责的，特别是总部设在巴林邻国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对此一言不发。

海湾国家的目标

颠覆北非、中东国家政权，代之以伊斯兰或亲伊斯兰势力，除对美国有利外，对以产油位列前茅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海湾君主国也有好处。

虽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由于各自领袖的骄傲与自私，使得利雅得和多哈存在竞争关系，但两国也有相似利益。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扩展瓦哈比主义，两国均接受这种形式的逊尼派激进主义。提醒大家注意，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都是“基地”组织的重要金主，当然是非官方的。

打造一个逊尼派联盟，以对抗伊朗及其在伊拉克和海湾地区的“扩张”野心，比如伊朗所显示的武器扩散威胁。

不惜一切代价掌控政权，并确保其安全。如果仅靠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那么就需要依靠美国，但必须做出妥协。

还有一些次要原因——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同时报一报私仇。特别是要打击报复卡扎菲，这个疯狂的家伙时不时地、有理有据地指责产油君主国的过失。

欧洲人的混乱角色

与美国和海湾国家不同，欧洲人在支持阿拉伯“革命”方面既无战略也无特殊利益。当然，只要这种倒台可能发生且对民众有益，作为民主社会的欧洲自然乐见各地专制政权倒台，但这对于法国来说，并无任何战略好处。

各种因素使我们相信，以法英为首的欧洲人在阿拉伯“革命”中充当了“有用的傻瓜”的角色，或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美国和海湾国家的战略意图，或是因为他们盲目服从华盛顿和北约的命令，或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发挥作用并赶超华盛顿。如果是这样，就是最坏的情况，说明欧洲人愚蠢至极。显然，萨科齐总统领导的法国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投入了旺盛精力，却并未察觉自己的这种投入变成了别人的娱乐。伦敦是华盛顿的传统铁杆支持者，它可以接受的，对巴黎而言却不尽然。另外，从利比亚问题到叙利亚问题，如果说今天的法美英三边合作似乎很融洽，那也仅仅是因为巴黎全盘接受了美英伙伴的观点。至于德国，从它在叙利亚危机中做出的承诺来看，它好像也走上了与法国类似的危险道路。但在利比亚问题上，柏林则像罗马一样极其明智地选择了不参与。罗马在上述问题上均态度谨慎。

运用屡试不爽的颠覆与操控方法

阿拉伯民众似乎没有能力凭一己之力打倒专制政权，所以美国就“好心”送去了必要的援助，于是美国就能更好地引导、控制该地区了。

阿拉伯民众起义是被精心策划的。前车之鉴，前几年民众自发举行的抗议行动力量根本不够，需要加入专业元素。正因如此，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事件，整理出美国颠覆莫斯科盟国塞尔维亚、乌克兰、格鲁吉亚政府的战略、角色、方法和口号。“阿拉伯之春”中运用的所有技术，都在前南斯拉夫及东欧的“颜色革命”中使用过，具体而言包括号召公民进行非暴力抗议、支持非政府组织、发挥媒体的中心作用、实行政治施压等。

紧接着，被阿拉伯起义的煽动者控制的国际媒体、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等接过接力棒，民众运动需要什么响应就会有什么响应，形势非常有利。面对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道路，北非、中东民众蜂拥而至，却浑然不觉。最终，正如事实所显现的那样，这些国家和民众损失惨重。

因此，我们揭露美国战略的真实目的、解构其过程和阶段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有众多观察家和参与者还被蒙在鼓里，浑然不觉。

创造有利形势和条件

其实，追查“阿拉伯之春”准备工作的迹象并非难事，事情通常都有迹可循。美国通过三种模式，发动了一场“无法抗拒”的运动。第一种模式是，筛选并培训抗议运动的领导人。第二种模式是，鼓励活动分子建立网状联系，向“亲民主”运动提供支持。在这两种模式中，所谓促进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和美国的基金会起着关键作用。第三种模式是，炒作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的“内幕”，这也是引导民众最终倒向抗议阵营的因素之一。

筛选并培训抗议运动的领导人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确保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在全世界推广针对未来精英的“授权”（Empowerment）项目，即寻找、接近、培训并支持那些未来可能会在原籍国为维护美国的政治或经济利益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人。[5]这个项目不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负责，而是由国务院、商务部、各大学、某些职业协会、基金会等相关机构负责。项目的运作非常专业，有人密切跟踪被选中者，与之“保持联系”，以确保华盛顿在未来能够准确掌握目标国家的社会情况。

大约2005年之后，阿拉伯国家成为美国的重要目标，阿拉伯世界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分化组合。美国在北非和中东国家“招募”的人数也随之大大增加。其中，“中东伙伴关系倡议”是最佳例子之一，该项目主要“招募”马格里布地区的大学毕业生。[6]美国的这项举措并非只针对新兴国家。研究影响力战略的杰出学者克劳德·雷维尔在其著作《法国：一个诸多影响力之下的国家？》（2012年出版）中称，2011年法国媒体披露了美国驻法大使馆实施的“蚂蚁”行动，即在法国的城乡接合部，圈定“来自移民家庭的青年”，再邀请其中翘楚赴美。[7]

策划“阿拉伯之春”的过程中，多亏了专门的非政府组织，其培训工作非常具有实战性。把穆巴拉克赶下台的“4月6日青年运动”的组织者就曾接受过名为“非暴力革命”的培训。培训是非政府组织“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CANVAS）在塞尔维亚组织研讨会期间搞的，而该中心正是塞尔维亚“抵抗”组织（塞语为Otpor，由塞族活动分子斯尔贾·波波维奇领导）的分支。在美国支持下，“抵抗”组织在颠覆米洛舍维奇政权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颠覆米氏政权后，“抵抗”组织成为全球非暴力行动的培训中心。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中，我们都可以找到CANVAS“顾问”的踪迹。[8]

2011年1月，“4月6日青年运动”的大学生在开罗街道抗议时，打出了CANVAS的专用标志。一度因言获罪的埃及“知名”博主穆罕默德·阿

德勒承认，他也在2009年夏接受过CANVAS组织的培训。

贝纳尔·欧文在为自己组织撰写的《公民社会，特洛伊木马？》一书的序言中写道：“20世纪70年代后，一切就都准备妥当，细节完备。针对活动分子的国际培训甚至包括对来访的外国人应该说什么、持何种态度。”[9]与其说这是培训，不如说是对思想的格式化。[10]

鼓励活动分子建立网状联系，向“亲民主”运动提供支持

自2007年起，“自由之家”[11]、“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等美国非政府组织就和CANVAS共同组织会议。在“阿拉伯之春”中表现活跃的博主和舆论领袖中的大部分人都参与过此类会议，通过他们，美国在北非、中东社会播下了“民主”的种子。

比如，2008年美国国务院在摩洛哥组织了一场大会，希拉里·克林顿受邀出席。大会还邀请了利比亚、埃及等马格里布国家人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其中就有埃及抗议运动的诸多领头人，以及后来成为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驻欧洲代表并于2012年10月当上利比亚总理的阿里·扎伊丹。

同年，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新设了一个接待突尼斯人的“公民社会”办公室。传统上，驻外使馆不与当地民众有直接、公开的联系，但华盛顿跨越了红线，却未遭到突尼斯当局的反对。

正如萨米·本·加尔比亚指出的，[12]“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1月21日的‘互联网自由讲话’中，[13]将互联网自由列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发表该讲话的前两个月，即2009年11月，希拉里宣布推出公民社会2.0倡议，[14]帮助全球独立机构使用数字技术。为此美国拨款500万美元给中东、北非的试点项目，以增强新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互联成网的能力”。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DIA）在谷歌公司和位于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共同组织的“2010年互联网自由”大会期间，还推出了“中东、北非博主网络”倡议。NDIA是“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NDI）的“分支”。NDI是支持美国民主党的智库，虽然它宣称自己是“非党派”的，但其由美国政府创立，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支持，“以便为那些提供捐助促进发展中国家民主的组织牵线搭桥”。

有了精细的战略和无懈可击的计划，支撑“革命”的基础设施已就位，为2011年冬运动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万事俱备，只欠“触发因素”，在火药上点火。

维基解密：真披露还是假泄露？

克劳德·雷维尔在其专著《法国：一个诸多影响力之下的国家？》中认为，“阿拉伯之春”事件发生的前一年，维基解密泄露的美国外交文件，对该战略的实行有促进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泄密不是该战略的组成部分，那它也是一种“火力准备”。

维基解密创始人兼领导人阿桑奇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2011年4月16日，他在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说：“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个触发因素，那就是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有关这些国家的外交电文。当地报纸用阿拉伯文持续报道，如黎巴嫩的《阿克巴尔报》；或者通过与维基解密类似的网站，如突尼斯的名为‘突尼斯揭秘’的网站。这些电文不仅描述了本·阿里政权的腐败，还充分证明了它极度脆弱：很明显，大家知道了本·阿里政权与军方有冲突，美国并不会支持它。这些内容向突尼斯的行动分子、军队以及本·阿里的身边人发出了强烈信号，同时也向邻近地区发出了强烈信号。”

维基解密披露美国外交电文中的秘密信息“阻止”了美国继续公开支持独裁者，因为恰恰是美国大使发出的电文对独裁者们提出了质

疑。“突尼斯的反对派将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和法文，登载在nawaat.org网站上。特别是那些将本·阿里政权描述成不折不扣黑手党的电文，让突尼斯人私下议论的和日常生活中亲身经历的事情，通过别国外交官之口（当然是在本非公开发表的电报中）得到了确证，这对动员民众极具效果。在恐惧之墙崩塌过程中，该因素很重要。”[15]

据阿桑奇所言，自此，“中东便犹如星星之火”,[16]逐渐形成燎原之势。

诉诸行动的模式：操纵民众和国际舆论

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煽动者而言，只创造有利的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确保运动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确保成功的操纵和颠覆技术便粉墨登场了。

十分有效的非暴力公民行动战术

正如贝纳尔·欧文解释的那样，美国在“阿拉伯之春”中运用的新战略是非暴力行动，也称“公民自卫”。该行动被巧妙地、有力地组织起来，获取境外大量援助资金，而外界却很难查实资金的确切规模和流入路径。[17]

对此种战略颇有研究的道德与政治科学研究院的社会学家让·贝希勒尔还对“公民自卫”的概念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公民自卫”是由创立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普首先提出的，他还为此撰写了不少专著。简而言之，“公民自卫”在对内夺权、对外抵抗侵略方面相当有效，是一整套非暴力战略战术，通过故意不遵守法律，造成经济活动整体停滞，行政部门拒不服从命令，士兵与警察犹豫不决等步骤实施。“公民自卫”与民主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该

战略首先服务于维护民主，或者当民主原本存在却遭威胁之时拯救它，或者当民主尚未建立时推广它。[18]

对吉恩·夏普而言，“非暴力行动是一门技术，可将冲突比如军队、代议制政权卷入的战争和游击战引向正确方向。它利用心理学及社会、经济和政治手段，在不同条件下，指向或善或恶的目标。它被用于颠覆政权或支持政府”。这个美国人阐明了他所希望使用的专用术语：“非暴力行动”、“非暴力斗争”或“人民权力”。他还描述了这种技术的运作方式：“我们不主动告诉冲突国家民众该如何行事。当他们询问时，我们才提供我们的理解和知识。我们强调严肃认真学习、独立思考和坚定意愿的重要性。”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所长、曾任美国陆军上校的罗伯特·赫尔维非常活跃，他说：“军事行动需要的钱比非暴力行动多得多，但后者仍需用钱。后者要有用无线电制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要有培训能力，还要给行动分子钱财让他们养家。”他特别提及：“必须说服某些军人和公务员，让他们相信投入我方阵营对其有利。当他们确信我们即将获胜时便会投诚。”[19]这番话再一次解释了突尼斯和埃及两国军队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媒体：扭曲事实的专家

国际媒体是“阿拉伯之春”运动的主要回应方，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正因为有了国际承认，抗议运动才能在本国得到巩固，参与者才相信全世界都在盯着和支持他们。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国际媒体其实只是负责“定调”的英美和阿拉伯地区的电视台，如以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半岛电视台（卡塔尔）为首的电视媒体，以及BBC（英国广播公司）和阿拉伯电视台（沙特阿拉伯）。这些媒体所属的国家恰恰是在阿拉伯“革命”中获益最多的。

在这份国际媒体名单上，没有法国24台和TV5（全球性的法语电视网）的踪影。法语媒体与其他地方的媒体一样，对“国际媒体”播放的新闻及画面，只是跟进和接力报道，一般都不加分析。这种亦步亦趋日益严重，因为讲法语的“大牌记者”本来就少，并且被安排在盎格鲁-撒克逊记者中间，由于不被重视，也就无法逆美英同行强加的“主流”而动，况且他们也从未对这些媒体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实际上这些媒体在西方及全球播出的信息绝对不可信，这些信息被严重误导、扭曲、剪接。例子不胜枚举，本书将涉及几例。

比如，在叙利亚冲突中，“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几乎是西方媒体现场信息的唯一来源。这一设在伦敦、观点明显有失公允的组织接受的是阿拉伯媒体的资助，是亲穆兄会的宣传机构。报道中受害者的数量都是由它提供的——通常极不可靠，谁搞了大屠杀也是它说了算。

互联网和社交网站推波助澜

对于突尼斯事件和埃及事件，人们屡屡提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站（脸书和推特）的作用。谷歌的瓦埃勒·古奈姆于2011年2月初在CNN上证实了它们的重要作用。他的话被诸多网站转载：“我想找一天去见见马克·扎克伯格，谢谢他……我是以埃及的名义……这场革命起自线上。这场革命起自脸书。”

但萨米·本·加尔比亚认为，“源自华盛顿的互联网自由‘经文’只是为地缘战略日程打的掩护”。数字“领地”便于国际公民社会通过在网络上进行有利于抗议者的动员来实施长期干涉。[20]

克劳德·雷维尔认为，10多年来，美国国务院公开依靠互联网和社交网站来推进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为此，它“与互联网寡头，特别是谷歌和脸书”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能够发动阿拉伯革命，似乎多亏了社交网站。这些网站的老板似乎与美国政府保持着毫不避讳的关系。”华盛顿利用这些新媒体来打击对手。“就拿伊朗的例子来

说。2009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朗审查制度受害者法案》。据此于2009年向政府广播委员会拨款3000万美元，资助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法尔达电台和美国之音用波斯语向伊朗广播；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伊朗电子教育、交流、媒体基金，即协助绕过互联网审查；还向国务院拨款500万美元，用于撰写关于2009年选举后伊朗政权侵犯公民权利的报告。选择这个时候出台这些措施很重要，因为距离6月伊朗大选和抗议骚乱不久。”

境外压力与干涉

鉴于“间接”或“自发”行动力量不够，或是目标国政府针对美国的战略试图采取反制措施，华盛顿当局便出面干涉，为阿拉伯地区“革命”的顺利进行扫清障碍。

2011年2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普·克劳利上传了一条关于阿尔及利亚事件的推特文章，文中写道：“阿政府取消紧急状态的决定是积极的，但它应进一步提高自由度，以显示真正的改变。”一个外国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向另一国下指令呢？显然是美国在对此事件施加影响。请注意，该文章被媒体以及众多网民转发！在中东、北非的一系列事件中，克劳利狂发推特，大言不惭地表明其支持抗议运动的态度。克劳德·雷维尔认为，施加影响力的行为如此公开，以至我们将其视为针对那些“犹豫不决”的政府稍加掩饰的某种威胁，意思是“如果我们愿意，就可以发动民众”。

美国人及其配角盟友在阿拉伯“革命”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并不属于秘密行动范畴。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可以看到美国中情局的黑手就大错特错了。冷战期间，该情报机构当然是创造并发展了此类手段，用于对抗苏联的宣传，建立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就是首批行动。但今天，美国中情局致力于情报搜集以及针对危害美国安全的恐怖分子的行动。而阿拉伯“革命”的战略是由各智库提供的，指挥工作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参与者是各基金会和以掩护身份活动的非政府组

织。曾经东西方对抗时期所打的密战——属于情报机构的那种，不再由情报机构独享，“行动”自此导向另一层次。

灾难性的后果

当检视阿拉伯“革命”的真实结果，我们会惊讶于其所致的恶果，这既体现在发生“革命”的国家，也体现在地区与国际环境。与这些比较，独裁者倒台的好处相当有限。

我们列出一张经历过“革命”的国家目前民主与自由状况的清单，对“革命”的后果相当有说服力。最好的情况是，专制政权已经倒台，国家却无任何变化。通常的情况则是局势恶化：人权状况、妇女地位退步，针对非穆斯林少数族群的威胁增加，宗教场所被毁，等等。主要原因是西方支持的伊斯兰势力上台，一些政权毫不掩饰他们想搞伊斯兰教法统治的野心。

另外，“革命”还导致安全局势恶化。如武器散失；法治遭弃，以伊斯兰教法代之；警察部门无序，公报私仇；罪犯出狱……众多因素使“阿拉伯之春”国家的民众生存日艰。叙利亚爆发了内战，国内情况最糟，利比亚次之，在境外势力煽风点火、火上浇油下，敌对的各派、各部落、各族进行着混战。

在或近或远的将来，在历经“革命”的国家中许多难题有沉渣泛起的危险。我们认为，这些由境外势力鼓吹、控制的“傻子革命”会导致六大危险：再发“革命”或“反革命”；执政的伊斯兰政权激进化；涉及国家安全的各派发生冲突；一些国家解体；西非长期动荡；大国间关系紧张加剧。

再发“革命”或“反革命”

经历过阿拉伯“革命”的国家中，一部分民众迟早会意识到自己被算计了。这很可能成为反作用力，再次引发骚乱。透过这些国家持续的或似乎已经重启的抗议，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些许迹象。或是因为部分民众认为自己的行动被误导至其他方向，或是因为一股反弹力量试图纠正“革命”中的过激方式——特别是强行推进伊斯兰政权的措施和法律。瓦利德·法里斯注意到了这一点，曾说道：“未来，‘阿拉伯之春’或者说‘阿拉伯-伊斯兰之春’将回潮。……今天，阿拉伯和伊斯兰公民社会已经组织起来，学着自成体系并重组其网络，以便对抗伊斯兰势力的抬头。”[21]

执政的伊斯兰政权激进化

在所有涉及“革命”的国家，发展进程几乎一致，均是由“阿拉伯之春”发展到“伊斯兰之冬”，即伊斯兰激进主义政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各国的状况大同小异：“自由派”发起抗议运动或许推翻了独裁统治，但很快受到伊斯兰势力和萨拉菲分子排挤。[22]后两派在“革命”中看似只起很小作用，但它们组织有序，懂得如何将“革命”引至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尤其是穆兄会，知道耍滑头，跟西方人说他们爱听的，言必称“民主”“公民社会”，甚至打“萨拉菲分子牌”，以显示自己是两害中较轻的一个。

目前，伊斯兰势力相当低调谨慎，但又会持续到何时？正如吉勒斯·凯佩尔所言：“这些激进组织的成员几乎全部干过地下工作，他们认为民主是亵渎宗教的终极之罪，因为它将真主安拉的无上权力转给了人民。”[23]几乎可以确信，一旦他们腾出手来，将会调转矛头。

2012年年中，在埃及，一部分长期忠于穆兄会的军人将力量的天平扳向反对坦塔维元帅和总参谋长萨米·阿南的方向，致使两人提前退休，降为国家领袖的“顾问”。瓦利德·法里斯担忧地说：“埃及伊斯兰势

力大获全胜，可能形成一个从加沙到摩洛哥的巨大伊斯兰势力空间，好在埃及自由派尚未放弃反抗。”

利比亚是西方在军事和金钱上投入最多的国家，却正在成为“阿拉伯之春”后最反对西方的国家。“基地”组织和“圣战”组织相互勾连管治这个国家，利比亚国内大的部落互有离心倾向，少数族群（非洲黑人和阿马齐格人）起来造反。“未来，我们可能要面对一个北非版的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

2011年9月中旬，伊斯兰国家爆发激烈反美示威，冲击着阿拉伯国家的“街道”，这是先兆。当时，美国制作的一部嘲笑先知穆罕默德的短片《穆斯林的无知》在网上传播，被认为是对穆斯林的可耻挑衅，但那只是一些住在美国的极端分子的私下行为。伊斯兰势力的这种激烈反应，显示他们在等待一个机会，来续推他们的价值观、表达对西方的仇恨。美国驻班加西领馆遭袭，致使4名美国工作人员死亡。这应当是对华盛顿的当头棒喝，令其检讨其战略的合理性。

涉及国家安全的各派发生冲突

2011年春，阿拉伯国家的“革命”主要依靠警察进行镇压，各国军队则保持中立，尤其是突尼斯和埃及两国。这为军方赢得了民心和尊重，并且在事件后提升了形象。

镇压“革命”、负责国内安全的力量和机构首当其冲。“长期以来，这些政权利用警察控制民众，维持统治，警方被视为统治阶层的武装臂膀，象征着当权者的压迫和暴力。”[24]在镇压行动中，警察驻地、营房遭遇攻击、被摧毁，武器被抢，其中一些人还丧了命。民政管理部门和法院也常常遭遇同样的攻击，无数档案被焚毁。监狱也未能幸免，罪犯和恐怖分子重获自由。更严重的是，不少警察害怕遭报复，就玩人间蒸发，没有返回工作岗位或干脆辞了职。警察和司法部门变

得极度无序，致使犯罪率飙升。特别是在突尼斯，军队迟迟不肯介入，犯罪问题更严重。

军方将民众的攻击引向当地的警察，称警方应为所有的恶果负责（该指控并非总无理），但警察觉得自己成了替罪羊，因而警方和军方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人们观察到“黑衣人”和“绿衣人”之间关系日益紧张，这对于国内安全稳定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

一些国家解体

阿拉伯“革命”还导致另一恶果，并可能持续扩大，为北非、西非、中近东所有具有离心倾向的势力提供便利，无论他们是要搞身份认同，要自治，还是闹分离主义。这一演变似乎正好让某些境外势力遂了愿，他们就是想按自己的利益来分割该地区。其实，1995年有关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代顿和平协议》就属此类，活生生将南斯拉夫分割成六部分。

我们正在见证类似的分割战略在中东上演。该战略美国已经计划了很久，我们可以在拉尔夫·彼得斯所绘的地图上看到，它将美国臭名昭著的“混乱重建”理论以及新保守主义者意图分化重组中近东地区的想法付诸实施。[25]

但是，美国这些措施不但不能解决中近东地区的问题，还很可能引发各族之间的冲突，成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得到较好控制的矛盾重新泛起的温床。

西非长期动荡

最令人担心的因素之一是北约军事干涉利比亚内政后，整个萨赫勒-撒哈拉地区陷入动荡，马里安全危机就是直接后果，其他危机将接

踵而至。相比来说，一向局势不稳的阿尔及利亚现在看起来像是一座稳定孤岛，却恰恰反衬了地区形势已经恶化到了何种程度，恶化的地区形势直接冲击了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的安全。

法国毫不迟疑地进行军事干预，灭掉了卡扎菲，令“圣战”势力获益。法国还呼吁国际社会对巴沙尔也照此办理，却眼睁睁看着马里被呼啸成群的狂热分子和罪犯肢解，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然而，该地区形势的变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对法国的国家安全和侨民安全是如此，对中东地区的安全也是如此。

大国间关系紧张加剧

阿拉伯“革命”的最后一个后果是叙利亚危机早已导致主要大国之间对峙。华盛顿及其欧洲、阿拉伯盟友希望颠覆巴沙尔政权，但遭莫斯科和北京的反对。因为俄、中与叙利亚长期保持紧密关系，巴沙尔的倒台有损俄、中利益。两国还认为，在关于利比亚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26]的解释问题上，被西方愚弄了。

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觉察出美国的战略有将世界置于动荡之中的风险，美国越发针对两国在北非和中近东的利益，这很可能对全球平衡产生灾难性的后作用力。俄、中两国由此判断，华盛顿的敌意未有丝毫减缓，这也导致俄、中采取反制措施。相关人士称，叙利亚引起了一场新冷战。

*

绝大多数国际媒体和观察家出于幼稚的激情，将极度邪恶的所谓阿拉伯革命视为北非、中东民众反抗暴政、寻求解放的象征，称之为21世纪的重大事件。但我们认为，应当更客观地看待、深入理解该现象，不放过任何一张“底牌”，抓住鲜亮外表下所掩盖的另一面，这才是情报专家特有的分析事物的方法。

实际上，对阿拉伯“革命”这一让西方人无比着迷的现象的判断，通常是基于对事实的错误认知上的，因为这一表面现象让人情绪激动，易于受媒体的操控。这些媒体实际上并不是中立的，都带有后殖民主义的色彩。

因此，观察家应当擦亮眼睛，让大家看清楚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境外势力煽动和操控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而非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利益着想。必须尽早揭示这一秘密，因为大家迟早都会理解我们是被欺骗的。在突尼斯、利比亚和其他地方，实际上许多人早就意识到之前的状态的确令人不满意，但“阿拉伯之春”后的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这些国家，民众受够了腐败的政府、任人唯亲的风气，渴望有更多自由，更盼望西方式的民主或更高的生活水平，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经济凋敝不堪；民众不仅没有得到更多自由，反而处处得遵守僵化的伊斯兰教条；由于行政和强力部门失序，罪犯被释放，社会变得更不安全；如果爆发了内战，情况或许会更糟。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部非同寻常的著作。

之所以非同寻常，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它指出了将“阿拉伯之春”视为自发事件、最终成功、作用积极、有利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社会演进的主流思想的错误之处。本书旨在揭开阿拉伯“革命”神秘的面纱，告诉大家它的运作方式、影响和结果。

其二，为此次集体思考做出贡献的女士们与先生们，来自五湖四海，水平高超。我们召集了来自阿尔及利亚、比利时、科特迪瓦、埃及、法国、马里、突尼斯、叙利亚8个国家的20多位学者，其中有政界和外交界的人士，有情报官员和记者，有经济学家和大学教授。他们不管是偏右还是偏左，都为此付出了辛苦。读者们将发现，为了还原、剖析这些复杂事件，法国情报研究中心（CF2R）运用了所掌握的所有知识，本书却不一定全涵盖。在我们看来，只有观点不同、视角多元，才能使大家细致地理解该现象。

第一部分，研究并解构发生在马格里布和中东的事件，包括：专家对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叙利亚、巴林的分析；伊夫·博内领导的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CIRETAVT）组团亲赴现场记录，萨伊达·本哈比莱斯等评估者的亲历见闻。虽然大家亲历的是2011年，此后事件的发展可谓飞速，但我们还是刊登全文。这让我们了解到利比亚和叙利亚“革命”的未来发展和恶果的苗头。作为对利比亚事件的分析补充，驻当地记者的文章反映了在事件发生的最紧要关头，民众和观察家也未能识破的那些操控。

第二部分，揭示境外势力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自构思“革命”到产生结果的那些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塔乌费克·布尔古等人披露了美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的操纵伎俩，以及各种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社交网站和国际媒体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第三部分，评估“阿拉伯之春”的后果，不管是早已显露出来的，还是正在逐渐显现的，涉及马里、撒哈拉、萨赫勒多个地区以及“基地”组织、基督教少数族群。读者们将了解到其结果既不积极，也不鼓舞人心。

读者们将在书中读到揭露美国行为的内容，但本书的各位合著者均不持反美的立场。尽管这样，几乎所有合著者都认为，美国的战略、方法及其令人起疑的盟友，皆有悖于西方所宣称的民主原则，确实威胁到国际安全，仅仅是因为美国只顾及本国——这个民主国家的利益。

其中一些作者描述了美国为实现称霸世界的目标而长期进行的自私自利的算计。在大西洋彼岸，确有那么几个小圈子的人有这种野心，但我们还是注意避免导致阴谋论的论调，就像“9·11”事件后类似论调满天飞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每位作者都要提出事实、谨慎论证。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和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要感谢所有参与的作者，虽然这个项目政治目的不那么明确，逆着形式化思

想的潮流而动，但他们依然充满热情。感谢这些作者的信任、勇气和坦率。

我们试图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以便读者在理解这些欺骗了非洲和阿拉伯民众的重要现象时，不被国际行为体的战略弄得晕头转向。

我们的分析向正统思想提出了质疑。这种正统思想就是将这些事件想象成田园牧歌式的行动，将世界的演变想象成总是向积极方向运动的进步。在此案例中，这种思想大错特错。一些人必须敢于说出来，揭露它。

埃里克·德纳塞
2012年10月

---

[1] Amin Allal,《Enjeux politiques en Tunisie.Des protestations de 2008 à la fuite de Ben Ali》,*Revue Moyen-Orient*,n°10,《Révolutions.Le réveil du monde arabe》,avril-juin 2011,p.27.

[2] Philippe Droz-Vincent,《Regard sur les sociétés civiles dans le monde arabe》,*Revue Moyen-Orient*,n°10,《Révolutions.Le réveil du monde arabe》,avril-juin 2011,p.8.

[3] Narrimane Benakcha,《Les révoltes arabes:convergences et hétérogénéités》,*Revue Moyen-Orient*,n°10,《Révolutions.Le réveil du monde arabe》,avriljuin 2011,p.54.

[4] 2011年之前，叙利亚各族群和平相处，宗教关系友好。穆斯林、阿拉维派、德鲁兹人和基督徒相处融洽，甚至经常居住在同一社区。——译者注

[5] Cf.Eric Denécéet Claude Revel,*L'autre guerre desÉtats-Unis.Economie*:*les secrets d'une machine de conquête*,Robert Laffont,Paris,2005.

[6] Claude Revel,*La France*:*un pays sous influences*?,Vuibert,Paris,2012.

[7] *Ibid.*

[8] http://www.canvasopedia.org/

[9] in Bernard Owen（dir.）,*La société civile,un cheval de Troie*?,Studyrama,Paris,2012,p.14.

[10] Eric Denécé,“Le formatage culturel par le Social Learning”,in Ludovic François（dir.）*Business sous influence*,éditions d'Organisation,Paris,2004.

[11] “自由之家”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由美国中情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领导，接受美国和卡塔尔政府的资助，重要成员包括布热津斯基（2017年逝世）和新保守派的拉姆斯菲尔德。——译者注

[12] http://nawaat.org/portail/author/sami-ben-gharbia/

[13]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35879.pdf

[14]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9/nov/131234.htm

[15] *Ibid.*（C.Revel,op.cit.）

[16] *Ibid.*

[17] *Ibid.*

[18] Jean Baechler,《Défense par actions civiles,ONG et démocratie》,in B.Owen（dir.）,*La société civile,un cheval de Troie*?,*op.cit*,p.19.

[19] Bernard Owen,《La régle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agissante et ses effets》,in B.Owen（dir.）,*La société civile,un cheval de Troie*?,*op.cit*,p.67.

[20] Bertrand Simon《Les nouveaux médias:du pain béni pour les ONG》,in B.Owen（dir.）,*La société civile,un cheval de Troie*?,*op.cit.*,p.200.

[21] 《Entretien avec le géopoliticien Walid Phares》,*Valeurs actuelles*,28 juin 2012,p.41.

[22] *Ibid.*

[23] Gilles Kepel,《Révolutions arabes:la tectonique syrienne》,*Le Figaro*,24 août 2012.

[24] N.Benakcha,*op.cit.*,p.58.

[25] Cf.http://www.etudes-geopolitiques.com/editorial_contents5.asp

[26] 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是联合国安理会于2011年3月17日通过的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利比亚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译者注

第一部分

分析与解构各国的“革命”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缘由和目的

我2011年3月着手撰写《突尼斯革命被掩盖的一面——伊斯兰主义与西方：高危联盟》一书。它于当年9月，即2011年10月23日那场选举欺骗前的一个月在突尼斯出版，又于2012年1月在法国推出。该书是我作为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在某些媒体称为"茉莉花革命"[1]期间的证言，也是我作为哲学学者在塞浦路斯外交部下辖智库——迪达洛斯地缘政治研究所担任所长之一时的分析和看法。在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大国竞争尤其是涉及美国问题方面，我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我在书中论述的观点：从2010年12月17日至2011年1月14日，这场真实存在于突尼斯的社会大爆炸，尽管有其客观的内生因素，但并不是民众自发的革命，而是有计划的阴谋。它是由美国政府的战略谋士们指挥协调的，其中还有西方各大媒体的积极帮助以及其他一些媒体或观察家的幼稚参与。后一类媒体或观察家不会采取其他立场，只是站在渴望民主、勇敢对抗代表着"世上最血腥独裁统治"的突尼斯安全部队的民众一边。行动的目的何在？就是一股脑儿地更换执政的政治精英，更确切地说，换下民族主义的世俗精英——他们是后殖民时代的遗产，代之以新的统治阶级——伊斯兰主义者。

正如我将要论述的，美国人在处理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上并不总能显示出大智慧，却真真切切地在"民主之春"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且不只是训练培养了一大群渴望自由的全球化的年轻网民。但仅仅靠美国人按下按钮，还不足以在世界某个地方发动革命。爆发革命的社会，如果不存在爆发革命的深层次原因，且革命未能回应革命者的关键需求，那么革命就不会成功。已经维持了23年统治的突尼斯政权在

23天里轰然倒塌，正是存在如下的一系列原因：有文凭而无前途的西方化的青年，与亮丽的经济增长不相匹配的全面贫困化，瘟疫般蔓延的腐败，受到禁锢的言论自由，全面缺失的政治辩论，无限期拖延的民主。

我迅速反应过来，这一成形于奥巴马政府的计划不只涉及突尼斯的本·阿里，还将冲击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袖。他们长期执政，不再符合世界第一强权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这一“革命的”和“民主的”接班计划名为“大中东民主计划”，其设计者也是决定入侵并摧毁伊拉克的那些新保守主义者。因此，我称奥巴马为长着鹰派翅膀的鸽派，称希拉里·克林顿为“阿拉伯之春”的燕子。出于与设计者相同的原因，我认为，“阿拉伯之春”并非始于2010年的突尼斯，而是2003年的伊拉克。

正如我书中所言，“阿拉伯之春”的性质会迅速且自然而然地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而我绝大多数同胞仍相信他们搞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外国观察家议论说阿拉伯国家即将出现世俗的民主政权，在该政权内部，伊斯兰“温和派”不占多数，但会像德国、意大利或法国的基督教民主派那样发挥作用。正当此时，我指出，伊斯兰运动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即使在50年任人唯亲却也较开明统治时期里取得的现代化进展也将明显缩退，神权加极权的政权将振聋发聩般相继登场。突尼斯就是如此。至于其他阿拉伯国家，我坚称，它们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持续的无政府状态，部落陋习回潮，因宗教信仰冲突将发生内战，贫困化加速，主权丧失，美英将全面控制从独裁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国家能源。

我的这些预言曾被认为是愚蠢可笑的，但就在“阿拉伯之春”发轫不到两年后一语成谶。而且现在只是一个长期进程的开始，伊斯兰神权统治正在该进程的末端等待着。只要发生过“阿拉伯之春”的地方，就只会留下废墟和眼泪。利比亚有5万人丧生，“自由派”才刚刚赢得首次“自由、透明”的选举。但是，这恰恰说明了该国已四分五裂，与伊拉克的结局无异。利比亚不再是新闻头条，不是因为一切进展顺利，

而是因为有人想特意掩盖事实。叙利亚还在英勇地抵抗着颠覆者、恐怖分子、伊斯兰主义者、当地叛徒和外国雇佣兵。这些雇佣兵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以色列的要求，由卡塔尔、土耳其、英国和美国豢养的。也门则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逊尼派、什叶派两派互相残杀，饥荒降临。埃及目前由穆兄会掌握，他们将在10年内抹去7000年的历史，就像他们的同门兄弟突尼斯伊斯兰主义者所做的那样。

对于“茉莉花革命”的自发性质以及这场“革命”与生俱来的伊斯兰化风险，没有多少欧洲政治家、专家或记者提出保留意见。所有人都故意掩盖上述伊斯兰化风险，其站不住脚的借口是“革命”运动没有政治或意识形态领袖，抗议者既没包头巾也没留大胡子，没喊出任何宗教或反西方的口号。个中缘由是，伊斯兰主义者的确接到指令，被要求不显山露水，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避免惊动西方舆论，也是为了让外界全面、不可逆地同情这场“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我研究伊斯兰主义已有30年，从2010年12月第一周起，我就认识到有伊斯兰主义者在幕后操纵“革命”，他们得到了美国、英国和卡塔尔的默认支持。因此，我将抗议者称作“一群狂热的人”，竭力替当时的政府辩护，试图警告突尼斯人：若现政权一倒台伊斯兰势力便会立即登场。

在法国，少数清楚内幕的大西洋主义者知道美国正在实施自己的计划，什么也阻止不了美国人。这一小撮人，正如他们在1945年后通常所做的那样（而且比任何时候都对法国的利益无动于衷），强烈地维护美国帝国的利益，以换取在其他方面的利益。大多数追随者，或是出于革命浪漫主义，或是亦步亦趋，或是因为幼稚，或是出于无知。意见领袖和追随者就这样凭空捏造出“茉莉花革命”的神话，之后再兜售“阿拉伯之春”的谎言。从“茉莉花革命”到“阿拉伯之春”，用词发生转变，使之更带有外国情调，更具有文化色彩。这种转变表明，他们有意将一场社会政治的、涉及经济的、一地一域的、孤立的危机搞成一场地缘政治地震，冲击之前筛选出的阿拉伯国家，以便未来30年内重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正如从2011年起我一直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也正如埃及《金字塔报》创始人、曾任纳赛尔顾问

的穆罕默德·哈桑宁·哈伊克尔后来断言的，这是一个新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即便是哈伊克尔这样的智者，也未从一开始就洞察这些“革命”的幕后企图。

在这一波政治、媒体喧嚣中，少数严肃、敏锐、称职的声音都立即被大媒体滤除，很可能是美国的原因。相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些“专家”和“春天学学者”混在这股本应作为释疑解惑者的人潮中，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到底该上哪家电视台，该回复哪家报纸的约稿。发出首批诚实之声者，就有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的主任埃里克·德纳塞。他在《论坛报》的访谈中坚称，在突尼斯，“民众确实有对自由的渴求，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将向更民主的方向迈进。我不相信这些经过多年准备的‘革命’是自发出现的。早在2007年或2008年，‘自由之家’‘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等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或CANVAS便组织过各种会议，如今一些十分活跃的博主以及这些运动的领袖大部分都参加过会议。正是这些会议给他们灌输了民主思想，为这些‘运动’的出现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从本质上看，这些革命与苏联政变、塞尔维亚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以及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都属一类……这一次，无论是在突尼斯还是在埃及，军队首次不与警察站在一起，而且国际舆论始终在关注着这些运动。更为关键的是，就在这些运动发生的前几周，无论是突尼斯还是埃及的军方最高层都访问了其重要金主华盛顿，他们都接收到了可以推翻现政权的信号。他们将不再忍受本国权力集团的掠夺。所谓革命，只不过是领导层的更迭：新的领导层利用民众的抗议风潮，在获得华盛顿的默许后发动的‘柔性’政变”。[2]

作为一名已经意识到正在失去许多东西的突尼斯公民，这不包括我的大使身份（在本·阿里被迫出走前我就已经主动辞职），德纳塞的上述一席话令我这个一度产生自我怀疑的哲学学者大获慰藉。有时我甚至被悔恨深深控制，认为自己错了，因为我逆着这股激情澎湃的“革命”潮流而动，错过了与“世界灵魂”的伟大约会。作为黑格尔的信徒，我未曾看过拿破仑坐在马上，代表着这一灵魂走向“均质的普世国家”，从而实现“历史的终结”！某些时候，我再无法忍受自己在媒体中

出现的形象：一个毕生都致力于对抗审查制度、争取自由、反对专制保卫民主、反对蒙昧主义保卫启蒙主义的男人，到头来却像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一个道德上应受谴责、政治上属于自杀行为的事业服务。正是德纳塞的话，接着是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的首份公告，印证了我作为孤独的哲学学者的最初直觉。自此，即使冒着“世人皆醉我独醒”且醒得非常早的政治风险，我也坚信自己有道德义务、有责任去对谎言说：“看，这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是“网络异见分子”还是“网络奸细”?

选择恰当的用词及概念，是客观、理性分析必备的条件。大众传媒是这样表述的：“网络异见分子”懂得使用脸书和推特这类新的传播技术，强调自己的公民行为，绕过审查手段，利用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试图在伊斯兰土地上打破独裁、建立民主。其被赋予以下品德：英勇无畏、尊重人权、热爱自由和民主等等。而“网络奸细”呢？其自愿为外国服务，对脸书的归属感强于对本国的归属感。他们是全球化的人物，吸收了其他族群的文化价值观，表面上的世界主义和个性解放，但依然无法掩盖其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异化。

严格来说，革命是什么？从经典意义上讲，革命是自发的、广泛的起义，民众通过起义显示出推翻现政权、代之以革命政权的意愿和决心。那么，何为网络革命或“2.0版革命”？它是通过中介人的间接革命，是一场虚拟的动员，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意识或潜意识，然后再冲击现实世界。它的发展分三部分，涉及三种人——协调人（领袖）、传递者（分包商）、执行人（消费者），或者分为高级设计师、工长、工匠。无论是谁，或无论哪个国家，都能承担其中一项功能，或从此进程的任何步骤介入。这就是“茉莉花革命”所具有的特点，从此角度而言，“茉莉花革命”是绝佳范例。

让我们倒着往前捋。突尼斯网络“革命”在开始的虚拟阶段，并非“纯粹”发生在一国内。一些秘密机构、群体、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经常隐姓埋名，并分布于世界各地，在距突尼斯数千千米外，积极参与这场“革命”的虚拟阶段甚至活跃阶段。萨利姆·阿马穆是突尼斯“网络奸细”头目之一，竟然傻乎乎、毫不脸红地承认上述事实，他口无遮拦地说：“整个世界参与了突尼斯革命。”[3]我们还知道，网络活动分子纳迪娜·瓦哈卜是在她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指挥埃及青年的。瓦哈卜现生活在埃及，支持“开放社会研究所”（现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穆罕默德·巴拉迪竞选总统。[4]因此，阿拉伯“革命”不是纯粹的国家革命，不是经典的、爱国主义的革命，而是毋庸置疑涉及多国的“离岸”革命。

突尼斯当局意识到这场被远程控制的“革命”的危险，便着手应对，实施互联网审查，因为这场“革命”的动员和起义的号召都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半岛电视台再接着炒作。但突尼斯当局自己的网站却被搞掉了！谁干的？据法国《解放报》介绍，这些人类似于一群青年志愿者，致力于“在网络或在全世界持续对抗审查制度”。

这群被称作“匿名者”的“黑客抵抗者”于2011年1月2日发动了“Operation Tunisia”（突尼斯行动）——行动名称选择英语而非法语，具有极大象征意义。据《解放报》报道：“这天，一条从聊天室传出的号召传达到数以百计的人那里。‘匿名者’发动‘突尼斯行动’，攻击突尼斯政府网站。一位不愿说出姓氏的居住在巴黎的该组织成员埃里克相信，攻击会取得成功。当天，所有官方网站全瘫，或遭遇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或遭受诸如低轨道离子加农炮（软件）的逻辑攻击。‘这被视为突尼斯的心理解放。我们在现场的关系人就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匿名者’随即进入第二阶段行动。埃里克说：‘必须建立抵抗网络。我们可不愿让突尼斯网民冒现实风险，搞无用的挑衅。言论自由，那就足够了。’……一切都在线完成，通过‘匿名者’聊天室和脸

书。‘我们解释了我们的网络是怎样的，我们预先告诉突尼斯网民将冒何种风险，最后，我们鼓励他们组织起来……’”[5]

《解放报》恰恰忘记提及的一点是，被该报脸上贴金的“黑客抵抗者”，如果不掌握那些只有大国才掌握的技术和后勤手段，就无法针对突尼斯（同理，埃及、也门、叙利亚也是如此）发动一场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并最终成功。《解放报》还忘了说，“匿名者”是诞生于美国的组织，它的诞生与圣诞一样神奇！该组织使用的逻辑攻击手段低轨道离子加农炮使志愿者可以出借自己的电脑来发动攻击，让政府网站因服务器爆满而瘫痪。维基百科介绍，“‘匿名者’向其成员或任何志愿者提供一个逻辑手段（软件），向目标网站‘灌水’，同时还对他们进行使用指导。一周后，突尼斯国家电视台TV7的网站被‘黑’，只显示一条阿语信息，‘记者谴责警方的镇压行动，要求释放萨利姆·阿马穆’”。

《解放报》还称，“‘匿名者’帮助突尼斯网民对付政府的网络审查，向其提供匿名发信息等技术。一些突尼斯人贴出了‘匿名者’招牌式的面具图案”。“匿名者”打击的对象均为那些不听命于美国的国家：伊朗、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也门。2009年伊朗网民所使用的技术和突尼斯网民2011年1月所使用的技术相同。但“匿名者”并不是参与并指导突尼斯“网络奸细”的唯一幕后组织，非常神秘的Telecomix也参与其中。这是个以邪教模式运作的组织，2009年4月在瑞典成立，并于2009年6月显示了自己的颠覆能力，它针对的是伊朗——伊朗是“2.0版革命”的首试国，但未成功。

如果我们研究叙利亚，会更清楚地理解突尼斯网络“革命”的展开过程。脸书上的“2011叙利亚革命”网页呼吁“2月4日周五发动全面动员”，而该网页是2011年2月初才创建的，当时没有一个抗议者上街。我们看到，所有被卷入的阿拉伯城市都选择了周五。因为对于穆斯林而言，周五具有极大象征意义。有了ADSL（非对称数字用户线路），在数分钟内可把成千上万好友引向某一脸书网页，“2011叙利亚革命”网页才得以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聚集了10万好友。在突尼斯，直

到2010年12月，该社交网站基本还是被禁的，2011年初才接入这项信息技术，满打满算只有6万个脸书的本土秘密用户。对于这样的国家，上述10万好友的数字至少会让人困惑吧。

《解放报》还忘记了一点，即法国电视台Canal Plus（提供更多内容的电视台）于2011年2月在其《特别调查》栏目中披露，2009年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也门、叙利亚和埃及数名青年参加了有关和平革命技术的入门实习。实习之一是在塞尔维亚进行的，“教员”是美国中情局的人，打着CANVAS的旗号作掩护。CANVAS是Otpor（“抵抗”）组织的下属组织。“抵抗”组织的创建，还多亏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Canal Plus电视台的纪录片并未披露全部内幕，因为还有许多其他类似实习，于2005年至2010年间在欧洲或美国进行，Telecomix承办的比较多。在该纪录片中，我们认出了埃及活动分子、曾是穆兄会青年积极分子（Canal Plus电视台是这么报道的）的穆罕默德·阿德尔，现在他是2008年建立的“4月6日青年运动”组织的发言人。穆巴拉克倒台后，2011年2月9日，他在半岛电视台上说：“2009年夏，我在塞尔维亚参加了有关组织举办的和平抗议培训。”他没法说别的，但相关信息已经由维基解密、Canal Plus电视台等媒体抖了出来。

穆罕默德·阿德尔是谁呢？他是希沙姆·穆尔西的表兄弟，瓦埃勒·阿德尔和艾哈迈德·阿德尔也都是。希沙姆·穆尔西又是谁呢？他是优素福·加拉扎维的女婿。加拉扎维是伊斯兰势力“温和派”中魔王式的人物，卡塔尔向其提供庇护，付他报酬！希沙姆·穆尔西在伦敦获得难民身份，他是穆兄会的领袖，创立了“变革学院”，接受卡塔尔的资助及英国情报部门的帮助。“变革学院”总部设在伦敦，在维也纳和多哈也设了分部。该学院缘起于“未来论坛”。2006年2月该论坛在多哈举办时，比尔·克林顿及其女儿，以及康多莉扎·赖斯都曾出席。此次论坛撰写了一份题为“阿拉伯世界的变革计划”的秘密材料，从而诞生了“变革学院”和“复兴计划”，由穆兄会著名成员卡塔尔人亚契姆·索尔坦负责。“变革学院”，更确切地说，是个邪教组织，为阿拉伯网民组织了

数个培训项目，培训基础是吉恩·夏普的理论。吉恩·夏普是美国哲学家，我将在后文介绍。

我们在Canal Plus电视台的纪录片中没看到，却也参加过美国间谍培训（或接受洗脑）的埃及“网络奸细”，有艾哈迈德·马希尔（他后来向《洛杉矶时报》承认，接受了索罗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帮助）、伊苏拉·阿卜杜勒·法塔赫（维基解密披露，他参加了“自由之家”组织的好几次培训），还有沙希纳兹·阿卜杜勒·萨拉姆和艾哈迈德·萨拉赫（他自2008年起就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是埃及最早的活动分子之一）。艾哈迈德·萨拉赫公开宣称：“当时，没人愿意与小布什政府扯上关系，那是魔鬼。”[6]至于埃及革命的偶像、年轻著名的“网络奸细”瓦埃勒·古奈姆，他曾在开罗美国大学受训，娶了个美国人，现在谷歌迪拜分公司当管理人员！要知道，谷歌通信部门的大管家是鲍勃·布尔斯廷，曾为比尔·克林顿演讲稿捉刀代笔。他表示：“我们的目的是推动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由……对我们来说，这是生意非常重要的部分。”[7]熟谙埃及政治的萨米尔·阿明写道：“我们不应当忽视博客的作用。一些博主有意无意地参与了中情局策划的真正阴谋。挑头的基本上是来自安逸阶层的年轻人，他们美国化到极致，并以当地独裁统治挑战者的形象出现。”[8]

突尼斯“网络奸细”的核心人物与这些埃及活动分子别无二致。他们在同一所“哲学”学校接受过培训[9]，且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属于知名的年轻网民或博主，个别人除外。其他人大多年岁偏大，经验丰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人倾向于保持沉默，即便2011年1月14日之后也是如此。他们是纯粹的职业颠覆者，除非任务完成，否则都会管住嘴！

多亏了《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我们才知道突、埃两国的“网络奸细”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已长达数年的联系。[10]我们还知道，他们出入相同的美国非政府组织，一起参加大会和培训、拿补助，在纽约、

麻省、约旦、摩洛哥、黎巴嫩、伊斯坦布尔、多哈、墨西哥、伦敦接受相同的理论教育。

CANVAS专门负责非暴力颠覆技术方面的培训，培训的理论基础来自人称“非暴力战争的克劳塞维茨”的吉恩·夏普。他撰写过《非暴力行动策略》（1973年）、《从独裁到民主》（1993年），后者记述的理论对“和平”搞垮苏联十分有用。2008年，有一个伊朗人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可以清晰地辨认出麦凯恩、索罗斯、比尔·史密斯和以中情局人员身份出镜的夏普。CANVAS接受“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开放社会研究所”“自由之家”等一些美国组织的资助。“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是麦凯恩。“开放社会研究所”是亿万富翁、著名金融投机家索罗斯建立的。2009年，他差点儿把英格兰银行整垮，靠自己投机赚了33亿美元。此人是匈牙利裔美国人，真名是捷尔吉·施瓦茨，1952年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曾师从哲学大家卡尔·波普。他给基金会取名“开放社会研究所”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导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作者波普。领导“自由之家”的伍尔西于1993年至1995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自由之家”的阿拉伯世界的尊贵“朋友”中，有新保守派的亨廷顿、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巴拉迪。一些欧洲国家的情报部门认为，“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是中情局的又一个掩护机构。

“阿拉伯之春”的灵感源自吉恩·夏普，负责军事培训的是罗伯特·赫尔维上校，他还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成立于冷战期间（1983年），由吉恩·夏普创立，旨在以非暴力手段维护自由民主。2007年12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指称该组织是中情局的下属机构，试图像颠覆苏联那样颠覆委内瑞拉现政权，以控制油气资源。

为了事业的需要，美国人把一切都设计得那么完美，一会儿在塞尔维亚，一会儿在别处。是的，所有一切，包括突尼斯网民的脸书网页上那个紧握着的拳头标识。该标识（最初属于布尔什维克，后来代表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源自“抵抗”组织，曾被用于2000年塞尔维

亚“革命”、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2009年伊朗起义。“抵抗”组织的这个标识与“茉莉花革命”中的一模一样，后来又出现在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巴林。这是纯粹的偶然？还是一种对外信号，以表示他们不再担心蒙面行动的邪教式组织曝光？以上是“茉莉花革命”象征层面的内容。

至于理论层面，它体现在一本手册上，由CANVAS推出、以夏普的理论为基础的《非暴力行动50点》。该手册介绍了199种“非暴力行动手段”，是“阿拉伯之春”的煽动者、“网络异见分子”（包括突、埃两国的博主）的“古兰经”。2011年5月12日，艾哈迈德·阿德尔向瑞士《周报》表示：“我们开始收集如何颠覆政权的材料，都看了，从游击战、合法手段到恐怖袭击。一天，我们看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抗理论，并决定将其运用到伊斯兰世界。”[11]我们后来终于明白，这个穆兄会成员为什么以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替代夏普。对于一个彻头彻尾反犹的伊斯兰主义者，最好跟随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路线，而不是一个犹太思想家的！

CANVAS谨遵夏普的教导，其手册中给出了具体的行动指南。在实践中，我们观察到，塞尔维亚、乌克兰、格鲁吉亚的抗议活动都具有相同的行动模式，特别是与强力部门套近乎，以和平方式令其缴械，拥抱他们，向他们献花。2011年1月14日前后，这些场景也见于突尼斯。捍卫全球（特别是委内瑞拉）进步主义事业的纽约著名女律师伊娃·戈林格尔称：“前美军上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成员罗伯特·赫尔维说过，我们的目的不是摧毁军队或警察，而是劝说他们抛弃现政府，要让他们知道未来政权中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要针对他们搞心理战，与军人拉关系，跟他们谈判。”[12]正如我们后来见证的那样，这就是发生在突尼斯的场景。

青年或妇女向军人献花，这样的场景出现在突尼斯、埃及、也门，之前也出现在苏联（后来美国将这些国家置于自己的“善意”保护

之下）。对突、埃两国的事件，我们只能引用《外交世界》周报（2005年1月）当时评论苏联革命的某些话："这些抗议者看似自觉自发，他们的力量也源于自觉自发，但几乎每个细节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3]叙利亚是抗议者运用CANVAS的手段后没能成功的唯一国家，于是抗议者便祭出更"硬"的手段，即在利比亚用的那一手：唤醒潜伏的恐怖小组、武装的叛徒和雇佣兵，将其送至叙利亚与约旦、土耳其、黎巴嫩等国的边境进行屠杀活动并制造恐慌。在德拉制造恐慌的武装人员的确来自约旦——半岛电视台对此保持缄默。各国（包括欧洲）的伊斯兰主义者拿着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提供的武器，从土耳其渗透到叙利亚，在民众中散布恐慌，甚至在大马士革搞恐怖袭击。

当吉恩·夏普式的和平颠覆（在突、埃两国）不如预期般奏效，他们便转入B计划：逐渐来"硬"的（在利比亚、叙利亚），也就是资助雇佣兵包括"基地"组织攻击无辜平民，并将责任推到治安部队身上；也不再称治安部队为"警察"或"国家军队"，而称之为政权的亲兵或民兵，以与由拉登前手下组成的"解放军"或"自由战士"相区别。这一切都在为北约打着"人道主义干涉"（这是库什内尔最喜欢用的词）的旗号进行军事干涉提供理由。"人道主义干涉"这个词在贝尔纳-亨利·莱维的伪善说教中也将成为套话。

法国军事干涉利比亚的行动以贝尔纳-亨利·莱维的这一法国新时代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为"指导"，法国每天花费数百万欧元，共耗资1.8亿欧元。除非卡塔尔买单，巴黎希望在卡扎菲倒台后能大量投资利比亚。但是谁授权莱维代替法国外交部行使权力？谁"选举"了他，让他把法国拖入一场并不符合法国（战略）利益却符合美英利益的战争呢？萨科齐在利比亚干的正是雅克·希拉克一直拒绝在伊拉克干的事情。北约军队并没有行动起来"避免班加西浴血"，也没有保护利比亚民众让他们免受嗜血成性的独裁者的残害，而是摧毁了军队，为卡塔尔、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的代理人，反革命和极端分子（而不是革命者）提供了便利。赌注当然是要在卡扎菲的故乡实行民主，即利比亚的五个地区（各民族之间）公平分配财富。《鸭鸣报》后来披

露，法国之所以投入这场“保卫人权”的战斗，是因为之前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保证，一旦利比亚“独立”（成为保护领地），法国将拥有自己那部分“合法”的石油及大量油气资源。

一位旅居加拿大的阿尔及利亚作家在魁北克出版了一本书，详述了美国直接介入“阿拉伯之春”的事情。[14]作者称，“推特、脸书、谷歌领导层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的确存在。作者并没有明说美国策划了这场“革命”，但他说，美国诸多组织“在抗议运动爆发之前举办的培训中，一直陪在突、埃等国的主要活动分子身边。而培训由输出民主的美国机构负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自由之家’‘开放社会研究所’。从大西洋到波斯湾，数十个阿拉伯非政府组织包括阿尔及利亚的几个组织，都通过培训或直接接收资助而获得了帮助”。

应该说明的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源自1982年罗纳德·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讲，成立于1983年，是美国中情局众多掩护机构之一。“美国国际开发署”成立于1961年，官方口径是负责减贫、推广民主和经济发展，实际上是美国中情局开办的众多“铺子”之一。[15]在此名单上，我还要加上非常重要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该机构由玛德琳·奥尔布赖特领导，她是阿拉伯人的“伟大朋友”。还有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该所云集了众多新保守派人物，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理查德·珀尔和“利比亚事业与突尼斯民主的朋友”约翰·麦凯恩。2003年麦凯恩公开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撰写了题为“击退流氓国家”的政策报告。突尼斯从枷锁中“解放”后，他是第一批到访者之一。

鉴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阿拉伯“革命”中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还是在这个隐秘的机构上多花点儿时间。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威廉·布卢姆写道，该基金会“几乎能够公开从事那些中情局曾经悄悄做的事”，“我们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其所从事的事情常常与它所宣称的宗旨相悖”。[16]他介绍，“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基本理念虽是反左翼的，但“客户”却常常是左翼政党或工会。我们是否回想

起突尼斯事件中突尼斯劳动者总联盟等的活跃行动？它“以多种方式介入别国内部事务，向公民组织、工会、异见者或学生运动、编辑、报纸和其他媒体提供经费、知识技巧、培训、教育材料、电脑……”。

2009年11月推出公民社会2.0倡议时，希拉里·克林顿呼吁全球非政府组织大量使用数字新技术，宣布拨款500万美元给中东、北非做试点，称“这将有助于增强新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互联成网的能力”。在2010年1月21日的“互联网自由讲话”中，她向网民承诺，更确切说，是向“网络奸细”承诺，美国将提供资金和后勤支持。当时，有10多个突尼斯博主通过网络视频会议，一些人甚至在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内听了她的讲话。她甚至还点了几个国家的名：伊朗、乌兹别克斯坦、突尼斯和埃及。

比希拉里·克林顿更积极的是约翰·克里。这个民主党人却是新保守派人物麦凯恩的密友。他表示，不仅要资助社交网站、博主和全体网民，更要引导他们，并提供培训。2009年1月8日，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会议上，他强调：“当这些网络尚幼小时，就要想着哺育、培养它们，以使其快快长大。”脸书当时约有950万用户，这些网络的确是个大筹码。

“茉莉花革命”爆发前不久，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中也持这一论点。他批评道，美国的“网络乌托邦”掩盖了新技术与生俱来的自由美德，只对准美国锁定的那些国家——伊朗、中国、委内瑞拉。他认为，这种“数字干涉”大概有助于在全球宣传自由，但首先并主要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17]对那些早就明白“人权问题更多服务于国家战略而较少惠及个人与民众利益”的人来说，上述论点纯属小儿科。

记者兼作家约翰·利韦尔内特也持此观点。他说：“阿拉伯民众知道他们获得了什么，但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从本能出发，我们惊奇地发现，这是一系列针对独裁者的颠覆运动——数十年来，阿拉伯民众都知道他们是暴君，但迄今一直很平静……确定的一点是，运动

没有自觉自发。一切已经计划很久了。”[18]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任何政治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如果真有，那也是故意安排成偶然的。”

从“阿拉伯之春”的非自觉自发出发，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突、埃两国是最脆弱、最先倒下的。在埃及约8150万人口中，两成是网民，其中的约500万是脸书用户，58%的脸书用户小于25岁。在突尼斯约1030万人口中，约有200万脸书用户，18岁至29岁的脸书用户占23.3%。2011年7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突、埃所属的地中海南岸国家中，IT（信息技术）通信业占比是阿拉伯世界中最高的。”因此，“两国政权倒台如此迅速，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很多人掌握了通信和媒体接入手段”。这份报告的口吻与其说是注重科学性，不如说是意识形态色彩深厚。报告称，相对于“极权”，这种开放显然是矛盾的。一个极权国家无论如何是不会开放其社会的，而是会拼命让其置身事外，以防被外部传染。

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美国及其非政府组织的二道贩子，特别是无处不在的梅纳尔领导下的为“言论自由和民主”摇旗呐喊的“记者无疆界”组织，无法忍受针对互联网的哪怕是最轻微的审查。一旦政权稍微开放，便会缴械投降。显然，“茉莉花革命”及其政治、社会恶果，如果没有突尼斯当局2010年5月的首肯（推出3G网络，即通过手机上网），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世上最残暴的独裁者”之一无意识犯的严重错误？还是对伊斯兰主义者随时可能一口吞下的政治自由化严加控制的同时，自愿对外开放、逐步引入民主导致的恶果？

艾哈迈德·本萨阿达认为：“突尼斯网民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遭遇感染。脸书、推特等博客都表达了支持。脸书上组建了数个群组，推特文章也设置了相关关键词——Sidi Bouzid（西迪布济德），并占领了微博平台。优兔上有3000多条视频带有相关关键词。”[19]在运动最激烈时，“网络异见分子”将新技术用到极致，包含“Sidi Bouzid”的推特信息每小时发了2.8万条。[20]

如果没有我前文中提及的美国机构的技术、后勤、资金支持，“茉莉花革命”根本不会发生，机构的角色就是“资助、训练、支持、建议目标国的异见运动，以使他们以非暴力方式动摇并颠覆当地政府”。[21]

举一个美国在技术方面帮助“网络异见分子”的例子，就是提供可接入网络又不留痕迹的TOR（The Onion Router，洋葱头路由器）。这是一种匿名通信软件，可为所有类型的信息加密，用户可通过它匿名上网。TOR项目由美欧黑客管理，接受美国联邦政府资助。该软件由麻省（马萨诸塞州）一家企业推出。据约翰·马洛尼披露，这家企业免费向伊朗人、突尼斯人、埃及人提供此软件，让他们在进行颠覆活动时能躲开审查和监视。那个神秘的突尼斯“海盗党”，其实就是一个媒体泡沫。[22]它的一名成员苏菲安（化名）宣称：“许多人使用TOR，软件光盘在大中学生中传来传去。一周前，软件发明人雅各布·阿佩尔鲍姆专门为突尼斯设计了一条通道，这让事件的进程大大加快。”[23]

首先应当澄清，苏菲安真名叫希姆森丁·本·杰马，是突尼斯裔法籍青年，法国“海盗党”成员。其次，阿佩尔鲍姆不仅是那款软件的设计师，而且曾是维基解密的活动分子。此人与“匿名者”组织联系密切，是这家企业的门面人物。他多年来遍访世界的“网络异见分子”，向其展示TOR的用法，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不是阿佩尔鲍姆不要钱，而是只对那些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异见青年免费。[24]谁在资助TOR软件生产商呢？艾哈迈德·本萨阿达调查后认为，资助方有谷歌、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美国联邦基金！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阿佩尔鲍姆曾赴突尼斯“向当地活动分子介绍自己的系统”。[25]我们还知道了，为了帮助突、埃活动分子在断网的情况下与外界联系，谷歌和推特迅速推出了一款名为“Speak2Tweet”（与推特对话）的服务。这项服务允许用户免费拨号、上传语音留言，该留言再被自动转换成

推文并传至互联网。[26]我们也知道，在动员青年中起到发动机作用的突尼斯“揭秘”网站的幕后推手是谁了。

再举一个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例子。知名的青年运动联盟（AYM）于2008年12月在纽约组织了首场大会（后来又于2009年在墨西哥城和麻省、于2010年在伦敦举办过）。大会得到谷歌、优兔、脸书、百事的赞助，参加者是来自拉美，以及伊朗、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的“网络异见分子”。与会者还包括：首个与小布什政府合作的埃及博主艾哈迈德·萨拉赫，“自由之家”负责中东、北非事务的项目执行人谢里夫·曼苏尔，突尼斯“网络奸细”的教父萨米·本·加尔比亚，脸书的共同创办人达斯廷·莫斯科维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下属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的共同领导人拉里·戴蒙德，美国国土安全部高官沙阿里克·扎法尔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首场大会后，该组织还创立了movements.org网站。此网站称，这个“美国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任务是：其一，在感兴趣地区物色网络活动分子；其二，促使他们相互建立联系，并与公民社会的专家和成员建立联系；其三，向其提供支持，包括提供培训和建议，为其打造一个平台，引导他们相互联系、发展壮大。一切都计划好了！”。[27]

我们注意到，movements.org网站的创建者之一是曾任康多莉扎·赖斯、希拉里·克林顿顾问的贾里德·科恩，他现在担任“谷歌理念”的负责人。另一创建人贾森·利伯曼曾在美国国防部任职。青年运动联盟的执行总裁则是戴维·纳赛尔，曾在“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中负责中东项目。

青年运动联盟的第二次会议于2009年10月15日至16日在墨西哥城举行，希拉里亲自前往，诸多阿拉伯（包括突尼斯）网民参加。伊娃·戈林格尔写道：“会议集中了新技术和社会网络方面的专家，如脸书、推特、优兔人员，还有华盛顿机构的官员，以及致力于颠覆和动摇那些不听命于美国的国家的专家。目的是训练那些国家的青年用社交媒

体来实施反政府的政治行动。”[28]换言之，教会这些博主通过非暴力手段，即以技术手段来推翻政权。

2010年4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乔治·W.布什研究所联合“自由之家”组织了全球“拥护自由人权的活动分子”“互联网专家”的聚会，以分析“全球网络异见运动”。[29]突尼斯有两男一女参加。参加的埃及人有瓦埃勒·古奈姆、艾哈迈德·阿德尔、纳迪娜·瓦哈卜、沙希纳兹·阿卜杜勒·萨拉姆和艾哈迈德·萨拉赫。

《阿拉伯式美国人》一书的作者称：“研究这些会议以及与会者名单，我们可从多种角度去解读。首先，美国政府通过大使馆，在世界范围辨别其‘感兴趣’的网络活动分子，并通过大使馆安排这些人去参会。其次，新技术领域的领袖在培训‘网络异见分子’、破坏别国政府稳定等事情上早就持有立场。最后，事实证明，美国政府、‘输出民主’的机构、新技术领域的大公司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我将用一个彻头彻尾的“网络奸细”的证词来结束这一部分。证词出自萨米·本·加尔比亚，他是“网络异见”方面的先驱，“网络奸细”招募与培训专家，曾是伊斯兰运动的同情者，1998年赴荷兰避难。2010年9月17日，即布瓦吉吉自杀的12月17日的前三个月，萨米·本·加尔比亚发布了一份资料翔实的研究材料，介绍了与美国情报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是如何训练和操纵阿拉伯“网络异见分子”的。他的坦白承认令人惊讶，文章的发表也是个谜。我的假设是，萨米·本·加尔比亚对伊朗有一种偏爱，在试图动摇伊朗政权未果后，他与自己的美国教员疏远了。在2003年出版的自传式著作中，他描述了在伊朗最初的那段时光。2009年，“非暴力网络革命”首次爆发就是在伊朗，未获成功。后来美国人花了一年的时间升级他们的“革命”制造机，使其在突尼斯达到了最佳效果。他的证词中有如下记述：

从华盛顿发出的有关自由的网络“真言”，只是为了掩盖其地缘政治战略日程。互联网自由政策并非一尘不染。首先，它基于美

国和西方对外政策与利益，换言之，服务于西方优先领域。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在互联网自由领域以主角身份行事。这对接受它们支持与资助的活动分子而言，构成了真正的风险。许多人觉察到网络行动主义是高度政治化的。这些人将该运动的“成功”据为己有，以实现美国的地缘政治目的，还将其视为“死亡之吻”。最坏的结果是，西方资助加高度政治化可能导致目前的网络行动主义空间突变，出现一个完全与当地阿拉伯背景脱钩的“并行的网络行动主义”。[30]

……令我特别担心的是，美国政府与涉及互联网自由和网络行动主义的美国研究中心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每一座桥梁，都将导致早已存在的桥梁被摧毁。后一种桥梁连接上述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中心与阿拉伯世界的行动分子和博主。如果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不变，活动分子特别是那些圈外国家的活动分子会继续视美国为伪君子，即美国企图利用活动分子，将他们的事业作为自己的工具，以便为自己所用或仅用于国内事务。

……鉴于互联网自由和网络行动主义成为政治领域的时髦物，充斥着狂妄的变革论调或理论，众多国家政府向这一“新的变革的科罗拉多”投钱。对这些政府、非政府组织、“翻墙”工具提供者和推广者来说，这一形势为它们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让它们把自己的日程排在优先位置，让它们根据当时的情况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公关战略，或纯粹为了多弄点儿钱。……美国和西方非政府组织针对阿拉伯博主和网络活动分子搞了那么多工作室和会议，其数量近年来急剧上升，以至没人能准确预测这些活动对阿拉伯网络行动主义的性质有何影响以及所引发的后果。

……在这方面最令人担忧的变化是，那些独立的网络活动分子和博主将自己总结、收集的知识和数据，通过与美国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中心合作的方式，转到华盛顿搞政治的一群人手上，为美国利益或全球网络战提供便利。

……现在，当我们想与研究中心或非政府组织合作，回答问卷，或参与群包的一个项目，或帮他们翻译些材料，或解释某些

话题的背景知识，或推荐活动分子和博主去参会时，我们就要问问自己了，我们是否正在通过美国政府的代理人里通外国。

这份材料还透露，cyberdissidents.org网站项目的最初构想源自以色列和美国政客，他们与各自国家的情报部门联系密切。该文称：“该项目由‘保卫民主基金会’首倡。这是个设在华盛顿的新保守派研究所，于‘9·11’事件发生两天后成立，而美国保守派组织竟好意思指责该基金会‘主要由一小撮亲以色列的鹰派人士资助’。《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则将其描述为‘最重要的新保守派智库’之一。曾在利库德政府内任部长的极右政客纳坦·夏兰斯基是网站的总裁，戴维·凯斯任执行官。凯斯曾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助理，也在以军战略部门任过职，是恐怖问题专家。”[31]

萨米·本·加尔比亚告诉我们，谷歌组织了2010年9月20日至22日的布达佩斯“2010年互联网自由”大会，邀请活动分子、博主、人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对人权事务感兴趣的多国政府和美国大企业代表，加尔比亚本人也参加了。会上，奥尔布赖特领导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提出了“中东、北非博主网络”倡议。但加尔比亚在材料中没告诉我们“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还在约旦（2007年12月）、摩洛哥（2009年6月）、土耳其（2009年11月）等国家召开了培训大会，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伊朗、也门都有人参会，他们学习如何将新技术（脸书、推特）应用到“自我革命”。

如果没有“网络奸细”和半岛电视台适时紧密的合作，没有法国BFM电视台和法国24台的接替炒作，“自我革命”怎么也成功不了。半岛电视台这家搞伊斯兰主义宣传的电视台，将脸书网络无法触及的（尽管突尼斯上网率很高）突尼斯人都发动起来。所以说，卡塔尔在这场革命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文我将谈及。

卡塔尔，阿拉伯以及西方世界的“伊斯兰主义特洛伊木马”

2011年7月21日，突尼斯十大反对党正举行名为“保卫自由的行走”的公民抗议，突然喊出口号“半岛，滚开！”。获得自由、心怀警惕的突尼斯人最终知道了这家电视台不是解放者，而是抑制因素。每当它的记者跑到各地采访，总有“突尼斯人民自由了，我们不要美国也不要卡塔尔”的喊声将他们赶走。伪善的面具终于被撕开，而且不只在突尼斯。在发挥了15年无与伦比的影响之后，半岛电视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它是如何诞生的？谁是它的主人？它走的是何种意识形态的编辑路线？它的战略是什么？它在搞乱突尼斯及整个“阿拉伯之春”中起了何种作用？

半岛电视台成立于1996年11月1日（此前，即1995年6月27日，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借其父赴瑞士之机篡权）。不久后，半岛电视台选定了优先目标：沙特阿拉伯、埃及、突尼斯、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拥有无限的金钱、全球65个办事处、3000名雇员、一天24小时播出、最先进的播出手段，这家国营电视台一直让人误以为它是私营的，2008年时拥有4000万阿拉伯语观众。半岛英语台有1.2亿观众。2010年12月，它获得印度信息部颁发的执照。在甘地的故乡，这家聪明绝顶的激进主义电视台的潜在观众达1.15亿个家庭，还不算半岛体育台和半岛儿童台。其受众特别脆弱、可塑性强，“年预算逾4000万欧元，节目制作委托给拉加戴尔公司”。[32]

半岛电视台实际上是公共电视台，由卡塔尔国王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指定电视台管理委员会成员，成员包括：其妻谢哈穆扎·宾特·纳赛尔·米斯奈德；妻弟瓦哈比主义者、该国首富哈马德·伊本·贾西姆；堂兄弟、穆兄会重要人物、电视台管理委员会主席谢赫[33]哈马德·伊本·萨默·阿勒萨尼。这样的人员组成，表明半岛电视台只会是一个反动的激进主义电视台。

“我之所以能成功推翻父王，是因为媒体力量极为高效。”这位埃米尔[34]阴谋家这样说道。的确，如果没有谢哈穆扎的主意，大搞让臣民中毒的宣传，政变不会成功。1995年6月27日，卡塔尔国家电视台播出通告，称埃米尔合法上位，接下来又报道所有部落长老向埃米尔发誓效忠。这个遭篡改的报道以及外国（法国跻身首批之列）的承认令卡塔尔民众最初接受了篡权者。最先揭露这些不实报道的是罗贝尔·梅纳尔：“其实，宣誓效忠的场面从未有过。那是在搞政变前夜，这位王储召来国家所有长老，向他们宣布他父王的消息，他父王从瑞士小镇与他通电话的内容。自然，仪式需要摄像，但播出时并无声音，而且还是在另外一个背景下。上当受骗的当事人没一个敢冒险揭发。”[35]因此，从基因角度看，半岛电视台的诞生多亏了两大染色体：背叛和混淆视听。

半岛电视台号称坚持自己的“观点与异见”，但除了这一貌似有理、阴险狡诈的口号，其成功的秘诀还在于它知道如何在阿拉伯世界史无前例的言论自由与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搞平衡。因此，它是最落后的意识形态与最先进的市场营销、信息技术的结合。

成立后5年内，半岛电视台对阿拉伯民众来说已成了“神台”。它几乎以真主安拉的声音说话。对那些一直习惯了对当局俯首帖耳、善于指鹿为马的本国国家电视台的观众来说，真相只可能源自这家卡塔尔电视台。它说了其他电视台不敢说的真相，于是积累了民众对它独一无二的信任和信心。半岛电视台的运作方式十分有效：十条信息中，它报道一条假的；十个真相中，塞进一条谎言。就这样，半岛电视台披露的都成了圣经式的信息，更确切地说，是古兰经式的。它对观众具有催眠的本事，观众们像犯了毒瘾似的去看它。穆罕默德之后，阿拉伯人就不再等待先知。但现在“穆罕默德化身为半岛电视台，它成了穆斯林做礼拜的新对象”。

半岛电视台还采用另一战术来绑架观众的思想、取得他们的信任、与之建立信任和情感关系：与那些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享有知名

度的人套近乎，从学者到恐怖大亨。如穆罕默德·哈桑宁·海卡尔（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顾问兼《金字塔报》前主编）、阿卜杜勒·巴里·阿特旺（1996年在阿富汗采访了本·拉登）、本·拉登、优素福·加拉扎维（伊斯兰势力“温和派”）、阿兹米·比沙拉（首位获准竞选总理的以色列阿拉伯议员），以及哈马斯、“伊斯兰拯救阵线”、“塔利班”的激进分子等等。半岛电视台只盯着赞扬阿拉伯“光荣”、伊斯兰“伟大”的人，特别是“保卫”巴勒斯坦事业者，以便为半岛电视台赢得人气。这种“保卫”只是媒体炒作和反复说教而已，因为卡塔尔私下跟以色列打得火热，以色列总理佩雷斯以前曾在半岛电视台总部发表过多场演讲，台下听众全是该台记者。我是说演讲，不是记者会。罗贝尔·梅纳尔在多哈待了一年后，终于弄懂了这个“拥有阿拉伯世界CNN的平静的激进主义国家”。他写道：“对跟我打交道的卡塔尔人的真诚态度，我深表怀疑，特别是当他们板起面孔做义愤填膺状来为巴勒斯坦事业辩护之时。”[36]

正因为有了这种仔细研究过的战略，半岛电视台的宣传才成效显著。2001年10月，穆巴拉克总统访问半岛电视台总部时说：“所有嘈杂声都是从这个‘火柴盒’里传出来的。”10年后，也是从这个“火柴盒”开始，它点燃了从突尼斯到埃及的“革命”火焰和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内战。阿尔及利亚是继突尼斯后第二个被锁定的国家。尽管半岛电视台及其薪资优渥的“记者们”——他们的行为更像造反者的教练而非分析员或见证人，呼吁观众马上起来造反，但很幸运，该国抵制住了“海妖的歌声”。[37]一个名为Afrohistorama的博主写道：一部分人觉察出半岛电视台的编辑路线有些变化，特别明显的是报道叙利亚事件时，它坚持使用某些反对派的说辞；但另一部分人认为从来就没变化，最初阶段只是一个诱饵，为的是打造自己的信誉度，以便关键时刻能临时拿来为自己的操控行动打掩护。曾是该台明星记者的琳娜·谢卜勒认同第二个看法。她证实，卡塔尔与美国有合作，并自小布什时期起就想不惜一切代价颠覆叙利亚。在杜尼亚电视台的一期节目中，她宣称：“针对叙利亚的战役数年前就已开始。半岛电视台按照每播出

十个真消息夹带一个假消息的规则后事，以便在观众中树立口碑。”这位从2002年至2010年在半岛电视台工作的记者称，有一个“针对叙利亚甚至阿拉伯世界的阴谋。根据美国的政策，该台制造流言或筛选信息，然后再播出去”。这位正直的记者与她的四位同事2010年从半岛电视台辞职。

谢卜勒不是唯一打破沉默的人。名人阿尼斯·纳卡希是战略研究网络“阿马内”的主任，没人怀疑他的反伊斯兰主义主张。他认为，半岛电视台“最终露出了真面目，即服务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走狗。……该台最初建立，就是为了代替BBC阿语台，接它的班。它运用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策略来哄骗阿拉伯民众。……多年来，该台以专业、客观的面目示人，特别是与阿拉伯民众的亲近者打成一片，从最激进的组织开始，如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等，到团结在阿拉伯人神圣的事业周围，即保卫巴勒斯坦”。“客观性要求将巴林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同等对待；客观性还要求，如果支持民主，就必须从自身做起，再呼吁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的埃米尔实行。”[38]

专栏作家达乌德·拉马勒也这么认为。卡塔尔“从一种平衡立场（一边是阿拉伯国家，另一边是以色列，同时显示出某种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敌意）突然变脸，全面介入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和起义，同时完全支持美国的政策”，这是“不可预测的立场转变”。

自诞生之日起，半岛电视台就不停地针对突尼斯搞恐吓、混淆视听，还假模假样地宣称自己维护人权民主——我们都知道卡塔尔的人权民主是多么糟糕。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涉及突尼斯的消息都是假的，消息还常常贴近现实。但这些消息均依从一个势不可当的政治计划，具有意识形态指向：系统地削弱那个被妖魔化了的政权的信誉，同时不断地美化那个被英雄化了的反对派。人人都知道这个电视王国的真正主人是哈马德国王和他的堂兄弟、妻弟。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安排，让人大唱突尼斯的赞歌或哀歌。他们用同一手段来对付沙特阿拉伯、埃及、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他们想让阿尔及利

亚服从他们的意志，特别是想压缩该国在国际天然气市场上的议价空间。突尼斯反对派在本国几乎被剥夺了发言权——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中也一样，因此反对派别无选择，只能参与这场游戏，他们可不是傻瓜。至于反对派中的伊斯兰势力，半岛电视台驻当地办事处简直就是他们的第二居所。原因在于突尼斯的伊斯兰主义者拉希德·格努希是半岛电视台的股东，伊斯兰主义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优素福·加拉扎维也是。

半岛电视台“信息自由、尊重人权”的游戏仅服务于反民主甚至蓄奴主义小国的利益和外交。一开始，这种游戏还低调、谨慎地进行。到了2003年，瓦达·汉费尔当上半岛电视台总裁，编辑路线明显转变，敌意增加，故意偏向萨拉菲主义搞宣传。原因在于汉费尔是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曾任约旦穆兄会的发言人。他在约旦完成学业，并被引上伊斯兰主义道路。记者玛丽-皮埃尔·叙布蒂写道：“他与穆兄会的亲密关系路人皆知。就是他将电视台打造成了国际网络，还是他，实施了新的编辑政策。”[39]汉费尔上任后，有7名驻外办事处主任辞职，包括明星记者和职业电视工作者米歇勒·柯克（巴黎办事处创建人，其继任者是一位亲伊斯兰主义的阿尔及利亚人）、哈菲兹·米拉兹（华盛顿办事处前主任，2007年时公开批评“汉费尔上台后电视台就滑向伊斯兰主义”）。[40]汉费尔还不顾一些女播音员的抱怨，坚持让与伊斯兰宣教团关系密切的艾曼·贾巴拉留在负责埃及新闻的副主任岗位上。2009年7月，汉费尔应邀访美，会晤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在这个时间段，他与奥巴马的新团队敲定了一些有关阿拉伯国家未来的事宜。

2006年，突尼斯关闭了驻卡塔尔的外交代表处。这个决定源于卡方的无耻敲诈，即宣称放松人权压力，换取突方诸多让步。自此，半岛电视台对突尼斯的攻击陡增，尽管后来突尼斯任命了新大使。2010年，考虑到艾哈迈德·凯迪迪与卡塔尔王室私交甚笃，突任命他为驻卡大使，正是他让卡塔尔丑恶的政治财阀阿勒萨尼家族与突尼斯黑手党

式寡头特拉布勒西家族和好如初。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后来突尼斯前第一夫人、她的身边人以及本·阿里的女婿们能够在多哈和迪拜的税收天堂过着纸醉金迷般的流亡生活了。

在拙作《迦太基将不会被摧毁》[41]中我就说过，把突尼斯搞乱、为伊斯兰主义者制造便利，是有意损害突尼斯。我早就指出半岛电视台说谎、混淆视听，十分狡猾地为国际萨拉菲分子服务。我说这是披着言论自由的外衣，搞针对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埃及和约旦的阴谋。我指责半岛电视台想在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点燃激进主义的烈火，特别是借助优素福·加拉扎维的伪善说教、拉登的末日论和末世学。我还指责它鼓动欧洲的女学生戴头巾。半岛电视台体态丰腴的女主播卡迪亚·本·加纳宣称，2003年她决定戴头巾，是为抗议“法国的厌伊（斯兰）情绪和种族主义”！我指责这个善搞颠覆的巢穴研究开播法语台，不是为了服务法语人口，而是为了更多地将激进主义言论的触角伸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及马格里布裔的法国青年。针对该计划，我在BFM电视上向法国政府呼吁保持警惕，不要被卡塔尔那帮贝都因人伪善的外表迷惑。他们自认为成山的美钞什么都能收买，包括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通过卡塔尔体育投资公司）！一列火车可以隐藏另一列火车：巨额支票可掩盖一些狂妄自大的伊斯兰主义者的阴谋。一些人批评法国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引发厌伊情绪，这些人错了。在该党推动下，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特别立法——免除卡塔尔人在不动产上的增值税！这样，他们就能以最少的费用获取法国文化和不动产遗产中最好的那一部分。这些脑子里装满了瓦哈比思想的贝都因人，在他们的秘密战略中，法国在待征服国家中居首位，先是通过砸钱，再通过劝人皈依伊斯兰教。

2009年6月24日，谢哈穆扎“殿下”被指定为法国艺术学院外籍成员。显然，这“不是”因为卡塔尔花费数百万美元的院外活动，“而是”因为“她为全球教育及她国家的民主化所做的贡献”。多亏了她，这个中世纪王国才变身“民主国家”，而它实际上却将本国公民视为子民，将他国移民视为奴隶。而迷人的谢哈穆扎——埃米尔最宠爱的妻子之

一，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亲善大使”的称号，以表彰她“提升了伊斯兰土地上妇女的地位”！这也显示了她作为宠妃而非作为唯一妻子的地位，因为卡塔尔这位新瓦哈比派的埃米尔将多妻制提升到与一神论同样重要的地位。

十多年来，我利用每一次机会揭露这家搞颠覆的电视台的真面目。在先知漫画事件、教皇拉蒂斯博纳大会、2005年10月郊区骚乱中，我都拿出证据谴责半岛电视台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散布不和传言，种下仇恨的种子，但这并不影响卡塔尔每年组织好几场宗教间的对话论坛。我指责它在全世界宣传伊斯兰教神权统治的观点，支持阿、巴两国的塔利班对付马苏德领导的北方联盟。杀害马苏德的凶手塔里克·马鲁菲如今竟可以在突尼斯街头自由漫步。我还指责它支持哈马斯对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试图破坏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刺激哈马斯的激进派——卡塔尔通过其他渠道向其提供资助。但这丝毫不妨碍卡塔尔埃米尔与以色列保持最好的关系，向其提供天然气。最后，我指责它炒作本·拉登发出的蒙昧及仇恨信息——之前早就转到了美国情报部门手上，以至变身为拉登半官方的信使和发言人。

我向法国当局呼吁，劝说法国国营电视台辟出专栏致力于宗教间对话，特别是应普及伊斯兰宗教价值观，以便对抗半岛电视台的邪恶影响，让启蒙主义的伊斯兰战胜瓦哈比派，让半岛电视台在西方特别是法国、北欧国家、加拿大由于搞可怕的劝人入教战略而显得格格不入。半岛电视台不久后将推出半岛巴尔干台，其总部早已设在了萨拉热窝。其战略是以麻痹穆斯林电视观众为手段，逐渐征服欧洲。让-弗朗索瓦·卡恩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公开批评半岛电视台的法国记者，几年前他就提出问题：接受卡塔尔资助的那家私营电视台覆盖整个北非，同时也在法国数个城市收视率最高，那么我们知不知道，该台公开地以激进主义立场，大肆鼓吹阿拉伯独裁政府的执政合法性！[42]

在法国为瓦哈比激进思想造势，与沙特阿拉伯相比，卡塔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卡塔尔人以金钱铺路，透过强大人脉，成功掌控了

法国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此种手段，他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对法国的对外政策甚至国内政策施加影响。换言之，利用法国的600万穆斯林，达到其赚钱的目的或阴险的政治目的。萨科齐先生如果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与“皇室”夫妇搞好关系来维护法国的最高利益，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这些人其实“怀有刻骨仇恨”,[43]没有朋友，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时效忠两个主人！

2010年12月17日，布瓦吉吉自焚后，半岛电视台记者便积极跟进，企图“告诉”突尼斯人，一个贫穷的大学毕业生沦落为菜贩，因为城管人员没收了他的秤、扇了他耳光，他才会自焚。此时，在与“网络奸细”的共谋下，舞台背景搭建起来，只欠构建动员因素了。于是乎，电视画面就24小时不间断播出。对半岛电视台颇有研究的克莱尔-加布里埃尔·塔隆称：“从突尼斯事件一开始，半岛电视台就表现出对‘革命者’的支持……它搞了一次广告推销，弄了一个影像和音乐的大杂烩，带有它招牌式的移花接木手法。……它有时反应太迅速，一些有关埃及或突尼斯的消息不太准确。”[44]

布瓦吉吉自焚两天后，“网络奸细”就用他们在培训班上学到的知识加紧煽风点火，随后抗议物价和失业问题的活动渐渐失控。半岛电视台的播音员本应是保持中立者，却显示出编剧的才能，公开呼吁突尼斯人起义。他们不再报道事件，而是试图制造事件。2005年10月，法国发生市郊骚乱期间，法国政府要求国营和私营电视台停播该事件，[45]因为各地的闹事头目竞相用手机自拍，以便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自己。出于国家原因和“公民意识”，各台认真执行了政府的指令。当社会安宁受到威胁时，就让知情权见鬼去吧。

利用最新的操控和煽动技巧，半岛电视台的主持人、邀请的伊斯兰激进派或左派嘉宾、“目击证人”等，不间断地高谈阔论，鼓动大家上街。2011年1月4日布瓦吉吉去世，对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兼演讲者而言，其死讯无异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们正好趁机搞乱突尼斯。加拉扎维公开呼吁进行“推翻暴君的圣战”，数周后他又发出了杀死卡扎

菲的号召。当涉及巴林时，这位伪善的伊玛目却宣称抗议是“教派冲突”，“是反伊斯兰的”。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卡塔尔埃米尔搞政变上台以来，加拉扎维就成为该政权的意识形态担保人。该政权以“瓦哈比改革派”面目示人，以区别于“要被打倒的对象”——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主义。其中原因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因为卡塔尔之于沙特阿拉伯类似科威特之于伊拉克：都是英国人凭空创造出来的矛盾。

在对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半岛电视台搞的都是同一套东西，所依据的是同一个政治日程。更糟的是，在利比亚和叙利亚，该台直接变身为英美情报机构的宣传司令部，创造出诸多恐怖场景，引发公愤和民众起义。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兵者，诡道也”，战争中要摧毁敌人，可以不择手段。在此仅举三例。

其一是，所谓叙利亚士兵冷血处决20余名双手被缚、排成一排的和平民众之事。我们事后知道，此景源自伊拉克战争档案。这段视频甚至是在美军驻卡塔尔基地内炮制的。相反，半岛电视台从来没播放过叙利亚军民被击中又遭割喉身亡的恐怖影像，因为凶手是在哈马的穆兄会恐怖组织分支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受到“圣战”感召的激进主义分子。

其二是，对米苏拉塔[46]的利比亚人抗议进行的所谓直播。一位伊拉克女观众成功躲过半岛电视台导播的盘问，闯到直播中说：“你们现在播出的，不是在米苏拉塔，而是在巴士拉。你们为什么这么做？”记者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回答道：“谁跟你说不是米苏拉塔的？你是怎么猜到的？”就在对话当中，米苏拉塔的“直播”突然中断，电视上出现阿拉伯国家开会的画面，接着是来自班加西的真直播。但那位女观众继续说：“如果这是你们所谓的米苏拉塔直播，那么请接着播放直播画面。你们混淆视听。我怀疑这不是米苏拉塔的，因为我现在在巴士拉，我就住在画面中的那个地方。”

其三是，一个名叫哈姆扎的小男孩死在叙利亚南部城镇德拉的“被杀真相”。电视台称，这个可怜的小家伙13岁，是被流弹击中的，极可

能是叙利亚士兵或警察开的枪。这个例子与半岛电视台煽动民众抗议当局的其他例子毫无二致。好像这一死亡事件本身还不够悲剧，还不足以向叙利亚当局施压，所以半岛电视台又播出了一段由“目击证人”拍摄的视频，显示小男孩身上有遭折磨的痕迹。画面上还配有另一“目击证人”的卑鄙证词：“他们觉得这些折磨都不够，还在弄死他之前割掉了他的生殖器。”半岛电视台主持人更卑鄙，他说这个男孩的“命运与被以色列士兵杀害的12岁男孩杜拉的一模一样”。杜拉死于2000年9月30日，第二次大起义刚开始后不久。这种类比极为有效，抹黑了叙利亚政权，煽动起了人们对它的仇恨。

谁会相信叙利亚的军人或警察，会去折磨一个孩子，还割掉生殖器？另一家电视台杜尼亚播出了对法医的专访，法医称小男孩的尸体被送到家时没有任何被折磨的痕迹，但杜尼亚电视台这期节目算是白做了。半岛电视台在一周内不断散布恐慌情绪，那一电视画面让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走上街头。

除了那些相信阿拉伯人确能干出如此罪恶之事的人，没人能相信这种无耻的操控！几份西方报刊接着炒作。一家名为《89街》的报纸用头条报道：“人们在大马士革说，死人会导致革命，那么此次哈姆扎之死将会加速革命。阿语的脸书网页‘我们都是哈姆扎’获得了5万个支持。叙利亚上网没突尼斯方便，但仅仅是影像的传播就增加了反对巴沙尔政权的力量。这个男孩会成为另一个布瓦吉吉，成为整整一代人的启发者吗？叙利亚不需要一个自焚的年轻人，单单这些画面就足以让街道挤满抗议人群。”[47]

半岛电视台是首个向本·阿里发难的，也是第一个要求他下台的。叙利亚发生的这一套正是突尼斯的翻版。布瓦吉吉死后，该台刻意制造出一个“起义之脸”的神话。这张“脸”得到了成千上万失业青年的认同，他们真的是大学毕业即失业。之所以说是“神话”，是因为布瓦吉吉酗酒成性，14岁就辍学了。

我不是来更正这位过世年轻人的形象的。优素福·加拉扎维不顾《古兰经》中不允许自杀的内容，说“让他去天堂，因为他是烈士”。第一个敢于说出真相的是拉尔盖施教授。他写道：“那一耳光导致那么多人流泪、流血，还费了那么多笔墨，让那么多人在西迪布济德的‘革命’祭台上自焚，无论是在布瓦吉吉当着众人的面自焚的市镇广场，还是在阿尔及尔、开罗、萨那等地，但这记耳光是假的。”[48]

第二个发出不同声音的是克里斯托夫·伊亚德。这位《解放报》记者写道：“在西迪布济德市公园的一个露天咖啡馆，拉明·布瓦吉吉引用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关于‘9·11’事件的一句话说：‘当他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攻击敌人，他就摧毁了自己的意志。’接着他又讲述了那记著名的耳光：‘他死后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全编造出来了。说他是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来打动听众，其实他就是初中毕业，是个卖菜的。为了让那些没怎么上过学的人动起来，我们又想出布瓦吉吉挨哈姆迪耳光的情节。这个地方以农业为主，甚为传统，这可会让人大受刺激。总之，就像美国对待阿拉伯世界那样，警察欺负弱势群体。’于是他们一脸坏相，掏出手机，微笑着说：‘这是魔鬼，是我们的武器。只要几通电话，就能把谣言扩散出去。对于我们来说，耳光是个细节。布瓦吉吉自焚，是因为市政府还有当权者拒绝接待他。’小道消息果然有惊人的威力。当天下午就约有2000位民众在政府机构前抗议。‘这天我们从警察的眼神就知道，恐惧情绪已经从我们的阵营转到他们那里了。’为了增加叙述的说服力，拉明还透露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细节：哈姆迪的亲兄弟法齐（在西迪布济德市任教员，同时是UGTT工会的积极分子）参与了谣言的策划。‘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有效的政治斗争。他没想到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我电话联系了法齐，他称‘不想见记者’。也许他感到自己有罪，亲手把亲人送进监狱。”[49]

是谁策划了布瓦吉吉事件？又是谁编造了这样一个“神话”？是“网络奸细”及与突尼斯“网络奸细”有联系的半岛电视台的那些人。这些人有录像设备，负责将影像材料传到多哈，再由半岛电视台不加审查地

立即播出。我们通过“革命”期间任内政部长的拉伊赫之口得知，布瓦吉吉就是个“流浪汉，是当你与爱人或妹妹一起散步时都会避而远之的那种家伙”。[50]为了纪念这位“烈士”，巴黎于2011年6月专门划出一个地方以他的名字命名。至此，突尼斯有两个人获得了在法国首都以自己姓名来命名地点的荣誉：总统布尔吉巴和流浪汉布瓦吉吉。真可谓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如此种种，人们在突尼斯的“所见所闻”并不能让人了解之后在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发生的事件的真相，反而是通过观察这些国家的事件，才了解在突尼斯真正发生了什么。换言之，要认真分析半岛电视台在这后四个国家的所作所为，才能了解其真实目的。我的同胞们所犯的分析错误在于将自己局限于突尼斯来审视其“革命”。只有将突尼斯放在马格里布，甚至阿拉伯地缘政治框架下，我们才能认识到“茉莉花革命”的巨大地缘战略冲击，因为它孕育了“阿拉伯之春”。

正是因为反对半岛电视台这些可耻的做法，本·吉杜等多名该台明星记者辞职。早在2010年就有不少女记者辞职，以抗议半岛电视台意识形态浓厚的编辑路线以及要求她们穿着符合伊斯兰激进主义价值观的衣服。

本·吉杜选择辞职是出于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因。他撰文称，半岛电视台对阿拉伯起义的报道有失偏颇，没有坚持客观性和专业素质。“半岛电视台毁掉了保持专业素质和客观性的整个梦想。半岛电视台脱离自己的媒体身份，成为宣传与动员的行动总部，专业素质被抛弃在路边的臭水沟。”[51]2011年5月他接受采访时披露，有人想暗杀他，并设法使民众质疑他辞职的真正原因。“我也许失去了半岛电视台，但我赢得了尊重。”他以这句话结束访谈，我也以这句话自勉。

本·阿里下台后第二天，半岛电视台的旗帜就飘扬在突尼斯市中心离内政部不远的非洲大厦上，真有象征意义！2011年1月21日21时20分，半岛电视台对“自独裁统治下解放”的突尼斯市进行直播，画面中还有“烈士”布瓦吉吉的母亲（之前她就被安排好了说辞并拿了钱），

报道十分感人。另外一则报道是关于“从叛徒手中终获解放”的清真寺的。在一个堪比戈培尔作品的报道播出前10分钟，半岛电视台一如既往地播出了“基地”组织领导人谢赫本·拉登的最新消息，他向“伟大的突尼斯人民”发来祝贺、抨击法国。该台一直给予拉登这个罪犯以谢赫头衔，也从来避免直呼恐怖分子的姓名，而代之以“被称为恐怖分子的那些人”等无耻说法。2007年4月，阿尔及利亚发生恐怖爆炸，半岛电视台竟然无耻到在其官网上搞民意调查——你赞成还是反对阿尔及尔的袭击？54%的“受访者”竟回答“赞成”！

据可靠消息，卡塔尔锁定的第二个国家（第一个是突尼斯）不是利比亚，而是阿尔及利亚，但阴谋未能得逞。不仅是因为在这个有百万烈士的国家，包括年轻人在内的人爱国主义意识仍然强烈，也是因为阿尔及利亚情报部门于2011年2月截获了500部带有半岛电视台标识的手机。这些手机原本是要送给特定人群用来拍摄视频再传回电视台的。

克莱尔-加布里埃尔·塔隆是最有资格谈论半岛电视台的人之一。[52]这位巴黎政治学院的女研究员说：“该台自认为是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政权反对派的论坛，发动电视广告战，为民主革命说好话。……因此，很难评估半岛电视台在这些‘革命’中的作用，但迄今，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它向阿拉伯世界播放了大量起义画面，覆盖到了那些不上社交网站的民众。”[53]

这样，由于建立了虚拟和真实世界之间的连接，生活较安逸的年轻网民与贫穷民众之间形成互动。互联网的催眠作用与半岛电视台的混淆视听相结合，使突尼斯人群情激愤并在军警的弹雨下如火山爆发。接着，该国的命运落入民主制度的死敌——伊斯兰主义者之手。

维基解密网站可一点儿也没饶过卡塔尔埃米尔的电视台。驻多哈的美国大使认为，半岛电视台犹如卡塔尔一直使用的“十分有效的外交工具”，类似于“为对外政策铺路的金钱”；“该国调整半岛电视台播出的

内容，以取悦外国国家元首，来换取他们停止对自己的指责”。[54]以上就是卡塔尔的手段。

另一重要人物是哈马德·伊本·贾西姆·阿勒萨尼，外界视其为埃米尔的宠臣，但他只听命于自己的保护人希拉里·克林顿。据维基解密披露，美国大使说了这么一件事：半岛电视台管理委员会主席谢赫哈马德·伊本·萨默·阿勒萨尼（埃米尔的堂兄弟）跟参议员约翰·克里说，他已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提出一项交易，即穆氏在巴以和谈问题上改变立场，半岛电视台在埃及停播。换言之，埃及这一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如果跟随卡塔尔这一阿拉伯世界的“阑尾”的立场，就会得到安宁。

对于本·阿里的倒台，我一点儿也不遗憾。我遗憾的是，卡塔尔居然能在那场有5000年历史的民族的“革命”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仅仅独立了差不多40年，仅仅由于在“阿拉伯之春”中所起的作用及金钱外交，卡塔尔就摇身一变成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灯塔，每个人冲着它点头哈腰。继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布迈丁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后，属于谢赫谢哈穆扎、谢赫哈利法·阿勒萨尼及其堂兄弟贾西姆·阿勒萨尼统治下的卡塔尔的贝都因统治时代已经来临。贾西姆2009年7月试图搞政变失败后，只要埃米尔出国，留在国内的贾西姆总会有人“陪”。这次政变半岛电视台当然要保持沉默。

半岛电视台也不会提及如下事实：美国国务院给卡塔尔扣上“贩卖人口嫌疑国”的帽子；到“天堂似的埃米尔国”打工的外籍雇员（包括记者），一踏上卡塔尔土地便被没收护照，成为人质和奴隶；一位比利时公司的管理人员菲利普·博盖尔特在卡塔尔遭敲诈、侮辱、羁押；德国记者海迪被当作人质长达数月；卡塔尔外交部前发言人因写了一本得罪王室的书而人间蒸发；美国在卡塔尔有埃斯萨利亚陆军基地，还有巨大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装备贫铀弹的飞机曾从那里起飞去屠杀伊拉克人，如今是去轰炸阿富汗；萨达姆在等候美国法庭的审判期间，被关押在卡塔尔，而非科威特；三名卡塔尔人在美执行侦察任务，其

目标后来成为“9·11”事件中遭袭的建筑；美国驻以色列前大使马丁·因迪克当上了卡塔尔新闻事务负责人，还创建了萨巴中东政策研究中心；2011年3月，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与卡塔尔签署协议，以便西方列强瓜分利比亚的油气和淡水资源；卡塔尔向利比亚及叙利亚叛军提供军火；卡塔尔与以色列关系甚笃，这是公开的秘密；丹麦报纸用漫画亵渎真主事件中的主编弗莱明·罗斯，于2009年5月3日应邀赴多哈，参加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卡塔尔赞助的世界新闻自由日活动。还有其他很多类似的令人恶心的例子，都是那帮黑手党式的人干的。他们除掉了卡塔尔民众拥戴、合法上台的埃米尔，靠驻扎在该国的大量美国兵的支持，控制着民众。因为他们是极愿为西方效劳的仆人，所以他们要求其他所有阿拉伯国家有样学样——这便是卡塔尔在利、叙、也、埃、突等国“革命”中积极活动的用意。

2011年6月7日至8日，半岛电视台记者克里申在开罗采访知名学者穆罕默德·哈桑宁·哈伊克尔，希望从他那里得到道德和思想方面的言论来支持半岛电视台之前对“阿拉伯之春”的“解读”（如果避免用“编撰”一词的话）。哈伊克尔将这些“革命”重新置于地缘政治框架中，从某些西方大国赋予这些“革命”的战略视角进行分析：承认以社情民意来解释“革命”的合理性，同时不强调民众起义的自发自觉性；表示担心国家（并非政权）崩溃、部落主义回潮（特别是利比亚和也门）；提醒人们注意叙利亚不稳定的局势，卡塔尔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其搞垮；强调境内和境外因素相互联系、影响；明确表示美国对这些阿拉伯政权有后备计划。他无愧于自己的名声——一个自由思想的大家，对事件的背后有着深刻思考。

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的其他阿拉伯“学者”却表现迥异，特别是阿兹米·贝沙拉。他长期享受叙利亚的资助，最后却背叛了它。我们所看到的“放过约旦”“洗白巴林”“集中火力对准叙利亚”的一幕幕将写入历史。“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一林肯名言可以送给贝沙拉和雇用他的半岛电视台。

半岛电视台从来就没有客观过，也没有给阿拉伯世界带去哪怕一丁点儿言论自由或民主的价值观。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说的，它生来就带有背叛、挑拨和破坏的基因。卡塔尔创建半岛电视台，就是为了潜移默化地在阿拉伯世界甚至在西方推广激进主义，以便为那个富豪寡头政权及其主子的商业利益服务。自建立之初，半岛电视台就是要破坏沙特阿拉伯、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稳定，这些国家也是“基地”组织的优先目标！它令利比亚陷入战火，又转过来对付叙利亚。大马士革的政权虽然独裁，但也是世俗政权，2002年起采取了更为开放的路线。其年轻的总统做了所有可能且必要的妥协，以便国家走出由境外因素导致的危机。但也有人采取一切手段进行阻挠，使得包括安南方案在内的所有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的实施都遭遇失败。因此，半岛电视台和卡塔尔对众多阿拉伯国家是有血债的：突尼斯丧生的有数十人，埃及、也门以及利比亚、叙利亚有成百上千人或更多；他们或是被一些无所顾忌的士兵杀害，或是死于美、法、卡支持的叛乱或恐怖分子之手。

自成立之日起任半岛电视台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萨默，其政治生涯始自官方宣传和新闻审查部门。“在信息部起步时，他对媒体自由的态度至少是‘严管’。此后他先是任印刷品审查部门的负责人，后任境外记者监控部门负责人，再任副部长。”[55]萨默自称获得卡塔尔“知名”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罗贝尔·梅纳尔将这位谢赫描写成一位“极其缺乏魅力的年轻人”，“说话乏味，为人敏感，我们嘴里关于信息自由的故事让他觉得很难受”。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当上了由卡塔尔创立的位于多哈的信息自由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普遍认为，该中心是由“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前负责人梅纳尔领导的。在该中心管理委员会里，我们还惊奇地发现有其他法国人，如多米尼克·德维尔潘，他也是埃米尔夫妇的座上宾！

“国家”军队与美国的地缘政治

首先，我要对那些对“人权第一”原则念兹在兹的人说一句：除了自由，还有安全，国家对公民的首要义务是确保社会稳定。“人权第一”思想的旗手是法国著名学者贝尔纳-亨利·莱维，他对“班加西免于陷入血泊”（却同时导致其他众多利比亚人死亡）大加赞赏。但他知道，所有国家，不论其政权性质，均有权利与义务维护自身安全，抵御来自境内的动荡或境外的入侵。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法暴力”，即只允许国家垄断暴力、实施暴力。一些人给我扣帽子，说我是反对《欧洲人权公约》的反动学者。我要提醒他们，该公约第二条在“任何人的生命权都应受法律保护”前提下列举了欧洲国家可以剥夺生命权的三种例外情况：防卫任何人的非法暴力行为；为执行合法逮捕或防止被合法拘留的人脱逃；为镇压暴力或叛乱而采取的行动。对于逝者，我表示遗憾，对于罪犯，我表示谴责，但我还是要说，本·阿里、卡扎菲、穆巴拉克和巴沙尔做出反应，完全合法。

皮埃尔·哈斯基正确地指出，在突尼斯，首批显示抗议者遭枪杀的照片“可能就意味着这场演变为政治革命的社会危机已经走上了不归路，毫无疑问，这是脸书效应”。[56]之前，我们已经了解了这场社会危机是如何演变成政治革命的，幕后推手是谁，即“网络奸细”与半岛电视台联手行动，前者控制了脸书的用户，后者用宣传催眠功夫全面控制了突尼斯民众。还有军队，它的介入最终完成了这场“人民自发的革命”。对军队的形象事先要做一番修饰，于是“网络奸细”编造出了“向本·阿里说‘不’的将军”拉希德·阿马尔的“神话”。这则登上国际媒体头版头条的谎言，是住在布鲁塞尔的突尼斯“网络奸细”亚辛·阿亚里的杰作。这一谎言对其后的事件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是谁让他编瞎话的呢？是美国情报机构。该机构还于2011年1月14日命令阿马尔将军搞政变。

本·阿里一直否认曾下令向抗议人群打实弹。2011年1月10日，他跟我通电话时是这么说的，当时我对民众无辜的无谓的牺牲表达了痛心之情。1月14日，我向本·阿里提出辞职时，他又说没下令开枪。这是我跟他的最后一次通电话，几个小时后，他被迫流亡沙特阿拉伯。

当时我不相信他所言，因为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只能由总统本人下达，他还是三军统帅。但本·阿里可能并未说谎。这一政治自杀式决定（况且从治安的角度看，该决定极其错误）的源头，极可能不是他，不是内政部长拉菲克·贝勒哈吉·卡西姆，不是总统卫队司令阿里·塞里亚蒂，也不是防长里达·格里拉。今天，我有很多理由相信，是阿马尔将军在美国驻突尼斯武官的授意下下令开的枪，就是要走上哈斯基所说的“不归路”。因此，我控诉拉希德·阿马尔将军犯下谋杀和叛国罪。

2010年12月18日至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军队的所作所为与1984年1月那次流血骚乱、1978年那次（不那么血腥的）骚乱中的表现相同，都是无情镇压。另外，2008年在阿马尔将军的指挥下，军队镇压了加夫萨地区的矿区人员起义。值得一提的是，在“茉莉花革命”爆发之际，本·阿里命令阿马尔集中指挥所有治安部队（军队、警察、国民卫队和总统卫队）。因此，阿马尔将军是在位于内政部（而非国防部）的总部里指挥所有部队的。

如今，这些情况在突尼斯是公开的秘密，但我们仍不知道那“5个以色列狙击手”的情况。他们在突尼斯城内被捕，遭突尼斯电视台曝光。2011年1月19日，这条“信息”出现在每日影像（Dailymotion）和脸书上，半岛电视台接着报道后没了下文，后来就再无人提起。为什么？因为这些狙击手根本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东欧人，是替美国干活的雇佣兵。不是本·阿里请他们来的（当时“网络奸细”和半岛电视台都故意认为是），而是美国情报机构，正如曾经辉煌一时的拉美国家搞政变年代发生的事情一样。他们的任务是散布恐慌，将突尼斯搞乱。这一幕，后来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重演。半岛电视台还播报假消息称以色列武器已送达卡扎菲手上。2011年1月14日政变后次日，这些被突尼斯警察追捕的狙击手大模大样离开了突尼斯，未受任何惩罚。阿马尔将军亲切目送，跟迎接他们当初到达突尼斯时一样。

本·阿里被迫下台后，拉希德·阿马尔的动作还没完。2011年1月15日起，通过间接控制，这位政变将军成为突尼斯的真正强人。他肩负

双重任务：其一，将突尼斯南部变成法-英-卡的中转基地，将武器和雇佣兵运至利比亚，以便推翻卡扎菲政权；其二，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控制突尼斯“革命”进程，直至政权以“民主”的方式移交至伊斯兰势力手中。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首次举行“透明、民主”选举，反映了权力移交的实际情形。该选举由美国非政府组织资助、监督、控制并宣布合法有效。突尼斯人被告知，这场选举以制宪为目的，目前的伊斯兰政府只是暂时过渡，直至立法和下一场总统选举。突尼斯人还不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伊斯兰主义者都会紧抓政权不放，他们不会在突尼斯搞“再伊斯兰化”（突尼斯14世纪以来一直是伊斯兰国家），而是搞“瓦哈比化”，建立以神权统治的集权国家。这一点也适用于利比亚、埃及、也门和叙利亚。叙利亚一旦落入穆兄会之手，20世纪七八十年代黎巴嫩的命运就会降临在它头上。这就是这些国家的未来。

在突尼斯，伊斯兰主义者不会对小偷施以斩手惩罚，不会立即在法律问题上“开倒车”。突尼斯现行法律赋予妇女的权利之多，这在阿拉伯世界里是绝无仅有的。他们不会勒令旅馆关门，但会推动伊斯兰式旅游；不会改变突尼斯经济中的自由主义方向，却会搞美式市场经济；不会强迫妇女戴头巾，但会通过社会舆论施压；不会废除现代化的国民教育体系，但会修订教科书，塞进涉及身份认同和教派意识等内容；不会对民法和刑法做大的改动，但会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搞“切香肠”式的伊斯兰化。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伊斯兰主义者打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鼓吹的“温和”伊斯兰主义的旗号，将以小步、渐进的方式进行转变。埃尔多安已经成为泛伊斯兰主义务实派的新标杆，其主张都是经美国新保守派审查通过的。

此前，我在拙作《迦太基将不会被摧毁》中写道：“无须再论述美国打激进主义这张牌了，因为它唯一关心的是石油。[57]通过搞乱阿尔及利亚（该国在能源和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整个马格里布地区都将被锁定。如果该国落入激进主义分子之手，突尼斯、摩洛哥和利比亚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58]除了在细节上有所不

同，我们正置身于这样的场景。但最大的不同是，导火索不是阿尔及利亚，而是突尼斯及其光荣的“茉莉花革命”。为何出现如此变化呢？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出台了相关战略，该战略不久被“大中东民主计划”取代。如何解释美国重新推出这一旧战略？奥巴马总统打所谓的温和伊斯兰主义牌，其利益何在？

上述问题正是“9·11”事件导致的。刚一入主白宫，奥巴马总统就从此次恐怖袭击中吸取教训，但他所理解的教训，恰恰与小布什所认识的相反。更确切地说，奥巴马的顾问团队认为，小布什对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的解决之道、应对恐怖“圣战分子”的政策，是无效的、适得其反的，特别是毁掉了美国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形象。我说“解决之道”而不是“战略”，是因为美国的“旧战略”得以延续：通过强迫阿拉伯世界民主化、与伊斯兰主义者维持良好关系这两种手段，实现“大中东民主计划”。

用一种简单化、类型化的解读，这一“解决之道”是，小布什打算只以暴力手段实现该目标，但这种解读不完全正确。新保守派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军事手段消灭敌人（伊拉克、塔利班、“基地”组织等），但也必须承认，他们同时向传统盟友——埃及、突尼斯、摩洛哥、沙特阿拉伯施以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以迫使其在政治特别是经济领域搞自由化。情报界、人道主义基金会、研究民主问题的中心、维护言论自由的机构、人权非政府组织、非暴力民主组织，所有这些在小布什任期内成立并发展壮大的组织机构，在奥巴马统治下继续享受资助和后勤支持。仅举一例，2002年小布什执政期间发起的中东伙伴关系倡议，在奥巴马任内继续成为美国外交工作的排头兵。

然而，小布什与奥巴马对阿拉伯世界的认知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前者出于无知和福音主义思想，蔑视伊斯兰主义；后者主张各宗教混合论，再加上多愁善感、假仁假义，不过他对伊斯兰教是真的着迷。我认为，这种不同的文化、性格和个人经历，对于美国战略延续中“解决之道”的调整是至关重要的。小布什倾向于（以硬实力）解决

伊斯兰问题，却铩羽而归；而奥巴马是试图（以软实力）达到相同目的，将昔日的伊斯兰“敌人”变身为未来的“朋友”。如果你了解国际关系史或懂得分析奥巴马上台以来，甚至上台之前的讲话，那么这种重要变化还是能预测的。

2009年4月6日，奥巴马在安卡拉发表讲话，称“美国并未与伊斯兰开战”。许多人大赞这一“决定性”转变，却忘了小布什也是这么说的，而且说了不止一次。相比小布什时期的确有一变化：布什嘴上说却心里不信，但奥巴马信仰伊斯兰！他称，要“向伊斯兰信仰表达深切的感谢。该信仰在数个世纪里引导这个世界向善，包括我自己的国家”。他还表示，除了那些攻击美国的恐怖分子，美国将向所有穆斯林敞开怀抱。鉴于“基地”组织的成员只占伊斯兰世界的极小部分，奥巴马讲话所针对的人群非常庞大，包括遵守美国提出的地缘政治新协议的所有政治伊斯兰势力。这有点儿像1945年2月14日罗斯福总统与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在美国军舰“昆西号”签署石油换保护的协议。[59]此举至今仍使这个瓦哈比主义王权国家免于接受美国的民主要求，也使其暂时免受“阿拉伯之春”的冲击。

2009年6月4日，奥巴马在开罗大学的讲话使人能够管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地缘政治新方向。他以一句极具潜意识意味的“Assalaamou Alykoum”（愿你平安）作为开场白。他接着说道：“我来到这里是要在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寻求一种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点的新开端——基于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并不相互排斥、不必相互竞争的真情实意。不仅如此，它们相互重合，拥有一些共同原则：公正与进步；容忍与尊严。这种信念一部分来源于我个人的经历。我是基督教徒。我父亲来自肯尼亚一个绵延数代的穆斯林家庭。我小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生活过几年，听到过宣礼塔在破晓和日落时刻的召唤。我年轻时在芝加哥的社区工作，那里有很多人从伊斯兰信仰中找到了尊严与安宁。作为一个研读历史的人，我还知道伊斯兰教对文明的重大贡献。……因此，在来到伊斯兰教的最初降示之地以前，我已经在三大洲了解了伊斯兰教。这段经历使我确信，美国和伊

斯兰世界的伙伴关系必须基于真实的伊斯兰教，而不是那些不实之词。身为美国总统，我认为我的职责之一是随时驳斥对伊斯兰教的成见。”以上讲话奇怪地让人联想到某些天主教布道者的说教。[60]

奥巴马演讲的最后部分，才显示了美国在伊斯兰土地上推广民主的想法。他说：“没有任何一种政府体制能够或应该被一个国家强加给另一个国家……每个国家以植根于本国人民传统的方式给这一原则（民主）赋予生命力……所有这一切必须通过合作关系来实现。美国人已准备与各国政府及公民、社区组织、宗教领袖及穆斯林社区的公司企业携手努力，帮助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

弥撒做了，对未来的伊斯兰民主体制也从文化和实质两个层面也遮遮掩掩地说了。但伊斯兰民主制不会照搬照抄法国普世主义的民主模式，那它会适应阿拉伯民众的历史和宗教传统吗？伊朗学者贾利利表示：“独裁者当上看护人、念歪了经的民主制、传播充满虚幻的改革思想，这一切成为伊斯兰主义的民主，西方一些人认定这种模式适用于其他伊斯兰国家。”[61]

奥巴马为伊斯兰主义者开辟了道路，向宗教领袖提出建立合作关系，意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伊甸园。这就是社会生活层面的美国式宗教概念，与法国人文主义的、世俗的、普世的模式截然相反。在该讲话中，奥巴马厚颜无耻地攻击法国的世俗制度，并为遭边缘化的穆斯林辩护：“同样，西方国家必须避免妨碍穆斯林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宗教活动，例如不能对穆斯林妇女的着装进行强制规定。我们不能以自由主义为幌子敌视任何宗教。信仰应有助于我们休戚与共。”奥巴马的论调再次与塔里克·拉马丹惊人地相似。

奇怪的是，一些法国智库的观点与伊斯兰主义相近。2007年4月23日一份题为“马格里布-中东”的报告称：“与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建立联系的难题浮出水面。上述势力是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对民众有巨大影响。其下属的机构运作高效，如果举行自由选举（正如我们一直在鼓励的那样，当然，是原则上的自由选举），他们能够

上台……阿尔及利亚深陷在自己的怨恨情绪之中，不管我们怎么做，都无法得到它的原谅；突尼斯具有温和与警察国家两个特点，算得上一位让人不放心的常客；摩洛哥有点儿像受宠的孩子，高贵、迷人、脆弱……伊斯兰运动在通常情况下是唯一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可代替现执政当局。”[62]

2009年4月26日，法国《世界报》刊登了我一篇长文——《伊斯兰的吸血鬼化》，明确指出美国试图与伊斯兰势力（按照最糟糕的版本，包括塔利班）合流。我写道：“小布什治下的美国无法击溃塔利班，因此，奥巴马将会与其合流吗？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融合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意图似乎日益成真。”2009年4月，希拉里·克林顿表示有必要与“塔利班”的“温和派”进行对话，当时就让我震惊。当读到奥尔布赖特的著作《上帝、美国和世界》时，我理解了美国为什么希望融合伊斯兰激进主义，因为这一想法早在比尔·克林顿时期就是美国的战略选择。我意识到奥尔布赖特是在拐弯抹角地为如下立场辩护：如果大部分穆斯林赞成伊斯兰势力上台，那么就以民主的名义、以各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名义让他们这么做，前提条件是将其限制在一定地理范围内。总之，“如果民众选择伊斯兰主义者，那是他们的事（他们要伊斯兰教），不是我们的（我们要做生意）”。换言之，要跳出文明冲突论，不是通过包容诸文明的手段（最理想的情况是通过一种各民族均认同的、普世的、人文主义的文明），也不是通过相互排斥的方法，而是主动去搞隔离。“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用作家吉卜林的话就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老死不相往来。”美国人会这么说，如果民众将伊斯兰主义者送上台，那是他们的选择和权利。这是民主游戏的规则。其他人会想，阿拉伯人不值得拥有更好的。如亨廷顿、珀尔等人就认为：神权统治扎根于阿拉伯人的宗教，伊斯兰主义是他们的文明，暴力是他们的基因。就让神权统治、伊斯兰主义、暴力在他们的“自然”环境中肆虐。“给他们伊斯兰教法，给我们石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几年前，小布什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当被问及对外政策的理论参考时，他说他的“总统岗位的DNA”是夏兰斯基的《论民主：战胜暴政和恐怖主义的自由力量》。[63]夏兰斯基是苏联时期的异见分子，移民至以色列，曾在沙龙内阁任部长，后辞职以抗议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书中，夏兰斯基不是把阿拉伯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而是各族群、部落、教派的拼凑。因此，他主张利用这些断层带，推行“建设性不稳定”战略。他与刘易斯、亨廷顿等人一起构成“大中东民主计划”的主要理论家。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这一旨在重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战略有一个代号——“创造性混乱”。[64]当时赖斯宣称，要以英国人对付阿拉伯部落首领的手段对付这些国家。

前文所言，丝毫不含“初级反美主义”的因素。相反，我一直赞赏美国人民及其对民主的热爱。我是第一批在《解放报》和《费加罗报》上谴责“9·11”事件的阿拉伯学者之一，并指出拉登是黑手，阿富汗是后勤基地。[65]但历史永远不会原谅美国政府的做法。它操纵年轻人（从政治和才智的角度看，他们都非常脆弱），把美国长期支持的阿拉伯独裁统治赶走，代之以伊斯兰神权统治（其“温和”性质符合白宫的标准，也获得了与产油国联系密切的金融卡特尔的首肯），或代之以混乱和内战。

美国深受拉登领导的“圣战”恐怖主义之害；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其在穆斯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美国分析人员知道，那些逃离自己国家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主义者是“基地”组织潜在的招募对象；迫害这些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权是美国的保护对象；夺权的伊斯兰势力将启动（理论上而言）程序，让他们成千上万的信徒和同情者回流原籍国；执政的伊斯兰势力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包括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目前为止）、卡塔尔；面对中、俄、欧及新兴国家，美国应保住世界领导地位；应当找到“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一问题的答案。因此，美国决定打出伊斯兰“温和派”这张牌，根据自己的

战略利益来重塑整个地区。但“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实施破坏了地中海联盟的建设。[66]

美国之所以决定打这张牌，不仅是针对突尼斯（“阿拉伯之春”的孕育者）这一实验室、起飞平台，而且是针对被“2.0版革命”锁定的诸多国家。早在小布什时期，这些国家就被选中用来重塑“大中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人试图在地中海地区构建一个逊尼派地缘战略弧：从摩洛哥至土耳其，经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以及未来的“约旦-巴勒斯坦国”，加上巴基斯坦、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其他产油国；什叶派的伊朗就被完全孤立，石油保住了，穆斯林信仰也保住了。

许多人仍然会问：把听命于己的政权弄垮，美国的利益何在？为伊斯兰主义者上台提供便利，美国的目的何在？这两个问题我早就回答了。但作为结论，我将对所有可能甚至极可能为真的答案给出综合叙述。

传统上，美国的对外政策极具战略性，极少是战术性的。它总是着眼于地缘政治，基本不考虑细小政治因素。美国从不针对单个国家进行思考，而总是针对国家集团进行思考；从不是短期思维，而总是中长期思维。因此，突尼斯被选为优先目标，尽管它既没油，也不具备关键地缘政治利益。它只是被作为引爆阿拉伯火药桶的导火索，阿尔及利亚首当其冲。幸运的是，阿尔及利亚顶住了，至少到目前为止！

何为地缘政治决策？其定义决定了所涉及的是多个目标。同理，一个优秀的战略选择意味着诸多利益。在外行人眼里，这些利益似乎相互矛盾，但它们有内在逻辑。美国打着人人获得民主、自由的旗号，打着伊斯兰势力的牌，为的是其中某些利益。

其一，在憎恨美国的伊斯兰世界重塑、美化自己的形象，使“圣战”恐怖主义的优先目标不再是美国了。美国这个“民主制度的麦加、

人权的圣地”不再保护阿拉伯独裁者，反而成为伊斯兰反对派的大善人。敌友关系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其二，推广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该模式近年来颓势尽显，其造成的后果正是阿拉伯“革命”之源。穷人和失业者是全球化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颐指气使的牺牲品。那些剥削者通过压迫这些牺牲品的政府来实施剥削，也正是这些剥削者引导牺牲品产生不满并转而对付自己的政府，并为其“打开枷锁”，为的是让美国致命的自由主义天长地久（这种致命的自由主义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负债最多的国家），但美国人也知道伊斯兰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韦伯等新教教徒看来，伊斯兰主义者在宗教层面相信神圣化的资本主义是有美德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可以依赖可靠盟友——伊斯兰主义者，他们的先知并没说“卖掉你所有值钱之物然后跟我走”，而是说“经商致富吧”。

最后，美国还将打击欧洲，或更确切地说，搞掉法国（它与一些阿拉伯国家维持着经久的优先关系），自己上位。法国希望通过利比亚战争重新投资该国，但美国只给它几个小渣，就像在伊拉克一样。法国的政绩工程“地中海联盟”早已半死不活，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振臂一呼，“地中海联盟”就再也没了意义。这是从阿拉伯民众票箱中选出来的伊斯兰政权（正如精灵从阿拉丁神灯中钻出来）执政的必然结果。

逊尼派地缘政治之弧是美国试图建立的“绿线”，将延伸至阿富汗以外，吸收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这是扼杀俄罗斯的战略。该扼杀战略也适用于中国，因为该弧（或用布热津斯基的词——伊斯兰新月带）的最终边界与中国接壤。美国要以一切手段阻止被亨廷顿称之为“伊斯兰-儒教联盟”的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接近。[67]对印度也是同理，它有1.3亿穆斯林，英国人早就基于纯粹宗教信仰的因素，人为创建了巴基斯坦（1947年）来削弱它。

在美国的新战略中，还有一条什叶派之弧：从伊朗到黎巴嫩，经伊拉克、叙利亚及数个海湾产油国（其什叶派居人口多数，如巴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像急于打掉伊朗那样急于打掉伊朗的什叶派势力，更确切地说，是“去掉那层石棉保温层”。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势力也负有重任，即不可让逊尼派势力越过美国所能容忍的界限。目前，美国控制伊斯兰势力的最好例子是土耳其。不管和平之舟如何驶向加沙，不管埃尔多安在达沃斯面对“妖魔鬼怪式”的西蒙·佩雷斯如何演技高超地大发雷霆，媒体对这一幕反响强烈，埃尔多安赢得了民意，满足了穆斯林的虚荣，维护了土耳其在巴以之间“公正掮客”的形象。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如果它真要让它的以色列友邦和谈，它尽可有其他施压手段。它想要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样板，就应当首先解放在其殖民重压下的塞浦路斯的一半国土，好让这一地中海地区的人民实现统一。它还应当就历史上屠杀亚美尼亚人、正在屠杀库尔德人的恶行认罪。

在美国的新战略中，土耳其将发展成地区大国，跻身大国竞技场。为土耳其谋得“帝国”新地位的，正是那些伊斯兰“温和派”国家，这些国家不久后将在阿拉伯世界站稳脚跟。是不是有点儿像“新奥斯曼帝国”的野心，为什么不呢?

总之，7年前我曾经赞同过这种策略，但当时是出于伊斯兰世界战略利益的立场，而不是美国的。我写道：“不必充当欧洲的‘牛尾巴’，假设土耳其有朝一日入盟，为何不当伊斯兰的‘鸡头’？土耳其永远不会完全准备好融入欧洲，它最大的也是无法克服的一点是伊斯兰特性。这使得人们不敢敞开心扉跟它对话，但它早已准备重回自己的自然环境——伊斯兰世界。80年来由于其悲惨的宿命而放弃的信仰，并非重建一个奥斯曼帝国，而是建立一个新的地缘战略实体，包括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并担负起领导这一集团的历史责任。但是，这个集团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不一致。与其融入有深厚基督教传统的欧洲，不如充当一

个正在找寻现代化道路的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因子。文明层面的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既是历史的赐予，也是世界地缘政治发展的新态势。中长期看，这个伊斯兰集团是会出现世俗的民主的意识形态，还是会出现独裁的神权统治？换言之，如果不围绕一个人文主义的务实的和平的计划来整合伊斯兰世界，那伊斯兰世界就会在更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旗帜下聚拢。就此前景而言，预言家亨廷顿的末日论必将到来。”[68]

俗话说“魔鬼总在细节中”，这个细节就是伊朗。在我2004年的分析中，伊朗是伊斯兰联盟的一员。在美国的新战略中，逊尼派新月带应当用于孤立伊朗，等待它缴械投降。我分析认为，这一伊斯兰联盟涵盖所有教派，构成一个足够强大的地缘政治集团，足以对抗世界列强。美国的战略是让那些意识形态上较同质（伊斯兰“温和派”）的国家联合，让其听命于土耳其，以在全球维护美国强权，并使阿拉伯国家在技术和军事上都逊于以色列。

该战略不是亨廷顿的杰作，而是伯纳德·刘易斯的[69]。这位著名的伊斯兰问题专家痛恨爱德华·赛义德，其学术生涯始自为英国情报部门充当土耳其事务顾问，他对该国了如指掌，迄今他还是土耳其的好朋友。他有英、美、以三重国籍，曾于内塔尼亚胡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期间（1984—1988年）担任内氏顾问。在小布什总统的班底中，他是最具影响力的新保守派战略家之一，鼓吹“民主化”阿拉伯世界，是他第一个使用“文明冲突”这个词，而非亨廷顿。几年前，一些美国分析人士写道：“占领伊拉克是实践刘易斯学说。”[70]2002年美国入侵阿富汗后不久，刘易斯向以色列《新消息报》表示：“如果西方想让人把巴格达、德黑兰或大马士革低效、任人唯亲的政权赶下台，那么与这些城市街头的欢庆人群相比，喀布尔街头的欢庆人群看起来就会像是送葬队伍。”瞧瞧这话说的。

对于那些知道“不了解历史就无法研究地缘政治”的人来说，让土耳其对付伊朗，这种场景完全站得住脚。萨法维王朝于16世纪初甫一

建立，便与奥斯曼帝国不断发生冲突。这已经是一场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宗教领导权的战争，鹬蚌相争，欧洲渔翁得利。

突尼斯的确专制，但自1957年来，它在政治上就一直进行自由的爱国主义的现代化。它的经济状况好于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甚至意大利。当毁掉这样一个国家时，土耳其人难道没感觉到这是在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倒车吗？而这些都拜假革命的疯狂所赐。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国家已沦为霸权主义地缘政治牺牲品，成为新殖民地后将会如何发展？这不是与阿拉伯人在“阿拉伯的劳伦斯”（英国人）指挥下反抗奥斯曼帝国（1916—1918年）一样？[71]不知道历史是否循环往复，但我知道，忘记过去者必遭惩。

经过数月的事态发展，美国的战略已经显而易见了。突尼斯也认清了伊斯兰主义者以及“进步主义”伙伴的真实面目，认清了卡塔尔起的重要作用。因为伊斯兰主义者拉希德·格努希终于承认“深深感谢卡塔尔，在突尼斯的‘解放’中，它是我们的盟友”。[72]突尼斯人也认清了“网络奸细”的重要作用，因为有些“网络奸细”打破缄默。而且有证据显示，拉希德·阿马尔将军指挥下的军队杀害了抗议者，而内政部长拉菲克·贝勒哈吉·卡西姆、总统卫队司令阿里·塞里亚蒂指挥的警察和宪兵得到的命令是“只射腿”，且只在正当防卫情况下。还有其他真相，但可惜，一切都无法改变突尼斯的命运。这些真相最多只能为历史学家或少数对生活在民主阳光下仍然心存希望的突尼斯人所用。

梅兹里·哈达德

---

[1] “茉莉花革命”，指发生于2010年末至2011年初的北非突尼斯反政府示威导致政权倒台的事件，因茉莉花是其国花而得名。2010年12月17日，一名26岁的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触发境内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及争取民主活动。事件导致时任总统本·阿里倒台，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第一场人民起义推翻现政权的“革命”。——译者注

[2] Eric Denécé,《Les révolutions arabes ne sont que des coups d'État militaires masqués》,interview dans *La Tribune* du 1er juin 2011.

[3] Entretien avec Fayçal Anseur,dans *Algérie-Focus-com*,Montpellier le 18 juin 2011.

[4] 《Égypte:Nadine Wahab,la bloggeuse qui a fait tomber Moubarak》,*Jeune Afrique* No 2634,du 3 au 9 juillet 2011.Nadine Wahab vit actuellement enÉgypte et elle soutient la candidature à la présidence de Mohamed El Baradaï,l'un des membres de *l'Open Society Institute*!

[5] 《Opération Tunisia:la cyberattaque d'Anonymous aux côtés des manifestants》,*Libération* du 12 janvier 2011.

[6] 《Les cyberactivistes égyptiens formés par les Américains》,*Le Figaro* du 22 février 2011.

[7] Cité par *L'Observateur du Maroc*,www.lobservateur.info.

[8] Samir Amin,*Le Monde arabe dans la longue durée*,éd.Le Temps des Cerises,2011,pp.20-21.

[9] 特别是参加2010年9月20日至22日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会议的培训者，会议举行过程中启动了"中东、北非博主网络"倡议，该倡议由位于华盛顿、隶属于民主党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领导。

[10] David D.Kirkpatrick et David E.Sanger,"A Tunisian-Egyptian link That Shook Arab History",*New York Times* du 13 février 2011.

[11] 《A l'école de la révolution》,*L'Hebdo*（suisse）,du 12 mai 2011.

[12] Eva Golinger,《Venezuela:la grève de la faim à la mode de Washington》,article à consulter sur *mondialisation*.ca,2 mars 2011.

[13] Régis Genté et Laurent Rouy,《Dans l'ombre *des révolutions spontanées*》,*op.cit.*

[14] Ahmed 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éd.Michel Brûlé,Montréal,2011.

[15] Jean-Guy Allard et Eva Gollinger,*La Agresion Permanente*:*USAID,NED Y CIA*,Caracas,2009,éd.ministère vénézuélien de la Communication et de l'Information.

[16] William Blum,Rogue State:*A guide to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Common Courage Press,2001.Traduit en français sous le titre L'État voyou:un guide de la seule superpuissance mondiale,éd.Parangon,2002.On se réfère ici à l'édition tunisienne,Cérès,2002.

[17] Evgueny Morozov,*The Net delusion*:*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éditions Public Affairs,2010.

[18] Johan Livernette,《Les vérités cachées sous les révolutions arabes》,4 mars 2011,http://johanlivernette.com

[19] Ahmed 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op.cit.*

[20] http://latimesblogs.latimes.com/technology/2011/01/tunisia-students-using-facebook-and twitterto-organize.html

[21] Ahmed 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op.cit.*

[22] John Maroney, 《Mass.Company helps activists avoid online government censorship》,30 janvier 2011,http://www.necn.com/01/30/11/masscompany…

[23] Entretien avec Damien Leloup,dans *Le Monde* du 10 janvier 2011.

[24] Ahmed 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op.cit.*

[25] *Le Monde* du 22 février 2011.

[26] The Official Google Blog,"Some weekend work that will （hopefully） enable more Egyptians to be heard".

[27] Ahmed 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op.cit.*.

[28] Eva Golinger, 《La grève de la faim à la mode de Washington》,2 mars 2011,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context=va&aid=23482

[29] *Ibid* .

[30] Sami Ben Gharbia, 《La liberté de l'Internet Sophisme et l'activisme arabe numérique》,publié sur *nawaat.org* le 17 septembre 2010.Titre original: 《The Internet Freedom Fallacy and the Arab Digital activism》.Republié le 24 janvier 2011 sous le titre"Les cybers-activistes arabes face à la liberté sur Internet made in USA".

[31] *Ibid.*

[32] Robert Ménard et Thierry Steiner,*Mirages et cheikhs en blanc.Enquête sur laface cachée du Qatar,le coffre-fort de la France*,Editionsdu Moment,2010,p.29.

[33] 谢赫：伊斯兰尊称，用来称呼比自己年长或学识渊博的人。——译者注

[34] 埃米尔：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对王公贵族、酋长或地方长官的称谓。——译者注

[35] *Ibid*,p.81.

[36] *Ibid*,p.180.

[37] Benjamin Barthe,《Al-Jazira.Télé révolutions》,*Le Monde* du 6 mars 2011.

[38] *Afrohistorama.over-blog.com*,article-al-jazeera-a-t-elle été crée pour le grand projet…

[39] Marie-Pierre Subtil,《Les insoumises d'Al-Jazeera》,www.rdpl.info/article-les

[40] Ferjani Riadh,Middle East journa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vol.3,No 1,2010,pp.82-100.

[41] Mezri Haddad,*Carthage ne sera pas détruite.Autopsie de la campagne antitunisienne*,éd.Du Rocher,2002.

[42] *Marianne*,n°230,du 17-23 septembre 2001.

[43] Olivier Bouchara,《Soutirer des chèques au cheiks,pas si facile!》,magazine *Capital*,No 239,août 2011.

[44] 《Moyen-Orient:Al-Jazeera dans la tourmente》,interview accordée au magazine *Jeune Afrique*n°2634,du 3 au 9 juillet 2011.

[45] Sous la direction de Raphaël Draïet Jean-françois Mattéi,*La République brûle-t-elle*?éd.Michalon,2006.Voir mon chapitre 《Violence anomique ou violence atavique?》,pp.37-56.

[46] 米苏拉塔位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以东240千米，而下文中的巴士拉则是伊拉克巴士拉省的省会，是伊拉克第一大港及第二大城市。——译者注

[47] 《Hamza,13 ans,torturé et tué:le visage de la révolte syrienne》,*Rue 89*,du 30 mai 2011.

[48] Abdelhamid Larguèche,《Cette gifle qui n'a jamais eu lieu…en hommage àFadia,fille de Sidi Bouzid》,journal en ligne tunisien,*Leaders*,du 25 mai 2011.

[49] Christophe Ayad,《La révolution de la gifle》,*Libération*,11 juin 2011.

[50] Cité par Mohamed Amine Mankaï,《Tunisie,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 Mohamed Bouazizi》,*Kapitalis* du 23 juin 2011.

[51] Journal *Assafir*,du 23 avril2011.Pourtant,dès le 15 janvier 2011,devant ses invités Rached Ghannouchi et Abdel Bari Atwane,il a rendu un vibrant hommage à la révolution tunisienne.Il a mis cinq mois avant de découvrir la vérité et de la dire avec courage.

[52] Claire-Gabrielle Talon,*Al-Jazeera.D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dans une pétromonarchie*,éd.PUF,avril 2011.

[53] Son interview dans Témoignage chrétien du 4 mars 2011.

[54] 《Wikileaks cables claim al-Jazeera changed coverage to suit qatari Foreign policy》,article de Robert Booth dans le quotidien britannique *The Guardian*,du 6 décembre 2010.

[55] Robert Ménard et Thierry Steiner,*Mirage et cheikhs en blanc…*,op.cit.,p.85.

[56] Pierre Haski,《Après la Tunisie:Internet sert-il à faire la révolution?》,*Rue 89*,22 janvier 2011.

[57] Jean-Pierre Chevènement,dans son interview à l'hebdomadaire franco-arabe *Al-Moharer*,n°5,3 avril 1995.

[58] Mezri Haddad,*Carthage ne sera pas détruite*,op.cit.,pp.258-260.

[59] Plusieurs associations ou structures tunisiennes basées à Tunis ou à l'étranger,et plusieurs personnes ont bénéficié des fonds du MEPI.Je ne les cite pas puisqu'ils sont connus.

[60] Dans sa postface du livre d'Alexandre Del Valle,*Islamisme etÉtats-Unis*,*une alliance contre l'Europe*,*op.cit*.,p.346.

[61] Mohammed-Reza Djalili,*Libération*,17 janvier 2002.

[62] 《Rapport Maghreb-Moyen-Orient.Contribution pour une politique volontariste de la France》,23 avril 2007.*Blog.mondediplo.net*

[63] Nathan Sharansky,*Défense de la démocratie.Comment vaincre l'injustice et la terreur par la force de la liberté*,trad.Française,chez Bourinéditeur,2006.

[64] Mgr.Joseph Merhej en a fait une remarquable critique dans son essai *Chaos constructif ou chaos destructif*?,éd.Universitédela Sagesse,Beyrouth,2007.

[65] Mezri Haddad,《Par-delà le bien et le mal》,Libération du 19 septembre 2001;et 《Le virus théocratique》,*Le Figaro*,3 octobre 2001.

[66] Mezri Haddad,《L'Union méditerranéenne sera un projet de civilisation ou ne sera pas》,Le Figaro,23 juin 2008.

[67] Samuel Huntington,*Le Choc des civilisations*,Odile Jacob,1997.

[68] Mezri Haddad,《Le marchand de tapis et la stripteaseuse》,*Libération*,31 décembre 2004.

[69] Mezri Haddad,《Bernard Lewis,un savant dévoyé par la politique》,*Jeune Afrique* n°2255,du 28 mars au 3 avril 2004.

[70] *Jeune Afrique* n°2248,du 10 au 17 février 2004.

[7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地区发动“圣战”，入侵阿拉伯半岛，英国以支持阿拉伯独立为由参战。劳伦斯是英军中的传奇英雄，他带领阿拉伯战士在沙漠与敌军展开驰名的游击战，最终使土耳其联盟军惨败，并引发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崩溃。——译者注

[72] 《Ghannouchi dévoile le secret:la révolution tunisienne est de production qatarie》,article publié dans le journal qatari *Al-Arab*,le 31 juin 2012.http://middle-east-

online.com/?id=132279

突尼斯：再伊斯兰化的实验室

“阿拉伯之春”2010年12月17日诞生在突尼斯的西迪布济德。或许有人会说，“茉莉花革命”本来应该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而不是在这个如此现代、开放、文化教育水平高且文雅的国家。突尼斯“革命”先于埃及、也门及利比亚：“民主”的希望之花在这些“专制”国家的坟墓上开放。

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自1956年独立及“阿拉伯之春”开始以来，得以举行首次自由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通过一轮选举方式，选举217个席位的国会，负责组建临时政府，并在一年之内组织新的选举。该国定于2011年10月1日到21日举行选举活动，将世俗及伊斯兰教议题带入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在选举的协商过程中，突尼斯人民就社会类型的选择问题而不是引发“革命”的经济问题表达了意见。

2011年10月23日的选举结果让发动“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人感到愕然，尽一切可能阻止本·阿里实施镇压活动的西方也非常震惊：伊斯兰主义政党复兴运动获得了37%的相对多数选票，领先左翼世俗政党保卫共和大会党100万票，赢得了89个议会席位，后者仅获得29个议席。列第三位的是人民请愿党，该独立组织在选前默默无闻，却获得了26个议席。第四位是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FDTL），该政党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Ettakatol（社会民主党），也赢得了20个议席。排在后面的是：民主进步党（PDP，左翼），获得16个席位；现代民主力量（PDM，左翼），获得5个席位。妇女有58人当选，其中39人来自复兴运动党，只有19人捍卫维护女性权益的世俗观点。

议会中排名靠前的两大力量复兴运动党与保卫共和大会党，同第四大力量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组建了多数派联盟。复兴运动党及

保卫共和大会党出任行政机构的两个领导职务。保卫共和大会党主席蒙塞夫·马尔祖基当选共和国总统，他任命复兴运动党总书记哈马迪·贾巴利担任政府总理。掌握实权的并非共和国总统世俗捍卫者马尔祖基，而是政府总理伊斯兰主义者贾巴利。既然复兴运动党创造了最佳的选举纪录，那么该职位理应属于复兴运动党成员。

突尼斯新领导人

主张世俗主义的马尔祖基

马尔祖基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1945年出生，是本·阿里的宿敌，他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度过了辉煌的中学时代。在摘得阿拉伯语大赛桂冠之后，他获得奖学金前往法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他选择了从事医学行业：先是担任住院医师，1973年获得斯特拉斯堡医学院博士学位，并在那里担任助教。马尔祖基是内科、神经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

然而，政治这个魔鬼俘获了这名才华横溢的医生。他在转向突尼斯世俗的左翼政党之后，于1980年加入突尼斯人权联盟（LTDH）。他在政党内平步青云：1985年成为执行委员会成员，1989年当选执行委员会主席。1992年6月14日，该组织被解散。马尔祖基成立了“捍卫因言获罪人权利”的全国委员会，后来该组织也被宣布为非法。1993年3月，突尼斯人权联盟获得合法地位。然而马尔祖基决定不再谋求职位，而是积极投身于“大赦国际”突尼斯分部的活动中。他决定参加1994年3月20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但最终未能获得所需的签名数。随后，他的护照被没收，然后他被关进监狱。紧接着，他又成为阿拉伯人权组织主席。2001年7月25日，马尔祖基创建保卫共和大会党并担任该党主席。本·阿里政权拒绝承认该党，马尔祖基被苏斯医学院解雇，随后流亡法国长达10年之久。

2011年1月17日，本·阿里逃走，马尔祖基宣布将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并于次日结束流亡回国。3月8日，他的政党获得合法地位。在2011年10月23日的制宪选举中，保卫共和大会党获得的议席仅次于复兴运动党。当选议员后，马尔祖基遂成为共和国总统。他能力出众、严于律己、清正廉洁，此职务他当之无愧。他代表了突尼斯向往自由、世俗社会、知识、经济发展和妇女解放的愿望。

伊斯兰主义者贾巴利

哈马迪·贾巴利任突尼斯政府总理，其愿望同马尔祖基相去甚远。不过两人都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为之奉献的勇气。但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贾巴利还承受了更多的磨难。他于1949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大家庭（共有6个孩子）中成长。他首次遭受的磨难同其做木匠的父亲介入政治有关，他的父亲因拥护突尼斯民族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萨拉赫·本·优素福，于1957年被布尔吉巴当局监禁。在争取独立的战斗中，优素福曾经是“最高司令官”的朋友及盟友，后来却成为其最主要的对手。1961年布尔吉巴派人刺杀了优素福，优素福的追随者遭到囚禁，有些人被绞死。贾巴利还记得，孩提时他曾去监狱给父亲送少量的生活必需品。

1969年贾巴利于技术中学毕业。他前往法国兰斯同一个兄长相聚，并在科技学院注册，后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他在巴黎国立工艺美术学院继续其学业，专攻冷热处理的热力学及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专业，1978年获得学位。

贾巴利在巴黎求学期间，在安东尼大学的住处及茹尔当大道的国际大学城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并形成了以政治伊斯兰为基础的理念。在这些地方，他结识了蒙塞夫·本·萨勒姆，其后来成为他的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长，以及萨拉赫·卡克，其同拉希德·格努希均是伊斯兰倾向运动（MTI）的创立者和标志性人物，该组织后来在1989年更名为复兴运动党。这群年轻的伊斯兰主义者开始组织起来，在首

次接待伊斯兰倾向运动发起人（后来的复兴运动党主席）拉希德·格努希的来访之后，他们的热情被点燃了。格努希是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布道者，他以充满伊斯兰激进色彩的演讲，让这些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青年热血沸腾。正因此，在许多欧洲国家情报部门的眼中，格努希是一名煽动犯罪的恐怖主义分子。

1978年，在法国停留9年之后，贾巴利带着坚定的政治信念回到祖国。他将工程师职业的科学现代主义观念与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信念相结合，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在格努希被捕后成为伊斯兰倾向运动主席。

贾巴利因反对本·阿里的活动，先后被监禁了17年，其中10年被单独囚禁在3米长2米宽的斗室中。第一次宣判是在1989年，因为一篇关于军事法庭的文章他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1992年因政治激进主义他再次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复兴运动党的数千名支持者，这次他被军事法庭以“参加非法组织”及“企图改变国家性质”的罪名判处6年监禁。由于监禁环境恶劣，他在2002年进行绝食抗议。4年后，一项总统大赦让其得以出狱。

在历经这些磨难之后，贾巴利本应对推动这些理念的信心产生动摇。恰恰相反，他学会如何以一位“温和”伊斯兰主义者的姿态面对西方，尤其是面对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的外交官。他钢铁一般的意志及出色的自控能力，加上遭受被单独囚禁多年的磨难，让他可以将风格变得柔顺，同时却不影响其激进主义的信念。这位来自苏斯，外表平静的已婚男人、3个女孩的父亲，凭借两面三刀的手法让自己成为复兴运动党（该党于2011年3月1日获得合法地位）这一“温和”伊斯兰政党出色的正式候选人，角逐政府总理一职。他努力安抚西方投资者及游客，同时坚持使突尼斯重新走伊斯兰化的路线。贾巴利悄悄地建立起一个联盟：将复兴运动党、保卫共和大会党及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联合起来，组建起一个除三方代表之外还包括独立代表的政府。在41个政府职位中，复兴运动党获得了17个，某些职位具有很强的意识

形态职能：司法部长、人权和恢复社会正义部长（同时具有政府发言人的职能），以及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长。

贾巴利准备巧妙地夺取世俗民主派的“革命”果实，后者与西方一直配合默契。在2012年1月25日至29日举行的第42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贸然向西方提出请求：要求与会的世界经济大国为新生的突尼斯民主提供经济和资金支持。2012年2月2日，他又来到布鲁塞尔，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后者没能给他所要的经济支持。在会谈结束时，双方仅宣布准备在欧盟同突尼斯之间进行优先合作，成立一个企业家混合委员会，重新启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并开启自由贸易协定收尾阶段的谈判。贾巴利利用这次访问出入豪华饭店，会见了欧洲议会主席马丁·舒尔茨、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特琳娜·阿什顿。

萨拉菲派压力下的突尼斯社会

世俗主义者马尔祖基及伊斯兰主义者贾巴利对西方尤其是欧洲的访问次数不断增加，试图证明突尼斯民主状态的良好，而且有能力为来突尼斯的商人与旅游者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但他们无法隐藏国家所经历的无休止的动荡。自“革命”将本·阿里驱逐之后，许多萨拉菲派团体增加了暴力示威活动，强迫民众根据伊斯兰教法的教条生活。他们用恐怖手段践行传播信仰的热忱。为了使突尼斯人的风俗习惯与教条相符，他们的攻击活动日渐增多，并获得了沙特阿拉伯提供的大笔资金。因此在2011年5月，人民起义的摇篮——西迪布济德的酒吧被伊斯兰主义者勒令关停。同月26日，突尼斯西北部的坚杜拜省，由于警方逮捕了数名袭击平民的萨拉菲派人士，一群携带短刀、弯刀和燃烧瓶的蓄须男子愤怒地袭击了当地建筑。

艺术家遭到伊斯兰主义者迫害，未得到政府和司法的保护

萨拉菲派信奉伊斯兰教最根本的形态是瓦哈比派，该教派于18世纪诞生于沙特阿拉伯，并得到其石油和资助。他们希望实行穆斯林神权政治，严格实行伊斯兰教法。他们不喜欢突尼斯艺术家，指责其“亵渎神明”。他们通过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方式向艺术家发出死亡威胁，将其照片、姓名及住址放到脸书上，并注明“死的活的都要”，将这些人置于恐怖的氛围之中。他们对社交网站的了解与运用，同世俗民主派的支持者一样得心应手……他们试图通过网络，将顺应世界潮流、开放现代的突尼斯的发展进程逆转。

除了在社交网站上进行威胁外，萨拉菲派的暴力示威活动在本·阿里倒台后就已开始，并且日渐增多。2011年10月7日，总统选举前15天，突尼斯私营电视台纳斯马（Nessma）播放《我在伊朗长大》一片。这部法国、伊朗联合制作的动画长片由玛嘉·莎塔碧担任制片，用突尼斯阿拉伯语配音，引发了对宗教融合的争论。该片通过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叙述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影响。但动画片中有一个画面展示了安拉的面孔，这是伊斯兰教所不允许的。萨拉菲派对此极为愤慨，以此为由引发了一场暴动浪潮。他们涌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指控该电视台总裁纳比尔·卡鲁伊“损害神圣的价值观及良俗，扰乱公共秩序”，并要求对其进行审判。该片的审查人员及译制人员也被要求追究责任。10月9日，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企图攻击纳斯马电视台在突尼斯的办公场所，但被警方阻止。10月14日，100多名萨拉菲分子向纳比尔·卡鲁伊的住宅投掷燃烧瓶。卡鲁伊就播放引发争议的影片公开向突尼斯人民道歉，试图平息这场席卷全国的狂热的宗教龙卷风。

尽管卡鲁伊已通过电视进行道歉，但伊斯兰主义者仍继续示威，坚持要求对其进行审判。他最高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2012年5月3日，纳斯马电视台的老板被处以2400突尼斯第纳尔（约1200欧元）的罚金，理由是“影片的播放扰乱了社会秩序并损害了良俗”。法庭还判

决两名合作人各支付1200突尼斯第纳尔（约600欧元）罚金。司法服从了伊斯兰教法——这个“茉莉花革命”的“私生女”，不惩罚暴力的萨拉菲分子，却处罚“亵渎神明”的艺术界人士。更为讽刺的是，该判决宣布的当天正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本·阿里倒台后突尼斯也将其列为庆祝日。即便如此，泰米姆营地区清真寺的伊玛目侯赛因·贾兹里竟然还认为判决极不公正、过于宽大。他曾在5月4日周五祈祷时呼吁处死卡鲁伊，当天，他又在纳斯马电视台新闻节目中，继续抨击突尼斯司法部门：“如果法官是穆斯林，他就应该下令立即关闭这家电视台。”

司法不利于卡鲁伊，政府也不站在他那边。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2012年7月1日至10日，在拉马尔萨的阿布德里亚宫举行的“艺术之春”展览，引发了萨拉菲派的不满。这些宗教狂热分子不断叫嚣，表达对非穆斯林画家的仇视情绪。他们在各城市组织暴力游行活动“以捍卫其神圣价值观”，使突尼斯陷入数天的混乱状态。在抗议“艺术之春”作品展的宗教狂热分子中，还混有年轻的失业者，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抢劫。此间，萨拉菲分子同警方的对抗越来越多，政府颁布了宵禁令。这次伊斯兰主义者引发的骚乱造成一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数个警察局被焚毁，酒吧、影院等商业设施遭到洗劫……

2012年6月发生的一系列萨拉菲分子骚乱再次显示，贾巴利领导的政府具有两面性，明明关心的是帮助突尼斯社会再伊斯兰化，嘴上说的却是另一套。政府对艺术家受到的死亡威胁丝毫不予谴责，文化部长迈赫迪·马布鲁克（贴着独立派的标签，实际上为伊斯兰主义者参选服务）将过错推到艺术家头上，对艺术进行如此这般极端的阐释：“展览包含很多品味低下以及艺术性平庸的作品，损害并践踏了伊斯兰教的某些象征。有些人属于自修者，其造型艺术没什么可看的，而且传递了含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信息。艺术不应该传递意识形态，不应该是革命性的，它应该是美的。”而复兴运动党则投票通过内部决议，希望将“损害圣教的行为”从轻罪法庭移交至重罪法庭。

伊斯兰主义者威胁下的大学

萨拉菲分子还对突尼斯大学里的世俗主义阵地展开行动。对世俗价值观及民主的捍卫者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受伤的阶段：从2011年底开始，一群狂热的伊斯兰主义者占领了马努巴人类文学及科学学院，直到2012年1月24日才被警方驱逐。这些极端分子尾随教师及学生，甚至用匕首和弯刀对他们进行威胁。他们要求在学校里准许妇女穿戴面纱。萨拉菲分子的占领过程证明，复兴运动党伊斯兰主义同萨拉菲激进主义存在合谋：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长蒙塞夫·本·萨勒姆来自复兴运动党，他是贾巴利在巴黎时期的密友，在这起事件中，他可耻地采取了观望态度。教育部门未能向教师、学校行政人员和学生提供保护以抵御来自宗教狂热分子的人身攻击，存在严重失职。

然而，这起事件中世俗民主制度的捍卫者被再度送上被告席。2012年7月5日，学院院长哈比卜·卡兹达赫里被迫出现在该城西北郊区的一审法庭上，被起诉缘由是他侵犯了一名戴面纱的女大学生。事实上，卡兹达赫里院长是一位正直廉洁、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事发当天，两名戴面纱的女学生闯入了他的办公室，将文件弄得散乱一地，并试图毁坏文件。3月6日，马努巴一审法庭的检察官证实了女学生这些违法行为，之后院长的办公室遭到石块袭击。

2012年3月，在学院被占领期间，一位叫亚辛·布迪尼的青年亵渎了突尼斯国旗——他将建筑物顶部的旗帜从旗杆拔下，换上了黑色的萨拉菲旗帜。被移交法庭后，他只被判处6个月监禁并缓期执行，然后就安然回到家中。突尼斯刑法第129条规定，任何人以语言、书面材料、行为或其他任何方式公开损害突尼斯国旗或外国国旗，都将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法律对伊斯兰主义者再次进行了宽大处理……

在大学里，萨拉菲分子对他人的语言及身体攻击行为不断增多，他们认为，这是将突尼斯再伊斯兰化的一个战略步骤。复兴运动党控制的政府任凭他们精心实施图谋，而不去保护高等教育机构的安全与独立性。

突尼斯安全形势日趋恶化

萨拉菲分子在突尼斯造成安全形势持续恶化。62岁的法裔突尼斯人贾迈勒·盖尔比是萨尔斯地区的社会党顾问，2012年8月16日，他与夫人及12岁的女儿遭遇了一段痛苦的经历。当天晚上，他们在故乡比塞大的大街上散步，母亲与孩子穿着夏装。一群由50多人组成的萨拉菲年轻人挡住她们的去路，对其进行言语攻击。她们只得赶紧逃走，盖尔比孤身一人面对歹徒，这群人用橡皮棍和短木棒殴打他。“没有一个人救我，”他说，“幸亏我成功逃走才躲过一劫。如果我倒在地上，他们肯定会把我打死。”当天正举办著名的比塞大音乐舞蹈与戏剧节。突尼斯内政部统计，在这天晚上，“约200人参加了萨拉菲派的行动，他们用暴力阻止一些团体在耶路撒冷日举行演出”。目击者称，这些人拿着弯刀和棍棒，破坏了乐器，将组织方的工作人员霍米斯·加尔比和另外5个人打伤。安全部队发射催泪瓦斯进行干涉，4名萨拉菲分子被逮捕并受到审讯。在此之前，由于受到萨拉菲团体的威胁，一场音乐会及一场演出已被迫取消。其他文化演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此期间，比塞大的安全部队未能很好地履行职责。

之后一段时间，盖尔比对此事件当事人提出指控并接到了来自总统府与突尼斯政府的正式道歉。他对此并不满足：“从第一天开始，我的要求就是犯下这些罪行的萨拉菲分子应该受到惩罚。我将永远坚持我的诉求。”盖尔比将注意力引到一个基本问题上：如果不处罚萨拉菲分子，其势必在突尼斯散播恐惧。

妇女地位退步

对阿拉伯世界中最具现代性的突尼斯女性而言，她们的地位将受到严峻挑战。1956年8月13日起实施的《个人身份法》，在许多领域都规定了性别平等。它赋予女性离婚、继承、与非穆斯林或外国人结婚、收养等权利。《个人身份法》是布尔吉巴时代留下的一项主要遗

产。但自“茉莉花革命”以来，复兴运动党对女性权益持伊斯兰激进主义观点，从而使该法的社会地位受到威胁。

在街头，女性的安全保障自“阿拉伯之春”后日益下降：萨拉菲分子经常对着装不符合其要求的女性进行侮辱和殴打，如同盖尔比一家所遭受的那样。还有一个更震撼的事件反映出突尼斯女性的社会地位极其不稳。2012年9月3日，一名29岁的女性与未婚夫开车途中被三名警察拦截。其中两人对该名女子实施强奸，另一名警察则控制其未婚夫，事先给他戴上手铐。事件的后续发展更让人无法接受。的确，两名警察因强奸被监禁，但9月26日受害者与其未婚夫应一名预审员传唤前去对质，在那里她被指控犯有妨害风化罪及有粗暴行为。内政部发言人哈立德·达鲁什指责说，这对年轻人是在一个“不道德的地点”被警察发现的，同时也承认这仍然无法证明后来发生的强奸行为合法。于是这名受害女性（及其未婚夫）因妨害风化被提起公诉。复兴运动党盟友、左翼的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党成员、议员卡利玛·苏伊德在脸书上怒斥这件丑闻：“自争取工作与自由民主论坛进入联盟以来，我只看到复兴运动党称王称霸。我决定彻底脱离这个政府。强奸事件以及今天上午对受害者的指控，正如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说是什么三党联合政府！你们真让我感到恶心！”

女性受害人的辩护律师布什拉·贝尔哈吉·西姆达指责政府应该对警察的胡作非为负有责任：“它具有政治及道义责任。”确实，警察的暴行“并非有组织的，但政党（复兴运动党）关于女性的言论是其产生的土壤”。她补充说：“自2011年10月23日，伊斯兰主义者掌权之后。他们看到一位现代妇女、一位突尼斯女性，就认为有权要求其做出交代，然后这些女性受害者就会受到指控。”该律师说，由于“警察中间普遍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惩罚”，这种现象逐渐蔓延。

突尼斯民主妇女联合会及突尼斯人权联盟曾签署一份公告，揭露这种诉讼程序“将受害者变成被告，目的是恐吓并强迫其屈服，让该女子及其未婚夫放弃他们的权利”。这些协会呼吁“政府要严正介入，出

台打击强奸妇女的国家方案”。这和突尼斯女权团体的报告是一致的。自复兴运动党伊斯兰主义者上台之后，警察对妇女的态度与布尔吉巴时代及本·阿里时代相比有根本变化。这些团体指责警方以女性着装“不当”为由，系统性地骚扰妇女。这些团体还认为，在“正当的理由”背后，隐藏着突尼斯政府的意志：由伊斯兰主义者控制的政府，试图剥夺女性在布尔吉巴时代所获得的在其继承者本·阿里时代保留的权利。复兴运动党希望由伊斯兰教法决定妇女的社会地位。另一个证据是，他们企图在未来宪法中加入性别“互补”的措辞，而不是性别“平等”。在等待未来宪法为他们保留什么权利的过程中，突尼斯人在公共场合越来越多地受到“道德警察”（事实上而非法律上）的刁难，后者有时在各种滥用职权外还要加上初夜权。在电影院、剧场、饮料专卖店、夜总会，被认为衣着轻浮的路人，时常受到威胁、侮辱与攻击。如此现代与充满活力的突尼斯，落入伊斯兰“道德警察”的手中，任何力量也无法有效抵制萨拉菲派对突尼斯的牢牢掌控。

穆兄会与萨拉菲派的勾结

复兴运动党极为谨慎地玩弄联合政府内的温和伙伴，许诺给其好处。2012年1月，加沙政府首脑、哈马斯的成员伊斯梅尔·哈尼耶，应贾巴利的邀请对突尼斯进行了正式访问。一群激进分子到机场欢迎他的到来，并高呼：“赶走犹太人！杀死犹太人！”7月2日，复兴运动党像迎接英雄一样接待前来参加在克拉迈展览馆举行的国会开幕式活动的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支持者向这位贵宾欢呼：“圣战！圣战！胜利或成为烈士！”复兴运动党领袖格努希对迈沙阿勒关怀备至。还是格努希，在几天之前向媒体保证：“国会应该秉承复兴运动党的理念以及温和开放的伊斯兰运动，涉及突尼斯全体人民的关切。”复兴运动党不断采用两面派的手法。

尽管复兴运动党向萨拉菲派团体保证支持伊斯兰教法，后者对此并不完全相信，指责其优柔寡断并与西方价值观合流。他们敦促复兴运动党在“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教的敌人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在响应“基地”组织新头目扎瓦希里讲话中指责复兴运动党“炮制美国国务院、欧盟或海湾国家能够接受的伊斯兰教”。他们号召民众发动起义反对“对宗教的损害行为”。他们通过努力，逐步将全国5000座清真寺掌控在手中。他们还在教育界编织了网络。他们希望将突尼斯变成逊尼派的神权政体，去麦加圣地和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朝圣。

除了同萨拉菲派有一些明显的分歧之外，复兴运动党追求的目标与之一致。作为受挫于经济危机的执政党，复兴运动党仍然坚持加强法制国家建设。它希望采取象征性犒赏的方式，取悦激进主义。它在打再伊斯兰化这张牌，这与其使命相一致，同时向被吓坏了的突尼斯人及西方人做相反的宣誓。

人们习惯于将穆兄会同萨拉菲派做比较：前者希望用和平的手段在伊斯兰国家实现再伊斯兰化，后者则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目标。突尼斯的例子表明，两种势力相辅相成、相处和睦。当“茉莉花革命”后突尼斯出现萨拉菲派骚乱时，复兴运动党领导人格努希以非常欢迎的态度评价他们：“这是我们的孩子！”穆兄会和萨拉菲派共同致力于一个目标：为了在突尼斯建立“第六任哈里发王朝”，推行教法，即伊斯兰法律。教法是一个整体，支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教合一、不分公私，因此它与建立在政教分离基础上的世俗民主制度无法相容。控制联合政府的复兴运动党尽其一切可能，掩盖萨拉菲派通过恐怖手段将教法逐步注入突尼斯习俗的暴力行径。

复兴运动党的穆兄会在制度范畴内行动，而萨拉菲派支持者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确，复兴运动党政府部门时常批评萨拉菲派的行动方式过于暴力，有时候（非常少）甚至会生气。在穆罕默德漫画引发示威活动之后，复兴运动党领袖格努希宣布，他将“严厉地对待”萨拉菲运动，因为它对突尼斯构成了“威胁”。两股势力合作过程中出现的

这些小裂缝，说明了二者在再伊斯兰化的日程战术上确实存在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将权力赋予非伊斯兰主义者的突尼斯人及西方。此外，海湾出资国的活动范围也相得益彰：卡塔尔主要资助穆兄会，而瓦哈比派的沙特阿拉伯则资助萨拉菲派。在这场游戏中，很明显，伊斯兰激进主义是赢家，世俗民主制度是输家。

从复兴运动党到“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

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复兴运动党同萨拉菲派之间的亲戚关系，这就是阿布·伊亚德（真名是赛义夫·阿拉·本·哈辛）的事例。伊亚德是“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的创建人与首脑，该组织是突尼斯伊斯兰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势力。1986年，伊亚德同复兴运动党的实际领导人拉希德·格努希亲密合作，开始投身突尼斯伊斯兰运动：在格努希的授权下，他参与组建了该党的军事机构——“突尼斯伊斯兰阵线”。在机构内，他为后来成为重要人物的另一活动分子、现任内政部长的阿里·拉阿里德提供了坚定支持。后来这些人的目标出现了分歧。复兴运动党继续在突尼斯展开活动，不断扩大组织和宣传活动，还在欧洲游历，建立国际政治联系，同政党联盟协商。这些活动引发了持续的风险：贾巴利和格努希都遭受过本·阿里无情的监禁或者流亡。伊亚德则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即“圣战”之路。他同“伊斯兰武装集团”取得了联系，后者最终演变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MI）。他还同阿卜杜勒·哈金姆·贝尔哈吉创立的“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LIFG）建立联系，贝尔哈吉正是的黎波里军事委员会的实际指挥官。

后来突尼斯围捕伊亚德的大网不断收紧。为了避免被捕或被杀，伊亚德来到了距北非数千千米之外的阿富汗。他在那里因战功卓著而获得了“突尼斯人”的绰号。随后伊亚德显示出精通政治的禀赋，他仿效“基地”组织，在喀布尔以东一百多千米的贾拉拉巴德建立了自己的恐怖主义组织“突尼斯战斗团”（GCT）。他在那里培训了数十名“圣战者”，并在全欧洲设立了分支机构，其“出色业绩”为他赢得了本·拉登的

信任。拉登将刺杀“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司令官的任务交于他，时间是在2001年进行“9·11”袭击的准备工作阶段。9月9日，“突尼斯战斗团”的两名恐怖分子假扮成记者接近马苏德，然后引爆摄像机与马苏德同归于尽。

北约进入阿富汗之后，伊亚德人间蒸发，后来他在土耳其出现并被拘捕。安卡拉将他遣返，他被突尼斯法庭判处43年徒刑。2011年2月18日，“茉莉花革命”导致被囚禁的反对派获得大赦，伊亚德因此出狱。这次他留在了突尼斯，并创建了“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他认为将突尼斯引入伊斯兰主义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实施了双重行动：一方面在清真寺祈祷，另一方面在突尼斯西北部森林中训练新的“圣战者”，随后派遣这些人参加马里及叙利亚的战斗。该组织还同卡扎菲作战。鸟儿已经归巢，但出于卑劣的企图，他并未断绝与复兴运动党老同谋者的联系。

因此，在2012年9月13日，即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两天之后，伊亚德同形形色色的突尼斯萨拉菲分子——“圣战者”或虔诚派信徒进行了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对影片《穆斯林的无知》“亵渎”先知穆罕默德采取何种回应态度。但与会的并非只有萨拉菲派，复兴运动党也派遣两名代表参加。伊亚德决定于9月14日周五主麻日袭击并摧毁美国大使馆。大会结束时，复兴运动党的两名代表获悉了决定的内容，并立刻汇报给贾巴利及其内政部长复兴运动党人拉阿里德。

第二天，蓄着胡须的人群（萨拉菲分子）开始行动，但理应阻止骚乱的部队却没有出现，在美国大使馆周围更没有汇集安全部队。于是，同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的情况一样，暴力迅速蔓延。萨拉菲分子爬上使馆围墙，侵犯了国际人权原则所规定的使馆领土豁免权，对使馆工作人员进行尾随与威胁，焚烧使馆建筑及停车场。暴徒们还袭击了使馆附近的美国学校，将其洗劫一空并纵火焚烧。他们还降下了美国的星条旗，升起了萨拉菲派的黑色旗帜。

有人用手机拍下了整个行动过程，这些画面很快就通过网络传到社交网站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致电马尔祖基总统，要求其保证美国使馆的安全。马尔祖基这才命令总统卫队介入。此次流血事件导致5人死亡，数十人不同程度受伤，这其中既有萨拉菲派袭击者也有安全部队人员，还有80名参与者被捕。袭击者认为复兴运动党违背了不干涉其行动的诺言，实际上是保卫共和大会党的马尔祖基下令进行的镇压。这次最后时刻的干涉，并不能挽回马尔祖基在突尼斯世俗主义者及西方眼中的形象。发生袭击美国使馆这等严重事件，正是因为复兴运动党领袖格努希挑唆政府参与并发布命令给政府总理贾巴利，这也充分说明了马尔祖基在联合政府中没有什么权力。

在美国使馆遇袭之后，复兴运动党政府同萨拉菲派的合谋再度显现。伊亚德通过社交网站召集支持者，前往突尼斯市中心的艾尔法萨清真寺。警方在清真寺周围部署了大量警力，伊亚德却能轻松地进入清真寺发表讲话，对内政部长进行威胁。他的此次讲话还通过互联网进行了直播。警方本来可以轻易地将其堵在清真寺，可是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做，让其安然离开。伊亚德同复兴运动党的勾结，权力通道可以让他自由、安然无恙地进行冒险行动。

在这群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中（其中多数在“革命”前被监禁），“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的领袖被视为象征性人物。“茉莉花革命”之后的大赦，让他们回到了突尼斯社会，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力量，于是产生了两个对立的突尼斯——实行多党制且自由的突尼斯与实行伊斯兰教法且暴力的突尼斯。马尔祖基及世俗主义者所完美体现的是前一个突尼斯，却没有能力控制格努希、贾巴利及伊亚德所代表的后一个突尼斯。

岌岌可危的突尼斯经济

突尼斯经济的传统支柱——旅游业始终未从“革命”中恢复生机，房地产市场持续萎缩，外国投资者暗中撤资，社会秩序也未恢复。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使得突尼斯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事实上，在国家内部政治动荡及世界经济放缓的双重影响下，突尼斯经济出现快速下滑，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过渡政府实行的经济计划收效甚微，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下降，2012年第二季度下降了1%，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当然，政府对基本商品价格提供公共补贴，但公共投资的效率低下，使得财政赤字不断上升。突尼斯第纳尔迅速贬值，造成进口商品价格飙升。银行系统只能靠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才得以生存，而这又刺激了通货膨胀。

在本·阿里政府时期，突尼斯经济依赖出口，为国内消费提供了充裕资金。由“阿拉伯之春”引发的社会动荡（要求提高工资的多次罢工），萨拉菲派的目无法纪，邻国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的移民失控，以及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扩张，打断了这种运行模式。出口下滑让经济机器停转，造成以下结果：过渡政府实行增加公共支出拉动国内需求的政策，不仅耗尽了外汇储备，增加了财政赤字，还加速了突尼斯第纳尔的贬值；以需求推动经济，刺激了消费品的进口，增加了外债。过渡政府从而卷进了一个可怕的旋涡：试图通过刺激需求拉动增长，鼓励增加工资、社会投资、对贫困地区提供补贴等，却增加了财政赤字。灾难般的经济形势让外国投资者逃之夭夭。

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突尼斯经济饱受结构失衡之苦，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更不可能痊愈。世界经济危机粉碎了一切，它减缓了西方不稳定的增长，因为这种增长是建立在过于理想化的市场信用及债务上，而非建立在储蓄与投资基础上。各国中央银行将利率人为保持在低水平，并超额发行货币，制造了表面的繁荣以及投机泡沫。这就是无法与实际需求相联系的没有生产力的“坏投资”。信用透支形成的繁荣过后，就是经济

衰退及萧条。这将导致最后的灾难，即货币体系分崩离析，除非能足够提前放弃这种宽松货币政策。

西方国家背负着超额的公共及私人债务，处于衰退的边缘，其退休制度也面临崩溃。新兴国家也未能躲过危机：由于西方消费下降导致出口减少，其经济增长也有所放缓。这些国家的活力建立在强劲的出口上，其国内消费一直较为疲弱，要避免更严重的经济收缩，必须增加国内消费，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预计经济增长速度将快速下滑，引发国内政治动荡。证券危机也将再次出现。世界危机即将接近其顶点，国家“破产”也将出现，由低利率导致信任危机扩大化的可能性也在上升。这些将使一些大银行及实体经济崩溃。避免危机的机会已经失去。危机将使世界经济丧失活力，任何机构都不能阻止其发生。如果20年前或30年前实行财政及货币紧缩政策，或许可以让世界经济恢复活力，但此时实行紧缩政策只能让消费——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陷入停滞，从而加快经济的崩溃进程。2008年经济危机后实行的经济刺激政策基本没有效果。

经济危机不利于民主

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及金融背景下，尽管突尼斯技术官僚及企业家具有良好的能力及愿望，仍然不足以使他们的国家在未来几年内重新走上增长的道路。他们要应对失业、中产阶级贫困化、低收入人群的医疗及食品短缺等各种问题。突尼斯将再度经历“面包骚乱”。1983年底至1984年初，政府宣布提高面包与面粉等小麦制品的价格，数日之内骚乱遍及全国，造成143人死亡、数千人被捕，政府被迫宣布取消涨价。但由于需求和投机性因素，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迅猛上涨，最终导致突尼斯国内食品供应短缺。此外，土地资源耗尽及时常发生的干旱，造成谷物产量下降。政府没有任何办法控制食品的价格涨势。如果当今再发生这种不幸，势必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高涨提供机遇。

突尼斯爆发的经济危机，是引发2010年底“革命”的导火索。在应对这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革命”向有利于伊斯兰激进运动的方向发展。的确，在突尼斯社会，尤其在妇女、青年人和公务员中间，同政治、文化多元化及公共自由相联系的民主自由潮流是大多数人持有的观点。突尼斯伊斯兰主义者选民占选民的三分之一以上，且本身占人口的一半。2011年10月23日，复兴运动党在制宪选举中获得相对多数，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很多选民没有去投票，从而世俗政党遭到失败，而世俗政党对中产阶级尤其具有吸引力。短期内，在大选中（初步定于2013年3月举行）很可能出现平衡选举的趋向，从而使世俗政党在议会和政府中重新取得优势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突尼斯社会再伊斯兰化的重心可能从投票箱转向“圣战”，从复兴运动党转向萨拉菲派组织。“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及其他该类型的运动，很可能效仿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FIS），发动一场内战。由于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大量资助，萨拉菲派可以直接为受到经济萧条冲击的贫困街区的青年失业者和贫困家庭，提供多于政府数倍的生活物资，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有了物质援助，再加上对日常生活悲惨状况的不满，他们自会寻求社区团结的精神安慰，在得到必要的金钱、武器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支持“圣战”，因为“圣战”会给他们带来冒险与荣光。与待在贫困的郊区，没有住房、工作和老婆的生活相比，这种生活明显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如果萨拉菲派最终认为通过选举无法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势必更多地寻求使用恐怖手段，人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对伊斯兰激进主义者而言，恐怖手段是夺取权力过程中的要素。

世俗主义者播种，伊斯兰主义者收获

人们很快就忘却了，西方曾将本·阿里统治下的突尼斯视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典范，特别是它还继承了“至高无上的战士”布尔吉巴留下的世俗制度和妇女社会地位。本·阿里政府对政治生活及部分公共自由进行了限制，但其开花结果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在等待的过程中，社会习俗日趋自由，旅游者前来享受日光，欧洲的退休人士来购买别墅，外国投资者投资了许多第二、三产业。突尼斯以热情好客和宽容闻名于世，它保证游客的安全，吸引了大量国际文化艺术展览。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到阳光、生活乐趣，还可以享受热情的接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掌声中，突尼斯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直到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这一切戛然而止。当“茉莉花革命”突然到来，这种“革命”的乐观情绪更加高涨，因为“民主”已经传播到埃及，“革命”已迅速向其他阿拉伯国家扩散。

但2011年10月的突尼斯制宪选举让复兴运动党掌握了权力，历史也因此改变了方向。这个戏剧性的变化让突尼斯世俗运动本身震惊不已，它严重低估了国内宗教极端势力的能量。的确，由于本·阿里政府的查禁，宗教极端势力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近些年，由于再伊斯兰化运动急速发展，突尼斯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进程与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同步加速。

本·阿里独裁政权按照佛朗哥政权的模式，在严厉镇压反对派的同时，也致力于经济现代化和发展壮大中产阶级。在现代专制君主的阴影下，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而他们想谋求政治权利时却遭到拒绝。在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推行议会民主，中产阶级的诉求得到了满足。政权交替波澜不惊。胡安·卡洛斯国王以其超凡的智慧和魄力避免了军事政变，建立了保障新生民主的君主立宪政体，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因素。当时西班牙经济奇迹[1]的背景是繁荣的欧洲，世界经济也处于上升势头。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缓和了西班牙国内政治紧张局势。同样，在柏林墙倒塌后，幸运地遇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东欧国家也顺利地完成了民主转型的进程。

阿拉伯“革命”则相反，它是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所激发的。经济上的失败是各国“革命”的导火索。由于经济危机，现代君主失去了对经济的掌控权，但世俗精英没有能力处理这场经济危机。主张世俗制度的政治人物、知识分子、记者向西方寻求贷款与投资，以支持“阿拉伯之春”后的民主进程，控制伊斯兰主义的扩张。这些诉求听上去非常哀婉动人，但是西方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已然乱作一团，分身乏术。

美国人多年以来一直为埃及提供援助，但在持续援助方面越发吃力，而且情况将越来越糟糕。相比之下，反对佛朗哥民主派的西班牙是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掌握政权，给人民带来了美好的希望，而世俗的阿拉伯民主派摆脱暴君枷锁的时候，天空中却布满了世界经济危机的乌云。他们保证要恢复国家的经济，但这些承诺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没有任何可信度。同世界许多决策者一样，他们并非不了解危机的原因和严重性，甚至连民众也感觉到世界经济已经成为一艘没有舵手的航船。相反，海湾国家由于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有能力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投资，但是它们特别偏爱伊斯兰主义者。于是，这个时期的伊斯兰主义者依靠海湾君主国提供的石油美元发展慈善事业。

除了经济环境，还有一个因素有利于西班牙及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而阿拉伯“革命”国家并不具备——共同的价值观：在妇女着装、妇女在两性中的角色以及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角色等问题上不存在冲突；在饮食和娱乐方式上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在宗教地位、多教派、宗教仪式及其与艺术的关系方面也不存在争议；在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宗教要倾听国家的意见，即使在天主教色彩浓厚的波兰，也实行世俗制度并尊重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

总之，西班牙后佛朗哥时代的民主派内部，及东欧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主派内部，均不存在文明的冲突。阿拉伯国家，却因为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者的价值观严重对立而存在冲突。因此，2011年10月23

日就突尼斯制宪选举而进行的竞选活动，竞选缺乏对经济因素的关注，主要围绕世俗派的民主价值观和伊斯兰民主价值观而展开，一部分突尼斯民众选择了西方民主，另一部分则想保留穆斯林文明。但文明的冲突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家的中心议题，俨然成为建立世俗民主制度的主要障碍。

*

就在萨拉菲派将国家搅得一团糟，反对政府经济政策的罢工此起彼伏之际，全国制宪大会制定新宪法的日程被推迟了。2012年8月13日，哈比卜·科赫德（复兴运动党人）曾指出，2013年2月，全国制宪大会将出台新宪法。目前为止，政府已经将2012年10月23日，作为实行新宪法的最后期限，并预告大选将在2013年3月举行。突尼斯各主要政党有一年的时间回顾2011年10月23日的制宪选举，以修订新的基本大法并替换“革命”后管理国家的临时法规。这些工作是没有尽头的，因为复兴运动党的伊斯兰主义者要求实行纯粹的议会制度，而其他政党希望国家元首拥有重要特权。第一份草案很可能在2012年7月底公布，一份“初稿”有望很快出台。[2]

在等待的过程中，突尼斯陷入混乱的局面……

洛朗·阿尔图·杜普莱西斯

---

[1] 西班牙经济在佛朗哥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西班牙成了当时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第二快的国家，这被称为“西班牙经济奇迹”。

[2] 2014年1月26日晚（当地时间），突尼斯制宪会议通过了新宪法。次日，新宪法正式签署。2014年11月23日，采用新宪法后的第一次正规总统选举举行，世俗派政党突尼斯呼声候选人贝吉·卡伊德·埃塞卜西当选。——译者注

利比亚：前途未卜

——对利比亚交战各方的评估报告[1]

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CIRET-AVT）、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在地中海和平论坛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国际代表团。该代表团先后对的黎波里（2011年3月31日至4月6日）、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班加西和昔兰尼加（2011年4月19日至25日）进行访问，并与各方代表举行会谈，其目的是以完全独立和中立的立场评估利比亚局势。

该代表团成员包括：萨伊达·本哈比莱斯（阿尔及利亚人），前团结部长，前参议员，CIRET-AVT创始成员，联合国支持公民社会奖获得者；伊夫·博内（法国人），荣誉省长，国民议会前议员，领土监护局（DST）前局长，CIRET-AVT主席；德克·博格斯（比利时人），独立专家；埃里克·德纳塞（法国人），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勒梅尼昂（法国人），独立专家，CIRET-AVT副主席。

该代表团的行动遵循以下原则：采用民主原则——尊重自由、人权，抵制违反联合国准则及决议的行为；保障平民的安全；在冲突中采取中立；禁止促进民族利益；反对一切违反国际法或与联合国宪章相抵触的，以所谓干涉权为基础的外国军事介入；陈述事实而不加以评判；采取批判的观点。关于最后一点，我需要强调的是，该代表团对危机局势及各种信息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最终做出一份有分量的鉴定。在整个任务期间，在需要通过调停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的冲突中，代表团一直对会谈方被操纵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与反政府武装和的黎波里方面均保持一定距离。

自1969年以来，穆阿迈尔·卡扎菲将独裁政权强加给他的国民。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强调该政权广受批评的属性，面对这样的情况，向往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才最具合法性。

不过，事实研究表明，利比亚“革命”既非民主的，也非自发的，而是一次由利比亚东部发动的，以报复和分离为主旨的武装起义。它试图以“阿拉伯之春”的方式出现，实际上对此却并无贡献。因此，利比亚运动无法与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革命”相提并论。

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各方面情况显示，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只是一个无法协调各方利益的反政府联盟。其中，真正的民主派只占少数，他们必须同卡扎菲以前的亲信、前政府复辟分子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拥趸共事。由于联盟中其他派别坚持按各自的意愿来引导委员会前进的方向，尽管民主派意志坚定，但全国过渡委员会仍无法提供任何对未来的保证。

值得注意的是，在爆发“阿拉伯之春”的国家中，只有利比亚的伊斯兰风险不断上升。在阿拉伯世界中，昔兰尼加是派遣“圣战者”同驻伊拉克美军作战最多的地区。

西方大国卷入这场危机似乎显示了极端冒险主义。反抗力量纯属乌合之众，本应轻松获得的胜利几乎变成了一次失败。起义者陷入两难困境，只能屈辱地撤退，或者将冲突扩大，尤其是投入更多地面联合力量。西方的介入，使得利比亚地区产生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很可能将整个北非地区、萨赫勒、中东地区陷入动荡，可能导致伊斯兰极端势力甚至恐怖主义在昔兰尼加再度兴起。

利比亚的反对派联盟或许最终将消灭现政权，但西方应防止现政权被一个更为激进却同样不民主的政权取代。

利比亚政体

利比亚是一个沿袭部落制度的国家，中央政权是“联合”国家的唯一力量。部落间的利益分配是社会的基石，这一点使利比亚与其邻国突尼斯和埃及有所区别。部落的忠诚在利比亚政治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

部落联盟构成了卡扎菲政权的基础，较小的卡扎法部落——卡扎菲属于该部落，与该国两个最大的部落联合：以的黎波里塔尼亚为主要基地的瓦法拉部落，以及费赞地区的马加哈部落。与其他非洲政权及部落一样，卡扎菲的支持者准备对他支持到底。

即使卡扎菲40多年的统治使国家情感有所凝聚，但利比亚人仍然将部落归属感置于首要地位。由于人口的持续融合，今天利比亚所有的部落都已重新分布。正因为这样，人们能在利比亚西部城市发现东部班加西部落的成员。这种社会流动性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反对政府的起义遍布全国。

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是一个独裁政权，与巴勒斯坦领土收复主义者及国际恐怖主义者长期保持紧密联系。这种说法尽管得到很多人的一致认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事实上，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强烈认为，该政权对国际恐怖主义具有影响，其应对法国联合航空公司（UTA）麦道DC-10-30型飞机空难事件和洛克比空难事件负有责任，但也有部分专家对利比亚情报机构在这两起事件中的主导作用表示怀疑。

的确，穆阿迈尔·卡扎菲对两起事件中所有的受害者家庭进行了赔偿，被视为承认犯有罪行。但有专家认为，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利比亚的“导师”卡扎菲知道无法获得真相，于是只能破财免灾。这种将责任与有罪区分开来的行事方式，具有争议性。卡扎菲持二分法的指导思想是具有东方色彩的人类生命观，它允许以现金方式对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庭进行补偿，而赔偿与是否有罪毫无关系。更值得称道的是，穆阿迈尔·卡扎菲根据相同的原则毫不迟疑地解救了人类学家佛朗

索瓦兹·克劳斯特，赎回了西塞内·哈布雷及其他霍洛岛上的人质。总之，卡扎菲表现得更像一位非洲国家元首而非阿拉伯领导人。

与突尼斯和埃及的情况不同，利比亚根本没有政党、工会和独立媒体存在的空间，也几乎不存在公民社会。反对派力量被削弱得微不足道。国家处于严格监控之下，随意拘禁民众的现象屡见不鲜。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非常明显。只有爆发暴力事件才能为其找到出口。

卡扎菲政权对利比亚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利比亚形成了事实上的岛国状态。它限制国民到国外旅行，限制对年轻一代进行外语教育，散居在国外的利比亚人除外。卡扎菲运行40多年的制度严重阻碍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他一年前还宣称类似的发展在利比亚毫无意义："在一个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不允许存在一个反对国家的社会实体。"这种社会政治空白，阻碍了反对派内部产生未来的领导人。

利比亚社会经济模式的独创性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确实是毫无争议的独裁者，利比亚人民在民主自由方面也没有任何值得羡慕的地方，但利比亚的社会经济形势在非洲范围内有其特殊性。尽管卡扎菲及其亲信在掌握权力之初就一夜暴富，但他的确使自己的国家得到了发展。尽管国家对经济红利的重新分配并不公正，但也毕竟保持了社会稳定。这与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明显不同。

1969年，卡扎菲通过政变推翻君主体制夺取权力时，利比亚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居民年收入不到60美元。40年后，凭借政府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制度及丰富的石油资源，利比亚成为阿拉伯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利比亚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很多家庭拥有汽车。

卡扎菲时期，利比亚的免费公共卫生体系是阿拉伯世界最佳体系之一。教育也是免费的，广泛地对女性开放。医院和诊所均按欧洲模

式运营，给外国人的补助由国家负担。因此，在400多名班加西儿童感染艾滋病的严重事件（“保加利亚护士”事件）中，利比亚政府还是有能力支付全部孩童的医疗费用以及相关家庭的转移费用（出国费用及医疗费用）。然而，现在这些家庭已经没有办法给孩子继续治疗了。过去，癌症的治疗也是免费的，现在也不是了。

卡扎菲时期，利比亚拥有高质量的公共和城市设施，公路网初具规模。然而，“革命”爆发时大量已经开工的公寓建设被迫中断。政府发展石油工业，创建了炼油厂。在农业和工业领域，实行了结构性的设备更新计划，直至宏伟的“大河”计划基本完成。房建与公共工程联合会（BTP）的全球领导人——加拿大人拉瓦兰和法国人布伊格认为，这是在“阿拉伯土地上”进行的独一无二的现代化尝试。

有关数据可以证明，在君主制时期，利比亚的社会经济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之一。“革命”爆发前，按人类发展指数排序，利比亚在全球排名高于俄罗斯、巴西、乌克兰和委内瑞拉，被认为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在突尼斯和埃及，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革命”，利比亚则相反，其经济发展吸引了约300万名外国劳工入境。失业现象几乎不存在，生活按国际标准来衡量也是体面的。

非洲国家的支持

有一个事实常被忽视，利比亚曾经是非洲大陆发展和独立的主要角色。卡扎菲为非洲第一颗通信卫星提供融资，非洲经历了一场实实在在的科技革命。该卫星让非洲大陆上的人们可以通过电话联系，保障了电视节目和电台广播的传输，并使远程医疗和远程教育等服务得以应用。由于无线通信方式的传播，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整个非洲大陆内部之间相互联系的成本降低了。

这一切均始于1992年，为了使非洲拥有自己的卫星，降低通信费用，当时45个非洲国家创建了RASCOM（非洲卫星通信组织）。此前，非洲主叫和被叫的电话都需要通过欧洲通信卫星，非洲各国为此要支付高昂的费用，从而成为世界上话费最贵的地区之一。非洲国家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欧洲相关机构申请贷款，努力了14年，却仍然没有结果，于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拿出3亿美元接手该项目，并使之走出困境。非洲开发银行接着又追加投资5000万美元，西非开发银行增资2700万美元。就这样，2007年12月26日，非洲拥有了第一颗通信卫星。

在机构计划方面，非洲联盟（简称非盟）15%的预算由利比亚提供。正是这个原因，该组织对卡扎菲献殷勤是可以理解的，这与阿盟领导人讨厌卡扎菲形成鲜明对比。

在卡扎菲统治期间，利比亚领导人的慷慨遍及非洲大陆，从南非、利比里亚到马达加斯加及萨赫勒地区的国家，向当地行政城市、旅馆、餐馆、各种团体、伊斯兰教组织、汽油分配网络（通过利比亚石油公司）、商业、游戏活动如马里的沙漠节，以及反对派团体提供资助。马里国家电视台的很大一部分开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是由利比亚提供。利比亚近来还在马里建设了政府设施，同时小心谨慎地为图阿雷格族叛军提供支持。利比亚政府擅长在敌对方或对手间进行斡旋调停，如解救佛朗索瓦兹·克劳斯特（1977年）和霍洛岛上的人质（2000年）。如此，的黎波里政府受到为数众多的债务人的支持，所有曾得到其政治、财务和军事支持的人也支持它。

利比亚政府最大的成功之一，是在20世纪90年代马里镇压图阿雷格运动时，积极维护和资助图阿雷格人的“联盟”，这也是造成利比亚与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尼日尔诸多纷争的源头。2005年，卡扎菲再度宣布，赋予利比亚境内尼日利亚及马里的图阿雷格人以无限期居留权。2006年，他呼吁包括图阿雷格人在内的撒哈拉各部落组成一个共同体，以反对恐怖主义及毒品走私活动。2008年8月，他在利比亚南部

的乌巴里组织了一次集会。正是这些原因，来自尼日尔和马里的部分战士通过对卡扎菲予以坚决支持，以还欠他的债，这是他们的使命。

制度的演变

利比亚社会经济形势与其古老的制度之间，无疑存在着严重脱节。卡扎菲在其子赛义夫·伊斯兰的压力下，近些年似乎已经决定对专制政体进行变革，尤其是通过卡扎菲慈善基金会推动变革。赛义夫·伊斯兰自2003年起以“现代派”的形象出现，点燃了利比亚民众对民主开放的希望。

2006年至2008年，美国公司摩立特集团负责开展一项公关行动，向利比亚民众宣示当局实现变革的意愿。利比亚当时确实需要帮助以使自己向民主化发展，并实现经济的现代化。经过几十年的孤立，商界人士、普通民众、政府及知识界精英均在寻求对世界上各种思想及实践的深化理解。

于是，2009年赛义夫·伊斯兰释放了近2000名伊斯兰教徒及政治犯，以表示推动民主的愿望。同时，政府多次表明同西方国家建立新伙伴关系的意愿。在有关移民潮的问题上，利比亚与意大利达成各项协议，由罗马提供快艇给的黎波里使用，由此利比亚加强了海岸巡逻力量，使得利比亚前往意大利半岛的非法移民数量减少了90%。

卡扎菲宣布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放弃恐怖主义，并对由其行动造成的实际或潜在受害者提供赔偿，最后还释放了保加利亚护士。尤其在同“基地”组织的战斗中，他与西方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2008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显示，利比亚政府“继续与美国及国际社会合作，同恐怖主义及其资金体系进行斗争……美国情报代表希望，在2010—2011年财政拨款期间，增加对利比亚在反恐领域的援助”。

2009年，利比亚情报机构与美国中情局在穆萨·库萨谈判的协定内，安排了一项共同反恐计划。美国方面为利比亚情报机构提供人员

培训。这些具体的合作措施一般只在完全互信的机构间开展。不仅如此，利比亚情报机构还应英国军情五局与军情六局的要求，派遣特工对伦敦的伊斯兰主义者进行渗透。

很多人都在准备起草一份新宪法，与此前卡扎菲的《绿皮书》的思想彻底决裂。起草工作得到了很多外国著名人士和卡扎菲慈善基金会成员的帮助，包括约瑟夫·奈教授（美国）、弗朗西斯·福山教授（美国）、本杰明·巴伯教授（美国）以及托尼·吉登斯教授（英国）。

如此，尽管利比亚有着沉重的过去，但该政权正处于全面变革之中。卡扎菲甚至准备宣布新的改革措施，但这一切为“革命”的到来所打断。

作为精心策划的行动，“革命”于2011年2月12日和13日爆发。[2]在衡量危险程度后，政府自2月17日起宣布了一系列平息举措，如向居民提供补助，并向各省派遣多名代表。3月12日，卡扎菲本人宣布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公民社会提供更大的空间。他放松了立法制度，让最高法院发布原则宣言，但不满情绪持续扩大。

似乎是当时“导师”卡扎菲的亲信建议他用暴力进行镇压，以打击示威者的士气。人们一直很好奇，究竟是卡扎菲的哪些亲信可以从形势恶化中获得好处。

利比亚军队及雇佣军

利比亚政府一直注意避免建立一支强大的职业军队，它更愿意依靠“革命委员会”组织的部落民兵体系来保障政权安全。

利比亚军队

利比亚军队约有5万人，只有约1万人真正接受过训练，装备良好，按时拿军饷并有战斗意愿。这些军队对政府的忠诚度最高，分为4个旅。尤其是卡扎菲的儿子卡米斯·卡扎菲率领的第32机械化旅，有士兵4000名，装备有坦克、装甲运兵车及自行火炮。

其余的地面部队划分为10个装甲营、10个机械化营、18个步兵营、6突击步兵营以及22个炮兵营。危机爆发前，利比亚地面部队拥有约500辆T-72、T-62及T-55型坦克，1500辆各式装甲车及2000门火炮，还有数十架武装直升机。

利比亚空军有18 000人，因多年的禁运而被严重削弱，一直处于勉强维持状态，在北约发起行动之前，拥有米格-21、米格-23、苏-24等型号战斗机100架，还有一些直升机。需要指出的是，部分飞行员可能来自塞尔维亚。尽管这支军队缺少训练，装备也不齐全，但在战术方面的素养仍然远远超过反政府武装。

利比亚海军有8000人，只有一些小吨位的舰艇，在行动中的作用微不足道。除了军事人员之外，还有一些警察编制（不详）以及受部落首领指挥的地方民兵。

在利比亚内战期间，观察家没有记录到忠于政府的利比亚军队出现叛逃现象，即使在米苏拉塔及艾季达比耶的战斗陷入胶着的时候也没有。这是因为这部分军队是从忠于卡扎菲的部落中招募的。

雇佣军

虽然媒体披露了一些关于在利比亚安全部队服役的雇佣军的消息，但这些消息多数是不确切的。事实上，利比亚实行雇佣军制度并非近些年的事情。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外国人为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服务了，有些在军队里，有些则在武装民兵组织中，但他们在作战中的影响一直非常有限。

20世纪70年代末，卡扎菲组建了一支“伊斯兰军团”，用于对整个非洲大陆进行干涉，他梦想将这片大陆变为“非洲合众国”。1987年，卡扎菲在乍得遭遇失败之后，这支部队被解散。近些年，利比亚军队对外国人的招募工作重启。这种现象同人们在利比亚经济生活领域发现相当比例来寻找工作机会的外国劳工没有什么不同。

目前，利比亚的多数雇佣军来自马里、乍得、尼日尔、刚果及苏丹。他们的军饷虽然并非反对派所宣传的每月高达2000美元，但仍然比其原籍国的薪金水平高出很多。

2011年4月初，反对派确认在艾季达比耶俘获15名阿尔及利亚籍雇佣军并打死3人后，反对派发言人立即指责阿尔及利亚为穆阿迈尔·卡扎菲提供支持，认为其对阿尔及利亚籍雇佣军的出现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华盛顿邮报》的詹妮弗·鲁宾引述一名投靠反对派的前政权官员的话称，有450名西撒哈拉籍雇佣军参与镇压反对派。这些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廷杜夫营地，那里是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成员的大本营，与阿尔及利亚的阴谋有关。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为期两个月的行动中，这些雇佣军每人可获得1万美元的报酬。军饷总额更是让人目瞪口呆。但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否认了这些指控。

相反，得到证实的且代表团能自己证明的，是尼日尔的图阿雷格人于2011年5月来到的黎波里，他们带来了对卡扎菲的支持。他们的行动反映了以荣誉的形式偿债，这是自发的行为。他们自称有3万人，这个数字是严重夸大了的。说实话，利比亚外籍雇佣军的具体人数极难估计。流传的数字有所夸大（某些来源认为达6000人），不管他们的数量是多少，占利比亚军队的比例都很小。

“革命”的原因

特殊的背景

利比亚“革命”似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阿拉伯之春”的地区背景，号召民众行动起来争取自由；利比亚特殊的局势，尤其是其东部地区的局势影响；外部势力的干涉。

在突尼斯，社会不满在“革命”爆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埃及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是其爆发“革命”的主要原因。然而，利比亚和突尼斯、埃及的情况并不相同，它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政府一直对财富进行实际分配，即使这种分配并不公正。危机前，利比亚每天生产约150万桶石油，掌握的资产接近1500亿美元，而人口只有600万。这种规模巨大的集体财富，加上雄心勃勃的社会政策，开创了非洲独一无二的局面：利比亚人拒绝从事他们认为“有损名誉”的工作，完成学业的青年人也不愿意从事低端工作，他们要求立即获得报酬高的职位、一间舒适的公寓、一辆新的汽车。于是政府被迫引进成千上万的外国劳动力，从事利比亚人不愿干的工作。社会原因似乎不是导致危机的根源，应该寻找其他原因。一切都似乎显示，利比亚人民的诉求就是政治性的：拒绝独裁政权，要求自由。

东部地区保守势力强大，黑手党猖獗

昔兰尼加一直拒绝接受的黎波里的优势地位，也不愿接受卡扎菲的统治，尽管他娶东部女子为妻。赛努西君主王朝及穆兄会的影响仍然存在，具体体现就是不断的示威活动。

昔兰尼加坚持的古老伊斯兰传统可以追溯至赛努西教团时期，那里的保守主义色彩比利比亚西部更为明显：妇女须以织物覆盖全身，不能抛头露面，她们的社会生活地位也被压缩至最低限度。蓄胡须的男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他们的额头上经常文有表示宗教虔诚的黑色印记。

班加西以宗教极端主义大本营而闻名。最近15年，班加西成为向欧洲输出移民的核心地区。那里的人口走私已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产

业，规模达数十亿美元。该城市的黑手党势力逐步发展，建立起走私行业，从业者高达数千人，还有警察和公务员为之效力。直到意大利提供帮助，利比亚政府才成功遏制了这个毒瘤。

由于商业资金枯竭，多名首领被拘捕，当地黑手党成为最早为利比亚反对派提供资助及支持的组织。许多出自贫民窟的帮派及盗窃集团成员，都因攻击班加西及其郊区的非洲移民劳工而臭名昭著。从叛乱开始，来自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及厄立特里亚的数百名劳工就被叛乱民兵抢劫甚至杀害。这个事实被国际媒体精心隐瞒起来，绝口不提。

社交网站的作用

在前文提及的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中，互联网和社交网站（脸书及推特）的作用经常被提起，类似影响在利比亚被削弱，但风险依然存在。

刚开始，脸书被赛义夫·伊斯兰用于在利比亚社会推广新思想，但在事变发生后，这种通信模式抛弃了他。渐渐地，来自博客和社交网站上的压力不断聚积：有人发出了示威游行的号召，立即得到了成百上千个签名响应。

在一个互联网不及邻国发达的国度，社交网站的影响力无疑受到削弱，但其传播能力足以使利比亚当局不安，网络传播效果通过卫星频道尤其是阿拉伯卫星频道得到放大。就这样，伊德里斯王朝的国旗和国歌出现在脸书上。显而易见，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的2011年2月17日成为“革命”的“官方日期”，这是通过社交网站的呼吁而实现的。

媒体的作用及冲突的上演

在利比亚，阿拉伯频道（半岛电视台、阿拉比亚电视台）的收视率远高于充满空洞言辞用于政治宣传的国家电视台。曾有几个阿拉伯卫星频道试图掩盖利比亚内战的一些事实真相，这种做法受到很多观察家批评。

2011年2月底，利比亚西部的多个城市局势仍然高度紧张和对立，东部局势稍好，但东西部关系成为媒体夸大的目标，有些消息甚至完全是捏造的。举例而言，西方媒体引述的有关利比亚当局空军轰炸的黎波里的消息就是极不确切的：尽管该城部分地区似乎发生了流血冲突，但政府军方面的确没有使用空军轰炸。半岛电视台及西方媒体还声称利比亚政府对民众开枪，此种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我们代表团曾亲临现场，并未发现此类事件。对此类事实进行歪曲的后果显而易见：在事先未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访问的情况下，联合国仅根据这些媒体的信息就表决通过了有关决议。毫不夸张地说，半岛电视台通过捏造事实对联合国施加了影响。围绕该事件进行的媒体战，让人惊讶地回想到1991年起巴尔干发生的损害塞尔维亚的系列事件。[3]

时局

利比亚示威抗议运动始于2011年2月12日及13日。利比亚人的不满情绪，尽管起初具有群众性，但并不代表全体人民。这与各类具有不同利益甚至利益相对立的实体有关：一方面，是对卡扎菲独裁统治感到厌倦的群众及民主派人士；另一方面，是被国家财富分配不公损害的东部各部族；还有就是拓展空间的伊斯兰主义者。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次运动由卡扎菲政权的达官贵人推动（穆萨塔法·阿卜杜·贾力勒以及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而他们过去对人权是极为蔑视的，发起抗议似乎主要就是为了获得权力。

如果说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是“赤手空拳的起义”，那么在利比亚，起义很快引发了军事对抗，并迅速从人民起义发展为内战。

代表团到访的所有城市的警察局、法院、身份登记处、兵营以及监狱等政权的象征均遭到波及。相反，城市建筑基本上未受损，抢劫事件也很少发生。不过，很明显，这些地方曾经发生过未经审判就公开处决的事件。面对这种局势，利比亚政权以武力进行回击的合法性似乎不足。因此它试图逐步控制局势，但最终没有做到，因为政府的“革命民兵”从未经受过战火的考验，对迅速扩散的叛乱的反应相当迟缓。

利比亚政府最终成功组织并实施了对反政府武装的进攻。由于反政府武装多数是未经军事训练的青年以及缺乏装备的民兵，他们很快就被逐出城市中心区。但与媒体报道的双方发生军事对抗相反，代表团访问的城市并无激烈战斗的迹象，原因很可能是军队的干涉行动有所克制，或者是反对派武装力量过于薄弱。

利比亚东西部的“革命”的开展进程完全不同。在东部，数日之内就宣告结束了，中央政府驻当地的代表很快就溜之大吉；而在西部，骚乱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被平息。

东部时局

2011年2月12日，班加西的人民运动由一位律师发动并领导。在利比亚安全部门将其拘捕后，一些人在利比亚社交网站号召游行示威。2月15日，300—400名积极分子带领民众再度进行游行示威，并开始攻击警察局、兵营及公共建筑。

在杰尔巴，我们曾遇到两位不愿透露身份的班加西大学教授，他们告诉我们，当时他们大学校园里突然冒出了许多陌生的“大学生”，正是这些人发起了运动。对那些不表态支持运动并拒绝喊口号的教授，他们采取了威胁和粗暴对待的手段。对此，两位教授极为忧虑。

从示威游行爆发开始，伊斯兰主义者和犯罪分子就立刻利用形势，攻击位于班加西郊外关押着他们同伙的戒备森严的监狱。在其首领获得自由之后，叛乱分子攻击了警察局和官方建筑物。清晨，居民醒来后，看到大桥上悬挂着警察的尸体。

反政府势力围堵和敲诈非洲劳工的事件也时有发生，非洲劳工被视为“雇佣军”，被驱赶、虐待、囚禁甚至杀害。反政府势力这些恶劣的行为，再加上卡扎菲长期以来对许多非洲国家的帮助，强化了非洲国家对卡扎菲政权的支持。

在骚乱开始之初，卡扎菲政府的镇压行动并未过度使用武力，从第二天起安全部队才开始向人群开枪，但到了第三天射击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杀戮。在班加西医院工作的法国医生证明，双方均有伤亡。

托布鲁克，利比亚第4大城市，约有17万居民，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地盘之一——在运动爆发之初就先于班加西获得“解放”。但那里几乎没有双方战斗过的痕迹。

2011年2月17日，一场“自发的”示威游行开始了。起初是由几名青年继班加西运动之后发起的，第二天示威游行的规模扩大。于是，警察向示威者开枪，致使三四名示威人员死伤。示威者开始用猎枪武装自己，双方发生武力冲突，引发了一场全面的暴动。在群众及群情激昂的当地部落面前，安全部队的领导人丢下部队（主要由未向人群开枪的当地军事人员组成）和枪支逃走了。在离开前，卡扎菲的追随者炸掉了两个军火库。

在托布鲁克，20岁至40岁的人群是事件的发起者，“资历深的人”则很快掌控了局面。托布鲁克的各位部落首领旋即会面，并发挥了中心作用：建立了地方救助委员会、安全委员会、妇女及青年委员会等。

托布鲁克的很多居民是贝都因人，他们自诩远比班加西的“城里人”勇敢，却极少有志愿者到前线同忠于卡扎菲的部队进行战斗。

德尔纳，利比亚东北部港市，有近9万名居民，是昔兰尼加伊斯兰主义者的主要据点。2011年2月15日，与托布鲁克情形一样，十几名大学生决定举行示威游行以声援班加西。教师们试图劝阻，但未奏效。我们访问时会面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当地成员（其中有三名大学法语教授），坚持认为脸书在这起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自示威游行第二天起，警察向人群开枪，造成平民5死10伤。暴动立即扩大了。面对不断升级的局势，警察很快就逃走了。示威者随后占领了警察局及其他公共建筑，然后将之付之一炬。在德尔纳获得“解放”之后，同托布鲁克一样，居民自发组成了各种委员会，部分学生和教师到战斗一线作战。

东道主安排我们参观了德尔纳清真寺内的公共陈列室，说是为纪念卡扎菲政权受害者专门设立的。不过那里的展览杂乱无章：有纪念乍得战争（20世纪80年代）的，也有纪念1986年美国轰炸的，还有纪念之前反抗当局起义尤其是1996年起义，以及2011年2月发生的一系列抗议事件的。最后，我们发现城市里很多墙上贴有用英语、法语和土耳其语书写成的标语，可以看得出口号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毫无疑问这并非群众自发书写的，只是为了让我们看到。

贝达，是拥有约20万居民的绿山区首府，骚乱再度以同样的情景在那里发生。2011年2月16日，星期三，班加西运动激化的前夕，十几名大中学生准备发动反政府示威游行。17日，游行队伍会集了许多来自普通街区的参与者，他们要求卡扎菲下台。警察对群众开枪造成两人死亡。随后，群众组织了一次静坐示威对此进行抗议。

在星期四祈祷时，安全部队抵达该城并向人群发射橡皮子弹，后来更换为实弹。据统计，此次事件造成17人（17岁至40岁的男性）死亡。贝达的居民断言在安全部队中看到了非洲雇佣兵。于是反叛的警察和民兵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将武器分发给他们以对抗“雇佣兵”。

星期五，反政府武装会集于夏哈特空军基地及政府兵营，并对其实施包围。政府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尤其是在援军抵达贝达（与夏哈

特相距不远）之后。战斗持续了两天，最后反政府武装攻占了兵营获得胜利。该地区于2月20日获得“解放”。我们无法准确获取安全部队的损失，但估计有272名军人投降。全国过渡委员会称，由于部落的介入，所有俘虏都受到优待，对其实行处决还是囚禁完全由各家族决定，缴获的武器被运往班加西。

贝达的“革命”共持续了6天时间，即2月15日至20日，实际冲突时间只有3天，示威者死亡人数估计有64人。此后，全国过渡委员会没有发现来自的黎波里政府的间谍活动，也没有发现企图破坏当地稳定局势的行为。

西部时局

直至2011年2月底，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的起义处于有利形势：反政府武装不仅抵达了距的黎波里200余千米的米苏拉塔，阿拉、兹奥维亚等利比亚西部城市的反抗运动也有了持续进展。

不过，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反政府武装只获得少数民众的支持。

兹奥维亚，距首都的黎波里约50千米。发生于此的起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和平与自发的，而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协调的。

“积极”的示威者仅有数百名（300—500人），多数是利比亚人，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外，警方认为有突尼斯人和埃及人。自骚乱开始，示威者就进入城市并立即占领中心地区，对部分群众进行训练，同时在清真寺建立了总部。

在骚乱发生后的前三周，警方接到了书面命令，对示威者不得采取任何措施，即不得开枪，不得与之对抗。在闹事者的压力下，警方甚至被迫撤出。政府虽然对起义的规模感到惊讶，但为了避免同各部落决裂、引发部族间仇杀，并不愿意发动大屠杀。卡扎菲同意了内政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不采取任何行动的建议，但从后来他脱

离卡扎菲政权投奔班加西看，他蓄意发布的该项命令的目的是让反政府武装发展壮大。

在三周内，兹奥维亚所有的公共建筑遭到洗劫和焚毁，有警察局、内政部办公室、法庭、身份登记处、监狱等。部分商店和药店遭到洗劫，一些诊所也遭到破坏。到处都是破坏与抢掠（武器、金钱和文件）痕迹，但没有一丝一毫战斗的迹象。这些都证实了警察的说法。

在反政府武装控制该城的三周内，还发生了一系列强奸妇女、杀害落单警察、残害平民的暴行。遇害者多被以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集团”的处决“方式”（割喉、挖眼、肢解，有时遗体被焚烧）杀害。部分居民因恐惧而逃离该城市。

三周之后，政府军接到了收复兹奥维亚的命令。战斗持续了约3天，根据迹象判断，双方没有发生特别激烈的战斗。100—150名反政府武装战斗人员试图以城市游击战方式来进行抵抗，最终不敌政府军。半数反抗人员逃向山区，余下的被打死，极少数被俘。战斗进行期间，又出现了新的受害者，战斗还波及并破坏了兹奥维拉的炼油厂（代表团未能参观此处）。

主要教训

利比亚“革命”并非一场和平反抗。这场运动并非产生于首都，也不是社会经济根源引发的。其中心位于利比亚东部的昔兰尼加，该地区传统上就反对中央政权。这场运动迅速演变为武装斗争。

战斗

政府军重新控制的黎波里地区的城市后，利比亚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该国进入了一场真正的内战，战斗的军事色彩也随之愈发浓

厚。

在西部，米苏拉塔和泽当（位于的黎波里西南部）这两座城市部分或完全落入起义者手中。战斗“前线”位于国家中部的某处：在希尔特湾深处，该地区有石油资源和设施，以及在拉斯拉努夫、布列加和艾季达比耶城市及其周围。

尽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有北约的轰炸（这显然已经超出联合国决议），但地面冲突仍然陷入僵局。尽管国际援助已到位，但这些城市人道主义局势恶化的状况仍然令人忧虑。

托布鲁克当局断言，“卡扎菲雇佣的部分埃及人”企图对米苏拉塔城港口实施破坏行为。4月20日夜至4月21日，当着代表团的面，8名负责看管石油仓库的男子被杀。该城市当局迅速排除了武装帮派甚至恐怖分子作案的可能，立刻向我们宣布这是卡扎菲军队的进攻导致的。

2011年4月，反政府武装在西部重新发起行动，于4月21日控制了瓦扎姆和突尼斯德伊巴之间的一个边境检查站。作为回应，利比亚政府军越过边界，在突尼斯境内沿着边界同反政府武装展开战斗。突尼斯军队宣称同卡扎菲的军队交火，并将他们赶回利比亚。突尼斯政府照会利比亚大使，对此次越境行为提出正式抗议。

米苏拉塔战役的赌注

海港城市米苏拉塔是反政府武装在的黎波里地区的最后一个堡垒。由于可以从海路定期补充食品、药品和武器弹药，它已经成功抵抗政府军的进攻达两月之久。

在“自由”世界的眼中，该城正逐渐成为利比亚版的萨拉热窝。班加西反政府武装希望用米苏拉塔的人道主义危机来说服西方联盟派遣地面部队，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2011年4月，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公布了与米苏拉塔相关的数据，该数据显示忠于卡扎菲的军队并未屠杀居民。这与某些国际媒体的报道是不一致的。米苏拉塔约有40万居民，在冲突持续两个月之后，有257名男性战斗人员死亡。949名伤者中，只有22名女性，不到总数的3%。如果政府军蓄意以平民为攻击目标，那么女性死亡人数应该占受害者的一半。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以奥巴马为首的西方领导人，为了让其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合法化，极度夸大了人道主义威胁。

米苏拉塔这座城市真正的意义在于，它既具象征性也具战略性：起义者控制该城，就能说明反抗卡扎菲的运动并非局限于利比亚东部，反抗运动从本质上也不是割裂的；此外，在对卡扎菲发动地面攻势的情况下，控制这座距的黎波里仅200多千米的港口城市，可以形成一个理想的前进基地。

冲突的后果

外国人撤离，经济活动几乎陷入停滞

“革命”以前，利比亚为其民众和相当数量的非洲和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劳工提供工作机会。它还长期吸收邻国的失业人口。许多外国劳工分布在石油和建筑行业。在骚乱的压力下，约有300万至400万外国人离开利比亚：150万至200万埃及人，100万萨赫勒、西非及中非人，60万苏丹人，20多万摩洛哥人，10多万突尼斯人，6万巴勒斯坦人，1万阿尔及利亚人，还有来自土耳其、菲律宾、斯里兰卡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很多劳工。

利比亚内战导致大量经济性移民回国，即便他们的国家也在经历严重的失业。这种回迁有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内部局势出现显著恶化：它们不仅失去了一个收入来源——移民汇回国内的收入，而且回

到国内的劳工将壮大失业大军，累积不满情绪。这将导致以欧洲为目的地的非法移民数量显著增长。这是因为海湾国家对来自这些国家的劳工不感兴趣，尽管他们都是“兄弟”还是“革命者”，但海湾国家更愿意雇用来自亚洲国家的劳工。

这些外国劳工为利比亚许多经济功能提供了保障，他们的离开导致多个行业缺少人手。工地、旅店、餐馆、商业、加油站均无法正常运营，致使利比亚经济活动几乎陷入停滞。

人道主义形势

自利比亚爆发内战后，位于利比亚、突尼斯、埃及三国交界处主要接纳外国人的塞卢姆难民营几乎消失了。相当数量的利比亚家庭（700多个）逃到了埃及的玛莎马图，还有约15 000名利比亚人逃往突尼斯。

起义者和全国过渡委员会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成立于2011年2月27日，自起义开始它就扮演着事实上的反对派政府的角色。3月5日，该委员会宣布自己为“利比亚的唯一代表”，并任命马哈茂德·吉卜里勒为国际事务主席。

全国过渡委员会只具备代表职能，暂时缓解执行机构的空缺问题。全国过渡委员会发言人、二号人物哈菲兹·胡加认为“它并非政府而是危机管理委员会”，他还宣布“当我们解放利比亚全境后将组建一个政府”。

全国过渡委员会由利比亚31个主要城市的代表组成，但31名成员中只有13人的名字是公开的。利比亚西部城市（艾季达比耶、库夫拉、加特、纳卢特、米苏拉塔、泽当及兹奥维拉）的代表身份，出于“安全”考虑没有透露，这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及亲信仍处于卡扎菲时

刻能威胁到的地区。实际上，全国过渡委员会被来自东北部的利比亚人掌控，不包括利比亚中部、南部的代表以及的黎波里的代表，这也反映出起义所具有的地区性特点。该委员会中只有一名女性成员萨尔瓦·迪格赫里博士，任司法委员会主席。

没有人质疑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正当性，因为利比亚人民尤其是昔兰尼加人，已经忍受了的黎波里独裁政权40多年的压迫。不过，全国过渡委员会又是一个由不同团体组成的代表不同利益的联盟，成员有：利比亚人权联盟（总部设在伦敦）；“拯救利比亚全国阵线”（总部设在利雅得）；赛努西君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萨法尔·伊斯兰的亲信（特别是其中两名亲信，一名来自“人权观察”，另一名来自“大赦国际”）；来自卡扎菲政权但反对卡扎菲的儿子继承权力，希望自己掌权的人；支持伊斯兰极端教义的人。

总而言之，全国过渡委员会同时包括长期反对政府的人、近期才背叛政府的青年平民及与反对派联盟的军官。由于缺乏团结，委员会所做的决定往往遭到质疑。例如，它曾鼓励许多缺乏训练的年轻人参加反对卡扎菲的战斗，导致了严重的军事失败。

因此，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分复杂，部分代表因存在争议而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部分主要领导人曾经担任政府要职。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委员会无法提供任何有力保障以推动政权向真正的民主制度转化。

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中抛头露面的主要是律师、教师和大学教职工，实际上他们并无代表性。只是因为他们的英语水平较高，知道如何与西方人及其媒体进行对话。

委员会内部的冲突很快就浮出水面。委员会2月底成立，成员之一的哈菲兹·胡加4月底就辞了职。此人是利比亚律师协会前主席，也是反对派团体最著名的代表之一，正是他在班加西指挥了最初几周的反抗行动。

赛努西君主主义运动的影响力

卡扎菲依靠利比亚西部、中部及南部的部落联盟掌握政权，完全不顾与前君主王朝关系密切的东部部落利益（哈拉比及奥贝达特）。

在利比亚，主导昔兰尼加政治宗教传统的是赛努西教团，这个反对西方的伊斯兰教派于1842年在贝达建立，遵守严格的伊斯兰教义。该教团自伊德里斯一世（建立赛努西君主王朝）起就与英国人联系密切，该王朝于1951年建立，1969年被卡扎菲推翻。

赛努西教团根本不是民主派，而是一个拥护君主体制的保守主义派，反对任何形式的现代政府。他们强烈希望对1969年政变进行报复，唯一的目标是消灭卡扎菲，重建君主政体。

我们在托布鲁克会见的部落首领之一、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当地领导人，他的父亲就曾经是伊德里斯一世的大臣。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对他而言，君主制是保持国家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

有争议的领导人

第一位是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在数月前还是卡扎菲的司法部长。他于反现体制运动开始后的2011年2月21日辞职。他被认为是传统派人士，得到伊斯兰主义者和部落的支持。

第二位是外交事务负责人阿里·阿卜杜拉齐兹·伊萨维，曾任经济和商业部长，后任驻印度大使，之后辞职加入反抗卡扎菲政府的力量。

第三位是负责“军事事务”的奥马尔·哈里里，曾经同卡扎菲一起参加了1969年的政变，1975年试图推翻卡扎菲，但政变失败，被囚禁，后流亡国外。

第四位是前内政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将军，是在军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强人，特种部队的缔造者。他曾是卡扎菲的战友，在骚乱爆发数日后叛逃。

如此多的政府高官背叛卡扎菲，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转向民主，而是机会主义作祟。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及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均为的黎波里政府前高官、卡扎菲的战友甚至同谋、“大利比亚共和国”各项政策的执行者。即使参加起义，他们也并不能撇清过去。如果将他们视为愿意带领利比亚进入民主和尊重人权时代的“解放者”，那就大错特错了。过去10年里他们曾轻松愉快地践踏过民主和人权。不过，全国过渡委员会里部分真正的民主派代表毫不犹豫地宣称，“全国过渡委员会内部出现政府前官员是有益的，因为可以利用他们的经验”。

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政治目标

建立民主国家

全国过渡委员会承诺，在卡扎菲倒台后实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强调其“渴望一个自由现代的国家”。全国过渡委员会“保障所有利比亚人享有投票权，以举行自由公正的总统和立法选举”，制定一部“经全民公决的宪法”来保障“组建政党，尊重通过媒体及和平示威实现言论自由”。

“宪法体制下的世俗国家将尊重宗教的不可侵犯性，并对排除异己、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进行惩罚”，全国过渡委员会还补充说，保证一个新的利比亚“在否定和拒绝种族主义、歧视、恐怖主义后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反抗力量承诺尊重人权，还暗示在国家重要的石油资源领域，“保护外国团体的利益和权利”。

然而，还有许多令人不安的因素存在。实际上，在国家过渡宪法计划的呼吁书中，第一章是这样规定的：“利比亚是独立、统一而非分

裂的主权国家。这是一个民主、分权、权为民所赋的国家。其宗教为伊斯兰教，且伊斯兰什叶派教义是其法律的来源。其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其首都为的黎波里。法律面前公民自由且权利义务平等。”

部分起义者宣布，“我们很多人都祈愿一个尊重我们宗教习俗的民主制度”，却没有看到其中的矛盾之处……

防止国家被分割

对所有利比亚人而言，他们的国家并非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是殖民时代人为形成的。这个国家建立在其边界和民族情感之上，利比亚人之间并没有地区仇恨。因此，全国过渡委员会、利比亚人民、政府支持者均不愿意国家被分割。

削弱部落影响力

代表团同全国过渡委员会德尔纳代表进行了长时间会谈，主题多集中于“公民社会”的概念。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愿望，即把支配国家的部落制度重新提交讨论。他们指责说，卡扎菲为维护其权力强化了部落的地位，企图告诉世界是部落在管理利比亚，而他们认为这不是事实。

全国过渡委员会代表宣称人民不再需要部落制度，也不再承认部落首领的权威。因此，全国过渡委员会是按城市而不是按部落组建的。该委员会将宪法及制度的制定建立在竞争力的基础上，而不是以部落归属为准。该委员会代表认为，在未来的利比亚，部落只具有社会地位而不具有政治地位。这些宣言在与会人士间引起骚动。我们将这些宣言与之前在托布鲁克听到的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根本矛盾。

重新考虑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必须指出，利比亚“革命”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所有出现在利比亚东部的黑人都被当作服务于卡扎菲的雇佣军。起义者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具有强烈的怨恨。根据全国过渡委员会数名成员的意见，新政权建立后，将对那些曾经帮助过卡扎菲的非洲人实行惩罚政策。

这种怨恨主要针对非洲联盟，因为非盟在2011年3月10日向的黎波里提出解决方案，而没有向全国过渡委员会提出类似建议。于是起义者不想再听到非盟的声音。

非盟代表最终来到班加西时，带来了一份法文版及英文版的文件，该文件却没有阿拉伯语版本。文件中并没有提及卡扎菲下台，而这正是全国过渡委员会坚持的一项前提条件。非盟为了支持卡扎菲，只提出停火建议，以及通过宪法改革结束42年之久的独裁统治的建议。

全球范围内，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人表现出天真和感人的热情，但他们并不知道获得自由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他们要以某种形式的政治及经济代价，来偿还国际力量为平息冲突所支付的成本。

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军事战略

在同卡扎菲军队战斗的过程中，远非世界上最精良部队而且缺乏重武器的起义者很快就显现出局限性。但必须指出，他们运用语言的能力要胜过使用武器的能力。

反政府武装在同政府军战斗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战术素养，他们的指挥官能力也不强。他们既缺乏战术又无整体协调性。他们的军队大部分由缺乏训练的民兵、利比亚前军队成员及“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改过自新的志愿者组成。在夺取了昔兰尼加的系列军火库后，缺少武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苦恼的是缺乏有才能的人员，尤其是能够使用重型武器装备（如T-55中型主战坦克）的人员。

即便反政府武装获得了外国援助，能够继续作战，但他们依然无法战胜利比亚政府的军队。如果没有西方的支持，他们早就被消灭了。因此，他们将战斗任务委托给北约，但当他们认为北约未尽全力或因导弹未击中目标而引发相关损失时，也会对其进行猛烈批评。特别是，之前长期叫嚷不希望外国力量进行地面干涉，这之后，他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2011年4月19日，来自米苏拉塔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努里·阿布达拉·阿布戴尔·阿提呼吁西方军队介入以保护城市平民，并驳斥了这种行动会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观点。

与代表团会谈的该委员会多名人士均向北约请求过援助，他们认为如果北约派遣地面部队，军事形势将迅速转变。自那时起，的黎波里政权的垮台就取决于北约了。地面干涉的主张之所以出台，似乎是因为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人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全国过渡委员会自称已准备接受与其数周前建议相反的方案，同时也不希望“北约出现伤亡”。我们代表团成员对这场“革命”代理人的人为特点感到惊讶，其各种人物舞动着外国的旗帜，屡次提及萨科齐的名字，并要求北约介入以实现他们的民主化目标。

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囚犯

代表团可以不受限制地参观反政府武装保安部门所控制的福伊哈特监狱，还可以使用自己的翻译进行会谈而不必接受审查。针对代表团的安全，监狱方面也未设置任何安保措施。我们甚至有几次同囚犯单独会面，他们表现得平静、顺从，甚至有些呆滞（似乎受到了镇静剂的影响）。

福伊哈特监狱环境良好，关押着60多名囚犯，除了1名加纳人和1名阿尔及利亚人[4]外，其余均为利比亚人。代表团访问期间，只发现极少数伤员。这里的囚犯年龄比较大（30—40岁），只有几名是年轻人。他们穿着得体（带风帽的长袍或厚运动装），还可自由携带打火机及香烟，这让我们很惊讶。

根据这些囚犯的表述，大多数人称曾经有偷盗行为，但从未参加过战斗。通过观察他们的手以及言行举止，我们发现，这些人的确不像战士。有些人承认曾接受过武器和少量钱财，参加镇压示威者的战斗，但未经任何训练。不过，我们没有办法核实谈话内容的准确性。

看守人员对这些囚犯的来源并不清楚，似乎也并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罪”。调查还将陆续展开，我们不知道应该采用什么方式进行调查。

一名忠于政府的将军自称是班加西工兵部队的司令，和其他囚犯一起被关在同样的环境中，这同《日内瓦公约》并不相符。[5]

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宣传”

全国过渡委员会在揭露政府的暴行时，进行了系统性的夸大，这降低了控诉的可信度。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 萨科齐的干涉拯救了100多万人的生命，即班加西全部人口。
>
> 在的黎波里，人们甚至不能到街上去，那样会丢掉性命。居民非常害怕，只有去买食物时才敢偷偷摸摸地出门。
>
> 卡扎菲雇用了密探，这些密探又雇人组织挑衅行动。
>
> 在米苏拉塔和艾季达比耶，卡扎菲给他的部队配发万艾可和避孕套，导致出现多起强奸并肢解妇女的事件。
>
> 卡扎菲希望北约实施地面干涉。他不希望和平也不希望停火。他只希望外国部队介入，他需要更多的牺牲品。
>
> 一辆阿尔及利亚军队的汽车已经出现在布雷加。
>
> 阿尔及利亚军队用直升机为卡扎菲的雇佣军提供补给。

2011年4月底，反政府武装领袖在访问科威特时，再次指责阿尔及利亚支持卡扎菲政权，称阿尔及利亚为卡扎菲政权提供物资并为雇佣军进入利比亚提供便利。全国过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成员、驻马来西亚前大使萨拉赫丁·比西里对此予以完全否认，他对代表团确认，全国过渡委员会没有发表任何涉及“阿尔及利亚雇佣军”的官方声明。他的说法显然不是事实，因为上述指控曾被国际媒体引用，全国过渡委员会也就此“事件”向阿盟提交了相关材料。

同时，在埃及的部分利比亚人被指控破坏利比亚东部的稳定。利比亚东部由反政府武装控制。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人要求开罗政府介入。

此外，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给他们的西方会谈者灌输了准备好的言论，对其进行诱惑及说服（选举、多党制、妇女权利、结束部落体制，甚至承认以色列）。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保持统一口径，似乎都接到过指示。这些声称向往更多透明度与民主的人一致采取这种“空洞的言辞”，真是让人惊讶，这些说法让代表团觉察到他们对西方所做的承诺与当地的实情相互矛盾。

在代表团访问期间，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代表和的黎波里政府的代表，分别给我们传送了多份显示安全部队对示威者进行镇压及示威者横行霸道的书面文件或视频文件。这些文件的来源均无法证实，公开使用这些材料是不可能的。

全国过渡委员会获得的支持

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成员没有提到自身的资金问题，这是因为起义者已经得到了大量的财物和人道主义援助。不过，他们似乎存在药品短缺的问题。但是，对全国过渡委员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获得西方的承认，其领导人强调法国是他们最坚固的后盾。2011年4月22

日美国参议员麦凯恩的到访，以及他在国际媒体上的讲话都具有非常重的分量。[6]

黎巴嫩真主党（及其领导人纳斯鲁拉的宣言）同样采取了有利于起义者的立场，他建议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教官和物资。哈马斯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北约的行动

空中打击的成功

尽管所有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均未明确宣布其目标，但目的显然是实现停火。为实现该目标，要三种方式同时进行：对武器实行海上禁运；建立空中禁飞区；保护平民。第二个方式引发的争论最多，因为它将影响北约通过空袭摧毁的黎波里军队的行动。

在空袭的最初几周，法国、美国及英国空军系统性“猛烈攻击”利比亚的军事设施，尤其是摧毁其防空系统、装甲运输车辆及重武器。由于缺少地面指引，有时也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浪费。如四枚导弹同时击中的黎波里的一个海军基地的车库，当时那里没有停放任何同禁飞区有关的飞行器。这次空袭只摧毁四辆用于训练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却花费了300万美元。

据北约行动指挥官、加拿大的布夏尔将军介绍，在联军打击下，30%的利比亚政府军被摧毁。各国联合打击期间，部分军事专家指责联军使用了含有贫铀的武器，北约对此进行了否认。但专家在分析了针对卡扎菲军队的空袭的照片之后，认为联军很可能使用了这些类型的武器。既然没有证据证明联军没有使用过这类武器，此疑问将继续存在，除非国际司法机构对此过问。

北约打击的附带损失

空袭属于精确打击，尽管由此产生的附带损失较小，但仍然不可避免。此次北约的部分打击，还给平民带来了严重后果。

在有军事设施的米兹达，北约空袭波及医院、医务人员的住所以及附近的数十所居民点，造成许多医务人员及平民受伤，其中有的医生来自朝鲜。许多家庭因此受到了心理冲击及创伤，被迫离开住所到搭建的帐篷里躲避。代表团与这些家庭会面时，注意到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非常不稳定。

代表团还注意到，利比亚西部及南部居民对空袭的动机很不理解。他们体会到仅仅因为自己是该地区的居民，就被认为是罪犯的痛苦。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国际联盟只考虑利比亚东部居民的利益。

根据在米苏拉塔与兹奥维拉收集到的其他证据，北约空袭还造成了外国居民伤亡。数百个阿尔及利亚家庭失去了一切，他们被迫丢下财产逃离住所，还有数百个家庭一直在寻找失散的亲人。

北约打击的局限性

在持续数周的空袭之后，北约打击很快显现出局限性。事实上，利比亚政府军知道如何应对，尽可能降低空袭行动的效果。如使用轻便的交通方式（特别是皮卡车），使侦察机难以侦察到；隐藏其脆弱的重武器，在夜间将装备运送至战斗区域；有时向城市区域撤退，以便增加北约打击造成的附带损失风险，他们在米苏拉塔战斗中就采取这种策略。

总之，利比亚政府军训练有素、积极主动。步兵部队配备迫击炮、火箭发射器、狙击枪等轻武器，完全有能力控制城市区域并击败反政府武装，无须空中力量的介入。当时的战斗中，似乎不可能根据空中打击及军事顾问提出的行动方案做出决定。

事实上，多种因素使得卡扎菲军队没有被完全解体。2011年3月底美国撤出战斗，仅剩6个国家以有限的手段参加打击，北约很难有效组织打击活动；反政府武装地面力量较弱，而利比亚政府军采取了降低空中打击效果的策略；虽然美国空军决定部署“捕食者”无人机，但收效甚微。

代表团观察到的情况

我们代表团在的黎波里和利比亚西部度过一整周的时间（3月31日至4月6日），没有看见一架飞机，也没有听见空袭的声音及防空武器的射击声。除了卡扎菲所居住的巴布阿齐齐亚及小海军基地之外，利比亚首都似乎根本没有遭到北约袭击。我们没有看到城里有任何部署军队或军事设施的迹象，那里的气氛完全不像处于战争中。的黎波里人出行完全正常，夜晚甚至还去海边散步。城中的警察也并未配备武器。

虽然的黎波里道路出口处安放着障碍物，但只部署了配备轻武器（有时是装在皮卡车上的ZSU-23-2型自行高射炮）的一小部分人（根据情况配备武器的警察和民兵）。

利比亚民众对空袭的反应

2011年4月30日夜至5月1日，北约重新开始空袭行动，造成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阿拉伯及3个孙子死亡。的黎波里民众开始对北约的行动感到厌恶。

这也导致北约国家几名外交代表在的黎波里受到攻击。的黎波里居民涌上街头攻占了意大利大使馆、意大利大使及英国大使的官邸，并纵火。针对法国及美国大使馆的攻击行动并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联合国的一所建筑物也成为民众攻击的目标。

一项含糊扭曲的决议

以法国、英国、美国为首的联军在利比亚展开代号为“奥德赛黎明”的军事行动，是联合国在最后时刻达成的一项决议。美国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弃权票，法国总统萨科齐对几个非常任理事国做了工作。该决议从地区组织（尤其是阿盟）得到的支持有限，很大程度上是法国和英国恶意推断得出的片面结论，所以联军军事行动的政治基础极为薄弱。

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限制使用空中力量以保护平民。但不幸的是，它所使用的“可以采取所有必要措施”这种模糊表达方式，为联军多次歪曲诠释留下了空间。该项决议甚至没有完全排除地面干涉，尽管它没有被联军诠释为“部署外国占领军”。该决议允许使用的武力手段相当广泛，从设立禁飞区、“为了保护平民”到完全摧毁卡扎菲的军事力量。

当法国、英国和美国对该项决议进行过度解读时，人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并表示遗憾。即便没有人不认为卡扎菲及其独裁政权罪有应得，但通过此次行动消灭利比亚政权既未得到授权也不合法。这种行动只会强化民众对时常出现于阿拉伯国家的新殖民主义进行指责。最后应该强调的是，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并没有授权进行这种政治谋杀。

西方特种部队的行动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中情局及英国军情六局就同利比亚情报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利比亚似乎已经允许美英情报机构，在穆萨·库萨领导的利比亚情报部门内拥有多个情报来源，其中多数人被怀疑是军情六局的双面间谍。

卡扎菲军队出现在班加西堡垒中，反政府武装被逐出城外，其失败似乎是板上钉钉。但华盛顿在秘密取得伦敦、巴黎同意后，决定攻击利比亚政府军，推翻的黎波里政权。

作为北约联军实施空中行动的补充，西方情报机构加强了在利比亚的存在感，其目的是支持反政府武装同卡扎菲政权进行战斗。联军使用特种部队及秘密行动部队的目的，在于规避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排斥所有“占领军”的决议。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行动在空中行动开始之前就已经秘密展开，而按国际法的规定，这显然是赤裸裸的干涉行为。

秘密援助行动

自空中行动开始，美国中情局各团队就按总统的命令部署至利比亚，以便同反政府武装取得联系，并为联军的打击行动提供指引。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允许为在利比亚“促成战争的努力”而开展秘密行动。这将使哈夫塔尔上校回归。[7]

于是，在华盛顿的要求下，英国向反政府武装派遣军事顾问，为中情局的地面行动打前站。数十名英国特种部队成员及秘密情报机构官员，在利比亚开始收集忠于利比亚政府的军队位置信息。但这些行动开展得并不总是那么顺利。

2011年3月初，一个由2名军情六局特工及6名特别空勤团（SAS）成员组成的行动小组，企图潜入班加西与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建立联系。他们从直升机上下来时，不幸撞见了负责看守一座农场的武装人员。被俘后，他们被转交给反政府武装并接受了盘问。但英国当局并未承认此次行动的目的，只是下令用直升机将他们撤回。

据《鸭鸣报》爆料，法国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幌子，向班加西反政府武装提供了105毫米口径加农炮及防空火炮，履行了萨科齐对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的承诺——“我们会帮助你们”。此次行动由

法国对外安全总局（DGSE）行动部门实施，并派出了数名联络官负责与反政府武装协调。同时，法国对外安全总局还派遣多名教官在技术指令、后勤指令和组织命令方面为反政府武装提供建议。意大利也不甘落后，向反政府武装派遣了多名军事顾问。

西方国家并非唯一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支持的势力，据媒体报道，隶属于埃及第777部队（“闪电”特种部队）的特战人员，曾经越过边界为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和战术支持。

暗杀卡扎菲的各种尝试

结束利比亚危机最快捷的解决方式之一，是消灭利比亚的“导师”卡扎菲。因此，联盟情报部门同空军展开合作，试图清除卡扎菲。

事实上，多国联盟也存在着解体的风险。一方面，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面临诉讼，极为脆弱的政治联盟很可能导致他在短期内下台。而继任者似乎并不打算加入北约的行动，并可能让意大利退出联盟。另一方面，奥巴马签署的执行利比亚行动的命令有效期为60日，即将于5月19日中止。

上述紧张的日程似乎可以解释，联军为什么要在4月30日夜至5月1日对位于的黎波里的卡扎菲住所实施空袭，该行动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北约这次空中打击，造成卡扎菲的儿子29岁的赛义夫·阿拉伯以及3个孙子被炸身亡。空袭时卡扎菲的确在房屋内，但并未受伤。利比亚政府发言人穆萨·易卜拉欣向外界揭露了北约企图暗杀利比亚领导人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卡扎菲位于的黎波里市中心巴布阿齐齐亚兵营的住所，在北约的第一轮轰炸中就被炸毁。

国际社会的策略

北约盟国对利比亚的军事干涉，以及其影响阿拉伯“革命”的各种尝试，本质是国际力量在角逐北非及中东地区的能源。

美国的战略

控制利比亚或将其变为自己的卫星国，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的确，虽然利比亚的石油产量仅占世界的2%，但它拥有整个非洲大陆所探明的油气储备最多，而且质量高，易于提炼，利润也高。

此外，2007年10月1日，美国组建的非洲司令部正式建立。五角大楼在该地区设立指挥部，其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及反制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卡扎菲在2008年拒绝加入美国非洲司令部，他还曾宣布反对这种“试图收买非洲大陆的帝国主义行为”。此举触及美国的利益，华盛顿早就想伺机报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的报告认为，美国时代即将结束，未来5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华盛顿试图对抗这种发展趋势，运用军事和战略优势限制中国获得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自然及能源资源，从而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在利比亚的行动明显反映了这项战略意图。

其他各方的利益

欧洲国家的参与同样与其经济利益相关。利比亚曾经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二者长期以来保持着密切关系。德国是利比亚石油的主要受惠国之一，又在利比亚进行了大量投资，利比亚还是其重要的出口市场。而法国和英国并未与卡扎菲签订有利合同，因此它们毫不犹豫地站在反政府武装那边，希望推翻的黎波里政权。

除了经济联系之外，德国还提请其伙伴注意，这场军事冒险存在极大的风险。柏林当局着重指出，干涉可能导致利比亚分裂，从而使

欧洲的大门外出现一个恐怖主义国家或失败国家。但德国的意见未被听取。因此，欧洲分英法“干涉派”及德意“观望派”两股势力。欧洲首先采用了美国的方式而非自己的方式，对第1973号决议进行了“自由解释”。欧洲在以下国家中寻求并找到了同盟：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及阿联酋。

自叛乱伊始，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政府就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它们通过阿拉伯电视台及半岛电视台等媒体，传播依据错误信息或精心编造数据所得出的观点。沙特阿拉伯这样一个独裁的海湾君主国，奇怪地支持利比亚人要求民主及人权的“革命”，并未使与它同盟的真正自由的西方国家感到窘迫。部分媒体透露，在阿联酋的支持下，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倾向于在利比亚东部建立一个“赛努西石油君主政体”。埃及作为最后一个与利比亚冲突相关的国家，自利比亚于1951年宣布独立以来，从未认可昔兰尼加及其石油资源归属的黎波里。1991年推翻卡扎菲政权的企图失败之后，华盛顿向开罗许诺将昔兰尼加划给埃及。埃及的新主宰正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其内部局势如同其对利比亚的影响一样，将成为该地区未来的决定性因素。

此处如果不提及以色列，那么就算没全面介绍参与利比亚冲突的各方。以色列对该地区各国政权不稳及伊斯兰主义抬头极为关切，它曾花费了数十年时间才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实现了平衡。尽管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部分成员准备承认内塔尼亚胡政府，但以色列态度依然十分谨慎。

法国的立场

法国介入的原因

2011年3月10日，法国成为首个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利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国家。萨科齐的这个决定使其他欧洲伙伴惊

诧。我们分析有以下三个理由促使他做出这项决定。

第一，法国外交部因未能及时应对阿拉伯“革命”而产生了挫败感。我们认为，法国外交部在应对2011年冬的突尼斯及埃及事件中表现迟钝，因而错误地产生了被抛弃的感觉。因此，它希望能够重新掌握外交先机。利比亚危机为其提供了良机。由于外交官中强烈反对卡扎菲的占了上风，外交部更容易将反对卡扎菲变成其自发的行动。

第二，内政的赌注。大选年宣布一次对外军事行动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从2012年的角度看，对一个长期受到非议的阿拉伯独裁者发动战争并轻而易举取得胜利，百利而无一害，而且作为战争指挥者能够增加参选总统的威望。

第三，其他原因。利比亚问题专家克劳德·盖昂刚刚离开爱丽舍宫就任内政部长，知名的阿拉伯问题专家、国家情报协调人贝尔纳·巴若来已就任驻阿富汗大使。萨科齐总统身边的主要顾问相继离开，没有人可以提供有用建议，才在贝尔纳-亨利·莱维及卡塔尔埃米尔的影响之下，接见、承认并支持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

萨科齐单方面做出打击利比亚的决定让其德国及意大利盟友感到错愕，为此柏林决定不签署第1973号决议。这项决定似乎也将法国外长阿兰·朱佩置于与科林·鲍威尔在2003年相似的境地——当时美国已经宣布要入侵伊拉克，鲍威尔只能捍卫一个自己并未选择且并不支持的立场。

危险的幻想

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人叫嚷“法国总统的决定拯救了100多万人的生命”，颂扬法国同全国过渡委员会之间的友谊，使得目前的形势有利于反政府武装生存。新生的利比亚“革命”代表的过激言论，以及班加西民众的热情均强化了萨科齐总统的幻想。

不可否认的是，法国及其总统获得了整个昔兰尼加无与伦比的热爱。我们代表团多数成员是法国人，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极为热情的接待。需要承认的是，法国总统的名字从未在外国如此频繁地被提及。利比亚东部民众对其大加颂扬，西部却对其极为蔑视，在双方的眼中，似乎只有法国才需要对局势负责。忠于政府的利比亚人仍然对法国人民和法国总统进行了明显区分。

法国作为超级中介尤为迷惑人且危险。的确，法国已经同起义者签署了一些秘密协定，但什么也无法保证萨科齐总统履行其推翻现政权的誓言。一旦卡扎菲继续掌握权力，在利比亚的法国企业将处于极端不利的环境。而在利比亚国家分裂或党派协商的时候，法国将无法扮演任何仲裁的角色，因为的黎波里政权对法国总统已经恨之入骨。

我们相信，巴黎鲁莽地介入利比亚冲突让华盛顿占了便宜。美国让萨科齐标榜法国是联盟的发动机，万一行动失败，法国将承担全部责任。奥巴马总统更为狡猾的做法，使得美国让法国最终火中取栗。

冲突的成本

法国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收益相当不确定，但冲突的成本则是不可忽视的。的确，空中行动中，“阵风”战斗机成绩优异，对扩大法国军备出口具有积极影响。但是，法国每天耗费在利比亚的费用是在阿富汗的5倍，其中主要是飞机的飞行费用及高昂的弹药费。

“阵风”战斗机每小时飞行费用（不包括燃油）高达1.3万欧元，“幻影”2000战斗机的该项费用仅为1.1万欧元。空军战斗机从法国基地起飞，往返利比亚需6个小时。“戴高乐号”航母抵达后，飞行费用有所减少。

法国国防部长热拉尔·隆盖4月底对众议员说，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共发射了11枚“斯卡普EG”巡航导弹，每枚价格高达85万欧元，总费用为935万欧元。法国军队还发射了AASM空对地导弹、GBU激光制

导炸弹等相对便宜的导弹。据专业媒体透露，仅在军事干涉的前两周，费用就超过3亿欧元。而最终费用无疑将取决于行动持续时间。相较于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国防预算，军事干预的费用显得尤为沉重。

恐怖主义风险

还没有人找到恐怖主义分子在利比亚存在的确切证据，不过恐怖主义表面上确实难以察觉。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利比亚东部保守主义色彩明显——有无数全身包裹严实的妇女、蓄须的男子。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利比亚穆兄会历来植根于该国东部。尤其近20年以来，昔兰尼加特别是绿山地区，一直是“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的避难所。

“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

20世纪90年代初，利比亚“圣战者”、参加阿富汗战争并于战后留在当地的老兵，在阿富汗成立“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该组织直到1995年才正式公开。“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入恐怖主义组织黑名单。

自1995年开始，在其历史性领导人阿布·阿布达拉·萨迪克的指挥下，“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对的黎波里发动了“圣战”。该组织大量成员因此返回利比亚，意图推翻卡扎菲并以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国家代之。于是该国境内恐怖主义活动频发。1996年，利比亚安全部门成功挫败一起针对利比亚“导师”卡扎菲的暗杀，卡扎菲立即展开对“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的无情打击。为了打击“基地”组织，利比亚安全部门及西方情报机构建立了难以想象的紧密合作关系。该决定促使本·拉登将卡扎菲视为生死敌手，“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在2010年还将卡扎菲列为优先打击的目标之一。

在利比亚的打击下，大部分“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活动分子被迫离开利比亚到国外开展活动。许多成员分散到“基地”组织国际分支机构内部。最著名的是阿纳斯·利比，他曾参与1998年8月针对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美国大使馆及肯尼亚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的袭击行动。2002年5月他在伦敦被捕。另一名重要恐怖分子是易卜拉欣·阿布·法拉基·法基·利比，2006年5月2日在巴基斯坦被抓获。此人来自“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成功跻身“基地”组织高层，在军事委员会担任职务，是本·拉登最信任的人之一。2003年3月，他接替被捕的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成为“基地”组织海外行动的负责人。

2007年11月，“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宣布正式成为“基地”组织的分支。他们将组织更多利比亚“圣战者”参加对抗驻伊拉克美军的行动。

昔兰尼加，“圣战者”的土地

2007年美国西点军校得到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反抗卡扎菲的暴动中心昔兰尼加也是招募前往伊拉克的伊斯兰战士的策源地之一。2007年美军在伊拉克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有600名“基地”组织成员的名单，其中112名是利比亚人，多数来自昔兰尼加。西点军校研究后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班加西经德尔纳至托布鲁克之间的地区，是世界最大的恐怖分子聚集区之一，该区域内每1000至1500名居民中就有一名被派往伊拉克的战斗人员。

在同美军作战的“圣战者”数量方面，沙特阿拉伯人的占比高居首位（41%），利比亚人排名第二（19%,112名“圣战者”）。这说明在参与伊拉克“圣战”的外籍战斗人员中，差不多每5人中就有1名利比亚人。如果按“圣战者”占本国人口比例计算，利比亚对“圣战”的贡献超过其他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的德尔纳只有9万名居民，却向伊拉克派遣了52名战斗人员，其他城市则望尘莫及。

利比亚人对“圣战”贡献的另一个特点，是自愿参加“神风式自杀攻击”的比例很高。利比亚“圣战者”实施自杀性攻击的比例高达85%，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平均值56%。这个数字足以引起人们的担忧。

2009年，被监禁的“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领导人同利比亚安全机构代表达成一项协议，同意放弃使用武力反抗卡扎菲政权。因此，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伊斯兰释放了800名被囚禁的该组织成员。如今这些人都加入了反政府武装行列。

简言之，是北约军事联盟为容纳了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反政府武装提供了支持。今天华盛顿所支持的利比亚反政府力量，昨天还是在伊拉克打击美国大兵的“圣战者”。

“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参加战斗

利比亚反政府武装首领哈基姆·哈西迪——“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首领之一，曾在阿富汗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宣布昔日在伊拉克对抗联军的“圣战者”正式投入反抗卡扎菲政权的战斗，有1000余人受他指挥。哈西迪目前是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德尔纳代表，负责昔兰尼加东部的安全。他的上司是卡扎菲前内政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将军。

美国海军上将、北约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斯塔夫里迪斯证实了哈西迪的话：“数十名‘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战斗人员投入了反对卡扎菲的叛乱。”但他补充说，这些人以个人名义参加战斗，并非有组织地实施行动。作为对此番言论的呼应，《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的领导人“已经与‘基地’组织保持距离，并保证其战斗只是为了推翻利比亚现政权”。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哈基姆·哈西迪坚持认为，他的战士“是爱国者和好穆斯林，并非恐怖分子”，同时也宣布“‘基地’组织成员也是好穆斯林，他们在同入侵者作战”。更令人忧虑的是，他还说：“同卡扎

菲宣称的相反，我不再是‘基地’组织的一员。但如果动荡的局势持续，我将毫不犹豫地求助于他们。”

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也发表了类似令人担忧的言论，如来自德尔纳的阿舒尔·布拉西德对“革命”内部出现激进主义没有丝毫不悦，反而说：“我们都是穆斯林……我们正处于民族‘解放’阶段。现在不是将我们之间的分歧放大的时候。等这些人显山露水时，我们再担心吧。”

西方情报机构对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内出现“基地”组织战士深为忧虑。斯塔夫里迪斯海军上将在美国参议院通报此事。他承认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反抗组织中有恐怖分子活动的迹象”。令人非常不安也最让人惊讶的是，“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的战士已经成为反政府武装的中坚力量。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哈基姆·哈西迪已经于2011年4月中旬离开班加西，同“25名训练有素的战士”乘坐一艘武装小艇前往米苏拉塔。

阿卜杜穆迈姆·马德侯尼曾化名穆斯塔法·扎维、奥瓦或伊本·瓦德，在20世纪90年代加入“基地”组织，此人在布雷加的战斗中被打死，此前一直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

伊斯梅尔·萨拉比，“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另一名主要成员，2011年4月7日在卡塔尔派遣的20多名专家协助下，于班加西兵营对200名激进主义者进行训练。

“基地”组织的声明

萨利·赫阿比·穆罕默德是“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的媒体负责人，他在接受在伦敦发行的沙特阿拉伯《生活报》的采访中声称，他的组织已经在班加西、迈尔季、贝达，尤其是德尔纳建立了“酋长国”。他说：“我们在德尔纳的力量尤为明显，哈基姆是我们的埃米尔，他同其他兄弟一起在当地成立了一个伊斯兰委员会，依照伊斯兰教法来管理

这座城市。”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个事实，地区性影响的潜力为“基地”组织在利比亚东部发展奠定了基础。

萨利·赫阿比·穆罕默德还证实，恐怖组织近期获得了武器，“以保护我们的战士及捍卫伊斯兰教的旗帜”。“基地”组织在利比亚出现，是西方对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持保留态度的结果。

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回应

面对上述事实，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的回应却是含糊不清的。关于武器问题，他们承认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在班加西的军火库遭到抢劫。但他们声称利比亚东部部队很少，而且装备经常不足。因此，示威者只获得了少量武器。然而，他们没有否认武器的扩散已经成为事实。全国过渡委员会对武器进行了清点，并要求公民在“危机”结束后上交这些武器。

当我们提及存在恐怖分子的问题时，全国过渡委员会则断然否认。多数被提问的成员声称，利比亚东部没有外国恐怖分子（“基地”组织），也没有支持恐怖活动的雇佣兵。他们认为很容易分辨这些人。但在托布鲁克，同我们会谈的一位人士承认，有些“战士”将驻扎在艾季达比耶的卡扎菲士兵割喉，但这些人已经被逮捕并记录在案，而且他们只停留“十天半个月”。

一个新的地区性恐怖主义源头正在形成

西方情报机构对遭反政府武装洗劫的利比亚军火库的武器去向深感担忧，尤其是便携式SAM-7型地对空导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MI）的成员通过利比亚走私者已经获得数件此类装备。如果情报属实，法国情报机构表示很担心未来会在“萨赫勒地区、阿富汗或其他地区”发现这些武器。法国内政部长克劳德·盖昂认为，提供给利比亚反政府武装的武器已经有一部分被运至萨赫勒地区。事实

上，马里当局宣称最近已经掌握了一些武器（AK-47自动步枪、RPG-7式火箭筒、ZU-23高射炮、SAM-7半自动步枪）及物资（运送物资的皮卡车及卡车）流入该国北部的情况。

因此，2011年4月末，马里外交部长苏梅卢·布贝耶·马伊加判断，该地区局势“严重且紧迫”。他举证说，马里国土上新建了一个AQMI的基地。此基地位于巴马科以北370千米处的纳拉附近，靠近马里同毛里塔尼亚的边界。瓦加杜古森林还发现了好几辆疑似AQMI运输物资的车辆。这个新基地让恐怖组织能够在毛里塔尼亚领土开展新行动，还可以随时撤退回马里境内。

利比亚危机还冲击了阿尔及利亚。根据该国安全部门信息，卡比利亚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同利比亚冲突有着直接的关系。AQMI利用这场冲突获取武器弹药。

因此，利比亚冲突对整个萨赫勒-撒哈拉地区及马格里布的安全形势构成了冲击。由于获得了来自利比亚的武器，AQMI的军火储备正在增强，对该地区的威胁也不断上升。阿尔及利亚、马里、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的总参谋长在巴马科举行会议，就地区局势展开讨论。更糟糕的是，AQMI可能正企图向东部扩展。

利比亚局势的发展可能导致形成许多保护区——真正的小“瓦齐里斯坦”，当地安全部队对这些地区难以进行有效控制。这种情况不禁让人联想起20世纪90年代的阿富汗局势。

“革命”的未来

自1969年以来，穆阿迈尔·卡扎菲将该政权强加给利比亚人民，但有很多证据表明国际各大媒体的报道都进行了添油加醋，该政权某些积极的举措大有被抹杀的趋势。没有必要强调利比亚政权有很多方面需要批判。没有什么比争取自由民主更为合法。我们代表团相信利比

亚民主人士反对现政权、要求结束穆阿迈尔·卡扎菲独裁政权的真挚情感。

然而，我们在分析后确信，利比亚“革命”既非民主的，也非自发的。利比亚正处在一场由东部组织的武装起义之中，其目的是复仇与分裂。这场运动很大程度上受外国激发和支持。想质疑这场“革命”的民族属性，只需要看看昔兰尼加各城市街道上飘扬的法国、英国、卡塔尔等国的国旗就足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起义的实际领导人隐藏在幕后。

公正地说，民众即使期待现政权终结，也要对全国过渡委员会持保留态度，这一点非常重要。全国过渡委员会是一个利益错综复杂的联盟，受支持恢复君主制及实行伊斯兰激进主义、叛变旧体制这两个派别的裹挟，真正的民主人士只是少数，三方唯一共同点是反对现政权。这三个派别都知道，安抚或糊弄西方，必须由他们出面。然而历史多次证明，捍卫自由的人士极少能够成为“共同阵线战略”的胜出者，因为在这种阵线中，其他派别往往更坚决而且拥有武器。由于全国过渡委员会中政府的前高层人士、君主制拥护者及伊斯兰主义者占多数，这些人想根据自己的目标来指挥委员会，尽管民主人士怀有良好的愿望，但该委员会不能提供任何保障。

在经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中，只有利比亚爆发了内战——国家的确存在分裂风险，该国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风险在日益增长。如果全国过渡委员会中最强硬的派别掌握昔兰尼加甚至利比亚的政权，就很有可能在该国推行伊斯兰极端主义。那些“圣战者”无法在阿尔及利亚办到的，就可以在利比亚实现。那么，对西方世界而言，这将是一场灾难。

西方大国介入这场利比亚危机，冒险主义的它们应该受到谴责，有时它们甚至表现得厚颜无耻、背信弃义。由于反抗力量无定见，本应轻而易举获得的胜利却几乎变成一次失败，只是媒体对此事的报道遮遮掩掩。反政府武装的行动陷入困境，只留给西方国家两种选项：

要么不光彩地撤退；要么加大对冲突的干预力度，尤其是派遣地面部队。目前冲突可以大致描述为三种走向。

第一种，卡扎菲可能重新控制整个国家。从军事角度而言，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国际社会已经决定与他对抗。

第二种，现政权将在短期内垮台。但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对反政府武装而言，逼近首都极为困难，那里是卡扎菲政权的发源地。尤其是谁也无法保证昔兰尼加的反政府武装会被西部地区视为“解放者”而被接受。

第三种，利比亚形成事实上的分裂，一部分为反政府武装、西方控制的苏尔特湾以东地区，一部分为仍处于卡扎菲政权控制的南部地区，时间长短不定。出现此种情形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尽管冲突的任何一方均拒绝接受。卡扎菲最终能否重新控制这两个区域交界处的油田，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控制资源的一方，将使另一方的前途变得极为渺茫。

如果出现这种分裂局面，不能排除美国控制苏尔特湾的影响。该海湾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助其完成控制地中海的目标。

目前，只有日趋虚弱的的黎波里政府，对调停的部分建议做了积极回应，并提出停火，但反政府武装、北约联军各国及联合国均拒绝了所有的和解方案。

*

西方对利比亚进行干涉而产生的问题远比它能解决的要多得多。希望将卡扎菲赶下台是一件事情，但因此将利比亚陷入血与火，使之成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温床是另一件事情。目前的行动很可能使整个北非、萨赫勒地区及中东陷入动荡，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策源地。

联军最终可能消灭卡扎菲或促使其下台。但西方应该警惕，取代旧政权的决不能是一个更激烈反西方且很不民主的政权，否则西方就

将成为伊斯兰激进派的帮凶。现在，我们看到华盛顿仅仅为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就将各种各样的势力拼凑成一个令人吃惊的联盟，参与利比亚事务。这自然会让我们心生疑问，利比亚是否已经选择了这一道路。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让人担心，西方已经忘记了阿富汗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忘记了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和斯库拉（Scylla）的古老故事。[8]

最后，如果上述考虑微不足道，还有必要提及一个问题，即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主之名开展旨在“废黜”一国政府的行动是否合法。准确而言，这种行动全然忘记了实行民主的原则是一国人民的特权，而非外国的特权。国际社会并非可以随意推翻各国政府的超级国家，尤其是以那些自己推行的原则为名，但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违反这些原则的国外势力。对“有罪的”人处心积虑地进行区分，往往根据其石油资源，而不是其罪行，更不用说是真还是假了。

萨伊达·本哈比莱斯

伊夫·博内、德克·博格斯

安德烈·勒梅尼昂、埃里克·德纳塞

---

[1] 本报告写于2011年5月，仅包括2011年4月30日之前发生的事件。

[2] 当时突尼斯、埃及刮起的民主风暴已蔓延到利比亚，激发了利比亚反对派的热情。有消息称，就是从这两日起，多个反对派团体开始在班加西举行抗议，要求卡扎菲辞职并和平移交权力。此后抗议活动很快演变成骚乱和冲突，继而引发内战。——译者注

[3] 科索沃战争中，美国等北约国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每天都对南联盟政府及其领导人如何“迫害”科索沃阿族人进行大量报道，并通过操纵卫星通信，不再为转播塞尔维亚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提供卫星服务，实施战略信息封锁。最终，西方国家通过舆论赢得了“民心”，瓦解了南联盟，赢得了战争。——译者注

[4] 这名阿尔及利亚人名为布阿朗姆·本哈姆达。据介绍他是雇佣兵，而他对我们说他在班加西已经3年了，在当地的市场上做买卖。

[5] 《日内瓦公约》第44条规定，军官及与其地位相等之战俘待遇，应依其等级及年龄而定。

[6] 麦凯恩呼吁美国以及国际社会承认反对派，并为反对派提供更多军事帮助。他表示反对外国地面部队进入利比亚，但呼吁加强对利比亚政府军的空袭，为利比亚反对派提供军事培训和武器。他的讲话为西方武力干涉利比亚提供了基础。

[7] 哈利法·哈夫塔尔是利比亚军队上校，于1987年3月在乍得被俘，当时乍得军队攻占了瓦迪杜姆。在被拘禁期间，他被美国情报机构雇用，自那之后成为特工。20世纪80年代末，哈夫塔尔加入“利比亚救国阵线”，该组织于1981年成立，由穆罕默德·穆洽伊夫领导。哈夫塔尔领导其军事部门，在巴黎和华盛顿的支持下，沿埃及边界创立了反对卡扎菲的游击队。行动失败后，他逃亡美国。最近20年他多数时间都在弗吉尼亚度过，其住所距中情局总部十多千米。2011年3月初，他返回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立即任命他担任重要的军事职务。

[8] 古希腊神话中的两个水怪，比喻刚出狼窝又入虎穴。——译者注

利比亚：西方同伊斯兰主义者的临时联盟

一场自发的起义

一切均始于2011年2月15日，班加西警察局前发生的偶然事件。开始只是数十人聚集在一起，抗议警方拘捕39岁的律师法思·特比尔。法思·特比尔是一位著名的反对派人士，1996年穆阿迈尔·卡扎菲政府在阿布·萨利姆监狱枪杀了1200多名政治犯，就是他担任受害者家庭的辩护律师。2011年2月中旬，他试图印刷传单号召民众于2月17日，即“社会网络国家动员日”当天走上街头抗议当局。

在阻止这场示威活动时，治安部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卡扎菲的妹夫阿卜杜拉·赛努西下令驱散集会人员，警方接到命令后使用警棍殴打示威者。这种暴行与集会带来的威胁极不相称，从而激起班加西民众的强烈愤怒，致使更多人涌上街头。2月17日，班加西、德尔纳和贝达的数万人无视当局的禁令展开示威游行，为了镇压此次抗议，治安部队向人群发射了子弹。

2月17日，即使有部分伊斯兰主义者参加了示威游行，但他们对事件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影响。利比亚军队和警察中出现的第一批变节者成了主要的反抗力量。此前卡扎菲政权因为害怕政变，一直拒绝给军警提供适当的装备和训练，导致昔兰尼加迅速陷落。3天之内，从班加西到利比亚和埃及边界的各城市均落入反政府武装之手。

参加2月17日抗议运动的有自由职业者、大学生、法官以及部分宗教人士，他们尽可能地在法院周围集结，那里是示威者自发的聚集地。持续的抗议吸引了两位政府人士的加入。第一位是内政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卡扎菲的战友。他来自昔兰

尼加，住在班加西，在班加西指挥驻扎在某军事基地的第36旅。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之所以选择“革命”，或是出于信念，或是感觉风向已变。他于2月19日率领部下投靠起义者。2月21日，司法部长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也选择加入起义者的阵营。而卡扎菲此前还派他去其出生地贝达，同反抗力量商讨释放被俘士兵的事宜。

在昔兰尼加，民众的愤怒情绪并非源于社会因素。与埃及和突尼斯的情况不同，利比亚几乎不存在极端贫困的现象。尽管高失业率以及因腐败和任人唯亲造成行政溃败，但事实上仍然有一部分石油收入得到了较合理的分配：多数家庭拥有住房和汽车，医疗及教育免费。2010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利比亚排在巴西、俄罗斯、罗马尼亚、土耳其和黎巴嫩之前。

起义的原因除了受突尼斯和埃及的激励之外，还有昔兰尼加同的黎波里之间积怨已久。卡扎菲生性多疑甚至偏执，长期对昔兰尼加不管不顾，因为卡扎菲认为那里是反对派的老巢，他在1969年政变时废黜的伊德里斯一世曾定都班加西。卡扎菲上台后，就将首都迁至的黎波里。

卡扎菲多年来一直逍遥自在，对时局并未采取措施，直到2011年2月20日的黎波里也出现动荡时才开始行动。起义从几个清真寺开始，造成一个公共电视台被毁，几座警察岗亭被烧。执政集团中变节的人越来越多。

2月22日晚，卡扎菲开始掌控局面，他发表了一个多小时言辞激烈的即兴演讲，声称宁愿作为烈士死去也不会离开他的国家。在利比亚首都，反对派于2月25日展开了最后的抵抗，当天还是主麻日。治安部队在亲卡扎菲的民兵支援下，在的黎波里数个区域向走出清真寺的示威者开枪。精锐部队重新控制了街道，局势恢复平稳。

伊斯兰主义者躲在一边，他们对政府能够运用的暴力手段了如指掌。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就曾尝过这种暴力手段的滋味。当时，卡扎菲在挫败数起暗杀企图后，对他们展开围捕，让他们噤若寒蝉。

联盟的急剧变化

正是之前联合打击伊斯兰主义者的战斗，使利比亚成为西方的盟友。自2004年起，美国、英国、法国与利比亚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非常频繁。中情局、军情六局以及法国对外安全总局甚至帮助利比亚建立了特种部队。法国Amesys（艾姆斯）公司[1]为利比亚政府提供了超级监听系统。作为回报，的黎波里允许这些国家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网络进行渗透，利比亚对这些网络的熟悉程度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然而，巴黎对利比亚的政策在短短数日内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弯。2月25日，尼古拉·萨科齐在对土耳其正式访问期间，宣布“穆阿迈尔·卡扎菲必须下台”。数个因素被纳入考量：爱丽舍宫试图让人忘记其对本·阿里及胡斯尼·穆巴拉克无条件的支持；他想借此机会走出因支持率不佳造成的政治困境；此外，拥有约600万人口的利比亚被认为对美国、中国或俄罗斯只具有中等战略重要性，这为尼古拉·萨科齐施展图谋留下了空间。

反对派的杂乱组成

利比亚反抗力量很快就在班加西形成了政治组织。一位人物在这个混乱的过程中走到前台：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他是前司法部长、人权卫士、笃信宗教者，没有什么威望。他只是一张王牌，没有人希望再看到一位新的卡扎菲。在由宗教人士、改革派、君主体制派，大学生、军人、商人和法官组成的反政府武装中，他最终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领导人。

临时政府是自行遴选成立的，这将填补42年独裁统治后形成的空白。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了解他的国家，尽可能多地吸收各部落代表，任命熟人马哈茂德·贾布里勒与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担任

部门负责人。几天前，这三人还替对立的阵营效力。马哈茂德·贾布里勒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向反政府力量传授其思想。他同国外联系较多，因此成为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外交面孔”，同时吸引流亡商人的资金援助。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统率军队，并得到其家乡奥贝迪这一有影响力部落的支持。尤其是，他是反政府武装中唯一具备军事才能的人，负责制定对抗穆阿迈尔·卡扎菲军队的战略。

伊斯兰主义者一直未参与此进程。首先是因为他们曾遭受卡扎菲政权的镇压，这使他们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乃至无法发出声音；其次，他们不相信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人能够夺取权力，还怀疑委员会中大部分卡扎菲曾经的合作者有腐败行为。于是，伊斯兰主义者静观其变，集中力量制订军事计划。他们必须将越来越多渴望战斗的志愿者汇集起来。而大学生、公务员和年轻人希望拿起武器投入战斗。

在伊斯兰主义者缺席时，全国过渡委员会可以依靠西方国家的支持维持国家运转。法国通过贝尔纳-亨利·莱维的介入最先对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提供支持。3月5日，这位哲学家同该委员会负责人会晤，并于10日将他们送入爱丽舍宫。这对反对派来说真是喜从天降，他们先将那些亲西方的脸面人物如马哈茂德·贾布里勒送到巴黎寻求支持。这位全国过渡委员会推举的“总理”乘坐的是卡塔尔提供的喷气飞机。除法国外，卡塔尔是这场起义的另外一位重量级教父。

卡塔尔的影响

1971年才实现独立的卡塔尔，近些年已经懂得如何弥补其国土狭小及人口数量少的不足——面积约为1.15万平方千米，人口约170万，其中卡塔尔公民不足40万，大量的外籍人员使得卡塔尔在国际社会占据一席之地。推动这种变化的是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他于1995年废黜其父后执掌政权。阿勒萨尼家族以铁腕统治该国已长达40年，这个纯粹的君主制国家没有政党。该国从石油及天然气资源

中获取巨额收入，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埃米尔管理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卡塔尔投资基金，资产接近7000亿美元。

该国领导人非常关注如何防范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威胁。因此，他们用金钱来购买保障——在外交、经济、金融和体育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埃米尔变成了全世界的顾问、金融家、合作者和中间人，如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勒斯坦、英国、黎巴嫩，哈马斯等。

法国也不甘落后。1994年，两国签订了防务战略协定。2007年，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成为尼古拉·萨科齐在爱丽舍宫接待的第一位阿拉伯国家元首。两人非常熟悉，巴黎同卡塔尔家族就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交换意见几乎成为日常性的事情。

按照其习惯，多哈在利比亚致力于避免正面树敌，它依靠昔兰尼加的两个网络对利比亚进行干涉。首先是阿里·萨拉比的组织，萨拉比是利比亚穆兄会的精神导师，1999年之后，他一直流亡多哈。按照他的建议，卡塔尔军官来到班加西，在那里他们会见了阿里·萨拉比的兄弟、穆兄会成员伊斯迈尔·萨拉比，其军事才能是公认的，自起义开始就同忠于政府的军队作战。他将自己率领的部队命名为“2月17日烈士旅”，这支部队以吸纳最优秀的战士著称，通过口耳相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奔。卡塔尔在班加西的另一位合作者是马哈茂德·贾布里勒，他在多哈拥有一家咨询公司。示威游行数日之后，他经利比亚和突尼斯边境抵达班加西，逃离了的黎波里。卡塔尔帮助他建立一个金融系统，为反政府武装提供所需资金。

西方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

自2011年2月25日的黎波里起义失败之后，利比亚产生了两个对立的政治实体，“革命”随即转化为内战。一方是反政府力量；另一方是卡扎菲政权，受到忠诚于他的部落支持，占全国人口1/3左右。

针对利比亚问题，巴黎、伦敦和华盛顿打出的口号是绝不重蹈伊拉克冲突的覆辙，在干涉之前应该得到联合国决议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支持。3月12日，阿拉伯联盟支持西方国家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而不进行地面干涉。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准备用一切必要手段保护利比亚平民。

穆阿迈尔·卡扎菲言辞激烈的讲话，其军队在班加西实施大屠杀给民众带来的恐惧，以及其在国际社会内部的孤立处境，导致此次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几乎一致通过第1973号决议。奥巴马、尼古拉·萨科齐和戴维·卡梅伦准备实施一场闪电战：实施狂轰滥炸，加上秘密部门迅速促成的变节浪潮，再辅以反政府武装的攻势，足以使卡扎菲政权倒台。

3月19日下午，联军的首轮空袭开始。法国空军摧毁了一小部分坦克和装甲车辆，从而阻止了利比亚政府军对班加西展开的攻势。入夜之后，美国及英国潜艇向利比亚全境发射了110枚“战斧”巡航导弹，基本摧毁了利比亚政权的防空体系。

但是，北约指挥下的联军很快就意识到，战局进展与之前预料的不同。他们低估了卡扎菲的抵抗力量，高估了反对派的准备程度。法国及英国的将军们了解到，由毫无经验的志愿者及利比亚前军队成员组成的平民旅，既缺乏战术素养也无协同配合。为了帮助反政府武装，3月30日巴黎派官方代表安托瓦内·希万到全国过渡委员会，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数十位负责为反政府武装提供技术支持的军事人员。卡塔尔方面，则为全国过渡委员会提供军事后勤支持，尤其是提供大量轻武器，还在班加西开展了几个军事训练项目——少数西方教官在卡塔尔军事人员的陪同下，为反政府武装提供培训。

3月25日，反政府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势，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直到在苏尔特外围遇到卡扎菲军队的伏击。4天之后，反政府武装被迫向班加西撤退，之后再度夺得一小片地区，稳定了布雷加到艾

季达比耶之间的战线。自此次进攻受挫之后，伊斯兰主义者逐渐露出水面，数家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

伊斯兰主义者的选择

尼古拉·萨科齐拦腰抱住了这场冲突。这是“他的”战争，一场他不愿意忽视任何细节的战争。2011年3月13日，尼古拉·萨科齐同英国首相共进晚餐之后，在爱丽舍宫接见了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及其陪同人员。反抗力量的军事领导人要求法国提供武器和能改变战争进程的意见。

利比亚前内政部长了解卡扎菲的弱点，他建议萨科齐向的黎波里西部内夫萨山区提供武器。此外，他还要求武装并训练西部反政府力量，对卡扎菲政权展开侧面进攻以逐步削弱其力量。但是，联合国及北约均不愿在利比亚部署地面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施这一计划呢?

巴黎最终找到了办法，即通过卡塔尔实施这个方案。多哈向巴黎购买武器，然后提供给班加西和内夫萨山区的反政府武装。在这些地区，法国特种部队成员提前建立着陆点，为接收物资做准备。4月底计划开始实施，法国、英国和卡塔尔军事顾问被派往班加西和利比亚同突尼斯的边境。卡塔尔方面的人数最多，他们建立了两个指挥部，一个在利比亚西部，一个在利比亚东部。联盟国家对多哈非常信任，委托他们发放武器装备。

卡塔尔方面找到了一个人——阿卜杜勒·哈金姆·贝尔哈吉，决定依靠此人在利比亚西部开展行动。贝尔哈吉来自德尔纳，过去是一名“圣战者”，是“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的前副统领，曾赴伊拉克参加战斗，2004年被美国中情局抓获并移交给卡扎菲。他在监狱服刑7年之久，2010年3月因利比亚以和解名义达成的一项协议获释。尽管他具有令人不安的背景，卡塔尔人仍然设法让西方合作者相信他们的眼光，

相信他们能够控制、改变他。多哈否认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选择武装伊斯兰主义者，尽管有人怀疑卡塔尔的埃米尔同穆兄会达成了某种默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卡塔尔没有给其伙伴留下选择的机会。它提供资金，选择合适的人，就认为有权利按自己的意愿行事。阿卜杜勒·哈金姆·贝尔哈吉被强加给西方，而西方也需要一位熟知“纪律”，尤其是具有战争经验的人。

的黎波里的失败

2011年7月28日，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被暗杀，致使北约盟军加快了对的黎波里发动攻势的脚步。这位反抗力量的军事领导人似乎是被“2月17日烈士旅”杀害的，他们最可能的动机是复仇。因为20世纪90年代，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负责对德尔纳地区的伊斯兰主义者展开围剿。他的死对全国过渡委员会及西方支持者是一个沉重打击。法军和法国外交界非常看好他，认为在卡扎菲政权倒台后他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法国、英国和美国担心他的死将导致各派间本已严重对立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分崩离析”，因而决定加快推翻的黎波里的各项工作。

战斗于8月20日夜幕降临后展开。自此之后，支持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民兵开始公开活动了。从负责保卫的黎波里的两位将军变节开始，向反抗力量投降的政府人员逐日增多。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滚动新闻频道对利比亚战事进行了直播，其中一个采访组同发动这次攻势的“明星”阿卜杜勒·哈金姆·贝尔哈吉的部下在一起。贝尔哈吉自行宣布担任的黎波里的军事长官。来自津坦的战士从南部进入首都并控制了机场，来自米苏拉塔的战士从东部进入首都。第二天，反政府武装控制了的黎波里大部分地区。为恢复首都秩序，全国过渡委员会试图同法国和英国的军事顾问共同制订一个书面计划。他们将伊拉克当作反面教材。

但全国过渡委员会缺乏合法性。参加战斗的部队没有一支来自班加西。的黎波里仍然是权力中心，分别为津坦旅、米苏拉塔旅和阿卜杜勒·哈金姆·贝尔哈吉的人所占据，后者在卡塔尔的支持下自任为的黎波里军事长官。这些部队均不承认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合法性。自8月25日开始，希拉里·克林顿向穆斯塔法·阿卜杜勒·贾利勒呼吁，要求他使“新利比亚摆脱极端势力”，但并未告诉他究竟该怎么办。

两个月之后，即穆阿迈尔·卡扎菲死后10天，西方明确表示自己既无意愿，也无手段支持并帮助过渡政府。10月31日，北约宣布在利比亚的军事合作结束，庆祝全面胜利，却让利比亚听从命运的安排。自此之后，利比亚面临武器扩散、宗教政党掌权或仍然处于内战的局面，寻求和平成为徒劳。

仅仅在的黎波里就有40多个组织宣称为“胜利”做出了贡献，且均不愿意交出从旧政权军火库中获取的大量武器。他们还制定法律。伊斯兰主义者希望能乱中取胜，而他们唯一的希望在于选举。阿卜杜勒·哈金姆·贝尔哈吉非常了解这一点。5月14日，他辞去的黎波里军事政府中的职位以便组建一个新政党。

亚历山大·伊菲

---

[1] Amesys公司是法国布尔电脑集团的子公司，是一家计算机工程服务商，成立于1979年，主要业务为国防采购、航空航天、电信、交通、能源、工业、网络、安全和微电子，曾帮助利比亚建立起被称为“鹰”的互联网大规模监视系统。

“清除”卡扎菲的真正原因

虽然利比亚的社会经济环境同其邻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但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也未能躲过2011年春天席卷北非的抗议浪潮。事实上，虽然利比亚经济远远称不上繁荣，但其国民的生活水平要比突尼斯、埃及及南方的邻国高出很多。的确，利比亚政权是独裁体制，卡扎菲及其安全机构对人民实行严密控制，不允许民众组建反对党并开展活动。特别是，利比亚不存在任何亲民主的潮流。

然而，同其他地方一样，民众“革命”的“自发性”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卡扎菲倒台的原因，不仅隐藏在“利比亚之春”或“2月17日革命”的名号之下，还能在其他方面找到。这些原因就是利比亚领导人同海湾君主国、西方国家复杂且持续恶化的关系，后者关注于保障其能源供应。利比亚同其他非洲国家的紧张关系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利比亚同阿盟及海湾国家的分歧

2010年至2011年，利比亚担任阿拉伯国家联盟主席国，但这并未给卡扎菲带来好运。他尽一切力量与阿拉伯兄弟国家修好，却最终被“抛弃”。卡扎菲可能真诚地笃信可以建立一个阿拉伯联盟，认为“并非同种同源的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均能各自建立联邦，而阿拉伯人却办不到，这真是一个巨大讽刺”。他曾经尝试建立阿拉伯联盟，并于1969年在埃及、苏丹和利比亚间建立松散的邦联，宣布“利比亚拥有资金，苏丹拥有土地，埃及拥有人力”。1970年他试图同叙利亚讲和，之后于1971年提出在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建立阿拉伯共和国联盟的构想，但该构想从未实现。埃及与利比亚于1972年建立的“完全联盟”最后也彻

底失败。卡扎菲试图同阿拉伯兄弟国达成的相关协议总数达七个，却没有一个成功的。正因此，他针对这些国家尤其是海湾君主国领导人的谈话越发充满敌意。

同非洲国家一样，阿拉伯国家对卡扎菲及其多变的立场充满疑虑。卡扎菲并未参加阿盟所有的峰会。他在1979年阿盟峰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次峰会他抵制了《戴维营协议》，让埃及陷入孤立。他没有参加1982年的阿盟峰会（在非斯举行），反而呼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项计划在其心中占有重要地位。1988年洛克比空难发生6个月之后，卡扎菲在阿尔及尔峰会上的举动让与会人士大吃一惊，他右手戴着白手套，以避免触碰阿拉伯领导人“沾过鲜血”的手。当约旦国王侯赛因讲话时，他披上了一件白色织物，还拒绝与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握手。

砰的一声，卡扎菲在2004年关上了通往阿盟的大门。他认为阿盟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尤其是建立“以色列斯坦”，即从地中海到约旦河之间的领土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享。自2004年突尼斯举行的阿盟峰会首日开始，他就对峰会日程大肆批评，认为这次会议不是“阿拉伯人民的会议”，并对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军事负责人进行抨击。在阿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进行发言的时候，他愤怒地走出了大厅。[1]在此次峰会上，利比亚领导人还打算就“两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和亚瑟·阿拉法特都被监禁”的事实进行抗议。[2]卡扎菲做过的还有比以上列举的严重得多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当2011年利比亚发生骚乱时，阿盟为何不打算为卡扎菲提供保护，甚至同意北约展开行动。

但阿盟依靠北约对利比亚进行干涉，对此也曾迟疑不决。卸任的阿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支持对利比亚发动打击，当北约行动造成24名平民死亡后，他感到非常不安。因此，他建议“在国际社会监督下实现真正的停火。在此之前，卡扎菲仍然留在台上。随后应该是过渡时期，以便就利比亚未来达成协议”。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沙特阿拉伯——敌对的兄长

卡扎菲不喜欢沙特阿拉伯人。沙特阿拉伯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并且同美国合作。当了解了卡扎菲从早年起就致力于捍卫“世界公正”以及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就很好理解了。2004年《纽约时报》透露，卡扎菲曾计划派人暗杀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勒·本·阿卜杜拉-阿齐兹。策划这起暗杀的5名利比亚、沙特阿拉伯人被逮捕，随后被沙特阿拉伯国王“赦免”。

2009年，卡扎菲指责阿卜杜拉国王在海湾战争一事上撒谎，并一直逃避对此事进行澄清，以致双方对立长达6年之久。卡扎菲声称“他（阿卜杜拉）正在编织一大套谎言，这将导致他的失败，他只不过是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傀儡”,[3]他还拒绝参加阿盟峰会。卡扎菲通过自己的这一举动，将瓦哈比派王国的领导人变成了自己强大的敌手。

20世纪80年代，卡扎菲同样禁止穆兄会及“其他类似组织在利比亚存在，结果在禁令发布后利比亚出现的秘密组织，都得到了沙特阿拉伯或其他国家的支持”。[4]正因此，2011年的黎波里强烈怀疑反对派的伊斯兰主义者是受利雅得的指使。

不过，2011年初，沙特阿拉伯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立场有所不同，与外国在利比亚进行的干涉保持一定距离。实际上，在卡塔尔和阿联酋参加反对的黎波里的国际联盟行动时，沙特阿拉伯作为“伊斯兰教的圣地、圣地的守护者，从情理上讲不能参加反对利比亚——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战争”。[5]此外，2011年8月，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在接待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时宣称，利比亚反抗力量的政治部门——全国过渡委员会已经被“基地”组织渗透。[6]

卡塔尔的野心

多年以来，卡塔尔一直试图走出强大的沙特阿拉伯的阴影。1995年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发动政变将其父赶下台，自己坐上国王宝座后，就开始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他曾担任达尔富尔等非洲危机的调停人，并为部分苏丹叛军首领提供庇护。

卡塔尔面积虽小但非常富有，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三。它非常有野心，想同大国平起平坐，在国际格局领域留下自身的印记。例如，2011年12月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文明联盟全球论坛上，卡塔尔保留了给“塔利班”提供发言机会的权利，以讨论妇女受教育权的问题。

卡塔尔同利比亚保持着奇特的关系。早在2007年，卡塔尔为营救被叙利亚控制的保加利亚护士而支付了大笔资金。当尼古拉·萨科齐宣称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均未向利比亚提供资金补偿时，利比亚外长阿卜杜拉曼·萨拉汗却做了如下相反的表述：“各方均支付了资金，包括法国等欧盟国家。这些资金用于补偿相关受害者家庭，甚至还有剩余。”[7]这些资金是否来自卡塔尔？“这应该是卡塔尔当局回答的问题。”法国总统赶紧打了圆场。不过在推翻卡扎菲政权过程中，卡塔尔是最为积极的海湾君主国。

比如说，2011年利比亚“革命”爆发后，有人在卡塔尔看见了刚刚逃离的黎波里的卡扎菲政权情报部门负责人穆萨·库萨。[8]这表明卡塔尔长期以来一直在玩两面手法。穆萨·库萨不仅被指责对利比亚人进行过折磨，还被怀疑卷入了洛克比空难事件，他本人对此予以否认。他是卡扎菲真正的左膀右臂，1980年任利比亚驻英国大使，后担任外交部长。当利比亚为回到国际舞台开始同国际社会合作时，他是同西方情报部门谈判的关键人物。

卡塔尔是第一个为支持联合国管理禁飞区而提供飞机的阿拉伯国家。2011年3月，利比亚反抗力量开始收到来自多哈的数亿美元资金以及石油（可满足其一个半月的全部需求）。卡塔尔的银行为资金的国际转账提供便利，尤其是通过对银行体系的再注资来完成。根据外交渠道的信息，卡塔尔还为在本国石油公司工作的利比亚劳工提供休

假，以便他们为祖国的战争做出贡献。卡塔尔甚至还向反抗力量提供武器，尤其是“米兰”反坦克导弹。随后在2011年5月，当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表明急需二三十亿美元资金时，卡塔尔立即提供了四五亿美元，[9]成为反抗卡扎菲政权者的最大金主。最后，当反政府武装于8月进入的黎波里时，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摄影师随同进行报道。

2011年春，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伊斯兰甚至声称，卡塔尔已经向塞内加尔总统瓦德提供资金，以便让其改弦更张。塞内加尔对这些指责予以强烈否认。

卡塔尔这个小国对西方的支持让人惊讶，因为它同伊朗保持良好的关系，却也是“反CNN”的半岛电视台的支持者。总体而言，西方对这家卡塔尔电视台关于阿拉伯“革命”的全面报道赞赏有加。比如在利比亚，半岛电视台成功报道了“革命”，它不仅大肆报道亲卡扎菲军队杀害其一名记者的事，还重点报道那些反政府示威者。这使卡扎菲必然遭到憎恨。

卡塔尔还是第一批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国家之一。不过，这种承认是在2011年3月末双方达成一项石油“交易”后才开始的。卡塔尔的确是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但它还觊觎石油资源。而利比亚石油产量占全球的2%，且靠近欧洲市场并同卡塔尔在天然气上竞争激烈。卡塔尔希望在利比亚石油及天然气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卡塔尔向推翻卡扎菲的行动提供后勤和财政支持，究竟能获得什么利益。联合国首轮行动后不久，卡塔尔石油公司承担了一项任务：售卖脱离卡扎菲控制的石油，为反抗力量筹集资金。此外，通过向利比亚反抗力量提供石油，“卡塔尔人想让世人知道他们拥有掌握利比亚石油资源的技能，且这项技能可以为利比亚人带来好处”。[10]冲突期间，利比亚石油开采几乎陷入停顿，卡塔尔以调停者的身份使利比亚石油工业恢复运转，其目的是获取对“革命”投资的回报。

部分观察家认为，卡塔尔是为了华盛顿的利益行事。美国在该国拥有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那里驻扎着曾经指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的美军中央司令部。但卡塔尔与法国也颇为亲近，实际上法国一直向卡塔尔提供武器（占其武器的80%）及飞机。自2007年以来，卡塔尔埃米尔两次作为贵宾参加法国国庆阅兵典礼。此外，卡塔尔还在欧洲宇航防务集团、空中客车公司、法国电力集团、万喜集团等多家公司拥有股份，还在2012年购买了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戛纳的马丁内兹广场、巴黎的协和拉斐特酒店（现名凯悦丽晶巴黎艾托尔酒店）。

巴黎同多哈之间的密切关系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外交部长克劳德·谢松建立。这种关系在雅克·希拉克和尼古拉·萨科齐执政期间继续发展。尼古拉·萨科齐在2007年5月当选总统后，邀请入爱丽舍宫的首位阿拉伯国家元首就是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这位埃米尔对法国元首的阿拉伯政策很有信心，并带来了一份购买80架空中客车A350客机的订单。法国大公司也同样出现在卡塔尔：道达尔自1939年起，巴黎银行自1973年起，埃勒夫自1989年起，更多的法国公司（阿尔卡特、阿海珐、家乐福等）2000年以后在卡塔尔安家落户。[11]

2011年3月19日，卡塔尔首相哈马德·本·贾西姆·本·贾比尔·阿勒萨尼前往爱丽舍宫与萨科齐总统会谈，并为在利比亚展开行动进行辩护："利比亚局势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它并非游行示威者同警方的对抗；这是一次有雇佣军参加的公开战争，应该尽早停止。"就这样，在卡塔尔的支持下，西方将对利比亚的打击合法化，宣称其行动征求了阿盟的意见。但卡塔尔只不过是阿盟的成员国之一，而且并非最主要的。

在卡扎菲倒台后，卡塔尔继续提供支持。2011年11月，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沙勒加姆，指责多哈向利比亚伊斯兰主义者提供武器和资金。[12]这些指控被卡塔尔方面断然否认，但质疑声仍未消除。

西方的两次转向

卡扎菲回到政治舞台

让许多观察家惊讶的是，2000年年中，卡扎菲突然成为可以交往的人。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于他放弃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以及加入了打击“基地”组织的斗争。实际上从1996年起，利比亚领导人对一些事件的态度就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年，利比亚同意将制造洛克比空难的嫌疑人移交苏格兰法庭。1997年他向西方世界靠拢，邀请“美国企业家到利比亚工作”，[13]并请求教皇让·保罗二世莅临的黎波里天主教堂的重建仪式。1969年后，该建筑是利比亚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

对美国人来说，自2003年起，利比亚领导人不再是其排斥的对象。因为利比亚放弃研发核武器，承认对1988年12月发生在苏格兰上空造成270人死亡的洛克比空难负有责任，并同意赔偿受害者家庭。这些举措使得西方国家逐步放松对利比亚的制裁。负责外交事务的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宣布，美国公司已经准备好重返利比亚，愿意同利比亚人一同工作。[14]

自2004年起，卡扎菲公开讨好西方投资者。2003年首批访问利比亚的欧洲政要中就有西班牙首相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也于2004年3月访问的黎波里，紧随其后的是负责近东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及其商务部同事威廉·拉什。

2004年4月，美国政府允许美国公司重新同利比亚建立联系，包括购买石油。波音公司（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公司）及其竞争对手空中客车公司随后展开角逐，争取一份利比亚国家航空公司的订单——利比亚阿拉伯航空订购22架飞机，总额达10亿美元。

还是在2004年4月，利比亚总理舒克里·加尼姆，对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会晤了雅克·希拉克总统、数名部长以及政商界人士。双方签署了多份协定，尤其是鼓励和保护投资方面的，这将改善“法国在利比亚投资以及利比亚在法国投资的司法安全，就法国对外贸易保险公司向利比亚提供总额为4440万欧元贷款的初步协议拟定了备忘录，同时就

两国间开展文化、科学和技术合作及为方便利比亚学生赴法国大学学习签订了新协议，最后就旅游领域及两国间新的合作领域签署了合作协议。数月间，欧美及亚洲领导人或政府高级官员在商界人士陪同下相继来到的黎波里”。[15]

利比亚和西方的重新接触并非仅限于商界。根据多个消息来源，自2004年起美国中情局就着手在“利比亚长期存在”,[16]该机构官员斯蒂芬·卡佩斯同利比亚外长穆萨·库萨交往甚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卡佩斯称库萨为“亲爱的穆萨”，后者则称前者为“斯蒂芬”。

2005年1月禁运取消后，利比亚同外国石油公司签订了15个合同，其中11个是同美国公司签订的，包括雪佛龙、德士古等多家石油公司。利比亚显然希望美国重返利比亚石油领域。

自1972年首次访问法国后，卡扎菲于2007年12月再次访问法国。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卡扎菲在爱丽舍宫受到了隆重接待。时任法国外交和人权事务国务秘书的拉玛·亚德对此进行了抨击。她因敢于挑战等级制度并发表如下宣言而饱受批评：“如果法国外交界满足于签订商业合同而不要求其保障人权，我将十分忧虑。这是一项义务。法国不仅是一架商业天平……卡扎菲应该理解，我国并非放在门口的擦鞋垫，某国领导人，无论其是否恐怖分子，随意用它擦掉鞋子上罪恶的血迹。法国不应该接待这个死亡使者。”[17]

法国Amesys公司是布尔电脑集团的子公司，在爱丽舍宫的首肯下，于2008年向利比亚政府提供了一辆具备隐形功能的四驱防弹车，以保障卡扎菲的出行安全。[18]2011年春，该“事件”被披露，部分媒体指责法国“通过Qosmos[19]及Amesys两家企业向利比亚出售数字化武器”,[20]不久这一事件就被人们遗忘。直到2012年，法国政权交接后启动了一项司法调查，该事件才再度引发关注。

不过，巴黎和的黎波里签订的这些合同利润极为丰厚，总额达30多亿欧元，涉及飞机（空中客车公司）、一座核反应堆及许多军事装

备，当然还有石油。这些合同还同样涉及安全、医疗及移民领域，以及一项利用核技术进行海水淡化的项目。萨科齐总统自称非常“高兴”接待卡扎菲，后者领会这是“鼓励他重新获得国际威望”。结束对法国的访问之后，卡扎菲趁势前往里斯本参加欧盟-非洲峰会。

2007年利比亚还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行政委员会。2008年至2009年，利比亚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担任代表非洲国家的非常任理事国。2009年利比亚非洲联盟事务秘书阿里·图里基还担任了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2009年9月，卡扎菲首次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这是他掌权40年后的一次胜利。但是，他破坏了外交礼节，原定15分钟的发言，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半小时，用了“大约17分钟谈其原则性观点：在联合国安理会为非洲国家争取一个席位”。[21]其余的发言则具有煽动性，他将联合国定义为恐怖组织。他还试图在美国中央公园及唐纳德·特朗普位于新贝德福德的一块土地上安置帐篷，后者对此坚决反对。

2009年，意大利对其殖民历史进行道歉之后，[22]利比亚与欧盟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协定卡扎菲要打击非法移民活动。2009年11月，他前往罗马，通过接待中心发表声明，要征集200名年龄在35岁以下、身高在1.70米以上且穿着得体的美女……要在两小时的时间内，向她们传授如何扮演好女性的角色以及伊斯兰教的善行，之后邀请她们皈依先知的宗教。[23]他还预言将出现“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意大利”。欧洲将其举动归纳为“荒唐但无恶意”，只将其视为行为怪诞但已被驯服的可笑之人，因而采取一笑了之的做法。

还是在2009年，就在卡扎菲执政纪念日前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对利比亚进行了正式访问，成为欧洲20年内访问利比亚的级别最高的领导人。巧合的是，意大利媒体在其访问期间透露，卡扎菲的儿子通过LAFI公司（利比亚阿拉伯国际投资公司）收购了都灵尤文图斯足球队5.31%的股份。

2010年8月，卡扎菲再次来到意大利，庆祝两国签订友好条约两周年，他宣布伊斯兰教应该成为欧洲的宗教。意大利北方联盟对此十分愤慨，叫嚷“意大利已经变成卡扎菲的迪士尼乐园”。但意大利还是同利比亚签订了大批合同，包括武器及石油。意大利埃尼公司（ENI）预计在利比亚投资2500万欧元。在友好条约方面，意大利将投入50亿美元对殖民历史进行赔偿，并建设一条长约1700千米的道路。

石油——西方干涉的关键

利比亚是非洲第四大产油国，每天生产160万桶原油，石油储量也居非洲前列。尽管其产量仅占全球产量的2%，但利比亚原油质量上乘，是含硫量少、适合提炼的轻质原油。2011年利比亚危机爆发前，美国消费的原油有10%来自利比亚，占利比亚出口收入的40%。危机爆发以来，原油价格的波动幅度加大。2011年1月至7月，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了13%，最高达到每桶115美元。因此，控制并保障利比亚石油生产成为西方及其海湾盟友进行干涉的考量，更何况伊朗的威胁程度日益上升。

法国是受益于此次利比亚石油领域“洗牌”的国家之一。法国获得的利比亚石油的数量，由2011年之前的每天5.5万桶翻了一番，并获得了利比亚约35%的石油合同。2011年9月，法国外长阿兰·朱佩在卢森堡广播电视台（RTL）宣布，“全国过渡委员会正式表态，在利比亚重建过程中，它将优先考虑那些曾对其提供支持的国家，我认为这相当合理且公平”。法国外长还补充说：“有人对我们说利比亚军事行动花费巨大，但这也是对未来的一项投资。”[24]尽管有人否认，但很明显，法国同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建立了“双赢”伙伴关系。

2011年10月12日，一个由7位议员与阿尔卡特、法国电信、道达尔及许多中小企业的共83位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的黎波里。代表团团长是法国负责经贸事务的国务秘书皮埃尔·勒卢什，访问目的是参

与利比亚重建工作。这些企业急于恢复它们的业务，其中很多企业甚至在危机前已经来到利比亚。

这次访问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在利比亚未来市场上占据有利位置”。[25]皮埃尔·勒卢什在访问期间宣布，要“持续建立”同的黎波里的合作关系。这次访问之前，总统萨科齐已经于9月中旬访问了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他宣称法国的干涉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算计，我们这么做只因为这关乎正义”。[26]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也对利比亚进行了访问，保证北约将继续为该国人民提供安全保障。

2011年12月中旬，法国上述活动的成果逐渐显现。它又向的黎波里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去采摘巴黎支持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所结出的果实。除了交付“2007年非洲航空公司及利比亚航空公司订购”的11架空中客车飞机之外，法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获得了这两家公司的飞机修复订单，阿尔斯通公司获得了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GECOL）的材料与设备的订单，而爱集思集团（EGIS）获得了最重要的市场，即战后米苏拉塔的城市重建设计方案。

法国还宣布将提供2.3亿欧元资金给利比亚新政府，[27]还保证“同联合国安理会合作，为新政府提取更多的资金”。实际上，自2011年9月卡扎菲政府被推翻后，法国只提供了1.5亿美元资金用于利比亚支付薪金及国家重建。到11月，联合国只支付了180亿美元（本应为1500亿美元）援助，因为部分援助国对西方干涉的合法性持保留意见，另一些国家则对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国家的能力表示担心。

英国也不甘落后。由于利比亚的石油具有很大的开采潜力，英国石油公司自2007年就与利比亚签订了一份总额达10亿美元的合同。2009年，英国的国际大石油公司（Major）宣布，未来20年将在利比亚投资200亿美元。由于利比亚人阿卜杜勒·巴塞特·迈格拉希是洛克比空难的肇事者之一，英国对进入利比亚采取了低调的态度。

对意大利和俄罗斯而言，军事干涉利比亚的行动并没有带来很好的收益。2011年7月，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对北约的行动表示怀疑，他是第一批如此表态的西方领导人之一，他说“联合国通过禁飞区决议将束缚其手脚”。[28]于是，意大利迅速将参加行动的军舰更换为吨位较小的舰艇，并从联军中撤出1000人。自2011年9月开始，罗马把为此次行动提供的2.04亿美元削减至8700万美元。意大利国防部长伊尼亚齐奥·拉鲁萨明确指出，意大利将开始“考虑一个期限”，预计在3个月之内结束其在利比亚的任务，促使北约能够对此次行动做出调整。他宣称，这样的态度“可以激励我们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盟友，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危机”。[29]在危机之前，意大利埃尼公司每天生产28万桶石油，是“其在非洲产量的1/3，在全球产量的12.5%”,[30]该公司在利比亚的利益本来预计达300亿欧元。

据《非洲人》[31]透露，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 Neft）及鞑靼石油公司（Tatneft）同样遭受了损失。“俄罗斯-利比亚经贸协会理事长阿拉姆·谢尔刚茨估计，由于北约禁止俄罗斯企业进入利比亚，它们将遭受全部损失”。北约干涉利比亚之前，俄罗斯企业在利比亚经营规模达数十亿美元。俄罗斯对北约打击利比亚的合法性态度不明朗，是否使其“错失良机”呢？2011年9月1日，俄罗斯决定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而联盟国家正在瓜分“战利品”。俄罗斯幸运地登上了这趟列车，按一位石油专家的话来说，“尽管并非头等车厢”。

2011年利比亚危机前的石油合作项目

合作者	万桶/天	评论
意大利（ENI）	28	最大的合作伙伴
中国	15	利益不断增长
美国（埃克森等）	12.4	自石油开发之初就开始合作
德国（巴斯夫）	10	暂无
法国（道达尔）	5.5	法国进口1025万吨利比亚石油
俄罗斯	暂无数据	Gazprom Neft 和 Tatneft 获开采许可
英国	暂无数据	英国石油公司获开采许可

*

卡扎菲死亡一年之后，利比亚的局势更加让人忧虑，而且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后危机局势”。实际上，“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等伊斯兰武装同“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有联系，并毫不犹豫地将其视为“盟友”，不断制造混乱和浩劫。2012年9月，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之死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利比亚建立联邦国家的方案提出后，就遇到了问题。盛产石油的昔兰尼加准备自立门户，利比亚能否保持统一？

卡扎菲的倒台本来应该让人松一口气，但恰恰相反，各种不确定因素、伊斯兰激进主义、恐怖主义伴随人民的苦难一拥而入。马里成为利比亚混乱局势的第一个受害者，当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即使人们对此都不后悔，但卡扎菲被推翻后留下的政权真空必然会对非洲大陆造成不利影响，并预示着利比亚黯淡的未来。

莉迪·博卡

---

[1] *El Ahram n*°692 du 27 mai au 2 juin 2004.

[2] *L'Expression* du 23 mai 2004,http://www.lexpressiondz.com/article/0/00-0/19336.html

[3] *The Guardian*,30 mars 2009.

[4] John K.Cooley,*Vent de Sable sur la Libye*,Robert Laffont,p.281.

[5] *RFI*,21 mars 2011.

[6] *Afri Scoop*,26 août 2011.

[7] *Rue 89*,24 juillet 2007.

[8] *BBC Panorama citépa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http://www.ibtimes.co.uk/articles/238737/20111027/qatar-and-the-koussa-riddle-gaddafi-s-exspychief-still-enjoying-impunity.htm

[9] *Reuters*,9 juin 2011.

[10] *Le Monde*,2 septembre 2011.

[11] *Le Figaro*.

[12] *Reuters*,18 novembre 2011.

[13] Danielle Bisson et Jean Fontaine,*La Libye,à la découverte d'un pays*,L'Harmattan,Paris,1999,p.141.

[14] *Reuters*,25 Juillet 2007.

[15] Medef International France,8 juin 2004.

[16] *Le Monde*,3 septembre 2011.

[17] *Rue 89*,10 Décembre 2010.

[18] *Le Monde*,19 septembre 2011.

[19] Qosmos是一家法国公司，该公司在深度包检测（DPI）、IP（网络协议）流量分类和网络智能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全球100多家公司都采用该公司提供的解决方案。该公司于2016年被瑞典的宜能（Enea）公司收购。——译者注

[20] Pascal Hérard,TV5,6 juillet 2012,http://www.tv5.org/cms/chainefrancophone/info/Les-dossiersde-la-redaction/Syrie-2011/Syrie-2012/p22301-Pendant-que-les-amis-de-la-Syrie-se-reunissentles-affaires-continuent....htm

[21] *New York Times*,24 Septembre 2011.

[22] En 2008,l'Italie a remis un chèque de 5 milliards de dollars pour les torts infligés à la population libyenne pendant la période coloniale.

[23] *Reuters*,25 juillet 2007.

[24] *RTL*,1 er septembre 2011.

[25] *Exporter Plus*（*Magazine*）,24-26 octobre 2011.

[26] *Libération*,14 septembre 2011.

[27] Ali Shuaib,*Reuters*,15 décembre 2011.

[28] *VOA News*,7 juillet 2011.

[29] *RFI*,17 juin 2011.

[30] *AFP*,11 août 2011.

[31] *Les Afriques*,29 août 2011.

“埃及之春”的起源与现实

在万隆会议及不结盟运动期间（1955年及1970—1975年[1]），部分阿拉伯国家处于争取民族解放及社会进步斗争的前沿。这些国家的政权（埃及纳赛尔、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叙利亚及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党）并非西方所界定的民主体制，也不是我所说的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而是一党专政体制。但它们通过实现其理念仍然具有了合法地位：大力发展教育，使社会具有向上的流动性（底层家庭的孩子能进入新兴的中产阶级）；发展卫生医疗；推行农业改革；保障各水平的学位获得者能够就业。这些成就与反对帝国主义的独立政策相联系，赋予各国政府强大的力量，从而加强抵御西方大国的敌对及以色列实行的军事入侵。

但是，通过合法手段进行了20多年的建设之后，这些政权开始显出疲态。帝国主义的反攻时刻已经到来，为保持权力，统治者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各项严苛要求——完全对外开放、实行私有化等。就这样，他们曾经取得的成就在短短几年内便丧失殆尽：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人口迅速增长；不平等现象加剧；贪腐横行；国际地位下降，并屈从于华盛顿甚至以色列的苛刻要求。为了应对其合法性被迅速削弱的问题，这些政权在华盛顿的支持下，越来越趋向于用高压方式管理国家。

于是，起义全面爆发。2011年6月，我在新作《长期日程内的阿拉伯世界——是“阿拉伯之春”吗？不，是樱桃时代》中，曾提出对这场“运动”的各种参与者及反对者进行分析，对这些力量在长期内的发展趋势进行评估。

在资本主义边缘国家中，埃及是试图“崭露头角”的第一个国家。19世纪初，早在日本和中国之前，穆罕默德·阿里就制订并推行复兴埃及与其邻国的计划。这项宏伟的实验占据了埃及19世纪约2/3的时间，一直到1870年左右，凯蒂夫·伊兹玛尔统治的后半期仍蹒跚而行。这项计划的失败与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入侵不无关系。英国于1840年及1870年两次控制埃及的财政，最终于1882年对其实施军事占领，从而达到其目的——阻止埃及在未来崛起。毫无疑问，由于时代的局限，埃及实行的完全是一项企图借助资本主义实现复兴的计划，这与我将在后面提到的埃及第二次复兴计划（1919—1967年）有本质区别。当然，这项计划本身所具有的社会矛盾，加上其展示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这些矛盾很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如同日本所经历的那样。

因此，在40年（1880—1920年）的时间内，新兴的埃及沦为附庸国，政治经济结构被改造，以服务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积累模式。丧失主权摧毁了国家独立的生产体系、政治结构及社会结构，同时还被系统性地强化了厚古、反动的意识形态及文化观念，以维持埃及的附庸国地位。

埃及民众、社会精英和国家从未接受这种地位。这种坚持不懈的抗争是第二次上升运动浪潮的源头，这场运动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1919—1967年）。这段时期是持续斗争和前进的重要时期。该运动具有三重目标：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尽管这三个目标的表达方式有局限性，有时还会混淆，但彼此是不能分割的。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映了现代埃及融入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事实。在此背景下，1919—1920年革命引发的长期抗争浪潮掀开最后一章——纳赛尔思想（1955—1967年）的篇章。

埃及争取解放的斗争长达半个世纪。随着1919年华夫脱党组建，解放斗争的重点放在了通过建立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的形式实现政

治现代化及重新获得独立。这种设想的民主形式推动了世俗主义运动，其旗帜由新月和十字（在2011年1月及2月的示威活动中再度出现）组成，构成了一种象征。这些“标准的选举”不仅使科普特人从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中脱颖而出，还有利于他们在国家内推行高效治理政策，而且不会引发问题。

在埃及君主王朝反动集团、大地主和富农的积极支持下，英国竭尽全力使华夫脱党推行的民主进程倒退。20世纪30年代，伊斯梅尔·塞德基·帕沙的独裁统治（1923年废除了民主制度）遭到学生运动抵抗，当时反帝民主斗争风起云涌。为了降低风险，英国大使馆及王室有意支持创建穆兄会，王室还将“伊斯兰主义”思想融入由拉希德·里达引入的瓦哈比派，此派推崇萨拉菲主义，这是新政治伊斯兰最反动的版本（反对民主与社会进步）。

墨索里尼征服埃塞俄比亚以及新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前景，让伦敦感到有必要对民主派做出让步，因此允许华夫脱党于1936年回到政治舞台，同年还签署了《英埃同盟条约》，此时的华夫脱党也变得温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埃及暂时脱离了斗争的轨道，但在1946年2月21日，斗争的浪潮再度席卷全国。学生和工人成立了联合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支持下，斗争不断激进化。得到伦敦支持的埃及派出军队并动用了穆兄会（支持塞德基·帕沙再次实行独裁统治），使用暴力进行镇压，但最终无法平息这场运动。华夫脱党再次进入政府，宣布废除1936年的条约，在被占领的运河区开展游击战。但开罗发生动乱（1951年）致使政府垮台，穆兄会在这次动乱中变得更为强大。

有些人认为，“自由军官组织”的首次政变（1952年），特别是使纳赛尔掌权的第二次政变（1954年），标志着这段长期的解放斗争获得圆满成功。另一些人则认为，政变宣告了斗争浪潮中断。纳赛尔主义取代了我所解读的“埃及觉醒”这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表述，抹去了1919年至1952年的整段历史，提升1952年7月“埃及革命”的地位。在当时，许多共产党人持这种看法：1952年及1954年的政变注定要结束

民主运动的激进趋势。他们是对的，因为纳赛尔主义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之后，才体现了反帝思想。于是纳赛尔主义将理念逐一付诸实施：在国际上采取彻底的反帝政策（同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及泛非运动联系），国内进行进步主义社会改革（但并非社会主义的）。这一切都是顶层推动的，不仅“没有民主”（禁止民众组党结社、争取权利），而且“废除”了所有政治生活形式，改革中产生的真空，则号召政治伊斯兰进行填补。然而，该项计划的实施耗尽了埃及在短期内的发展潜力。从1955年至1965年的10年间，埃及经济社会低迷，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提供了破坏这场运动的良机，为此它们使用了其地区军事工具——以色列。1967年埃及军事失败宣告了半个世纪的解放浪潮终结。[2]

浪潮的再度兴起是纳赛尔本人推动的，他选择了向右派让步的道路——实行开放（同资本主义全球化合作），而不是其他人为之奋斗的激进路线。例如20世纪70年代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其发生时间就在纳赛尔去世前后。继任的萨达特强调继续“右转”，并将穆兄会纳入其新独裁体系。穆巴拉克奉行了同样的路线。

随后埃及的斗争进入了低潮期，此阶段持续了近半个世纪（1967—2011年）。埃及屈从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及美国的战略，一直扮演着积极的地区性及国际性角色。纳赛尔治理下的埃及推行的经济社会制度虽受到批评，却是协调一致的。纳赛尔曾保证要实现工业化，摆脱依靠棉花出口的国际殖民分工体系。该制度下的收入分配体系有利于新兴的中产阶级，同时也避免了普通民众陷入贫困。萨达特与穆巴拉克则摧毁了埃及的生产体系，他们用一种完全不协调的制度取而代之。这种制度专门建立在企业赢利的基础之上，而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分包商。近几十年来，世界银行一直对所谓的埃及经济高增长赞不绝口，实际上这种增长毫无意义，也是极端脆弱的。此外，这种增长还伴随着分配不合理及失业率迅速攀升，打击了绝大多数青年。埃及国内的紧张局势一触即发，也最终爆发了。

华盛顿则极力赞扬这种表面上的“制度稳定”，而这种稳定是建立在庞大的警察体系（埃及拥有120万名警察，而军队仅有50万人）之上的。虽然警察很多，却要应对层出不穷的日常违法活动。西方国家声称，该制度“保护”埃及不滑向伊斯兰主义阵营，然而这绝对是一个弥天大谎。事实上，该政权已经任由反动的政治伊斯兰（海湾国家的瓦哈比派）完美地融入其权力体系，并将教育管理权、司法权及主要媒体（尤其是电视台）的管辖权拱手相让。美国关于中东建设的发言充满了两面性，奥巴马在这一点上与布什没有区别，只是完美地服务于自身目标。而埃及政府为政治伊斯兰提供支持，摧毁了埃及社会应对现代世界挑战的能力。（这是埃及教育及研究发生灾难性滑坡的根源。）媒体时不时地披露政府“滥用”权力的消息（如暗杀科普特人），这为华盛顿借“反恐战争”进行军事干涉提供了合法性。当局对“社会安全阀”的运行[3]采取了“宽容”态度，大量底层民众及中产阶级外迁至石油生产国。这种迁移受阻之后（亚洲劳工取代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劳动力），引发了强烈的反抗。2007年，埃及发生了非洲50年来最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有可能被农业资本夺去土地的农民进行了抗争，中产阶级也受到了关于民主示威的相关培训（“Kefaya运动”[4]与“4月6日青年运动”），这些都宣告“埃及革命”的爆发不可避免。这让“外国观察家”大为震惊。于是，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埃及解放斗争潮流的新阶段，来分析运动的发展方向和可能性。

埃及民主运动成员的组成

2011年的“埃及革命”很有可能宣告欧美引入“新自由主义”制度的终结，该制度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各领域都受到质疑。埃及民众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联合了三支积极力量：自愿“发挥政治作用”并具有“现代色彩”的青年、激进左翼势力、民主中产阶级。

约100万青年人充当了这场运动的先锋。激进左翼势力及民主中产阶级立刻加入了示威游行的行列。在抗议活动爆发的最初四天，穆兄会领导人认为这些示威活动应该被镇压，并号召抵制这些活动，直到后来才被迫接受。此时，埃及人民已经行动起来，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达1500万之多。

青年与激进左翼力量有三个共同目标：重建民主（结束军人及警察政权），实行有利于民众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决裂），推行独立的国际政策（不再屈从于美国的霸权及其在全球部署军力的行为）。实质上，他们追求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革命。尽管青年在其社会组成、政治与意识形态表达方面存在多样性，但总体上仍然属于左翼。他们与左翼势力自发组织了大规模的活动就是明证。

中产阶级也汇集在民主这杆大旗之下，他们认为并不一定要重新讨论埃及的“道路”及国际阵营。在这场运动中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群博主：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了美国中情局策划的一次真正的阴谋；他们通常是来自富裕阶层的年轻人，极端美国化，时常以反对独裁的“不同政见者”自居。实际上，他们参与了这场以东欧“颜色革命”为范本，强加了华盛顿意志的，却被伪装成民主革命的反革命大合唱，并通过社交网站将其广泛传播。但是，如果你认为这项阴谋是民众革命的根源，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中情局不断贬低此次运动的意义，使运动参与者背离自己渐进式社会变革目标，并将运动扩散至其他国家。如果埃及这场运动未能联合各种力量，未能确定共同的战略目标，未能建立组织形式及有效性，那么美国这项阴谋的成功概率是相当低的，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就曾经失败过。有趣的是，这些博主使用的是英语而非阿拉伯语，捍卫美式“民主”，散布要求政府赋予穆兄会合法性的言论，其目的不言而喻。

埃及民众很快就听到了这场运动中三种主要势力发出的游行号召。示威活动从一开始就遭到极端残暴的镇压，造成上千人死亡。然

而，这并没有将这些青年及其盟友吓倒，他们也没有向西方大国乞求帮助。他们的勇气成为示威活动展开的决定性因素，促使抗议浪潮席卷大小城市，甚至村镇的各条街道，成千上万示威者不分昼夜地表达诉求。这场摧枯拉朽般的政治胜利产生了效应——恐惧使阵营发生变化，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发现他们必须放弃一直支持的穆巴拉克。于是，埃及军方领导人打破沉默，拒绝参与镇压行动以此维护自己的形象，并最终迫使穆巴拉克及其主要帮凶放弃权力。

这场运动从青年、激进左翼势力和民主中产阶级迅速蔓延至全体埃及民众。此次运动本身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其中一些人的加入，无疑增加了运动激进化的可能，但约500万工人阶级的加入成为运动激进化的决定性因素。小农户针对征地发起激烈抗争[5]，也是这场运动走向激进化的一大因素。参与此次活动的还有一大群“穷人”，他们积极参与2011年2月的抗议，经常现身于邻里们组成的旨在“保卫革命”的人民委员会中。这些“穷人”留着大胡子、戴着面纱、穿着大袍子，使人误以为这个国家本质上就是“伊斯兰的”，甚至是由穆兄会驱动的。实际上，他们的粉墨登场是有人幕后指使的，目的是同民主派争夺民众。穆兄会及其伊斯兰盟友萨拉菲派对阵民主派，两股势力的高下取决于能否与失去方向的民众达成有效阵线或“管住”他们。

民主派在与工人达成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取得了不可忽视的进展。有五个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即埃及社会党、人民民主联盟党（分裂自埃及全国进步工会党，继承了它的大部分成员）、工人民主党、社会主义革命党（托派）、埃及共产党（也分裂自埃及全国进步工会党），于2011年4月组成了社会主义力量联盟共同斗争。同一时间，这场运动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各民主派政党、独立工会、农民组织、青年网络、诸多社会协会）建立了全国委员会。而穆兄会和右翼党派拒绝加入，再次声称反对继续搞这场运动。

面对民主运动：反动集团

正如埃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一样，反对霸权的社会民主运动必然会遭遇强大的反动集团。如何识别反动集团？我们可以通过它们组成人员（社会阶层）的言论，也可以通过它们如何界定政治介入的手段，及服务于上述政治介入的意识形态言论。

从整体社会层面看，反动集团由埃及的资产阶级领导。埃及近40年的依附式发展模式催生了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虽然“全球自由主义”模式导致了极度不公正，但惠及了他们。他们是几万名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发财致富不是靠自己的“创新企业”（引用世界银行的用语），而是靠与当权者合谋。“腐败”已经成为这个统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还是买办阶层，用埃及民众的政治通用语表述就是“腐败寄生虫”。他们坚决支持埃及融入现代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是美国的“死忠”分子。这个阶层出了不少警方和军方的官员，与当权者过从甚密的“文官”、宗教界人士（所有穆兄会领导层、各教派的主要谢赫们都是大富翁）。当然，反动阶层中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主，但他们却是这一统治体系敲诈的受害者，受到买办阶层的盘剥，沦为各地垄断势力手下的“小包工头”。

反动集团在农村的势力也不可轻视。他们是富农阶层，是纳赛尔农业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取代了大地主的位置。纳赛尔统治时期搞的农业合作社将小农、富农捏在一起，使富农获得主要利益。为防止出现对小农不利的情况，当时的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到了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统治时，政府听命于世界银行，废弃了这些预防措施，于是富农加速扩张，消灭小农。这些富农一直是现代埃及社会的一支反动力量，是农村的伊斯兰保守势力的主要支持者，而现在他们比任何时候都逆潮流而动。他们通过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民意代表，控制着农村的社会生活。此外，城里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军方和警方的官员、技术官僚、自由职业者）也大多出身于富农家庭。

反动集团公器私用，让军、警、政府部门、执政党、宗教组织、政治伊斯兰势力（穆兄会和萨拉菲派）都为自己服务。美国每年向埃

及军队提供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是从未用于加强国防，而是用于应对腐败统治所导致的危机。有了“援助”，高官们才得以鲸吞买办经济的大部分果实，以至埃及有一种说法叫“匿名社会/军队”。在埃及过渡时期，“指挥”国家的军方高层并非中立，而是采取措施与“革命”时期的镇压行为进行切割，以“中立”形象示人罢了。“文职”政府官员听命于军方，前者就是后者任命的。一些官员是前政权的人，他们被精心挑选过，其实不怎么知名。政府官员采取反动措施，阻止这场运动的激进化。措施包括：禁止罢工，要将经济引入正轨；限制组建政党，从而为穆兄会等伊斯兰政党参加选举提供便利。在旧政权系统支持下，穆兄会的组织机构已经十分完善。但是，军队的态度仍是最后一个不确定因素。除了那些腐败的军队高层外，民族主义思想在军中还是存在的。（士兵是招募的，一般军官是职业军人。）另外，因为警方的存在，军队与当权者走得不是很近，而且这场运动宣称要将军队势力逐出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因此军方高官未来很可能考虑隐身幕后，不推自己的人去竞选。

警察跟整个国家机器一样，没受损失，没有一起针对警方高层的诉讼。新的地方大员全部来自旧政权，而旧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却在动乱中销声匿迹，司法部门宣布将其解散。但请相信，埃及的资产阶级懂得如何改名换姓重组政党。

政治伊斯兰

旧政权容忍其存在且积极帮助发展壮大的唯一政党是穆兄会。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托付给穆兄会三大基本系统——教育、司法和电视。然而，穆兄会从来不也不可能温和，更不用提民主了。穆兄会的领袖是自封的，整个组织基于纪律原则，严格执行首领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穆兄会的领导层完全由富豪把持（他们全都得到了沙特阿拉伯也就是华盛顿的财政支持），他们一般出身于信奉蒙昧主义的中产阶

级家庭，而基层成员是由其慈善机构（金主是沙特阿拉伯）招募的普通民众，突击力量是民兵。

穆兄会完全赞同在埃及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且完全依赖外国的经济体系，他们实际上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大罢工，反对农民为保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而进行的斗争。因此，我们从两方面可以看出穆兄会一点儿都不温和：一方面他们一直拒绝制定经济和社会纲领；另一方面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但从来都没提出过质疑，事实上他们已经接受了美国为控制该地区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所以，他们对华盛顿来说是非常有用的盟友，为此美国为他们颁发“民主证书”!

但是，美国不会承认自己真实的战略目的是在该地区建立伊斯兰政权。美国需要做出“伊斯兰政权让自己害怕”的样子。通过这种手段，美国才能使“长期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合法化。其真实目的在于对全球实行军事控制，以便美国、欧洲和日本能够独霸资源。美国这种表里不一的态度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动员公共舆论中的“仇视伊斯兰”力量。美国和欧洲最害怕的是出现真正民主的埃及，因为这样的一个埃及肯定会对追求经济自由、支持美国和北约侵略的政策提出质疑。美国竭尽全力阻止埃及变得民主，在倡导进行真正变革的埃及人民运动之中，虚情假意地支持少数派穆兄会替代此前的政权。

在埃及，穆兄会还得到萨拉菲派的支持，并接受海湾国家的大笔资金。萨拉菲分子承认自己是极端主义者——作为坚定的瓦哈比派，他们对其他任何形式的伊斯兰的解读没有丝毫宽容，也正是他们犯下了大规模屠杀科普特人的罪行。如果没有政权的默认支持，甚至是同谋，特别是掌握在穆兄会手里的司法机构的支持，这样的屠杀行动很难实现。这种奇特的分工让穆兄会显得很“温和”，而华盛顿却假装相信这一点。但埃及的伊斯兰教派内部，肯定会出现激烈斗争。因为埃及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派是苏菲派，目前有1500万信众。埃及的苏菲派坚持开放、宽容，坚持个人信仰而不是宗教仪式的伊斯

兰，但他们一直受到政权怀疑。政权对他们一直使用“胡萝卜”和“大棒”两种政策，不与之产生公开冲突。20世纪20年代，拉希德·里达开启了将瓦哈比派引入埃及的进程，穆兄会继续推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瓦哈比派才真正完全引入。海湾国家的瓦哈比派与苏菲派观念相反。它是旧式的伊斯兰，重视宗教仪式，主张遵循惯例，反对除自己之外任何对伊斯兰的解读（而它自己仅仅是复述《古兰经》条文而已），反对任何带有批评性的思想。瓦哈比派公开对苏菲派宣战，它要“根绝”苏菲派，这个行动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而当今的苏菲派已经变得世俗化（不是完全地世俗），他们呼吁政教分离，是民主运动的盟友。

美国的战略：巴基斯坦模式

在整个革命低潮时期（1967—2011年），控制中东的是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三个亲密盟友，当然美国才是幕后老板。这三个国家都害怕民主的埃及崛起。因为民主的埃及将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将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与主张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拉开距离，将使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变得无足轻重，将成为团结起来的阿拉伯人的领袖，会要求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立国。

埃及是美国控制全球战略的基石。华盛顿及其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有着共同目标，就是让埃及的民主运动流产，为此它们设计将一个由穆兄会领导的“伊斯兰政权”强加给埃及，这是让埃及永远屈从的唯一手段。奥巴马的“民主讲话”也只能欺骗幼稚的舆论，首先是美国和欧洲的舆论。

为了给穆兄会政权披上合法外衣（“支持民主”），美国采用了人们常常谈论的“土耳其模式”，但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方式。华盛顿的计划，也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及为其服务的智库所公开表态的计划，实际上都是从巴基斯坦获得的灵感，即“伊斯兰”军队躲在幕

后，前台是一个（或多个）“当选的”伊斯兰政党领导的“公民”政府。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埃及的“伊斯兰”政府必须以自己的服从为代价（不对新自由主义和所谓的和平协议提出质疑，让以色列继续自己的领土扩张政策），而且可以继续实施“国家和政治伊斯兰化”的计划，继续谋杀科普特人！瞧瞧华盛顿为埃及设计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民主”。沙特阿拉伯当然会尽自己所有（包括财政）手段支持实施这一计划。因为利雅得非常清楚，要行使自己的地区霸权，即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霸权，必须让埃及变得边缘化。其手段就是让埃及“国家和政治伊斯兰化”，实际上就是瓦哈比式的伊斯兰化，最终将产生严重后果，其中包括对科普特人的狂热谋杀，以及对妇女平等权利的否定。

这种形式的伊斯兰化有没有可能出现？也许吧，但代价是出现极端暴力。刚刚下台的政权公布的宪法第二条就曾引发了冲突，该条规定“伊斯兰教法是法律的源泉”，这在埃及的政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1923年的宪法以及纳赛尔颁布的宪法都没有提出这一点。萨达特在自己的新宪法中引入这一条文，得到了三方面的支持——华盛顿（称应“尊重传统”）、利雅得（称“《古兰经》应代替宪法”）和耶路撒冷（称“以色列国家是一个犹太人国家”）。

穆兄会的计划就是建立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它坚持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颁布的宪法第二条就是明证。此外，该组织发布的纲领加强了它的厚古倾向，建议设立一个“伊斯兰教学者委员会”，负责监督所有法律提议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要求。这个由教士组成的宪法委员会与伊朗的类似，目的就是监督“当选的政权”。政权由此将被单一的超级宗教政党掌握，所有要求进行世俗化的政党都将变得“不合法”。这个超级政党的支持者如那些非穆斯林（科普特人）都将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尽管如此，华盛顿和欧洲的政府都摆出了一副将穆兄会宣布“放弃”神权统治的计划（但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纲领）当真的样子。这个纲领纯粹是机会主义的，而且谎话连篇。美国中情局的专家难道读不懂阿拉伯文吗？结论很重要：华盛顿宁肯让穆兄会上台，也不会让民主派上台，因为穆兄会能够让埃及、让新自由主义的

全球化继续掌握在美国手里，而民主派则会对充当美国附庸的埃及提出质疑。自由与正义党是受土耳其模式启发建立的，它只是穆兄会的一个工具而已。科普特人竟然也被接纳进来！这表明，如果科普特人要获得“参与”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权力，就必须接受穆兄会的纲领中建立神权统治国家的条件。穆兄会开始采取攻势，建立了“工会”、“农民组织”和一大群形形色色的“政党”，唯一的目的是分裂工人、农民和正在建设之中的民主派，当然，受益者是反革命阵营。

埃及的民主运动真的能使未来的宪法废除第二条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一下现代埃及历史上所开展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大讨论。

确实，革命低潮时期的一个特点是，公共舆论的观点多种多样，但都将一直存在于社会中的“宗教”放在次要地位。从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到赫迪夫·伊斯玛仪统治时期的19世纪中下半叶就是如此，当时有关现代化的议题主导着政治舞台，但是人们仍希望以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而不是民主的形式来进行。1920—1970年时也是如此。“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公开化，很大程度上二者的冲突占据着政治舞台，直到纳赛尔主义出现才结束。纳赛尔废除了这个大讨论，代之以一种泛阿拉伯主义的民粹主义，但又是“现代化的”言论。这个体制相互矛盾，最终为政治伊斯兰的回归开辟了道路。人们发现，在这一阶段，舆论的多样性消失了，让位于自称是伊斯兰的嗜古主义，该政权垄断了所有言论。1880—1920年英国人改变政策，将自穆罕默德·阿里时代以来经过培养的埃及所有思想家和现代主义派人士流放，其中大部分被流放到了努比亚。这时人们可以注意到，即使“反对”英国占领的人也都开始支持嗜古主义。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开创并得到穆罕默德·阿布笃继承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继续这种转变，也陷入了这种奥斯曼土耳其主义的幻想之中，这种幻想却得到了由穆斯塔法·凯末尔和马哈茂德·法里德的新民主党的捍卫。直到极端反动的拉希德·里达时期才得以结束，但到哈桑·班纳时期又重新开始。哈桑·班

纳是埃及穆兄会的创始人，因此嗜古主义重启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

在1970—2010年的低潮时期就更是如此。政权的官方讲话（包括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讲话）完全是伊斯兰主义的（证据是将伊斯兰教法引入宪法，设立了主要由穆兄会组成的政府代表团），假反对派的言论同样如此，唯一得到容忍的就是清真寺的言论。因此，宪法第二条稳稳扎根于普遍的“信仰”之中。我们不能低估低潮时期由于系统去政治化所造成的毁灭性效果。斜坡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爬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目前埃及正在进行的大讨论的内容（无论明确和不明确的），就是针对“伊斯兰挑战”引发的“文化”层面问题。积极的迹象是人们在经过几个星期的以事实为根据的自由讨论后发现，“伊斯兰是解决办法”这个口号在所有的示威游行之中都消失了，人们明确要求社会必须进行切切实实的变革：实现言论自由，自由建立政党、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工资改革，实施劳动法；农民有权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建立学校和健康体系；拒绝私有化，呼吁国有化；等等。事实是不会骗人的，5年前穆兄会作为所谓的反对派，它所持的言论被人们接受，取得大学生选票中80%的票数，获得压倒性胜利，可是在2012年4月的选举中获得的支持率明显下降，只有20%！穆兄会的敌人也懂得反击“民主的危险”。全部由高级委员会（被军方控制）选择的伊斯兰分子组成的委员会建议对（一直在实施的）宪法进行一些改革，并在4月份匆匆经过公投通过改革，但改革明显无足轻重，而且根本没有涉及宪法第二条。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按规定应在2011年9月和10月举行。民主派系的力量坚持不懈地斗争，以便得到一个更长的“民主过渡”时间，让已经迷失方向的民众听到自己的声音。但奥巴马在起义的最初几天就做出了选择：进行短期的有条不紊的（也就是说不要对政权提出质疑）过渡，尽快举行选举（最好是让伊斯兰分子获胜）。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埃及的“选举”不是让民主落地生根的最好方式，而通常是结束民主进步的方式。

埃及的政治伊斯兰在选举中获胜

穆兄会和萨拉菲分子在2012年1月举行的埃及选举中获胜并不令人吃惊。资本主义全球化引发的经济形势恶化，导致“非正式”经济活动奇迹般地膨胀，曾为埃及多半人口（据统计有60%）提供了生存下去的手段。穆兄会正好可以利用经济恶化的形势，并且希望将这种形势常态化。他们简单化的意识形态为反对以市场经济推进经济发展的人提供了合法性。海湾国家为他们提供数量惊人的财政支持转化成了他们有效的行动手段：推动了“非正式”经济中的金融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慈善机构（护理中心及其他机构）的设立。穆兄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触手伸入到真正的社会之中，并让社会对他们产生依赖。但是，海湾国家从未打算通过工业投资等方式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它们支持的是一种“流氓式发展”的模式，这里采用的是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说法，让相关的社会落入一个日益贫困和受到排斥的下降漩涡之中，这反过来会强化反动的政治伊斯兰对社会的控制。但如果穆兄会不能完美地契合海湾国家、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这三个亲密盟友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能让埃及经济起飞。因为一个强大的埃及将结束海湾国家（服从社会必须伊斯兰化的言论）、美国（买办化的、贫困的埃及将永远在其掌控中）和以色列（软弱无力的埃及可让它在巴勒斯坦为所欲为）这三重霸权。

在埃及，自萨达特时期起的历届政府都完全接受新自由主义并服从华盛顿，而阿尔及利亚和匈牙利的节奏则要缓慢和有分寸得多。我在这里重申，穆兄会作为政权体制的组成部分，不应当简单地被视为一个“伊斯兰政党”，它首先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政党。不仅是因为它在“社会问题”上反动（蒙面围巾、伊斯兰教法、对科普特人的歧视），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也非常反动：穆兄会反对罢工，反对在工作方面提出要求，反对建立独立于政权的公会，反对农民发动的抵抗剥夺其土地所有权的运动，等等。

按照预定计划让“埃及革命”流产，这样就可以保障自萨达特时代以来，在军队高层和政治伊斯兰缔结联盟的基础上所建政权具有连续性。确实，穆兄会由于在选举中获胜而变得更强大，今后就可以向军人政权要求比其所能出让的更多的东西。

2012年5月24日，埃及组织的首轮总统选举，就是为了达到当权者和华盛顿坚持的目标，即加强军队高层和穆兄会两个政权支柱之间的联盟，解决它们的分歧，并将其中之一推到前台。本着这种想法，两个“可以接受的”候选人才能够享受到竞选资金，其中穆尔西（穆兄会）占24%的选票，莎菲克（军方）占23%。真正的候选人萨巴希因为享受不到候选人应当得到的资金，获得了21%（该数字还存在争议）的选票。从长期的谈判看，为了让穆尔西在第二轮中成为“胜者”，双方达成了某种交易。议会和总统都是通过向已经投了伊斯兰分子票的选民打出“牌”（塞给肉类、食用油和糖）的方式选举出来的，在场的“外国观察家”似乎什么都没看到。解散议会的事也被军方推迟，军方试图赢取时间，希望穆兄会因为拒绝触及社会问题（就业、工资、学校和健康体系）而自降声誉。最终，这次选举沦为了埃及街头巷尾的笑柄。

穆尔西“担任总统”的政府，是美国达到继续“流氓式发展”和摧毁埃及国家体制的目标的最好保障。人们将会看到，穆兄会这个一向强烈打击民主、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的组织，在竞选闹剧之后会如何行动。这些根本问题似乎没有让任何重要的政治角色感到忧虑。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表明“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迅速在选举中获胜。似乎表现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源泉都体现在投票箱里。但是，毕竟合法性的表现形式不是唯一的。民主有多种形式，包括为了争取社会进步和真正的民主化而继续斗争！这些合法性未来都会面对巨大冲突。这在埃及已经明确出现。

政治伊斯兰能够融入民主吗?

在政治伊斯兰登上舞台的过程中，去政治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当然不是纳萨尔时代的埃及和后纳萨尔时代的埃及所独有的现象。去政治化是南方国家在首次觉醒过程中，包括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一个阶段的革命高潮后都曾经历过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取消革命活动（我不仅仅是说举行多党派的选举），也就是说不再遵守言论、政治建议和政治组织的多样性。政治化要求民主，但是只有当自由被交给“敌人”的时候才会出现民主。取消革命活动导致了去政治化，并引发灾难，出现嗜古主义（宗教的或其他形式的），又或者会出现“消费主义”和西方媒体所说的个人主义。

在穆斯林社会，这种去政治化还以“回归”伊斯兰的形式出现。反动的政治伊斯兰与政权勾结、服从买办以及通过实行市场经济（“流氓式发展”）让社会贫困化，这些都不是埃及所独有的现象。

一旦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其他国家掌权，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情况吗？我们的思想已经被那种认为必定会出现这种结果的言论渗透，这些言论一般都带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真诚或者虚伪的天真。一些人会说：“这已经命中注定，我们的社会都被伊斯兰渗透了。我们希望不理睬它，但它就是被强加给我们。”似乎政治伊斯兰的成功不是由去政治化和社会形势恶化所导致的似的。人们还试图对它视而不见：“没有那么危险吧，它的成功会转瞬即逝，政治伊斯兰所领导的政权会垮台，舆论会摆脱它的。”好像人们所说的穆兄会已经完全赞同了民主原则！主流媒体以及阿拉伯的“知识分子”所制造的“舆论”，要么是出于机会主义，要么是缺乏远见，都假装要相信美国。

无论是在阿拉伯世界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民主的政治化都是我们所要迎接的挑战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当今的时代不是民主进步的时代，而是民主倒退的时代。垄断资本极端集中，政权不得已屈从于它的号令。“总统”权力的增加，表面上看是极其个人化的现象，实际上完全服务于金融寡头政治，导致资产阶级民主的意义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的闹剧。

民主的倒退就是去政治化的同义词。因为去政治化意味着承认那些已经上台的人，承认他们有能力制订替代性的社会计划，而不仅仅是通过毫无意义的选举完成“替代”（而不是变革！）。现在，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公民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去政治化的个人，个人充其量只是政治舞台下的一个被动旁观者、一个被体制模式化的消费者，而其还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个体。让社会实现民主化，让人民重新政治化，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但起点在哪儿？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开始。

国家和民族是走向民主还是毁灭?

美国及其北约附庸盟友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目标当然不是实现民主，而是保证相关国家继续服从它们对当前全球化战略部署的要求，实行全球化只对帝国主义垄断有利。“改变一切，以便一切又都不改变。”“流氓式发展”正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被排斥及其贫困化的基础之上的，它是这种全球化战略的必然产物。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摧毁那些抵制这一战略的国家。伊拉克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美国占领者以“宗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恶性互斗）或“库尔德人的种族特性”的名义，用三个犯下更多罪行的独裁政权替代了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此外，他们还陆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专业干部以及诗人，并禁止任何形式的教育，除非这些教育是“宗教性的”和“有用的”（如企业管理）。

摧毁叙利亚后，西方的目标马上转移到摧毁伊朗上，借口是伊朗拥有核武器。当然这是西方惯用的双重标准：以色列也拥有核武器，但它们对此一言不发!

除此之外，这个战略还针对发展中国家，首先是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的“机构”已经为此制订了两个阶段的计划。首先是“遏制”这些国家为调整全球化、寻求多领导中心管理、结束华盛顿“霸权”所做的努

力。此处使用的英语词汇是“containment”。从长期看，就是要摧毁这些国家的自主能力，以便进行某种程度的“重新殖民”。而此处所用的词汇是“rolling up”。这个计划的内容公开后，牵涉到要取消国际法、不再尊重国家主权、诉诸战争等。在中东开展的“预防性战争”，更确切地说经过准备的战争，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战略的最终目标是保证“北方”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保持美国、欧洲和日本在阿拉伯地区的资源垄断地位。然而滥用这些资源，必将会带来生态灾难。为此西方使用的所谓的文化议题（如服从“北方”的“持续损害”所需要的“捍卫民主和文明”的战争、“人道主义干涉权”等），都是为了掩盖真正的目标——要求阿拉伯国家的人民进行“流氓式发展”。

但是，这个战略是不可持续的，不仅是众所周知的生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它对政治与社会造成的灾难。阿拉伯“革命”不是对这一挑战的唯一回应。拉丁美洲那些得到众多支持的回应手段，与全世界范围内（包括欧洲）的斗争增多一样，都证明这个挑战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

萨米尔·阿明

---

[1] 本文指1970—1975年，但实际上不结盟运动成立于1961年9月，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不结盟运动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不结盟运动开始被边缘化。冷战结束后，不结盟运动逐步失去了存在价值。

[2] 指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方面称六日战争，阿拉伯国家方面称六月战争，亦称六五战争、六天战争，1967年6月初发生在以色列和毗邻的埃及、叙利亚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被以色列打败。——译者注

[3] 即底层贫困民众外迁，减少了社会矛盾，社会的稳定程度提高了。——译者注

[4] 即埃及变革运动组织，Kefaya是该组织的非官方称法。——译者注

[5] 当时穆兄会在投票废除农业改革法时称，伊斯兰教中私有财产是“神圣的”，农业改革源自共产主义，这使得农业改革法被废，使征地成为可能。

叙利亚：人为的黎巴嫩化

——国际专家代表团对叙利亚危机中的活动分子进行评估的报告

在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CIRET-AVT）的提议下，2011年12月3日至10日，我们组织了一个国际专家代表团赶赴叙利亚，以独立和中立的立场对叙利亚局势进行评估。此时，叙利亚危机已经持续9个多月了。代表团会见了危机中的主要活动分子以及国外的各叙利亚反对派的代表、研究近东问题的欧洲专家，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评估使命。

本次访问叙利亚的代表团成员包括：萨伊达·本哈比莱斯（阿尔及利亚人），曾担任政府团结部长、参议员，是CIRETAVT的创始人之一，获得过联合国支持公民社会奖。里夏尔·拉贝维埃尔（法国人），中近东问题的国际咨询家和作家，曾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防务》杂志（法国国家防务高级研究所出版）担任总编，也是CIRET-AVT的创始人之一。埃里克·德纳塞（法国人），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安妮-玛丽·利赞（比利时人），尽管她由于日程未能随代表团前往叙利亚，但也参与了报告的准备与撰写工作。她是比利时参议院荣誉议长，也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全体代表大会的副主席。她曾任欧洲议会议员（1979—1988年）、比利时政府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1988—1992年），还曾担任比利时众议员、参议员和参议长。

本次访问叙利亚的代表团行动的指导原则如下：重视民主原则——自由、人权和女性的权利，反抗压迫，这些都是联合国的法律和决策中所要求的；公民的安全和保护；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或者建

立在所谓的干涉权之上的，与联合国宪章相矛盾的外国军事干涉；陈述事实而不加任何评判；本着批判的原则进行；禁止通过收买代表团成员达到促进民族利益的目的。

针对最后一点应当强调，代表团从组成伊始，就对危机的局势和某些信息歪曲的情况等进行了专业的分析和解读，并从中获益良多。在任务过程中，由于代表团更多面对的是媒体冲突而非军事冲突，我们始终保持着特别的警惕，避免受到受访者的操纵。代表团早已做好准备，要与叙利亚政权的反抗者、献媚者保持一定距离。

自2011年冬天开始，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受到了反抗现有秩序的人民运动的动摇。他们渴望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更好地分配财富，抗议当前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政府任人唯亲的行为感到厌倦。无论在哪个国家，原因都基本相同。

紧随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巴林、也门，叙利亚也受到反抗运动的波及。但“叙利亚春天”这一表达人民期望政治自由化的合理诉求行动，却在春天即将结束的时候，由于难以撼动政权，演变成日益激进化的反对派与安全至上的叙利亚政权之间的武装冲突。尽管叙利亚危机从一开始就属于活跃的阿拉伯“革命”的一部分，但它牵扯更大的国际范畴，因而显得与众不同。

实际上，叙利亚30年来一直是伊朗的盟友，而伊朗是美国所认定的“邪恶轴心”国家。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削弱伊朗，原因很多，不仅因为伊朗坚持实施核计划、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支持，还因为它的地区影响力日益提升。反过来，伊朗问题又极大地制约着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美国军队从伊拉克撤军，海湾国家日益担心叙利亚、伊拉克、伊朗有可能建立轴心的背景下来看。

外国势力在叙利亚危机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比在利比亚问题上尤甚。而且国际角色的干涉每天都在进行，无论是在支持反对派方面，还是在通过阿拉伯和英美媒体发动对叙利亚的信息战方面。

叙利亚政权确实不是民主样板，但敌对势力会尽一切可能抹黑叙利亚局势，以便让国际舆论支持位于国外的反对派，为反对派采取反政府行动提供借口，加快叙利亚政权的垮台。这种篡改行为，实际上掩盖了叙利亚大部分民众支持其政权的事实（尽管这种支持通常是违心的），也掩盖了另外一个事实，即国外反对派既不是最合法的（与历史上的国内反对派不同），也不是最接近民主理想的（因为它带有鲜明的伊斯兰主义特征），尽管它一直宣扬要促进民主。

由于叙利亚危机的实际情况已经被反对派控制的国际媒体极大地歪曲，因此，我们撰写本报告的目的就是提供叙利亚危机的客观信息。为此，本报告逐个对如下情况进行了分析：自叙利亚“春天”以来反抗事件的发展情况；反对派的各种成分，其合法性、目标和战略；叙利亚政权的反应、责任和民众对其态度；危机的媒体层面，特别是媒体介绍反抗事件时有组织地歪曲事实的情况；外国行动者通过支持反对派或叙利亚政权所要达到的外交政策目标（尽管这与叙利亚国内局势没有任何关系）。

反叛的原因与背景

安全至上的政权

叙利亚政权有两大支柱：一个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另一个是该党与巴沙尔·阿萨德家族所属的阿拉维派（努赛里耶派）这一宗教少数派之间的关系。

叙利亚是一个议会制多党派的共和国。全国进步阵线包括8个政党，全部受复兴党控制。叙利亚人民议会议员每4年选举一次，却不真正掌握任何权力。总统每7年选举一次，总统也是全国进步阵线的主席、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秘书长，是决定国家政策和社会生活的职位。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合法地反对政府以及总统。

军队和安全部队是政权的两大支柱。国家机器中特别部门众多，禁军数量庞大。叙利亚的领导人尽管喜欢躲在幕后，却是政权内难以绕过的人物。总统表面上拥有所有权力，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必须与政府内的重要人物合作，一旦决策不符合这些人的要求，他们可以随时发动一场宫廷政变。

巴沙尔·阿萨德掌权伊始，本来不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很快就与掌握政权的高级官员发生了矛盾。他不得不对这些重要人物妥协，因为这些高官通过秘密部门和军队、掌管经济命脉来管理着日常政治运作，他们还管理着日益麻木不仁的官僚机构。

总统巴沙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开始了他的经济改革。表面上看，改革力度很大，但实施起来非常缓慢。2006—2007年，经济改革才得到具体实施，但在所有层面都遭遇了腐败的干扰。总统本人经常谴责腐败，称之为政权的结构性难题。幸运的是，与他父亲哈菲兹·阿萨德一样，巴沙尔得到了宗教少数派、农民、城市逊尼派资产阶级和数量庞大的公务员的支持。

转瞬即逝的政治自由化

2000年7月10日，巴沙尔接任父亲哈菲兹·阿萨德的职务时，人们对政权实行自由化改革，就是所谓的大马士革之春[1]，还抱有很大期望。国家上下都在表达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的愿望，期待未来出现政治开放的局面。很多叙利亚人包括国内的反对派认为，即使不出现政权变革，真正的开放时机也已到来。当时很多讨论如何进行改革的论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撰写了很多陈述国情的材料。但就在2001年2月，安全部门突然制止了这些论坛的活动，逮捕了论坛的大部分负责人。政权的情报部门、军队的一些高级军官、复兴党的领导机构、阿拉维派的“老卫兵”都认为，“大马士革之春”将席卷全国，很可能会引发颠覆政权的革命。

尽管如此，在这短短的6个月的时间里，叙利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大讨论，在国家的精英层面和国家机器内部留下了永久的痕迹。国家机器也分成了两派：一个是“老人派”，支持保持现状，让复兴党继续对国家实行垄断统治；另一个是“现代派”，支持进行现代化改革，将政权逐步开放。

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使叙利亚政权变得警觉起来。2005年叙利亚政权变得更加强硬，因为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被刺杀，国际调查委员会得出初步结论，明确谴责叙利亚政权支持了此次谋杀。叙利亚反对派的协调委员会发言人侯赛因·奥达特就是在此时被捕的。当时，国内反对派试图重新组织起来，但它们的尝试被迫中断。奥达特解释说，政府会尽一切可能来阻止一个全国性的反对派出现：“它的走狗们总是歪曲现实，提供虚假信息。叙利亚公民再也没有共识了：没有自由、民主、平等、三权分立……也没有法治国家的概念。这是一个建立在安全部门基础上的制度，它拥有一切回旋余地，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制裁。任何倡议都要获得审核，如113种职业（公务员、教员等）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这是一个安全至上的政权，建立在普遍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的基础上：无论是议员、审判员还是法官，都由政府指定。没有社会公正，也没有政权更替。但这些政府部门在任何领域都证明不了自己具有管理能力。”

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困难

几年来，叙利亚遭遇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失业扩散；生活成本飙升；伊拉克难民蜂拥而至，而叙利亚国内的巴勒斯坦难民本已很多，难民群体日益庞大。失业涵盖了25%的人口（2011年叙利亚人口约为2300万），其中多为年轻人（75%的失业者为14—24岁的年轻人）。实际上，叙利亚60%的失业人口都不足20岁。巴勒斯坦难民（43.5万），特别是伊拉克难民（12万），再加上自1967年以来从戈兰高地迁来的30.5万人口，让国家的整个经济陷入巨大困境。

下层公务员不得不私下从事第二职业，以贴补自己和家庭的需要。尽管西方式的奢侈品商店不断扩张，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价格高得离谱。叙利亚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是5.5%，但实际上接近25%！大约1/3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10%的人（超过200万人）没有能力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物价高昂：2007年房租价格增长了300%；很多水果和蔬菜价格翻番；2007年10月，汽油价格提高了20%。尽管后来采取了一些社会性措施，但到2009年和2010年，生活必需品的通货膨胀率还是10%—15%。

经济受到了腐败的损害，国有企业老化，农产品的产量降低，石油资源迅速枯竭，教育体系陷入无序状态，资本持续外逃。美国的禁运、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等，都沉重地压在叙利亚商业上。

另外，哈菲兹·阿萨德时代重要人物的继承者中还出现了“黑手党化”倾向：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渗透到了政府的各个层面。他们利用国家机构的松懈状态，发展出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当前社会，很容易地控制了很多部门。首先是对新技术领域、服务业的控制，特别是移动电话领域。随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部分当权者支持的新商人，对传统工业进行了逐步收买，土地也被占有。

阿拉伯“革命”的爆发为这种状况泼了一盆冷水，但大部分政治、军事和经济精英仍然认为叙利亚是一座圣殿。它拥有两条难以穿越的“马其诺防线”：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摇篮，自身能够保持完美的社会和民族结构；以色列（自1967年开始）还占领着戈兰高地，这对叙利亚来说具有国家建构价值，能让政权推迟紧急状态的出现。

事件进程

“新的叙利亚之春”的发生

叙利亚动乱升级始于2011年3月15日，地点是边界城市德拉[2]：大马士革政权圈子里将这里视为“伊斯兰颠覆之路”。由于处于叙利亚与约旦边界，这里的逊尼派部族一向不接受大马士革的统治，约旦的穆兄会也在这个地区活跃。自巴林发生政治动荡以来，沙特阿拉伯的地产商蜂拥而至，给予了该地区部族首领们大量经济上的好处。

叙利亚的反抗事件是由德拉的“少年抗议事件”引发的。首次示威活动发生在市中心的清真寺前。此前，15名少年因在墙壁上画反政府的涂鸦而遭到逮捕，随后受到了折磨（指甲被拔等）。当家长要求释放孩子时，省长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再生嘛，如果生不了，可以把你们的女人带来，我们可以让她们生。”这些家长受到了公开侮辱，他们找到部族首领组织在省政府门前示威。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德拉的省长被巴沙尔解职，巴沙尔后来还接见了受害者家属。

示威活动被军队镇压下去了，但与此同时，类似运动在国内其他城市爆发，而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个最大城市的人口占叙利亚全部人口的一半左右。但自4月份开始，示威行动密集出现，不仅在德拉，而且在东北部的代尔祖尔以及东北边境的多个地方连续出现。总的来看，示威活动多发生在逊尼派清真寺的周围，尤其会在星期五祈祷后出现。

人们注意到，同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一样，社会运动最开始都是要求拥有更多的公民自由。在第一阶段，示威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只是建立在家庭和街区团结之上的临时起意的行为。到了第二阶段，示威运动具有了教派色彩。逊尼派清真寺毫无争议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要求对穆斯林进行现代化的叙利亚人在国外（分别位于艾克斯-拉沙培尔、伦敦和华盛顿）的代表都呼吁扩大动员，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但这些在首次“大马士革之春”后逃离叙利亚的人，还

有国内反对派人士都已经过时，此时人们已经大量使用“数字网络”实施动员，这对扩大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受到地方上的无能部门和已经腐败堕落的领导人的安全至上政策的蒙蔽，中央政府未能真正了解事件的发展进程。“德拉事件”未能得到解决，就是叙利亚政府僵化的表现。巴沙尔·阿萨德没有抓住机会平息事态、重新开启全国大讨论，在政府内极端保守分子的影响下，他选择了镇压并谴责外国的干涉。

抗议的策源地

叙利亚民众的此次反抗首先在历史上经常发生抗议的地区爆发（如同班加西对于利比亚一样），反抗的中心点通常在与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接壤的边境城市。发生大规模示威和激烈冲突的两个城市是德拉和霍姆斯。

霍姆斯是一个逊尼派人口占多数的城市，距黎巴嫩仅20千米，且与国外保持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合法的或非正式的贸易）。它还靠近哈马市，曾是1982年时哈菲兹·阿萨德镇压穆兄会武装反叛的战场。霍姆斯省也是叙利亚最大的省，占叙利亚25%的领土，是农业用地最多的省，而且紧邻黎巴嫩和伊拉克。

历史上霍姆斯的犯罪率就很高（毒品走私和消费品走私较多）。武装团伙2011年5月开始叛乱。6月，他们组织民兵发起“自卫”，逐步从保护逊尼派地区发展到打击阿拉维派地区和警察、军队所在地。然后，当地出现了公开的萨拉菲主义组织，受“黎巴嫩事件”的启发，他们也开展类似的招募行动。他们的诉求和战术令人想起了“凯比尔河事件”[3]。2011年12月8日，这些武装分子袭击了霍姆斯的炼油厂，以破坏当地的石油供应，加剧人民的不满。这些起义者占领了霍姆斯的多个街区，宣布建立叙利亚“自由军”。

在外省和农村的民众支持下，德拉长期反对复兴党的统治以及当权的阿拉维派。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的逊尼派部族从来不接受大马士革的统治，并且作为“伊斯兰颠覆之路”的必然通道，德拉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成了约旦穆兄会的桥头堡。

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示威规模则小得多。在首都大马士革，只有居住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一些下层民众参加。这两处局势之所以稳定，主要是因为城市的逊尼派商业资产阶级与政权结成了盟友。只要“集市”（指商业活动）不太受到局势影响，拥有特权的商业资产阶级将不参加运动，那么这两个中心城市——政权和国家的真正支柱就可以保持稳定，而这种稳定还是建立在基督教徒、库尔德人和德鲁兹教派等占人口少数的基础上。

反抗运动的激进化

2011年3月18日，也就是反抗运动开始后3天，虽然德拉、霍姆斯、哈马以及接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都出现了武装组织的痕迹，但在以后的3个月里民众的示威游行总体上还是和平的。尽管反抗运动的活跃分子与军火走私集团保持着联系，开始储备军火，挖掘掩护军火和撤退人员的地道，但还没有人使用武器。反抗集团的军火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在反抗运动开始前，叙利亚政府就确定有6.5万人从事走私活动而未受到任何制裁，这些人通常活跃在边境线上，与地方势力（省政府、警察和安全部门、海关、部族等）勾结，军火大多是通过这些网络被运送到叙利亚的。

在几个星期的反抗被镇压之后，很多和平示威者被捕，街头剩下的人变得激进起来。这时民众注意到，游行队伍中出现了拿武器的示威者。从2011年6月起，在大部分反抗运动的中心，行动开始激进化，示威者要求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结束当前的政权。

根据从国内反对派的代表和宗教社群领导人那里收集到的众多证据显示，从2011年夏天开始，示威运动就不再具有和平性，活跃分子最常做的事就是拿起自己的武器与维护秩序的警察发生直接冲突。东正教的教长格雷高里奥三世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革命，年轻人没有目标和路线，只有毁灭和挑衅的意愿，以便引发更多暴力，让叙利亚给人留下恶劣印象。"他出生的村庄距德拉只有几千米，他讲述说，第一次示威发生在2011年5月，有300人参加，示威人群找碴儿，与军队发生冲突，导致3人死亡。第二天就有1万人以和平的方式参加了死难者的葬礼，而且"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国内反对派的领导人很不了解这些"新示威者"，因为在2000年"大马士革之春"时，"新示威者"还没出现。在他们看来，这些"新示威者"与突尼斯和埃及的相同，属于"自发的一代"，其身份几乎都是通过网络确认的。

反抗行动并不是统一的，唯一的特点是，多为临时出现的，没有经过协调，只是通过亲戚、近邻的相互联系集合起来：先是家庭、街区，然后发展到部族、教派等。其中星期五的祈祷活动，增强了反抗运动的教派性。

但是，确认游行队伍中的武装分子身份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们包括三种人——普通的罪犯、走私犯和萨拉菲分子集团成员（包括叙利亚人、伊拉克人、约旦人和黎巴嫩人）。反抗运动呈现激进化的特点，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相结合、相互影响的结果：在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上（位于西北部）的难民营里，难民人数大量增加；逊尼派士兵开小差增多；霍姆斯逊尼派街区成为"圣地"。

士兵开小差与叙利亚"自由军"

士兵开小差尽管不是所有阿拉伯国家兵役制度的一个结构性问题，但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叙利亚军队也不例外，而且对此习以为常。起初，士兵开小差后一般会返回家乡，但到了反抗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些人就背起行囊、拿起武器加入武装组织，进入"圣地"。

2011年12月，军事专家确认开小差的士兵人数不足2万人，对于一个45万人编制的军队来说确实不算什么。

叙利亚“自由军”只拥有大约3000支步枪，其作战能力却被大大夸大，与其宣传的影响力不成正比。叙利亚“自由军”主要驻扎在叙利亚与土耳其边界的难民营里。霍姆斯的逊尼派街区也有一些武装组织。直到2011年底，这支武装力量还没有能力支撑与叙利亚政府军的正面战斗。叙利亚“自由军”只有手枪、猎枪和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等轻武器，后来逐渐装备了反坦克火箭筒和迫击炮等类型的武器。

叙利亚与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接壤处，还出现了其他武装组织，他们要把叙利亚拖入打击“邪恶的阿拉伯复兴党政权”的“圣战”。这些人都是从逊尼派激进分子中招募来的，是“夏姆军团”、“支持革命者联盟”和“伊斯兰法塔赫”重建的结果。这些后继无人的组织龟缩到了（黎巴嫩的）的黎波里（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名称相同），还有土耳其和约旦，得到了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土地承包商的支持。直到2011年，这些武装组织除了霍姆斯的一些街区和土耳其的一些难民营外，还没拥有任何“组织圣地”。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一条长达20千米的地带，被叙利亚政府军控制着。[4]

萨拉菲主义组织的强力崛起

阿斯玛·卡夫塔罗是大穆夫提·卡夫塔罗的小女儿，她是一个由穆斯林妇女和逊尼派族群的重要人士组成的论坛的领导人。2009年她曾发表一篇文章，强调杜马（大马士革东北部郊区的小镇）和德拉存在一些萨拉菲主义组织。她写道：“3年或4年前，叙利亚人还不留长胡子，不穿戴萨拉菲主义的装束（蒙面罩袍）。这些都是由商人和非政府组织从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传进来的。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说‘真主在上’。这些词已经被玷污了。”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叙利亚政权的宗教纲领助长了激进化倾向，官方的逊尼派机构接纳了一些因极端言论

而著称的伊玛目[5]，而这些机构一向鼓励狂热思想的传播。阿斯玛·卡夫塔罗指出，8年来温和派被边缘化，不再受到重视。长期以来，叙利亚不太重视打击恐怖主义乱象，这就为那些开展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提供了方便。大马士革即使不是这些组织的支持者，也会是中转站，因为这些组织曾承诺不在叙利亚领土上搞恐怖活动。这种对恐怖主义组织的管理方式不太科学，有时候运转失灵，破坏了政府出台的政策，让叙利亚感到非常难堪。这也是该国国际声誉不好的原因之一。

2006年，武装组织“阿布卡卡”[6]发表声明，称其对袭击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下属地方电视台的事件负责。这种形式的袭击与叙利亚在伊拉克所采取的“停止支援走人”的政策分不开。因为此时伊拉克正遭受英美军队与抵抗组织、逊尼派与什叶派、“基地”组织与伊拉克达瓦党三种极端对抗同时聚焦的痛苦，此外受到以色列特别部门支持的库尔德组织也在活动，他们也与萨拉菲分子保持着零星的关系。

其他萨拉菲主义组织也在沙特阿拉伯血腥镇压“巴林之春”[7]后，通过德拉边境进入了叙利亚。当时，承包叙利亚边界土地的沙特阿拉伯人，暗地鼓励那些亲穆兄会的约旦武装组织进入德拉地区。而此时的德拉地区正遭受严重的干旱，社会非常不稳定，农业工人已经有4个月没拿到工资。他们正好利用社会的动荡，甚至挖掘地道和地窖来掩藏武器，这让人们想起了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集团”在1988年至1998年采取的做法。该方法也被运用到了霍姆斯，该城无论是地理范围还是人口规模都更大，在打击叙利亚政权方面可以扮演武装斗争中心的角色。

煽动犯罪和加剧宗教冲突

2011年底之前，霍姆斯已成为逊尼派和阿拉维派之间教派冲突激进化的象征，而且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黎巴嫩化”。叙利亚政权和

萨拉菲主义组织都应对这种人为的变化负有责任。因为政府采取的是一种单方面的安全至上的管理方式，导致对危机的政治解决滞后。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阿拉伯国家、西方媒体以及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的重要宗教人士也应为这种“人为的黎巴嫩化”负责。

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重复播放经过歪曲的消息的同时，卡塔尔电视台（卡塔尔一家地方电视台）公开呼吁宗教对抗，宣称“巴沙尔·阿萨德背叛了穆斯林”。

2011年春，哈马的一名伊斯兰教重要人物脱去了自己的穆斯林长袍，称只有杀死300名阿拉维派教徒后才会重新穿上它。果然，在2011年6—7月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发生了冲突和大屠杀后，他重新穿上了长袍。从穆兄会于叙利亚反抗之初在伦敦发表的多篇文章看，示威者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想要看到叙利亚问题被放到联合国解决，就必须至少杀掉1000人”。伦敦靠近大理石拱门的芬斯伯里清真寺和其他祈祷地点发出了很多追杀令，声称要杀死叙利亚1/3的民众，特别是阿拉维派教徒，称这是拯救另外2/3民众的唯一方法。

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萨拉菲分子得到了外国支持，其共同目标就是摧毁叙利亚——其社会模式以及多教派共存的模式。因为这种共存模式在阿拉伯世界里是极为特殊的：“对于海湾国家的激进分子来说，叙利亚的这种特殊性令人难以容忍。他们认为所有阿拉伯人都应当属于瓦哈比派，而在叙利亚什叶派没有受到轻视。我们应当继续反对萨拉菲主义，提防海湾国家。”阿斯玛·卡夫塔罗希望内战范围不要超出霍姆斯，她指出：“如果叙利亚出现‘黎巴嫩化’的倾向，并演变成真正的内战，那将更加悲惨，而且将比黎巴嫩经历悲剧的时间更长。”

叙利亚国内反对派的大部分负责人认为，“把阿拉维派送进坟墓，将基督徒赶到贝鲁特”的口号是当局编造的，为的是恐吓少数派。武装冲突在各地爆发的同时，一些捣乱分子组成的小集团也在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居住区进行挑衅。一位驻大马士革的欧洲外交官说：“叙

利亚逐渐被模糊不清的暴力笼罩，很难追本溯源，不知道真正的煽动者是谁。”

恐怖主义活动

自2011年9月以来，叙利亚进入了“冲突阿尔及利亚化”的局面——暴力行为具有模糊性，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谁”，而且三个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也固定了：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例如，仅2011年5月，就有多个阿拉维派军官及其子女被杀害，而国际媒体对此置之不理。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多次指出，自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警察和军人已经有1100名被杀。

脸书和其他“数字网络”上，流传着一份被起义者“判处”死刑的名单，他们决定谁必须死，谁是叛徒谁不是……阿涅斯·玛利亚姆·德拉库鲁瓦嬷嬷是圣雅克安德西斯修道院的高级修女，她讲述，2011年12月6日是霍姆斯历史上最阴暗的一天：大约100人在教派械斗中被杀，其中大部分被碎尸。“场面相当恐怖，妇女被强奸，乳房被割掉，很多人被碎尸”，“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新郎被杀，仅仅是因为他拒绝与起义者一起示威游行。一个逊尼派商人也被杀，只是因为他将东西卖给警察……”。库尔德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奥马尔·乌西解释说，这种残暴行径不符合叙利亚的历史和文化，他认为这是外来的萨拉菲派的做法。起义者穿上警察和军人的制服，然后开始杀戮。为了应对他们的这种战术，安全部队不得不经常更换制服。

我们的一些对话伙伴认为，萨拉菲活动分子经常化装，刮掉胡须，将亲政府的标语放在明显的地方，然后混到支持巴沙尔·阿萨德的队伍之中。根据多个安全部门的消息，利比亚的活动分子（包括奈富塞山的柏柏尔人，以及阿卜杜勒·阿基姆·贝勒哈吉的支持者）也渗透到了叙利亚“自由军”的长枪队中，他们通常是通过位于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营混进来的。

维护秩序的警察部队的反应

巴沙尔·阿萨德的顾问穆罕默德·纳西夫将军（曾给巴沙尔的父亲哈菲兹当过顾问），还有一些来自山区的阿拉维派的军事首领，在反抗事件开始时，很可能希望采取安全至上的管理方式。他们知道，1982年对哈马叛乱的镇压还深深地镌刻在逊尼派的记忆中，一旦失去政权，他们也将处于危险境地。他们害怕反抗运动，本能地采取了一致的行动来保护自己，这也说明了政府从一开始就进行激烈镇压的部分原因。多个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受访者承认，政府“最开始在判断和反应方面确实出现了很多失误”，他们对政府的强硬镇压表示遗憾，认为镇压让形势更加恶化。

2011年5月和6月是转折点，此后安全部队每天都经受着危险。多个军官在家中被杀，很多士兵在往来部队和自身所属族群途中落入陷阱。某些士兵一旦被确认为阿拉维派，就成了被打击的靶子，使得由多教派士兵组成的部队中充满了不信任气氛。骚乱时有发生，特别是在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骚乱最终会演变成武装冲突，反抗者最后都藏进了利比亚与土耳其边境的难民营。

阿斯玛·卡夫塔罗认为，对穆卡拉巴（叙利亚情报机构）的反复指责通常是有根据的，“情报部门诚然不是圣人，但那些武装组织通常作恶更多”。如同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警察挑衅性的夸大言辞正好为反对派所用，他们此刻正愁于没有能力为自己捏造的事实提供证据。

一位驻大马士革的欧洲武官的随员解释说：“尽管西方大使馆和媒体现在听不进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叙利亚很多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试图缓和局势，至少不愿让局势恶化。”叙利亚的装甲部队本可以摧毁霍姆斯的反抗街区，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同一来源的信息表明，很多计划呈报给了巴沙尔·阿萨德，他最终选择了“遏制”管理，没有支持清除反

抗街区的正面冲突的解决方式。同样，在之后极少的“和平”示威中，军队得到的命令是要避免直接接触，要注意对示威人群进行“疏导”。

2011年5月，巴沙尔·阿萨德在代尔祖尔要求一些部门在维持秩序时不携带武器，武装组织的活动分子立刻加以利用，导致很多维持秩序的警察伤亡。这在警察中引起了不满，他们认为自己被总统抛弃了。但命令还是得到服从，因为开火的士兵会受到法庭审判。然而，这些惩罚并未公之于众。因为政府害怕引起更多的挑衅性示威，特别是不能让军队的底层士兵失望。

但是，空军的情报机构臭名昭著，直接加入了镇压行动。国内反对派的很多负责人解释说：“一些示威者宁肯死也不愿被捕，因为被捕意味着遭受折磨和长期监禁。这些说明了为什么示威会变得激进化，为什么暴力会升级、会扩大……”

2011年12月底的国内局势

从反抗开始，叙利亚3个边境城市（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就成为政府军和一直难以确认身份的武装组织之间的“内战”区。在冲突的9个月中，武装组织在叙利亚领土上并未完成具有决定性的行动，直到2011年12月，这3个地区还都被叙利亚军队占据着，而且叙利亚政府也没有给人留下要进行战争的印象。与国际媒体所提供的消息相反，叙利亚其他地区的局势相对平静。

2011年12月7日，我们去哈马的路上没有任何路障，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这条战略轴心的道路上没有一辆装甲车。我们在哈马南城入口只看到有一些BMP-3步兵战车，一辆T-62主战坦克，而且是固定不动的。仅霍姆斯有一些简单的控制点（如沙袋、土坝等），我们并未发现战斗的痕迹，城市建筑上也没有射击痕迹。

在城里，我们也没有看到特别部署的部队，负责巡逻的警察也没有荷枪实弹，商店和学校都是开着的。没有任何紧张的局面，也没有

明显的不安全迹象。我们在当地人员陪同下向民众提问时，他们一点儿也不躲闪，甚至还主动聚集到摄影机前。

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安全机构也显得非常稳定。一旦有人群集中，身着便衣的情报人员就会立即进行干预。安全部门将很多没有牌照的公共汽车、轿车等车辆部署在首都的各个角落，虽然安全人员身着便衣，但民众很容易辨认出来。在大马士革，军队主要驻守在位于王朝广场的体育馆内，那里是人群集会场所。王朝广场地区是大马士革市中心与敏感地区（东北和东南街区）的“边界”。在市中心附近，军队还负责监视首都的主要道路。

其实，民众对这9个月的冲突、不安全形势和暴力行为感到厌倦。我们在大马士革和哈马的路上碰到的很多居民渴望和平，希望恢复正常局面。叙利亚库尔德人联合会的主席奥马尔·乌西总结指出：“只要叙利亚人民为自己属于这个国家感到自豪，保持团结，只要军队中的作战部队不发生叛乱，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他认为示威规模在倒退，“一旦国际制裁放松，街头示威就会减少，政治进程也就可以开启，而目前政府在街头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难以做出重要的决定。在涉及未来的问题上，这两个因素有着内在联系，因为叙利亚不接受美国和以色列对中近东的安排”。

混乱的反对派

叙利亚反对派有三个显著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内反对派——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比较老派而且民族性强，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但也反对与政府谈判，要求政府下台；第二部分是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希望避免发生混乱，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第三部分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得到外国支持，希望军事干预。

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

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叙利亚人的政党以及独立民族人士11名。委员会有20位领导成员，其中5位是阿拉维派。该委员会似乎缺乏沟通能力，保守封闭，与国际上没有真正的联系，在国外也不太有名，但它是国内最重要的、存在时间最长的、最合法的反对派别，国内根基很深。

该组织所有领导人都曾因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政府而蹲过监狱，但其内部也有人事斗争。该委员会一直呼吁对话，但遭到政府拒绝，所以它也拒绝谈判。委员会认为政权必将垮台，要求巴沙尔·阿萨德走人。该组织尽管声称拥有解决危机的路线图，但实际上没有拿出任何可靠的替代纲领。它也应为目前叙利亚局势陷入僵局承担部分责任。

该委员会反对将叙利亚问题国际化，反对外国干预（它的领导人也不相信会出现国际干预），但要求通过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观察家来保护叙利亚平民。洛阿伊·乌西也承认国内反对派没有保证政权更替的手段。为此，该委员会提倡应有一个过渡阶段，以便进行体制改革。它还要求政府放开和平示威，以便将国内的精英动员起来。委员会另一位不愿被提及姓名的负责人认为：“尽管我们应当分享权力，但目前我们并不拥有足够的建立替代政府的人力资源。”该委员会目前正试图让政府释放自己的支持者，其最大的希望是得到和平示威的权利。

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

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是三个反对派中最低调的。它包括叙利亚民族党、库尔德人联合会、叙利亚共产主义联盟，还有各种各样的青年协会和妇女协会、一些部族以及一部分中产阶级。

它支持和平，反对任何外国干预，谴责“国外的”反对派受穆兄会控制。它目前与政府保持着对话，而且试图说服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也这样做。但它认为，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很多领导人出于个人的报复思想，阻挠任何形式的变化。

库尔德人（在叙利亚约2300万人口中占300万）是“理智反对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叙利亚与土耳其缔结协定，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分裂主义分子，致使他们在国内长期被边缘化。他们受到复兴党的压迫，有16万人没有叙利亚公民身份，另有7.5万人甚至拿不到身份证。但是，他们必须服兵役，却没有投票权。

起初，库尔德人认为自己的诉求合理，也赞同上街游行。大部分库尔德人赞成改革，提倡公民自由、政治自由并建立民主政体，但认为军事激进化会对国家统一构成威胁，而且会让叙利亚甚至中近东在未来陷入危局。

此外，叙利亚最近也通过了几项有利于库尔德人的改革，特别是给予他们叙利亚国籍。最近与政府进行对话后，库尔德人首次被正式准许拥有自己的政党，也为政府的法律草案提供了一些建议。2011年2月，西方试图将库尔德人与叙利亚政权分离开来，由于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民族情感非常强烈，他们并没有被牵着鼻子走。因此，大多数库尔德人支持巴沙尔·阿萨德，反对任何外国干预，拒绝与“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对话，认为穆兄会在叙利亚建立伊斯兰政权是最坏的解决方式。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很大程度上被穆兄会控制，尽管它将几个得到福特基金会或其他美国部门资助的会法语的学者、科学家、大学教授，还有几个卡塔尔的土地承包商推到前台。该委员会希望复制利比

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模式，但它在国内缺乏根基。它受到国内反对派的谴责，其合法性不被承认。

自1982年哈马镇压以来，叙利亚国内就不存在正式的伊斯兰政党了。穆兄会主要活跃在德国、英国、比利时和美国，在国内也只有几个沉睡的网络而已，但通过一些“挡风协会”[8]和在萨拉菲主义组织的联络人，成功建立了一些基地。2011年反抗事件发生后，“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得到约旦穆兄会的大力支持，并为其输送人员。该委员会似乎得到了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一些地方分部的支持。但萨拉菲活动分子所领导的示威游行，让该组织与国内其他反对派产生了分歧。该组织也应为示威游行造成的人员伤亡负部分责任，因为是它让示威者相信政权将会在15天内垮台，并推动示威游行变得激进化。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还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武装组织叙利亚“自由军”和拉菲克·哈里里支持的黎巴嫩民兵保持着联系，并得到了土耳其的“善意”关注。一般情况下，穆兄会“推高”“圣战分子”的地位，让他们制造恐怖活动，以使自己成为可以被接受的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试图给人留下叙利亚每天都在血流成河的印象，以此让国际社会采取“利比亚方式”进行干预。穆兄会和“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掌权。

根据该组织一位领导人的说法，一旦“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获得政权，叙利亚就会立即切断与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朗的联系，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这种立场让很多叙利亚人震惊，由此该组织有了一个充满贬义的称呼——“伊斯坦布尔委员会”。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库尔德人代表称，他们永远不会接受“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领导，因为它是一个受土耳其指挥的组织。

反对派在应采取何种战略上存在立场分歧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叙利亚没有多少分量，没有什么根基，成员也不多，在国内没有任何基础，但它得到了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西方国家及其媒体的支持。这些媒体主要目标就是使日后的西方干预合法化，而这也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真心呼吁的。相反，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被孤立，没有财政手段。更糟糕的是，它尽管是一个合法组织，却无法获得国外的支持，无法在叙利亚实现任何政权更迭。

对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和支持与政府对话的国内反对派来说，危机的解决方式必须百分之百是叙利亚式的，必须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解决。这两个反对派的一些代表希望与政府实现和解，设一个过渡期，可以举行自由和民主选举。

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和“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之间和谐相处非常困难。双方曾试图在埃及进行协调，但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代表米歇尔·基洛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协调以失败告终。该委员会主要协调者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却认为，反对派之间的分歧被夸大了，因为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目标：政府下台，建立民主制度。他认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内部存在矛盾，这可以促使双方接近，“但问题是，叙利亚阻挠我们接近，它希望在边界地区建立一些缓冲区”。我们会见的叙利亚反对派的领导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一观点。侯赛因·奥达特认为，如果反对派能够联合起来，在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是能够找到解决方法的：总罢工、时不时地静坐、普遍不服从命令等。法耶兹·塞拉赫认为，联合国和阿拉伯联盟应当共同找到一个有约束力的和平的国际干预方式。哈桑·阿卜杜勒·阿齐兹认为不应当进行军事干预，他不相信会发生内战：“因为叙利亚人民不可能这样做……一旦出现外国军事干预，必定会发生内战。”

叙利亚库尔德人联合会的主席奥马尔·乌西也不相信外国干预：“如果有的话，早就该发生了。军事干预会导致战争，让整个地区陷入战火，围绕伊朗问题出现极为紧张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与俄罗斯

和中国的关系会恶化。”他深信，西方在自己的日程中排除了军事干预，它们仅仅是要削弱叙利亚政权，以便继续包围伊朗，因为伊朗的变革才是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钥匙。

叙利亚政权已经落后于反抗形势?

叙利亚本以为能够从2011年1月开始的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冲击波中幸免，但是，尽管收到情报部门多次警告，叙利亚政府仍然没有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它给人的印象是已远远落后于形势发展。叙利亚主要反对派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主要协调人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指出：“政府走到了自闭的弯路上去了，它一直拒绝面对现实，拒绝做出哪怕一点点的政治让步，拒绝做出哪怕最小的对话尝试。”自2011年1月起，他本人就曾提醒政府注意“突尼斯事件”及其对埃及等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国家的影响，“但政府的答复是，这是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除了这种自愿的失明，政府极端的安全至上政策也导致了反抗运动的激进化”。

政权的责任

我们在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对话者认为，叙利亚政府已经失明，它不愿正视反抗运动的激进化、面临的各种危险、国际经济制裁的后果、国内的危机，以及街头的人们每天经历的困难。民众都对旅游业和商业活动剧烈下滑及国家经济生活陷入困顿感到伤心。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指出：“政府以不可理喻的固执态度，否认制裁对国家产生影响。”他认为：“政府的不作为和阻挠变革，为外国干预开启了大门。”他补充说：“这种姿态鼓励和推动了反对派中最极端最暴力的组织的发展。政权本身也在制造国家的‘黎巴嫩化’……尽管开始时抗议是和平的，但现在已经陷入武装反叛的危险。然而，政府在阻挡这

种疯狂的局势恶化方面什么都没做……协商大会一直都在做样子，就像空贝壳一样没有内容。”

法耶兹·塞拉赫认为，政府扩大对伊斯兰威胁和内战风险的宣传，是在为自己的安全至上政策提供佐证：“国家认为存在某种阴谋，而且还进行这种宣传。但国家确实存在与大多数叙利亚人民利益攸关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归根结底，政府总是拖延时间，并像猫躬着背一般，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叙利亚通讯社社长阿德南·马哈茂德承认，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确实出现了失误，特别是在反抗事件刚刚出现于德拉的时候。但他认为，这是反对派“要么就要全部，要么什么都不要”的战略导致的，这种战略促进了恐怖主义和武装组织的出现。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代表们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是政府的做法推动了最狂热的反抗者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反对派当中一些人认为：“他们只是正好走到了政府愿意他们到达的节点上——军事冲突可以巩固政府宣传的外国阴谋论，更确切地说是西方阴谋论，是政府自己打开了外国干预的大门，正好按照利比亚的形势发展。”

驻大马士革的外交官们认为，叙利亚当局阻挠他们工作，根本无视国际法和自己国家的利益。但对外交官们来说，实地访查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安全部门也针对大使馆组织了一些袭击活动，特别是对法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和驻阿勒颇领事代表处。

不可能进行对话

自反抗事件伊始，政府就与国内各反对派进行接触，但没有出台任何具体的措施，对话很快中断。叙利亚副总统曾与侯赛因·奥达特接触过，以便确定2011年8月首次会面的日程。9月份，双方举行首次交流，“但为时已晚，德拉和霍姆斯的死亡人数太多了。示威已经激进化，一切都已恶化。接着出现了新的死亡事件，更多人被捕”。奥达特

继续说道："很明显，政府希望开始对话，但在本质上又不想做出让步。"他补充说："总统和他身边的人也许有对话的意愿，但他们没有什么手段，权力掌握在家族和安全部门的手中。"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称，法鲁克·沙拉赫曾"请求帮助他说服政府圈子中的人"，但巴沙尔·阿萨德身边的人进行阻挠，并歪曲了奥达特对国内真实情况的看法。

尽管如此，奥达特还是会见总统顾问十几次，但始终没有达成共识。他说："政府将对话与谈判混为一谈，不想听人们谈论实施具体的改革计划，而改革必须立刻进行……他们想要拿走我们的主张，却又要声称是自己的主张，甚至已经开始规划实施，但又不让我们参与……"

因此，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极为艰难。法耶兹·塞拉赫解释说，巴沙尔·阿萨德与他身边的人并不愿真正开展对话，有时甚至假装要进行对话。他本人支持外国的政治和军事干预，在谁是政府内最大的阻挠者的问题上他却含糊其词。他认为，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应为"完全陷入僵局的局势"负最大的责任。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也认为："总统应该为叙利亚国土上发生的事情负责，不管他的命令有没有得到执行。"

但国内反对派也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政府在宪法改革问题上的进展，即删除著名的第八条（这一条文保证复兴党的垄断地位）只是一个拖延动作，是一种工具，为的是重新开始谈判进程。过度关注这一点，导致在有效推动叙利亚政治生活自由化这个主要问题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多名成员承认，宪法第八条不再是问题，但总统在宪法中拥有几乎神圣的地位成了叙利亚制度的真正问题。

羞羞答答的开放

虽然叙利亚局势不稳，但我们依然可以自由地在没有政府人员陪同的情况下会见了国内反对派的最重要成员。这些成员可以自由地发表通告、与外国大使馆座谈、接受媒体采访并到国外旅行。

此外，自从突尼斯爆发动乱以来，巴沙尔总统宣布了好几项重大改革措施。政府开放了多个领域：取消紧急状态；批准给予库尔德人国籍；通过了实施多党制的法律和媒体法，特别是在取消了有关复兴党地位的宪法第八条之后，要重新修改宪法。

市政选举成为缓和局势的机会，尽管在冲突地区，选举根本不可能举行。原则上立法选举应当定在2012年春天举行，却恰好与预计将在2012年夏天举行的全国大会的日期重合。特别是巴沙尔总统最终同意让阿拉伯联盟的观察员进驻叙利亚。

军队的忠诚

叙利亚军队实行征兵制：编制为60万人，实际上只有40万人。军队是按照苏联模式建设的，军官都是经过良好培训的职业军官，出自不同的族群。在大多数军事参谋部和作战部队里，阿拉维派军官并不多。

军队的装备多数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造的坦克、装甲车、火炮等，总体上已经老旧。只有几个装甲师（第41师、第8师、第9师和第11师）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比较新式的装备，同时依靠与伊朗合作，目前还能作战。还有总共4万人的共和国卫队、突击队和准军事人员。这些力量足以维护国家安全、管理三个主要的内战城市——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还应提到的是，自2008年起，俄罗斯经常为叙利亚提供雷达和中短程导弹，还有50架最新式的苏式歼击轰炸机。

很多西方军事专家寄希望于叙利亚军队分裂，甚至发动军事政变，2011年12月前还是异想天开。尽管士兵开小差时有发生，并且被

媒体大事渲染，但高层军官都没有叛变，任何体制内的部队都没有叛离。

民众对政权的支持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所有支持政权和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游行都是政府组织的，而且这些支持都不是自发的。如果说这些游行看上去确实组织有序，并且得到政府的保护，那也只能说明叙利亚人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强迫的情况下参加的。此外，尤其是在阿拉伯联盟取消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时，民众自发组织了大规模游行，但国际媒体很少看到这一点。

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一名不愿被提及姓名的发言人指出，“在叙利亚，大多数民众不会积极地支持或反对政权。他们渴望享有更多的自由，并保持自己的社会模式。但是，如果要让他们在巴沙尔和萨拉菲分子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会选择巴沙尔”，“对他们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权更替……归根结底，目前的政权虽然有缺陷，但总比混乱好得多。叙利亚人民希望和平，其他的一切都是歪曲事实”。

我们已经强调，叙利亚人口中的一半生活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座城市。直到2011年12月，这两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暴力活动。除“亲巴沙尔”和“反巴沙尔”的人之外，大多数人是默不作声的，他们远离政权，也没有积极卷入反抗活动之中。

一位反对派遗憾地表示：“总统非常强大。”圣保罗的基督教族群中有人说：“他并不缺乏魅力和支持，他代表着未来和国家的现代化，但他受到了萨拉菲主义组织的阻挠，他们希望在国内进行种族和教派清洗。”

东正教教长格雷高里奥三世认为：巴沙尔·阿萨德是一个新派人物，思想开放，精神现代；他曾在伦敦生活，在国内游历过，他了解

自己的国家，“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总之要给他一点时间……”。

2011年5月4日，格雷高里奥三世正式公开地要求外国元首“呼吁对话和理解”。他写道：“国家在开放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他还要求各国元首“应鼓励这种开放和现代化的变革”。

危机的媒体层面

叙利亚当地局势与盎格鲁-撒克逊媒体、阿拉伯媒体传递给人的差别甚远，比在利比亚的时候更甚。代表团很多成员当时就发现了这一现象，郑重指出存在着针对大马士革的密集媒体战。

叙利亚危机是媒体战的目标，它动用了众多大规模通信手段，通过国际媒体、美国广播电台、萨瓦广播电台、亲“3月14日运动”的黎巴嫩媒体等开战。应当指出，尽管法语媒体处于次级地位，但它经常采纳未经确认的阿拉伯和盎格鲁-撒克逊重要媒体发布的消息。因此，媒体报道的内容过于片面，变成美国新保守派的地缘政治优先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已经将中近东国家分裂为了“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和所有石油王国）和“邪恶轴心力量”（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特别是在此次的叙利亚危机问题上，新闻报道通常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主流”媒体只发布攻击叙利亚政权的新闻，而且只有一半是真实的。正如格雷高里奥三世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传媒和外国的立场一向如此，好像来自大马士革政权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真的，不是好的，大马士革应当为一切错误负责。这导致叙利亚非常反感西方国家及其记者。”

尽管阿斯玛·卡夫塔罗与政府、国内反对派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她重申，在反抗事件发生之初，从媒体对政府宣布的一项政治改革计划的报道中，能够预见叙利亚发生与其他“阿拉伯之春”同样的“革命”的可能性。她说：“没有一个人报道或者解释政府所做的努力，也没有任何

一家国际媒体报道人们为拒绝外国干预而进行的示威，而这种示威经常发生。”她抱怨人们听到的只有“外国的声音”：“反对政府的最强硬立场来自外部和国际传媒，比国内的立场强硬得多。”

曾经由120多位外国记者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叙利亚，会见叙利亚通讯社社长阿德南·马哈茂德。阿德南·马哈茂德指出：“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团对叙利亚的局势给出公正的观点。”国内反对派的多名代表也曾指出，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推动下，国际媒体重复简单的二元论观点，即“恶的”对“好的”，这样就掩盖了叙利亚局势的复杂性，未能同等看待反对派的残酷行为与政权的残酷行为。

歪曲信息的方法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编辑部门对报道用词可谓字斟句酌，其目的就是攻击叙利亚政权，使示威游行、暴力行为和恐怖行动合法化。我们列举几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歪曲信息的方法：以偏概全法——不提具体地点，只说“叙利亚”或“一个被家族势力占据的国家”；偷换概念法——不提萨拉菲主义组织，只说叙利亚“自由军”或“抵抗力量”；时空转移法——把事件发生的日期提前，在其未发生前就宣布发生冲突；偷天换日法——很多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播放的是埃及或也门的画面（几个星期前或几个月前的信息不等），却说是在叙利亚拍摄的，这些画面与叙利亚当时的季节、天气都不符，例如2011年夏天，报道中甚至有人穿着大衣在游行。

新闻报道中很少“有来源”。以美国的福克斯新闻为例，评论都只称呼“反对派”和“抵抗运动”，报道中经常使用的说法是，“有人认为……”“城市里有人说……”“居民们看到……”。大部分时候，它提到的是“目击证人”，但很少提到受害者的名字或身份。一些自称是“叙利亚活动分子”的人经常接受采访，但观众根本无从了解他们的身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名所谓的证人其实只是一个生活在荷兰的黎巴嫩

记者。法国电视台有很多记者被称为“大屠杀的目击证人”，但他们实际上生活在迪拜、约旦和科威特。

最后，在有关叙利亚政权残暴不仁、疯狂镇压而导致大量人员伤亡问题上，西方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之一是“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该机构是欧盟承认的，它宣称自己拥有统计当地受害人的地方协调委员会的数据。但该观察组织的合法性都令人怀疑。实际上，该观察组织是生活在德国亚琛的穆兄会成立的，后搬到了伦敦。该组织的领导人、律师默莱赫是叙利亚人权委员会的主席，曾经因为加入宗教协会而入狱7年，直到2010年才被释放。

特别是，2011年5月以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将70%的时间都用来播放叙利亚新闻。这个国家就这么值得如此报道吗？如同在利比亚，该电视台为何如此费尽心力，服务于怎样的政治目的？这样的行为更像是在发动一场信息战。在此，我们可以列举很多媒体操纵信息的例子：

2011年9月11日，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电视台说叙利亚的拉塔基亚发生了炮击。而实际上炮击是在两小时后，即凌晨4点才发生。

2011年9月23日，同样是这两家电视台报道说，大马士革的王朝广场发生了大规模示威……实际上第二天周六示威才发生。

2011年11月，还是这两家电视台宣布，一点半在叙利亚的杜马有一个安全中心遭到攻击和轰炸。叙利亚电视台当即派遣一个小组到现场，到达时间是两点半，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可是，三点钟时这个安全中心就遭到了攻击！

由于堵车，人们通常会在大马士革的倭马亚广场上排队等出租车，这也被描述成了反对叙利亚政权的示威。

2011年12月初，叙利亚的霍姆斯发生了示威游行，要求当地政府下台，谴责政府没能打击起义者、有效保护民众。这次示威也被外国媒体描述成了反政府示威。

很明显，每个例子都值得深入调查，对其进行方法上的解构，但我们这个小小的代表团还不足以承担这一使命。有朝一日，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但这些普通的小故事已经达到了它的狡猾目的，木已成舟……

我们还可以回顾2011年6月6日的情形，当时媒体称，叙利亚活动分子阿米娜·阿卜杜拉·阿拉夫·奥马里被政府安全部门带走。这条消息让叙利亚很多反抗者及其外国支持者义愤填膺。但是这些支持给予同性恋者权利、反对巴沙尔·阿萨德的反抗行动的领导人，实际上都是被虚构出来的。作者是一个美国人，此人是“阿拉伯事业”的斗士，几天以后，他承认是自己开了一个玩笑。

媒体操纵的最鲜明例子发生在霍姆斯。一位妇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起义者杀死，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出了录像，却说孩子被叙利亚军队残暴杀害。

2011年12月7日，我们代表团见到了这名妇女及其家人，也观看了录像和卡塔尔电视台的评论，以下是具体描述。[9]

> 该妇女叫格奥尔基娜·伊阿尼奥斯·尼加玛，是一家电缆厂的工人。她是一名基督徒（希腊东正教），生活在霍姆斯郊区的拜亚代街区，事件就发生在那里。后来她躲到了霍姆斯郊区的父母家，我们就是在那儿见到她的。
>
> 2011年12月1日上午，她9岁大的儿子易卜拉欣·萨乌德跟她要礼物。8点半，她和儿子出门买东西，刚走出商店就遭到了枪击。她慌忙把儿子搂在怀里，感到身上在流血，开始她还以为是自己中弹了，却发现儿子失去了知觉，鲜血从他的脖子汩汩涌出。她不知所措，只是大声喊叫着让儿子醒过来。
>
> 几个年轻人想要救她儿子，可一伙儿蒙面男子不让，还把年轻人驱散开。他们抓起她垂死的儿子，拎到一个放满家具的大厅里，放在地上，然后给垂死的孩子录像。她害怕也被这些人杀

死。这期间，孩子的血流干了。这些男子还给大声哭叫的妈妈录像，故意给她身上的基督教十字架一个大特写。随后，这些人高呼着“真主在上”扬长而去。红十字会来了，但为时已晚，孩子已经死去多时。她抱着孩子的尸体赶到医院的时候，那些武装分子还在高喊着同样的口号朝建筑物开枪。

一个小时后，也就是10点钟过后，半岛电视台播放了垂死的孩子和在他身边哭喊的妈妈的录像。评论说，这是叙利亚军队的新暴行，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打击基督教少数派了。

这位妈妈说：“枪响的时候，附近既没有警察也没有军队。如果安全部队在那儿，也许易卜拉欣就不会死了。”蒙面男子大概有十几个，不是当地人，但他们似乎很熟悉那个街区。枪击持续了大约30分钟。多位证人说，枪击就是为了散播恐怖气氛，挑衅者就是要把军队引到那个街区，好对军队展开伏击。

格奥尔基娜·伊阿尼奥斯·尼加玛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她家里人都说，那里各个族群都能和平相处，过着“正常”生活，他们都支持总统巴沙尔。他们为自己国家的教育体制自豪，希望军队能更好地保护他们。

阿拉伯媒体——冲突恶化的始作俑者

叙利亚通讯社社长阿德南·马哈茂德指出，这场战争背后，始终隐藏着国际媒体攻击叙利亚的政治计划：“它们是冲突中的重要角色。有些媒体就是在叙利亚国内作战的武装组织的伙伴，它们通常听命于这些组织。它们传播的消息污蔑政府，煽动仇恨，鼓励暴力和分裂，企图将话题引到种族和教派问题上。”

圣保罗社群的多个代表高兴地表示，幸运的是，有关霍姆斯死亡儿童的虚假信息还可以“澄清”。由此可见，人们怀疑武装组织和某些海湾国家媒体勾结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叙利亚政府才关闭了半岛

电视台、阿拉伯电视台和BBC世界新闻台驻叙利亚办事处，驱逐了这些机构的代表。西方电视台只能与在叙利亚秘密活动的独立记者，以及新闻真实性很少得到证实的“数字网络”平台进行合作。阿斯玛·卡夫塔罗坚持认为，半岛电视台的作用“非常负面”，“它只会用极端方式撒谎，导致局势直接恶化。媒体煽动仇恨和教派冲突的行为在霍姆斯大行其道。这座城市已经落入宗教冲突的陷阱。政府不应当为此负责，媒体和国际宗教人士的煽动造成了这种局面”。

卡塔尔电视台不停地煽动宗教冲突，宣传“巴沙尔·阿萨德不能代表穆斯林”。该电视台最暴力的煽动者之一是谢赫卡拉德哈维，曾主张发布宗教追杀令，暗杀穆阿迈尔·卡扎菲。

独立证据被毁

除了进行单方面的媒体引导外，阿拉伯和盎格鲁-撒克逊媒体还阻挠宣传和发表有关示威者暴行的证据和研究成果。如果这些媒体见到有人反映真实的局势，不顺着媒体的意思讲，它们就直接打断证人的话。最后，它们还通过媒体和网络，宣称所有与它们的报道内容不同的信息都不可信。

叙利亚发生流血事件时，阿涅斯嬷嬷认为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东方的事业协会”[10]希望听取她所属的族群对当地局势的看法。从发表第一篇文章起，她就受到激烈批评，首篇文章被认为是为叙利亚特别部门撰写的。她的首篇文章材料文献丰富（研究、解释、证据、论点齐全），描述了她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后来她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谈霍姆斯的瓦蒂塞耶尔街区发生的事情。自首篇文章发表以来，阿涅斯嬷嬷遭到了海湾国家媒体的激烈炮轰。很多媒体说，她的文章是叙利亚情报机构的“剪辑”之作，“这个所谓的嬷嬷根本不存在”。

后来，她接受了自称蒂埃里·梅桑的人的采访，此人长篇大论地引用她的话，但这也没有改善她受损的声誉。于是，阿涅斯嬷嬷决定组织一批天主教媒体赴叙利亚访问，好让它们对她描述的真实情况有一些实地体验。她动员了法国KTO电视台（一家天主教电视台）、比利时法语区电视台及电台、《自由比利时报》、《星期日报》、华盛顿集团研究院、比利时KTO电视台、意大利RAI2电视台、西班牙《世界报》，以及一些自由媒体和互联网网站等。这些媒体受她之邀访问了叙利亚。

阿涅斯嬷嬷带领代表团进入了霍姆斯的阿拉维派街区。他们没有看到和平示威，只看到安全部队被身份不明的挑衅者伏击，还收集到了被起义者施暴过的平民的证词。这些媒体害怕与“主流”决裂后受到批评，丝毫没有报道这些内容，更有甚者随波逐流，歪曲事实。参加了此次访问的英国独立电视台记者马克·德沙尔沃隆报道说，他看到在库萨伊村的肯基清真寺前广场上，示威人群达到1.5万人。事实上，该村只是位于大马士革和霍姆斯之间、距叙利亚与黎巴嫩边境几千米的一个小村子，他所说的那个广场只有12米长，根本不可能容纳那么多人！

“数字网络”的角色

除了电视媒体，“数字网络”在示威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可以在推特网站上找到50余个“叙利亚政党”的代表，但不能确定这些人的身份。起初，他们都是一些经常在黄昏时示威的人，示威人群一般为几十人或几百号人，他们有节奏地呼喊反政府口号，几分钟后就消失无踪（所谓的快闪族）。半岛电视台循环播放他们的录像，为的是让人相信叙利亚经常发生大规模民众示威。

美国“全球民间行动组织”（AVAAZ）[11]在叙利亚危机中扮演了特别角色。[12]该组织在阿拉伯国家的“革命”中曾投入大量精力。该组

织的创始人里肯·帕特尔（此人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成员）也亲口证明了这个非政府组织所采取的行动："'全球民间行动组织'处于支持阿拉伯世界民主化斗争的中心。利用成员们捐赠的150万美元，我们结束了叙利亚独裁者企图驱逐所有外国媒体所造成的黑暗局面。这些资金足以让我们对数目不小的公民记者进行培训，为他们配备高科技的调制解调器和卫星电话，给他们提供互联网链接。"

"全球民间行动组织"承认，在有关叙利亚危机的问题上，诸如BBC、CNN和半岛电视台等国际重要媒体，所播放的新闻中有30%来自该组织的"数字网络活动分子"。"在其他组织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的网络秘密地往叙利亚输送了100多万美元的稀缺物资。这些物资都是遭受猛烈攻击的民众们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我们还秘密安排了一些可能会受到折磨或杀害的斗士及其家庭穿越边境。我们的地点非常安全，可以秘密掩护几十名斗士免受叙利亚政府的搜捕。因此，我们的组织成为一个非常保险的庇护所，他们可以在那里发起行动。阿萨德政权对此非常不满，因此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才把我们组织内负责这一行动的人称为'最危险的人'。我们积极支持亲民主化运动的同时，还对美国政府持续施加国际压力，让他们将那些野蛮政权逼入困境：'全球民间行动组织'数百万成员的行动取得了胜利，欧盟对叙利亚实施了石油禁运，阿拉伯联盟也对叙利亚采取了制裁措施。"

2011年10月，"全球民间行动组织"依据虚构的或者说很难证实的反抗事件继续开展行动，[13]以下说法便是明证："叙利亚政权达到了一个新的残暴程度：它的敢死队利用救护车和医院，吸引受伤的示威者并将之杀死。俄罗斯作为叙利亚的关键盟友和武器提供者，本是可以阻止这种杀戮的。我们作为世界公民，要求你们使用所有和平的手段，要求叙利亚政权停止杀戮、迅速向民主过渡。我们要求加强国际制裁，让俄罗斯停止支持目前的叙利亚政权，停止为其提供杀伤性武器，因为这些武器被用来杀害和平示威者和人道主义工作者。"

叙利亚政权的笨拙回击

面对很大程度上的伪造信息，叙利亚政府未能及时做好应对信息战的准备，完全落后于形势。政府的反应显得既笨拙又不合时宜，最终只会加深人们对它的怀疑。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有时也会歪曲新闻。例如，2011年9月24日，法国大使及其护卫队在大马士革的巴伯沙里基受到攻击，当时他们刚刚结束与一位隶属希腊东正教的族长的会面后出门。叙利亚国家电视台的评论员却说，正是法国人的挑衅，才造成了“人群”对其投掷鸡蛋和石头。

叙利亚政府的宣传计划优先关注的是国内舆论，针对国际舆论的只占很少一部分。仅有的几次反击行动，由于准备不足、用词不佳或时机不好，导致几乎每次都使矛头转向了叙利亚政府自己。例如，2011年12月6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接受美国ABS新闻台采访时，把军队的责任和他作为总统的责任完全混为一谈，让人看到他在以下两方面都没能有效控制：首先是他的讲话，更令人遗憾的是他缺乏对危机的安全管理。

总统的媒体联络部门应当对叙利亚国家电视台的特别节目事先制订出计划，以便更好地解释总统真正要说什么，也要说明被全世界媒体转播的ABS新闻台为什么、又是怎样歪曲和大肆删减了他的讲话，导致他不为人所理解。此外，叙利亚政府的很多成员包括一些非常亲巴沙尔·阿萨德的人都承认：“我们不懂得沟通！”

冲突的国际层面

在西方世界看来，叙利亚政权一无是处。作为以色列的敌人，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的盟友，它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等组织。大部分人都认为它是美国宣称的“邪恶轴心”俱乐部里的一个强硬成员。

造成叙利亚负面国际形象的原因

与苏联的盟友关系是首要原因，可以回溯到冷战时期。与纳赛尔一样，哈菲兹·阿萨德选择了莫斯科。他之所以把叙利亚的利益与苏联等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捆绑在一起，是因为当时的国际背景：东西方对抗，国际关系紧张，以色列被视为“自由世界”在东方的桥头堡。叙利亚与西方的关系起起伏伏，甚至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过：“在中东，没有埃及我们就无法发动战争，没有叙利亚就无法缔造和平。”尽管哈菲兹·阿萨德预料到了冷战的结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再向美国做出保证，而且叙利亚在1991年时加入了打击伊拉克的国际联军，但叙利亚的形象一直与共产主义阵营联系在一起。

对黎巴嫩的干预是第二个原因，与黎巴嫩持续了15年左右的内战和地区冲突密切相关。在那段时间里，叙利亚成了地区战争的主要煽动者，与以色列和西方大国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人们经常会忘记一件事：叙利亚军队是在属于马龙派的黎巴嫩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以及基督徒阵营发出紧急请求的情况下，才在1976年春对黎巴嫩进行干预的，目的是挤压巴勒斯坦人的阵营。在叙黎联盟历经转变之后，大马士革才最终得以按自己的规则行事，在华盛顿和巴黎的积极支持下，建立了“叙利亚式的和平”。但不管怎么做，大马士革都受到谴责，说它利用黎巴嫩的派系分裂，要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建立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大叙利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极端组织得到了叙利亚安全部门的庇护并武装起来，导致叙利亚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对不了解“黎巴嫩战争”这段历史原因的一代，更确切地说那些支持黎巴嫩基督教组织的人来说，叙利亚应该为20世纪最惨烈的内战之一——黎巴嫩内战负主要责任。

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在贝鲁特被暗杀是第三个原因。2005年2月14日，谋杀发生后几分钟，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大使馆和媒体就开始

指责叙利亚及其领导人安排了此次袭击。几个月之后，国际调查小组公布的首份报告根据一些后来被确定是荒诞不经的证据，指责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以及叙利亚秘密部门是幕后凶手。后来发布的几份报告，立场游移不定，相继指责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但都说是叙利亚提供了渠道。为此，美国不断谴责叙利亚助长恐怖主义，导致美国驻伊拉克军队成为受害者。

总之，由于历史上与苏联结盟，又被牵涉到拉菲克·哈里里被杀事件中，再加上对黎巴嫩内战的干涉，叙利亚被列入“恐怖主义国家”，成为继“邪恶轴心”伊朗之后的第二大威胁。这就是布什两届总统任期内新保守主义分子进行的意识形态解读。

尽管执政风格有变，但美国民主党新政府并没有改变这种已占据上风的看法，也没有改变对中近东国家的战略优先目标。即使2008年春天大马士革举办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3月29日至30日），与法国达成和解，2008年7月13日巴沙尔·阿萨德被邀访问巴黎以建立地中海联盟，但叙利亚在美国的名单上仍是“恐怖主义国家”、伊朗的盟国。

伊朗和叙利亚的战略伙伴关系是第四个原因。自1980年以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成为该地区地缘政治中难以撼动的因素。伊朗继续将叙利亚作为后方基地和忠诚的盟友，扩大其在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的影响。叙利亚曾被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称为“什叶派新月带”，有利于伊朗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

伊朗与叙利亚之间的合作已经扩大到了军事、安全、经济和科技领域。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曾在2007年2月宣布，伊朗和叙利亚对彼此来讲都拥有一种“战略深度”。伊朗总统马哈茂德·内贾德也表示：“伊朗和叙利亚拥有共同的敌人，面对敌人的计划，我们必须进行完美的协调；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达到最大程度的深化，这一点是有可能做到的。”

除了叙利亚通过军事合作得到伊朗的打折军火以外，两国的经贸关系也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工业、农业、科研和能源方面。2010年，

伊朗对叙利亚的投资达到了30亿美元。德黑兰甚至建议大马士革使用伊朗在“民用”核能领域的知识。

最后，两国都公开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成为黎巴嫩这个政治-军事组织（真主党）获得武器的中转站。

美国中东政策的障碍

自第一次伊拉克战争（1990冬至1991年）和第二次伊拉克战争（2003年春天）以来，人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实施“大中东民主计划”，即摧毁那些对根据美国-以色列的利益来重塑中东的计划持敌意的政权。美国的这一政策也被称为“建设性不稳定”政策，主要建立在三个原则之上：第一，对低密度冲突进行管理；第二，促进这些国家政治和领土分裂；第三，推动族群主义（并非种族-教派清洗）。

美国的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曾担任以色列外长的奥代德·伊农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中东计划”的影响。奥代德·伊农的计划于1982年2月出台，详细列出了将整个中东分裂为尽可能最小的领土单位的地缘战略计划，换句话说，就是鼓吹摧毁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14]奥代德·伊农写道：“将黎巴嫩分裂为5个省，这将提前勾勒出整个阿拉伯世界，包括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上所有国家的未来命运。在黎巴嫩，这已成为事实。将叙利亚和伊拉克按照黎巴嫩模式分裂成以单一的种族和宗教为主体的省份，这是以色列在其领土东部的长期优先目标，短期目标则是解散这些国家的军队。叙利亚将根据族群被分裂为几个国家：该国东部将变成一个什叶派的阿拉维国家；阿勒颇地区变成一个逊尼派国家；大马士革将出现一个与其北部邻国对立的逊尼派国家；德鲁兹派也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它的领土也许可以延伸到戈兰高地这一块；无论如何，都要在豪兰山这一带和约旦北部建立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将保证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安全。从现在起，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达到的。”

将族群主义作为自己的工具，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建设性不稳定”政策中对该地区的目标国家制造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方式。在叙利亚，美国政府试图挑动政权更迭。正如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所长罗伯特·塞特洛夫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对阿萨德政权的生存不感兴趣。这是一个少数派政权，它的基础非常薄弱，仅仅建立在恐吓的基础上。该政权的根基动摇后，将很快产生裂缝，随后将引发地震”。[15]他认为，美国应当集中在三个优先目标上：第一，对叙利亚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种族”等方面的情况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第二，围绕民主、人权和法治国家等主题发动宣传战；第三，不要给叙利亚政权留下求助出路，除非巴沙尔·阿萨德准备在“和平倡议”的框架下向以色列投降，或者他将反以色列的组织全部驱逐出叙利亚领土，并公开宣布放弃暴力、“武装斗争或民族抵抗”。

2005年9月，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启动了“建设性不稳定”政策。当时，美国外交在其近东的几个优先目标上都取得了进展。

首先，对叙利亚持续施压，谴责它允许很多活跃在伊拉克的国际活动分子穿越其边境。谴责中还提到了黎巴嫩问题。尽管叙利亚承诺在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的问题上全力配合国际调查，但华盛顿仍然试图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这是以色列强烈要求的。

第二，试图说服国际社会应对伊朗核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予以谴责。随着在伊拉克陷入泥潭，美国新的优先目标不得不转向“遏制”伊朗的影响。此后，美国不断增加国际压力，要求伊朗放弃核计划，或者至少限制伊朗在自身核设施遭受打击时的反击能力。“遏制”计划要求必须制服叙利亚这个伊朗在中东的最后盟友，切断其与伊朗的联盟，并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随着美国撤出伊拉克和提前从阿富汗脱身，这一计划的后续执行似乎遇到了障碍。

因为叙利亚不接受“大中东”的建立，并且自两伊战争（1980—1988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局部战争）以来一直是伊朗的盟友。于是，叙利亚仍然被列为“恐怖主义国家”，成为美国打击伊朗的一个薄

弱环节。美国政府的多个负责人都曾宣称："如果叙利亚希望走出危机，它就必须谴责自己与伊朗的关系，谴责恐怖主义组织。"同时，削弱伊朗还可以让土耳其成为能够稳定以色列北部边界的地区大国。

叙利亚国内反对派的多个代表称："美国与土耳其制订一切计划，同时又与穆兄会合作，共同制订三方解决方案。这从2008年它们在伊斯坦布尔制定的协议中就可以看出来。"还应当指出，华盛顿历史上就对穆兄会提供支持。对美国来说，穆兄会是各工会、左翼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最好解毒剂，何况它还一直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支持西方大国。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约旦和各个石油王国，且不说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美国到处打穆兄会这张牌——自1945年2月13日罗斯福和阿卜杜勒·阿齐兹签订《昆西协议》起就一直如此。这个以沙特阿拉伯向美国出让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矿藏，来换取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王室进行军事和政治保护的协议，2005年又重新签订并延期60年。除了制造"阿拉伯街头"的震荡，美国还通过《昆西协议》，通过穆兄会的帮助，指导中近东国家的军队、政权和各"春天"的管理。

为了回报美国为其提供的援助和支持，"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多次重申，一旦获得政权，新政府将立即切断与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朗的联系，开启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但对穆兄会来说，民主与伊斯兰教的原则是相背离的。他们认为，促进民主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抛出的诱饵。其目的是欺骗西方，在卡塔尔的支持下推翻叙利亚政权。

叙利亚其他敌人的战略

叙利亚国家重建组织的主席洛阿伊·侯赛因认为，除了美国的战略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卡塔尔、土耳其和法国进行的可耻干涉"。奥马尔·乌西也批评外国干涉，特别是西方国家、以色列和土耳其。

在美国对叙利亚危机的管理中，海湾国家和欧盟明显是美国的左膀右臂。那些不反对叙利亚的国家（西班牙、意大利）都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根本不可能抵制欧盟路线的压力。这一路线是在北约和海湾国家协商下，在布鲁塞尔制定的。

卡塔尔，一直是美国的助手，是服务于美国战略（针对利比亚、叙利亚）的工具。该国非常富有，又因与美国结盟，拥有半岛电视台，所以地位尤为重要。奥马尔·乌西称："卡塔尔是一个年轻的人为制造的国家——人口只有约170万，且其中80%为移民。在那里，民主和人权根本不存在。现在它却来教训叙利亚这样一个拥有丰富文明和千年历史的国家。"卡塔尔的国家元首阿勒萨尼自称是"温和的萨拉菲主义者"，一直力图取代沙特阿拉伯在逊尼派的霸权。

沙特阿拉伯，需要安抚什叶派这个少数派，不愿出现在打击叙利亚的前排。它也害怕自己的国内发生叛乱。此外，在巴林发生动荡的背景下，利雅得也不能直接报复，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如此。但是，这个石油王国不会放弃间接指责大马士革这个"邪恶轴心"的薄弱环节的机会，在叙利亚边境地区支持制造混乱。

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叙利亚经过8个月的动荡之后，明显已经屈从于来自美国等的压力。东正教教长格雷高里奥三世指出："如果阿拉伯国家联盟为巴勒斯坦所做的能达到它为叙利亚民主化所做的十分之一，那巴勒斯坦可能更早立国。"一位驻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外交官解释说，"阿拉伯国家联盟就是一个围绕6个海湾国家组成的极不平衡的组织，这6个国家拥有石油、美元，对伊斯兰教进行最反动的解读"，"海湾国家试图收买其他国家，包括埃及和马格里布……正是这些北非国家首先遭到了阿拉伯'革命'的冲击"。自2011年1月阿拉伯"革命"以来，人们似乎见证了这些石油王国对"共和国"的报复。

土耳其，也是叙利亚危机中的主要角色。叙利亚国内反对派的多个负责人认为，"安卡拉希望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式，希望在美国帮助下土耳其模式能够在阿拉伯国家扎根"，"它需要削弱叙利亚和伊

朗，以便确立自己的地区强国地位”。土耳其目前还有些犹犹豫豫：它想在叙利亚的未来中扮演角色，但又害怕该国不稳定，因为它与叙利亚有800千米的边界线。土耳其人忧心忡忡且立场不定，因为他们了解叙利亚军队的力量，不太希望冒险。

此外，土耳其还与大马士革有贸易往来。叙利亚危机发生前，大约200家土耳其工厂设立在与叙利亚接壤的地区，为叙利亚国内市场提供产品。叙利亚还是土耳其对中东和海湾国家陆路出口的必要通道。这些事实说明了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立场不定、拖延时间的原因。安卡拉不会忽视库尔德人因素。奥马尔·乌西称：“土耳其正式向叙利亚当局表示，拒绝在土耳其领土上收留武装反抗分子，拒绝支持他们……但这都是假的！土耳其不可能在自己的边界地区建立缓冲区。一旦它这样做，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就会与（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联合起来打击伊斯坦布尔。那样安卡拉就有麻烦了。”奥马尔·乌西还说：“安卡拉应当为针对库尔德和其他民族的大屠杀负责。自1984年以来，土耳其杀害了5万库尔德人。它使用美国给的飞机轰炸民房，而且与以色列进行合作。”

对叙利亚的支持

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否决票，这对叙利亚来说是确定无疑的。在此次危机中，这两个国家一直都与大马士革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莫斯科希望推动对话解决争端，但是遭到“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拒绝。莫斯科曾多次提醒西方人，不要过于威胁叙利亚！莫斯科尽管认为暴力活动与叙利亚政权难以分开，但仍然在2011年底向叙利亚交付了首批可用于打击军舰的防御导弹，叙利亚将之部署在自己的海岸上，可以防止外国从海上进行军事干涉。叙利亚对俄罗斯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叙利亚拥有俄罗斯地中海舰队的主要停靠港。

伊朗，有些人认为有2000—3000名伊朗革命卫队士兵加入叙利亚维持秩序的警察军队。此消息至今也没有得到证实。叙利亚政权似乎不需要任何人帮助维持秩序。但伊朗也承认，叙利亚在面对任何形式的外国打击时“不会是一个人”。

经济制裁及其效果

东正教教长格雷高里奥三世认为：“挥动制裁大棒绝对会产生消极作用。”奥马尔·乌西也对制裁的重要性表示怀疑：“叙利亚每年生产300万吨小麦，只消费一半。叙利亚80%的食品能够自给自足，目前的食品储备足够使用2年。”

尽管叙利亚的农业不够现代化，水资源也不足，但农业劳动人口占全国劳动人口的35%，保障国内80%的食品能够自给自足。近些年政府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农作物灌溉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未来几年还会继续，农业产量将会增加。叙利亚提出了加强水果和温室蔬菜种植的计划，农产品包装业也在迅速发展。

在叙利亚，22家国有工厂几乎覆盖了奶产品、水果和蔬菜罐头、食用油、饼干、烟草等整个农产品领域。这些工厂都归农产品企业总署管理。叙利亚在诸如食糖、小麦、矿泉水等生活必需品领域进行国家供给。

危机前，土耳其对叙利亚的出口达到230万美元，而叙利亚对土耳其的出口仅有60万美元。因此，两国的贸易是极不平衡的。根据财政部门的消息：“逊尼派资产阶级对切断从土耳其的进口感到欣慰，因为进口导致叙利亚很大一部分企业停产。现在很多企业重新开始生产，以弥补缺口。”

国内大部分反对派代表不相信西方的禁运会长期实施下去。因为长此以往，叙利亚邻国失去的利益将比叙利亚失去的更多。土耳其的工业家早就心生不满，纷纷到埃尔多安面前抱怨。但是，对叙利亚普

通民众来说，经济制裁使得生活压力变得日益沉重：燃料价格不断上涨，经常出现断电，等等。制裁对叙利亚经济产生的初步影响已经显现：天然气价格攀升。多位金融分析家估计，通货膨胀可能接近20%（2011年12月），失业将打击到35%的劳动人口。旅游业已经崩溃，石油禁运将给叙利亚带来20亿美元的损失。

*

西方国家在叙利亚实行经济制裁或军事干预来施加压力，无非要迫使叙利亚实行“民主化”，在叙利亚复制西方国家的民主规则和市场经济原则。

而利用宗教这个极具国家和民族特性的因素来实施干涉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但正如我们在巴尔干《代顿协议》的执行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民主化”不仅会导致政治和领土的分裂，还可能引发新的种族清洗行为。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目前都已进入转型期，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即使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有共同点，但由于形势不同，结局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因此，由于具有特殊的历史、社会和宗教模式以及地区环境，叙利亚政权可能会坚持得更久。

“革命”在继续，但“革命”又各不相同……无论如何，从阿拉伯“革命”后的选举日程看，想要知道激进的伊斯兰主义会不会融入民主或后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化”浪潮之中，我们拭目以待。

萨伊达·本哈比莱斯、安妮-玛丽·利赞

里夏尔·拉贝维埃尔、埃里克·德纳塞

---

[1] 巴沙尔就任总统后，一方面继承其父亲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也开始改革：在政治上，释放政治犯，放松言论控制，打击贪腐行为，并禁止神化领导人；在经济上，推行九个五年计划，进行经济改革，提出了“改革、发展和现代化”的一揽子计划，吸引外资，改善民生。——译者注

[2] 2011年3月，叙利亚南部边境城市德拉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并造成人员伤亡，在叙境内引发连锁反应。巴沙尔因消极回应反对派的改革呼声而错失对话良机，导致对立情绪被充分激化，叙利亚危机由此爆发。

[3] 凯比尔河事件，发生在2007年5月20日，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法塔赫”组织出现后，黎巴嫩军队轰炸并打击了那里的营地。

[4] 叙利亚反政府军都以叙利亚与除土耳其外的其他国家的边境为据点，在那里对叙利亚政府军发起围攻。

[5] 伊玛目在伊斯兰教中本意是领拜人，负责带领穆斯林大众做礼拜，礼拜时所有参加者必须遵守伊玛目的领导，跟随其做礼拜。历史上，逊尼派内部有很多阿訇（教师）被称为伊玛目。

[6] 巴勒斯坦“伊斯兰法塔赫”组织的一个军事分支。本文认定该组织是萨拉菲主义组织。

[7] 2011年2月11日，巴林发生动乱，多达1万名抗议者走上街头。2月17日，抗议受到镇压。3月14日，在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支持下，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1500名军警进入巴林，帮助该国平息内乱。

[8] “挡风协会”是指替另外一个组织出面。——译者注

[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e_ROvqm_h4&list=UUPjO16xQiUI63LkoZPgLZQ&index=1&feature=plcp

[10] “东方的事业协会”，旨在帮助东方国家基督徒的人道主义组织，位于法国。

[11] “全球民间行动组织”，是一家位于美国的网络组织，2007年1月成立，关注人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腐败问题、贫困问题及地区冲突等。英国《卫报》称之为“全球最大、最强大的活动分子在线平台”。

[12] http://signal-monitoring.blogspot.com/2011/12/lorganisation-americaineavaaz-au-coeur.html/

[13] http://www.avaaz.org/fr/stop_the_horror_in_syria_fr/?fpbr,publié le 18 octobre 2011

[14] Oded Yinon:*Kivunium*,numéro 14,février 1982.Revue publiée par le Département de la propagande,Organisation sioniste mondiale,Jérusalem.Cet articleaétéenvoyéàla*Revued'étudespalestiniennes*par Israël Shahaketpublié dans le numéro 5,automne 1982.

[15] Robert Satloff,*Assess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f Constructive Instability*（*Part I*）:*Lebanon and Syria*,Washington,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15 mars 2005.

附件1
会见人员名单

·米歇尔·基洛，社会学家，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代表，国内反对派人士，大马士革圣保罗地区信仰天主教的希腊人社群的成员（12月4日，星期日）；

·洛阿伊·侯赛因，叙利亚国家重建组织的主席（12月5日，星期一，在其办公室）；

·法耶兹·塞拉赫，作家兼记者，属于公民社会的知识分子，2005年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创建者（12月5日）；

·格雷高里奥三世·拉哈姆，昂蒂奥什地区的东正教教长（12月5日，在其教堂区）；

·侯赛因·奥达特，作家兼记者，曾担任总理顾问14年（12月6日，星期二，在其办公室）；

·奥马尔·乌西，叙利亚库尔德人联合会的主席，曾担任厄恰兰地区的中东问题政治顾问15年，直到1999年被捕（12月6日）；

·阿涅斯·玛利亚姆·德拉库鲁瓦嬷嬷，黎巴嫩的法国籍修女，领导天主教希腊人族群在昂蒂奥什地区的“分部”，该组织位于圣雅克安德西斯修道院，距离大马士革90千米（12月6日）；

·哈桑·阿卜杜勒·阿基姆，律师，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的主要协调人（12月6日，在其办公室）；

·格奥尔基娜·伊阿尼奥斯·尼加玛（在霍姆斯被枪杀的男孩儿的母亲）及其家庭成员（12月7日，星期三）；

·阿斯玛·卡夫塔罗，逊尼派妇女组织（该组织为公民社会妇女协会）的领导人，叙利亚穆斯林妇女论坛的成员，社会团结活动国际论坛成员（12月8日，星期四，在其住所）；

·阿德南·马哈茂德，叙利亚通讯社社长（12月8日，在办公室）；

·加利卜·坎迪勒，黎巴嫩全国视听委员会成员（12月8日）。

此外，还有多位不希望被提及姓名的驻大马士革和驻巴黎的欧洲、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外交官，以及许多叙利亚危机中的活动分子和观察家。

附件2
部分历史参考资料

叙利亚最初的独立，就好像是一个历史误会。英国为了回报以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为首的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起义者（1916年），承诺支持他们建立一个王国，以大马士革为首都。1918年，阿拉伯军队进入大马士革，建立了费萨尔领导的王国。费萨尔是阿卜杜拉·伊本·侯赛因的兄弟、麦加的谢里夫之子，出身于伟大的哈希姆家族。

但这个王国转瞬即逝，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达成一致，要共同瓜分这个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赛克斯-皮科协定》结束了历史上的叙利亚，即大叙利亚，范围包括现在的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1920年7月，麦塞隆战役后，古罗将军率法国部队进入大马士革。巴黎开始对该国实行托管统治，将之称为“民族社会”。费萨尔流亡到伊拉克。

托管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叙利亚民族主义上升和反复出现打击法国人的叛乱。1940年6月，英国人和“自由法国”的军队控制了该国。1941年6—7月的叙利亚战役后，“自由法国”重新统治了叙利亚。叙利亚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要求法国人离开。1946年，叙利亚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该年就此成为叙利亚的独立元年。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叙利亚陆军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发动政变，于1949年3月结束了叙利亚的议会制度。安东·萨阿德由于支持复辟“大叙利亚”或“天然的叙利亚”、创立叙利亚民族社会党，不得不逃离黎巴嫩（在那里他被判处死刑）并到叙利亚避难，当时扎伊姆承诺给予其保护。但几个月之后，扎伊姆将萨阿德交给了黎巴嫩政府，萨阿德被枪

毙。在背叛别人之后，扎伊姆自己也成为政变的受害者。1949年8月，叙利亚民族社会党的成员萨米·辛纳维发动政变，逮捕了扎伊姆并处决了他。

第三次政变发生在1949年12月，由阿迪卜·施舍克里策动。1951年，他自称总统并解散了议会。美国和英国希望施舍克里参加巴格达协定。华盛顿希望他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定，因此为其提供了重要支持。作为回报，美国希望大马士革政府接收巴勒斯坦难民，将之视为全权的叙利亚公民。1952年，华盛顿建议为叙利亚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以便将50万巴勒斯坦难民安置在以农业为主的叙利亚平原地区。

阿克拉姆·胡拉尼领导的阿拉伯社会党和米歇尔·阿弗拉克领导的阿拉伯复兴运动党强烈反对这一建议，他们认为这是出卖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两党结成联盟，建立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于1952年试图推翻施舍克里。施舍克里不得不拒绝了与美国的协议，但他还是在1954年被推翻。在经过一段极不稳定的时期后，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和叙利亚联合，1958年2月1日，建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遭遇失败，马蒙·库兹巴里将军在1961年9月28日发动新的政变后，建立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但不稳定仍在继续。1963年3月8日发生了另一次政变，全国革命委员会上台，委员会主席为阿明·哈菲兹。该委员会是一个由军人和平民组成的集团，所有人都出自复兴社会党。

在几个月时间里，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发动了一次政变。叙利亚政府再次思考与伊拉克和埃及建立联盟关系。1963年4月17日，三国在开罗签署了一项协议，决定在9月进行公投。但这三国之间的分歧不断加剧，联盟计划被放弃。1964年5月，阿明·哈菲兹公布临时宪法，规定建立全国革命委员会。

1966年2月23日，同样出身于复兴社会党的萨拉赫·贾迪德领导的军人集团推翻了阿明·哈菲兹政府。新政权解散了全国革命委员会，废除宪法，驱逐了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创始人——米歇尔·阿弗拉

克、萨拉赫·丁·比塔尔和阿克拉姆·胡拉尼，放弃了泛阿拉伯主义部分理想，支持更以自我为中心的政策。当时，新政权将政党的路线确定为“修正”。1967年6月的战争否定了这一选择，同时也削弱了萨拉赫·贾迪德政府。

1970年11月13日，国防部长哈菲兹·阿萨德领导了一次新的政变，废黜了萨拉赫·贾迪德，通过“纠正运动”成了叙利亚的强势人物。一年后，他担任了叙利亚总统。

叙利亚：牌局内幕

有关叙利亚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经常有一些相互矛盾甚至虚假的消息传到欧洲。因此，人们很难了解叙利亚真正的局势。因此，我在此重申几个观点是很有意义的，有助于理解叙利亚危机的复杂性、根源和所涉及的重要问题。

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

正如叙利亚国家元首2011年6月26日在新政府就职仪式上所做演说中承认的那样：“我们正处在真正的战争状态！我们所有的政策和部门都应当为赢得这场战争服务！”尽管这个心声吐露得略迟，但还是非常重要，因为迄今为止，“战争”这个词都被小心翼翼地避开。叙利亚政权曾试图淡化危机局势，只使用“武装团伙”“恐怖分子”，或通过黎巴嫩、土耳其、约旦和伊拉克渗透到叙利亚的“基地组织圣战分子”等称呼。实际上，叙利亚的所有邻国都早已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这场战争！

长期以来，叙利亚政权都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曾以为自己能以最小的代价战胜这次武装反抗，直到最后才集中所有力量应对危机。最初，它高估了国内阵线的团结，以及西方、土耳其和海湾国家对武装反抗组织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的规模。它还试图避免再次出现1982年哈马城大清洗的局面，当时现任总统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在那里镇压了已持续4年之久的伊斯兰游击队的反抗。反政府武装由叙利亚穆兄会的武装分子“战斗先锋队”领导，战斗时炮火纷飞，血流成河，这也是叙利亚目前为止最后一次武装反抗。

镇压之前，穆兄会中的少数派、持不同政见者曾针对叙利亚政权发动了多次暗杀，杀害了很多亲政府的科研界、学界和军界人士，清除了阿勒颇大学军事学院的近百名学生（他们选择这些学生，主要依据是他们属于阿拉维派），这与今天的情况极为相似。当初数字革命还没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因此当时的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1982年冲突的最终结果是，哈马城的多个街区被摧毁，几千名投奔武装反抗组织的民众遭屠杀。此后，政府又开始镇压穆兄会，他们被追捕、监禁或流放、处决。后来，政府颁布了特别法令，对所有属于穆兄会的人处以重刑。紧接着，复兴党政府对穆兄会地下组织进行清洗，随后镇压左派工会组织和民主力量，因为他们要求得到更多自由，要求政府进行政治、社会和经济民主化改革。穆兄会的武装起义流产，却让他们受牵连并成为受害者。沉重的政治气氛笼罩了叙利亚，但这丝毫没有让美国、西方国家和海湾地区的王国感到难受，它们当时需要叙利亚。因为叙利亚可以让深受无休止内战之苦的黎巴嫩出现和平，也可以让那些选举出来的温顺的巴勒斯坦的各组织守好自己的规矩。

流产的改革尝试

随着2000年6月哈菲兹·阿萨德去世，其子巴沙尔·阿萨德继任总统——他得到了时任国防部长穆斯塔法·特拉斯（出生于霍姆斯的逊尼派，其子马尼夫参加了反政府武装）的直接支持，叙利亚政权继续进行遮遮掩掩的自由化，出现了短暂的“大马士革之春”。当时言论十分自由，建立了多个论坛，人们要求结束紧急状态，实行多党制，将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很多人权组织也谴责政府的安全部门。以安全部门和复兴党为代表的政权中很多重要人物认为，这些举动过分之极。他们成功地将当时还受其父设立的政权部门掣肘的年轻总统拉拢过去，终结了这场只持续了6个月的“春天”。

尽管2001年“春天”戛然而止，公民社会论坛的多名领导人遭到逮捕，尽管政府继续进行“温和的”（与以前相比）镇压，但应当承认，新的政治活力已经开启，新的政治氛围开始出现。当时，沉重的政治气氛已经消散，很多政治犯被释放，很多被流放的反对派人士经过谈判有条件地回国，其中包括穆兄会的原成员和亲伊拉克的叙利亚复兴党人，这种情况很常见，但名额有限，且必须获得安全部门的评估和准许。审判穆兄会人员的法律仍旧存在，但现实中并未使用。

受到“大马士革之春”教训的启发，或许由于过度谨慎，复兴党没有迅速实行政治开放，而是选择了“经济技术”的现代化。

为了证明自己有理由进行缓慢的政治改革，叙利亚政权还指出了所面对的地区挑战：以色列仍旧占领着部分叙利亚领土，巴勒斯坦的和平进程陷入僵局，伊拉克局势不稳，等等。特别是黎巴嫩问题：截至2005年，仍有一支几千人的叙利亚军队部署在黎巴嫩。因为自2000年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日内瓦的最后一次会晤失败以来，美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争取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包括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以色列与叙利亚、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冲突，而是让这些冲突的主角们自生自灭，这也是以色列乐于看到的。

国际影响与干涉

从2000年开始，很多地区性事件相继出现，推迟了叙利亚国内改革的进程。

2000年3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哈菲兹·阿萨德在日内瓦举行峰会，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因为他们的执政即将到期：克林顿第二任总统任期即将结束，哈菲兹·阿萨德则已经病入膏肓。日内瓦峰会日程包括叙利亚和以色列要在和平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缔结一份全面协议，以色列应将军队从1967年6月4日占领的叙利亚边界领土上撤

出。这份协议签署后，以色列还将与黎巴嫩签订类似的协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签订最终和平协议也将变得更为容易。但是以色列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拒绝完全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本来准备就不太充分的会面在经过两小时的空泛讨论之后，最终失败。2000年6月10日，哈菲兹·阿萨德因病去世，其子巴沙尔继承了叙利亚这份沉重的遗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色列的埃胡德·巴拉克政府错误地认为，叙利亚失去了抵抗以色列占据黎巴嫩南部这张王牌，单方面决定将其军队从黎巴嫩撤出，因为这支军队越来越多地受到叙利亚和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的猛烈攻击。但以色列撤出军队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黎巴嫩真主党从以色列的“溃败”中变得更强大了，叙利亚也是如此。以色列军队的撤出并未削弱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控制，反而大大促进了。此后，真主党的命运——成为黎巴嫩的国中之国，与叙利亚的命运变得不可分割。以色列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出军队[1]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况且它也未能与黎巴嫩政府签订单独的和平协议。

2000年，以色列仍对黎巴嫩和叙利亚持不妥协的立场，再加上由美国充当调停人的巴以戴维营谈判和塔巴谈判（埃及）遭遇失败，由此引发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出现了第二波起义浪潮。起义得到了叙利亚的支持，这极大地损害了被美国新保守派控制的小布什新政府的威信。就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两年后，美国及其盟友占领了伊拉克，给叙利亚政权造成巨大压力。尽管叙利亚政府承诺将参与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与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携手合作，尽管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的关系本就不佳，但叙利亚依然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

因此，巴格达政权刚刚垮台，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就前往大马士革，带去了最后通牒。他要求叙利亚总统做到如下几件事：停止支持那些打击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抵抗行动（有将近150万伊拉克人在叙利亚受到庇护）；遣返被指责在叙利亚领土上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巴勒斯坦组织；停止与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所有战略合作；叙利亚军队从黎巴嫩撤出；撤销化学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叙利亚必须做到所有

这一切，且得不到美国的任何回报，巴沙尔·阿萨德拒绝了这份最后通牒上的所有条款。于是，一场推翻叙利亚政权的全面战争（经济的、地下的，但也是政治的）就此展开，而且这一次美国得到了法国和沙特阿拉伯公开和一致支持。

2003年11月11日，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叙利亚责任义务法案》（又称《叙利亚责任与黎巴嫩主权恢复法案》），准许美国总统在做出决定后，公布针对叙利亚的制裁。制裁很快付诸实施。2004年9月2日，法国和美国联合提出倡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559号决议[2]，呼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政治独立，将所有外国军队从黎巴嫩领土上撤出，解散所有黎巴嫩和非黎巴嫩民兵并解除其武装，举行自由和公正的总统选举”，等等。实际上，该法案是为了阻挠时任黎巴嫩总统埃米尔·拉胡德连任而提出的，因为他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可靠盟友，而叙利亚感到在中东地区将面临一个不确定的困难局面，想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连任。

这些威胁没有吓退巴沙尔，他依然不屈服于美国、法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国，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依旧为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提供支持，坚持与伊朗的战略联盟关系。拉胡德再次当选总统，但他必须修改宪法。当时，黎巴嫩部长会议主席拉菲克·哈里里反对修宪，但最后不得不接受。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军队和安全部队大幅缩减，但最终还是部分保留了下来。

正在此时，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2005年2月4日，拉菲克·哈里里在贝鲁特遭遇自杀式袭击身亡。叙利亚及其盟友立即遭到谴责。部分黎巴嫩人及国际社会在媒体上连篇累牍地表示愤怒，在政治上表达不满。在谋杀发生几周后，叙利亚不得不将最后一批部队从黎巴嫩撤出。黎巴嫩政权内与叙利亚交好的重要人物也被驱逐或被逮捕。联合国安理会于2005年4月7日通过了第1595号决议，决定设立拉菲克·哈里里遇刺案调查委员会。叙利亚屈从了，而且从未打断该委员会的工作，甚至与该委员会进行了合作。但是，截至目前（2012年），该委

员会也没有拿出任何可以证明大马士革和黎巴嫩真主党参与谋杀的可靠证据。虽然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为审判哈里里的谋杀者而设立的特别法庭什么目的也没达到，但这却成了西方人悬在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谋杀之初就有人认为可能是“圣战分子”所为，但调查人员迄今都没有将调查指向西方和以色列的安全部门，或者“圣战分子”。为此，国际上很多法学家联合起来谴责调查委员会是西方的政治工具。

尽管2006年时的国际环境对叙利亚政权十分不利，使其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但它面对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的美国，依旧斗志昂扬、毫不屈服。就在此时，黎巴嫩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使局势朝着对叙利亚有利的方向发展。2006年7月12日上午，黎巴嫩真主党的一支突击队在黎以边界地区袭击了以色列巡逻队，8名以色列士兵被杀，2人被劫持。此次大胆行动是黎巴嫩真主党战略的一部分。自2000年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就试图以被俘的以色列士兵作为交换条件，逼迫以色列释放几十年来关押在其领土上的黎巴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俘虏（大约有1.1万人）。此次行动的另一个目的是，要让以色列结束自1967年以来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

类似行动过去曾多次发生，但都没有转化为全面战争。这一次，以色列军事指挥部门做出了别样的决定。埃胡德·奥尔默特政府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鼓励，希望与叙利亚和伊朗的盟友黎巴嫩真主党真正干一场，一劳永逸。一旦成功，黎巴嫩将永久成为西方及其盟友的囊中之物，叙利亚也很快会垮台，然后是伊朗，美国新保守派心目中的“大中东”将成为现实。正因此，以色列军队才会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胆行动做出异乎寻常的反应。

出乎所有人意料，尽管黎巴嫩的基础设施遭受了巨大损失，但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的支持下，成了此次小规模战争的胜利者。以色列的反击持续了34天，最后也未能达到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目的。此次战争让1200名黎巴嫩人付出了生命代价，主要是平民；以色列方面

有163人被杀，其中119人是士兵。以色列军队虽然号称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但也没能战胜黎巴嫩人的抵抗。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战略失败。对美国、法国以及其阿拉伯国家的代理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失败。相反，叙利亚和伊朗彩旗飘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此前一直处于守势，此战成就斐然，在庆祝“抵抗胜利”的演说中，他将曾预言叙利亚会失败的阿拉伯三驾马车——沙特阿拉伯国王、约旦国王和埃及穆巴拉克总统戏称为“半吊子”。自此，亲叙利亚的轴心国家和亲沙特阿拉伯的轴心国家之间的战争变成了全面战争。尽管在2008年至2011年出现了短暂停顿，因为当时叙利亚与法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后来又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实现了互访。但自那时起，西方动摇叙利亚稳定的计划已开始制订。

2008年12月27日，战争进入了新阶段：以色列军队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当时哈马斯得到了叙利亚的支持。此次军事行动尽管让巴勒斯坦人员损失惨重，但最终也没能让“哈马斯”跪地求饶。2009年1月18日战争结束，以色列军队士气削弱，名誉大减，没有达到自己最初的战斗目标。

国际开放的失败

通过叙利亚受到包围一事，人们可以看清楚，它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联盟关系，才导致自己受到攻击。美国及其盟友眼见大棒政策不成，开始尝试胡萝卜政策。打碎大马士革和德黑兰之间联盟的“诱惑者”的角色落在法国（和欧盟）、土耳其和卡塔尔头上。作为对法国“和解”政策的回报，叙利亚被要求融入全球化。对西方来说，这一策略比大棒政策有效得多了。叙利亚政权由此开始的转变，对其也是一个致命的战略失误。因为叙利亚社会最脆弱的阶层，特别是农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的自由化、解除与土耳其的关税壁垒、持续4年的严重干旱，让叙利亚城市周边的农民全部变成了“无产阶级”。正是这些经济条件变差的民众，最终变成了反抗“大军”。

应当承认，叙利亚政权本就是保守封闭的，再加上野蛮的经济自由化的愚弄，它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经济开放政策和政治上的困局，严重动摇了政权的社会基础，让大部分民众弃之而去，更何况经济开放还导致了腐败盛行。而只要能够保持社会稳定，满足最低的生活需求（住房、购买力、健康体系等），叙利亚民众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专制。

此外，叙利亚安全部门自闭又傲慢，对危机的管理不善。

遭受长达一年半的反抗的打击之后，叙利亚政权经过长时间犹豫不决，最终决定恢复过去的政策，结束野蛮的新自由主义，同时将所有军事力量和安全力量都投入到应对反抗的斗争之中。人们可以从2012年6月26日叙利亚新政府成立后的首次正式会议上，巴沙尔·阿萨德对政府部长的电视讲话中解读出来：进行打击武装反抗及其外国支持的全面战争；展开打击自由化规则的全面战争，因为正是这些规则导致农民和“流氓”无产阶级参加了反抗；至于基本的改革，可以留待和平重建后再进行。

叙利亚冲突中不可告人的目的

叙利亚冲突中，西方的目标主要是地区性的：粉碎叙利亚与伊朗的联盟，让叙利亚与以色列签署打了折扣的和平协议，摧毁叙利亚的民族国家基础，使之面对瓦哈比主义者和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打击。这就意味着叙利亚将被分裂成几个部分，各部分之间处在战争状态，这样在未来几十年，西方便可以长期扎根于中东地区。

西方的另外一个主要赌注是海湾地区的那些石油王国。尽管自身也因受到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反抗运动的冲击，以及伊拉克战争意外变化（伊拉克摆脱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但变成了伊朗的保护国）的影响，而变得十分脆弱，但它们还是试图通过让反对瓦哈比主义、亲俄的叙利亚政权垮台，将叙利亚变成其重新征服伊拉克、让伊朗局势变

得更动荡的后方基地。特别是，它们试图将黎巴嫩真主党铲除掉。这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至今还没有达到。

卡塔尔和沙特在叙利亚危机中扮演的主要角色

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石油王国在叙利亚危机中完全自行其是，这纯粹是幻想。它们很大程度上依附美国，美国保证它们的安全，但要求它们在地缘政治和能源问题上俯首帖耳。从目前它们与伊朗交手的问题上就可以看清这一点。这两个王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另外四个成员国——阿联酋、科威特、巴林和阿曼，都认为必须打倒伊朗政权。这些国家根据美国和以色列的日程行事，主要还是追随美国。宣称伊朗存在威胁，就能让美国在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变得不可或缺，并能长期维持。美国就此可以不断增加军事基地。不弄明白这一点，就不可能明白卡塔尔为什么会对“叙利亚朋友”、叙利亚与伊朗的联盟如此大张旗鼓地进行攻击。

以前，这些海湾的酋长国准许外国在其领土上设立基地，但外国必须提供铺设石油管道的费用。可如今，这些酋长国竟然还要负担基地的费用。事实上，这些海湾国家自身的结构已变得异常脆弱。为了保证自己政权的生存，它们认为必须让邻国变得脆弱。为此，它们参加了摧毁伊拉克、削弱埃及的行动，而今它们又不懈地打击伊朗及其盟友。它们不但服从西方和以色列的军事战略，而且服从西方的能源战略。

这些石油王国是怎么做的呢?

在有关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问题上，它们执行美国的命令。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们与国际能源署进行政策协调后发起价格战，而国际能源署的首要政策目标是要摧毁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诸如阿尔及利亚、伊拉克、伊朗、尼日利亚、委内瑞拉、俄罗斯这样既桀骜不驯又重视主权的国家。1973年以后，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威胁要（对

西方）动用石油武器，之后他竟遭到暗杀！此次事件后，这些王国才温顺起来。挑起价格战的目的是对上述国家进行经济劫掠。

卡塔尔通过进攻性的天然气政策，努力完成这一任务。由于拥有特别有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和一支极为现代化的船队，这个天然气酋长国试图在欧洲市场上打击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在亚洲市场上挤压伊朗。但当时要实现这一计划还存在一个问题，即修建一条途经叙利亚的天然气管道，而大马士革作为莫斯科和德黑兰的盟友必然会拒绝，也许这可以部分说明卡塔尔为什么会对叙利亚反戈一击。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也是这两个瓦哈比主义王国的共同目标：将叙利亚瓦哈比化，削弱叙利亚，继续追随美国的战略。而美国的战略一向就是在世界上支持所谓政治伊斯兰，反对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派别。

叙利亚国内局势的特殊性

叙利亚危机中的教派分歧和社会困境

叙利亚与黎巴嫩、伊拉克一样，是由多个宗教派别组成的。将各个教派凝聚在一起的是他们同是阿拉伯人。叙利亚90%的民众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复兴党与其他所有的纳赛尔主义、阿拉伯联合主义或叙利亚民族主义，甚至所谓的进步主义的政党一样，希望自己能反映现实。叙利亚打算将所有宗教社群都联合在一个世俗的阿拉伯国家之内，能够超越教派和种族对抗。这一计划是将伊斯兰作为凝聚国家的阿拉伯民族特性的核心，它是基本的，但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确实，逊尼派穆斯林在叙利亚占大多数（65%），但缺少对抗意识，而且他们都是苏菲派，害怕瓦哈比派掌权[3]，因为一旦瓦哈比派掌握了叙利亚政权，他们就会反过来消灭苏菲派。这些属于苏菲派的逊尼派穆斯林与属于少数派的阿拉维派、基督教徒、德鲁兹派、伊斯玛依派

一起，构成了叙利亚人口的绝大多数。叙利亚民众或者是出于信仰的原因，或者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或者仅仅是因为拒绝西方、土耳其或海湾石油国家等外国势力的干涉，都愿意支持本国政府。正因此，叙利亚政权才能继续在舆论中得到支持。叙利亚唯一不属于阿拉伯人的就是库尔德人（占人口总数的10%），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支持叙利亚政权。他们厌恶土耳其，因此才会对叙利亚政权持批评性支持态度，更何况反抗开始后的几个月，叙利亚政权就同意给无国籍的库尔德人叙利亚国籍。

人们误以为叙利亚政权是一个阿拉维派的政权，也许是历史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目前叙利亚军队和安全部门中有很多官员都是阿拉维派人士，人们认为这与阿拉维派在人口上占少数不成比例。实际上，城市中富裕阶层（多为逊尼派）的子女不喜欢进入这两个机构，反而成了农民和少数派人家的子女提高社会层次的最快手段。另外一个原因是，现今的总统本人就出自阿拉维派，很多高级军官也属于阿拉维派。

此外，叙利亚的分歧主要是社会及经济层面的，国家主要经济领导人大都是城市中的富裕阶层。正如叙利亚反对派人士海赛姆·曼纳所强调的那样，国家的500名经济决策者或商界人士中，勉强算来也就15人来自阿拉维派。

叙利亚当前的分裂还表现在地域上——农村与城市之间、农民与城市从事商业的小资产阶级之间，而且政府实行过度的自由化政策，导致分裂加深。但实行经济自由化是欧盟提出的“和解”条件，它要求叙利亚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和提高经济效率。

叙利亚反对派的不同派别

正如2012年7月在阿拉伯国家联盟、联合国和西方国家主导下，为将叙利亚反对派团结在一起而举行的开罗会议所揭示的那样，叙利亚

反对派没能克服分歧。

在叙利亚境内从事游击战的武装组织——大部分都是伊斯兰分子，全然拒绝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被边缘化。他们甚至谴责聚集在开罗的反对派是“反革命的阴谋家”。我们应当看到，反对复兴党政权的主要力量是穆兄会。正是这个反对派接受了来自国外的主要资金、武器和“圣战分子”。即使在被国外称为追求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反对派中，穆兄会也无处不在、决定一切，只是小心翼翼地将那些强调自己是自由派的、世俗的或者民主的人推到前台而已。

反对派之间的分裂对叙利亚政权有利。反对派中有些人支持武装反抗组织，有些人呼吁北约进行干预，还有些人寻求进行民主改革。他们之间的鸿沟是难以跨越的。

在叙利亚国内，叙利亚“自由军”拒绝对政权进行任何妥协，一条道走到黑，最终导致了自身的分裂。“叙利亚革命总委员会”由国内反对派组成，它们拒绝外国干涉，也属于单独的一部分。该委员会于2011年8月成立，确定的目标是使在叙利亚国内活跃着的各反对派之间的联系“更紧密”，而这是徒劳的。至于“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它是反对派的对外窗口，也是西方和海湾石油王国的棋子，被穆兄会控制，而且本身无论在内部还是对外都存在分歧。

此外还有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和“支持世俗化和民主力量联盟”。与在叙利亚国土上影响不断扩大的“圣战”组织相比，这些组织无足轻重。但“圣战”组织内部也没有协调一致的战略。

危机出现向地区和国际上蔓延的危险

目前，尽管某些亲沙特阿拉伯或亲卡塔尔势力，确实在利用黎巴嫩作为动摇大马士革政权的工具，但只要叙利亚政权及其黎巴嫩盟友（黎巴嫩真主党和绝大多数基督徒）认为自身没有受到威胁，就没人

愿意在黎巴嫩重燃战火。叙利亚的确需要保持黎巴嫩的稳定，将之作为自己的后勤和财政基地，以便绕过西方制裁。而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却在试图对黎巴嫩火上浇油，以便对叙利亚保持压力。它们利用黎巴嫩作为向叙利亚国内反政府组织少量输送人员、武器和资金的通道。这是一把双刃剑，具有双重危险：如果叙利亚及其盟友获胜，西方和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将被彻底根除，而且黎巴嫩将彻底倒向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轴心。无论是出现混乱局面还是亲伊朗轴心取得胜利，对以色列来说将是灾难性的。为此，美国才不得不要求自己在黎巴嫩、海湾国家和土耳其的代理人，不要过多地将叙利亚引向这种不可控制的方向。对西方来说，最好的方案是阻止火上浇油，不要让这些阵营中的任何一个占上风，这也就相当于长期让叙利亚处于软弱无力的局面。

一些观察家还提到，围绕叙利亚危机出现了新的东西方对抗。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和南北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继巴尔干战争、利比亚战争之后，叙利亚危机最终结束了西方在国际关系中实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宣布了多极化世界的到来。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出现导致世界体系出现了重大变革。西方刚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会推动新的战争出现。

一架土耳其军机在叙利亚领空被摧毁，曾让北约内的好战分子苦思良久。土耳其尽管最后做出了一些姿态，但最终也未向北约提出干预要求，因为它知道自己会面对来自叙利亚的报复。此外，伊朗、伊拉克和俄罗斯也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干预。因此，该地区也就不会发生东西方的对抗。但围绕北约的反导系统，围绕叙利亚和伊朗问题，围绕瓦哈比派的扩张，还是会出现新的角力。

叙利亚危机的出路在哪里?

大胆预测叙利亚未来的变化，将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与其他国家发生的那些已持续16个月之久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事件相比，叙利亚政权还在坚持着，甚至还能组织陆路、空中以及海上的军事演习。军队、安全部门、政府以及外交团体中没有出现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崩溃性事件。它与俄罗斯、中国、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也没有出现裂缝。而伊拉克甚至出乎所有人意料，进口叙利亚产品，让西方针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无从谈起。

叙利亚政权中的某些极端人士认为，军事和安全选择是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唯一办法，这纯粹是幻想。与此同时，反叙利亚阵营里的极端分子也在努力运作使巴沙尔下台，摧毁叙利亚当前的安全和军事机构，而不再要求开展建设性对话，因为对话将导向建立一个过渡政府，让叙利亚免遭内战。开展建设性对话——安南计划，俄罗斯、中国，以及阿尔及利亚等一些明智的阿拉伯国家所提倡的，除了这一可以让叙利亚人重新找到团结、民主和稳定的道路的过渡计划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救得了叙利亚。

但是，我怀疑西方国家及其在阿拉伯国家的代理人不会支持这样一个计划，尽管它们表面上曾经在日内瓦对此表示赞同。今后，叙利亚危机的出路再也不能由叙利亚人独自决定，它掌握在俄罗斯和西方的手中。

今天，叙利亚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叙利亚人将为此付出代价，这是他们之大不幸。

马耶德·尼赫梅

---

[1] 以色列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出军队并不是完全撤出，因为以色列还占领着部分领土，辩称那里虽位于黎巴嫩，但实际上属于叙利亚。

[2]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559号决议的15票中，9票支持，6票弃权，其中阿尔及利亚、巴西、中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认为该决议干涉了黎巴嫩内政。

[3] 穆斯林分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90%属于逊尼派，10%属于什叶派。苏菲派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中都有，各国穆斯林中都有。瓦哈比派是逊尼派支

派，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激进主义，为沙特阿拉伯国教。

巴林：改革以保持平衡

本文是自巴林发生动摇政局的事件以来，我在多次访问巴林，在巴林当地和法国与多人会见、访谈的基础上写就的。有许多因素吸引着我产生兴趣：巴林周围都是酋长国，但它却多次重申自己仍将继续作为一个王国而存在。这吸引了我这个比利时王国的女公民，因为我了解“团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但更重要的是，我要会见的巴林人口少数派，他们害怕王国解体，害怕解体后会不可避免地增加人口多数派的权利，而这个国家的人口多数派对人口少数派所持的敌意全世界无人不知。我的这种感情在法国是不可能被理解的，但那些讲法语的比利时人，特别是出身于瓦隆大区的人，他们能够非常准确地理解我要说什么：我们知道自己的人口居于少数，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弗拉芒集团”（迅速壮大）而无力制止[1]。占比利时人口多数的弗拉芒人急于让我们变穷，急于摆脱我们，他们使用种族主义的歧视性的言辞，言之凿凿地说，由于历史原因，在以前的几个世纪里，属于人口多数的弗拉芒人的权利被剥夺……他们对我们的报复50年来一直在持续，只在战后的一小段时间里，或者在弗拉芒人加入日耳曼人的事业时（或者说与纳粹德国直接合作时期），才被短暂地打断过。而那也让他们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但此后他们的报复无以复加，所依仗的无非那些准备随时背叛并充当弗拉芒新领导人仆人的瓦隆人。因此，我们与巴林人有很多共同点。这比我们都是弹丸小国更为重要。

这些开场白必须写出来，以便让读者将巴林问题置于全面分析的背景之下。这不是我们常在法语媒体上听到的“什叶派多数反对逊尼派少数”这个简单口号所能概括的问题。在此还要加上一句话，阿拉伯

的“春天”已经四处碰壁，而且并不为时过早，我们甚至认为是为时过晚。我们在分析巴林的局势时，不能不提的是，“春天”这个词已经让地中海北岸的很多评论员和分析家变得盲目和过分浪漫。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春天”，也不是一个希望增加所有人权利的运动，只是一个被有组织的集团利用的事件而已。那些外部的社交网站正好利用巴林国内的气氛来创造对自己有利的结果，以便攫取政权为己所用。

地理因素比历史原因更重要

我们可以从历史角度去理解和分析巴林，但更要通过其边界、地理位置等决定性因素去理解和分析它。因为正是这些因素让这个小小的王国成了沙特阿拉伯的邻国，并完全黏合在一起。巴林的预算中，有70%是由阿布·萨法油田提供的，而这个油田是它的逊尼派大邻居（指沙特阿拉伯）于1996年转让给阿勒哈利法家族的，直到1999年，国王哈马德才开始执政。

作为一个非常特别的由很多大小不一的小岛组成的群岛之国，巴林首先是一个渔业王国，它拥有石油生产能力也是最近的事，而且这一能力与它的邻国相比非常有限。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商业、朝圣、安全等等，很多种族和宗教社群移居至此，巴林成为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国家。大多数居民实际上不是巴林人，确切地说是宗教和种族各异的外地人。

巴林是苏美尔人文明的范例，尽管迄今的考古发现尚未让其文明的丰富性完全展现出来，但足以让人们知道，巴林是海湾地区人类生活最古老也是最早开展贸易的地区之一，其历史远早于伊斯兰。在对麦纳麦旧城进行改造时，人们发现，在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印刷、最早的日报出现等），巴林已经在开展经济活动。巴林人应当为此感到自豪。

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巴林共有1 234 571居民，这本该是一个很好管理的国家。但没有任何一项人口普查可以确定各宗教派别的具体人数，因此难以分清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数量。巴林人口的组成，特别是什叶派与逊尼派的人口数量，都与巴林的边界分割密切相关。巴林将沙特阿拉伯什叶派中的一大部分人口都涵盖进来，因此什叶派才成了这个小国人口的多数派。（什叶派在沙特阿拉伯属于少数派。）

巴林人口的宗教派别远非什叶派和逊尼派那么简单，因为正如其所有邻国一样，天主教和佛教人口——主要是从事家政工作的移民，具有与逊尼派一样的分量。201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非巴林人即非穆斯林人口有366 513人，因此巴林拥有19座正式注册的教堂和多座不同社群修建的寺庙，其中包括印度人和锡克人的寺庙。这也反映出巴林是一个好客之国、对外交流开放之国，对新来的人极为随和，政治上和社会上都是如此。所有信仰在此处都可被提及，而且政府也一向自由接收其他社群，接受他们的墓地，接受那些与教堂有联系的社会团体以及他们的洗礼风俗等。

巴林人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方言，拥有多种多样的文化。阿拉伯语是巴林的国语，英语为商业用语。尽管亲法国的人热情很高，中学引进了法语，但法语并不流行。

身为岛国，巴林首要考虑的目标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水和电力的储备。2012年4月30日，巴林建设了一个核电站，可以满足所有人口的电力需求。该电站有巴林的投资，也有外国特别是法国（苏伊士集团和农业信贷银行）、英国、韩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投资。

巴林对欧洲的重要性

巴林常被称为“中东的瑞士”，它既有伊斯兰国家的金融资本，也有来自世界各大银行的国际资本。因此，巴林也受到当前金融危机牵连，当然这也与欧盟加强自身政策的协调性相关。欧盟打算在地中

海，甚至海湾地区实施一项特别政策的努力已经付诸东流[2]，但这让巴林与法国建立了更友好的关系，成为巴林传统上与英国紧密双边关系的补充。

实际上，巴林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石油资源有限。多年来，它一直在与欧洲对话，对欧洲的能源多样化技术很感兴趣。对欧洲来说，巴林有几个优势，可以成为欧洲在中东的政治“桥梁”。在海湾所有酋长国中，它是唯一表现出有意改革社会的国家，并愿意考虑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提高劳动者地位。巴林女性在公共生活中拥有一定的地位。自1924年以来，巴林女性就拥有投票权。很多女性成为经济部门的管理人员。巴林总理手下还有一个特别部门，专门为提高巴林青年企业家的能力服务，不管其是男性还是女性。2011年底，我参加了“巴林女企业家创业博览会”，必须承认，我被深深震撼。无论是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女性高涨的热情，还是巴林第一夫人的支持等方面都是如此。不管是逊尼派、什叶派、犹太人、佛教徒还是基督徒，她们都拥有要取得成功的共同愿望。

最近的选举表明，女性代表来自国家的所有社群——什叶派、逊尼派、犹太人和基督教等，她们都有能力提出建议，无论是在巴林的公共生活中、传媒中还是在政治生活中，女性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与海湾地区其他酋长国内妇女遭受歧视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也使巴林和欧洲之间产生了亲近感。

2012年3月，巴林两院的女议员代表团去欧洲访问，引起强烈关注，这使巴林新当选的议员和欧洲的布鲁塞尔、巴黎、柏林和海牙等的女议员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2012年3月12日，她们参加了在法国国民议会举行的有关讨论提高（巴林）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法律的见面会。此法律意在让所有什叶派和逊尼派女性在家庭中都拥有自己的权利。但是，这一法律遭到巴林国内什叶派教士的拒绝，他们试图纠集什叶派的女性反对这一立法，让这项立法只停留在日常生活层面，而不是成为法律文件。

在此还应提到，巴林驻法国大使做出了很多努力，以使两国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定，让法国的居斯塔夫·鲁西学院治疗癌症的模式成为海湾国家的范本，加强麦纳麦医院与法国之间的合作。

巴林的这些现代化因素可以成为其发展积极的国际关系的基础，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些明显的事实：该国的逊尼派教士大男子主义很强，而什叶派女性中又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拥有的权利，基督教大多数女性从事着低等的工作，没有行动自由。尽管如此，巴林第一夫人还是在2008年成功组织了一个有关波斯湾国家人口走私问题的研讨会，这在该地区不啻是一场革命。此次会议让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内政部长不得不公开讨论这一在其国内被深深掩盖的问题，因为人口走私侵犯了所有人的权利，无论男女。

2011年的事件

先是突尼斯，然后是埃及：这些“革命”样板真是太好了。2011年2月至3月，巴林的几千名什叶派人士走上街头要求改革。什么样的改革呢？在巴林，就是要限制逊尼派皇室的作用，结束对什叶派的歧视。对此次游行，政府毫不犹豫地动用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军事力量，进行了严厉的镇压，而且媒体大肆渲染。沙特阿拉伯为巴林军队提供了支持，派兵支持这个小小邻国。这些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军队”主要用来保卫巴林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石油设施，这本来就是海湾合作委员会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此处还应提到的是，美国部署在麦纳麦的第五舰队也出现了，以避免局面失控。

全世界突然发现，在三周半的时间里，珍珠广场上聚满了示威的人群。很多人被捕，35人死亡，镇压变成了国际丑闻。医生和辅助医护人员，由于救助什叶派的受害者，也成了镇压目标。在此，我应当详细说明这件事，因为它很快出现在各大国际媒体，成为政府进行严厉镇压的证明。实际上，什叶派医生支持珍珠广场上的示威人群，这

与其职业的中立性和巴林种族法中的有些部分是不相容的，尽管职业和法律都一直允许他们救治伤者，即使其属于另外一个族群。在医院里，他们对珍珠广场上的示威表达支持，这让非什叶派的巴林人感到害怕。《巴西乌尼报告》指出，医院接待的病人急剧减少，那段时期只有平时接收量的50%，而且非急性手术减少了30%。

珍珠广场上的示威者坚持说巴林存在经济歧视，要求政治自由化，但所有观察家都认为这只是什叶派的说法。珍珠广场被各什叶派社群分成小块儿，示威人群来自该国各个什叶派村庄，仅有的一个什叶派清真寺也被通知到了。从示威一开始，女性和男性就被分隔开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要接受其他族群，尽管他们可能同样要求政府进行自由化。珍珠广场立即被装点起来，以便各国际电视台拍摄，但示威的象征符号主要是什叶派的。示威者要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公开批评阿勒哈利法家族，同时也反对那些加入巴林国籍的移民，还有外国人。两周之后，他们的口号变了，不再要求结束王国统治，而是要求重新分配巴林财富。对王储的指责减少，王储的形象开始变得正面。

逊尼派认为，此次事件的什叶派领导人和组织者所要的并不是欧洲人所认为的那种改革，即增加所有巴林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想要的只是推翻政权、改换政体。他们拒绝全国对话即是明证。实际上，他们对巴林这个国家不感兴趣，想要的只是让多数派掌权，从此可以自由地行使权力。这让我联想到比利时近年来所经历的事情。

当然，发起这些怀有敌意的示威行动的准备阶段，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2011年2月14日之前的几个星期，巴林的多个政党都对反对派，其中主要是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政党“瓦法克全国伊斯兰社会”的垄断舆论表示不满。该党只关注什叶派的利益，忘记了或者是忽视了应该提出能够让其他集团受益的改革。这也是该党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尽管它得到了国际传媒的支持。这些传媒在2011年底时，就将巴

林的“革命”视为“阿拉伯之春”的新例证，根本不顾巴林的“革命”与北非的“革命”的不同。

此处还应提到外部势力对巴林示威者的支持。位于伦敦的“支持巴林建立共和国联盟”组织要求巴林废除王国体制，这一口号在巴林曾流行了两天。3月11日，立场最激进的示威者决定徒步朝阿勒哈利法家族所在的里法街区进发，举行和平示威，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3月13日，他们对正在举行考试的大学发动攻击，破坏公共设施，导致大学关闭。这不仅干扰了大学生，还干扰了其他人员，但没有造成明显的政治损失。

在零星的示威背景下，拒绝开展全国对话

巴林事件中应当重申的是，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事件和动乱没有让巴林政府中的任何人感到吃惊：巴林王储萨勒曼王子从突尼斯事件一开始，也就是在麦纳麦局势混乱之前，就建议开展全国性对话，但这一建议遭到了示威运动领导人什叶派组织者的拒绝。《巴西乌尼报告》发表之后，各什叶派政党继续拒绝对话，根本无视全国对话委员会及其所做的努力。

但应当强调，有一些勇敢的什叶派人士没有追随，因而被自己社群不容。他们都受到了粗暴的排挤，迪拉兹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接受了《巴西乌尼报告》全国跟踪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尽管因为“与敌人合作”遭到排挤，得不到什叶派社群的支持，但他仍在努力，争取让什叶派社群在国家管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就足以证明，示威反抗的真正目标并不在此。

但国际传媒不愿意正视事实，它们不惜一切代价要做的就是将巴林列入“阿拉伯之春”的行列，丝毫不考虑巴林局势有多么不同。它们对那些证明该事件开始即意味着失败的信息充耳不闻。

2012年3月，巴林国王重申自己愿意继续进行开放性对话。他坚持认为，国家的不稳定是经济不安全导致的，不管他们信仰何种宗教，社会不稳定对所有人都不利。2012年这一年还有零零星星的反抗出现，但规模已大大缩小：包括夜里有人向麦纳麦的主干道上扔燃烧弹，这是我亲眼所见，但这没产生任何影响，只是导致短时间的交通瘫痪；在4月22日麦纳麦举办F1方程式大赛时，还有人放火烧汽车轮胎，以此证明反对派的存在，但这也没有影响大赛举行；此外，纪念2011年动乱一周年时，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冲突。什叶派似乎已经厌倦了自己的极端行为，不再希望采取大规模的过分行动："瓦法克"这个什叶派大党也难以控制巴林反抗活动仍然活跃的局面。

2012年4月9日，巴林安全部队的一队巡逻兵在埃卡村口遭到袭击，7名巡逻兵受伤。很明显，此次行动是当地人所为，而且方式很简单，但这也证明反抗活动在这一地区还会零星发生，而且十分活跃。

全国跟踪委员会和改革进程

2011年2月至3月的动乱之后，哈马德国王马上对反对派拒绝全国对话的局面进行了评估，建立了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他给委员会确定的任务是，要对巴林发生的动乱做出明确分析并提出补救建议。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巴西乌尼先生，此人是一位国际法专家。《巴西乌尼报告》分析了困难局面出现的原因：民主进程停止，警察行为失当、实施酷刑，等等。

报告一出，哈马德国王就发表了一篇文章给予积极回应。他接受了报告得出的最终结论，承诺实施报告提出的建议。为此，他在2011年11月26日设立了全国跟踪委员会。该委员会于2012年3月20日提交了第一份报告。国王再次详细地、积极地给予了回应，表示希望避免恶性事件再次发生，愿意为此开展必要的变革。他提到了安全、司法、教育方式、信息改革、恢复被解雇人员的工作等问题，决定实施"补偿和敏感行动计划"，以便实现全国和解。

巴林两院也通过了一项有关言论自由和禁止酷刑的法律，尽管这项法律在欧洲人看来还远远不够，但它足以推动在警察部门实行真正的改革。为了避免司法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国王建议成立为示威反抗事件的受害者进行补偿的专门法庭，并重申公民社会，包括各协会及非政府组织都应为促进社会恢复平静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巴西乌尼报告》中，最棘手的问题显然是安全问题和维护安全的方式问题。这些是受到强烈批评的问题，大多数西方分析家和外交官都承认这一点，人们认为警察的方式过于粗暴。警察部队从动乱一开始，就使用了一些会导致死亡的手段，致使示威者反击，引起恶性循环，镇压变得更激烈。这正是反抗的组织者所期望的，因为镇压会让他们此后的激进行动合法化，夯实他们的活动基础。这个陷阱针对的就是巴林当局。截至目前，尽管反抗事件已持续一年，政府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巴西乌尼报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措施。首先是选择外国专家来训练负责维护秩序的警察部队。最终选出的专家是苏格兰警场的前警长。他的任务是，告诫各相关部队的负责人，在示威组织者希望问题升级且确实出现升级危险的时候，必须学会保持冷静，教会他们使用那些足以吓退示威人群而又不会造成人员伤亡的技术。简言之，就是学会使用欧洲人维持秩序时所用的最基本手段。催泪弹就是这样的技术之一，它应当作为最后的手段，但在巴林，警察通常从冲突一开始就动用这个手段。对巴林来说，采购催泪弹所用的催泪毒气也是一个问题，由于巴林本国并不生产，因此巴林很容易成为催泪毒气出口国敲诈的目标。

第二个建议是巴林的安全部队和维持秩序的警察部队招收什叶派人士，什叶派至今没有获得这些岗位的权利。这种大讨论对比利时人来说很容易理解，因为比利时在培训卢旺达、布隆迪、刚果等非洲国家部队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利时人记得，无论是在警察还是在军队中，瓦隆人和弗拉芒人之间发生过巨大摩擦，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出

生地和所讲的语言不同。相比本国的什叶派士兵，巴林当局更容易信任招募的巴基斯坦或也门的逊尼派士兵。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一成不变。招募什叶派士兵时，可以进行忠诚测试，这将成为改革成功的基础，也表明两个族群之间完全可以建立信任。

《巴西乌尼报告》中提到了很多确保安全的措施。但人们对这些措施的反应多种多样，特别是在逊尼派支持者中，反应非常强烈。这丝毫不令人吃惊，因为巴林目前的局势极为脆弱，沙特阿拉伯这个大邻居对巴林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安全问题提供保护，都要收取现金。因此，尽管巴林内政部争论很激烈，最终还是决定按照“欧洲式”的方法来培训士兵，而且未来还将继续这样做。政府还将招募几千名当地士兵，也就是说在什叶派地区招募什叶派士兵来对什叶派表达信任，但这不是一年就可以完成的。

恢复被解雇者的工作也是这份报告中的一个重要建议，但这不能独立于司法改革进程之外。目前，恢复工作正在缓缓启动，因为牵涉到的大部分是医护人员。但这些人显然认为，这个过程过于缓慢。

那么，在开展了并不完美的全国对话，《巴西乌尼报告》又提出多项建议之后，巴林对宪法进行了哪些主要修改呢？

加强议会的权力，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权增强，但不能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宪法修改后，议会将拥有更多咨询权，内阁人选必须事先经过议会同意；

（选举的）议会可以拒绝政府提出的规划，可以收回对政府部长的信任；

与国王钦点的议会（舒拉）不同，（选举的）议会将拥有特别的权力：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拥有最终投票决定权；

议会的立法权力增加，政府部长必须接受议会质询；

设立议员大会，自主确定日程；

简化立法程序和法律执行的审查程序。

此处，我们还要对上述措施做出简单说明。在巴林的议会体制中，基本的民主进程是多么落伍，议会的职能与国家的日常事务管理之间的协调关系是多么缺失，因此上述改革才受到了热烈欢迎，而且未来还将继续更深入的改革，加强议会的作用。

在司法改革方面，巴林与其他国家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因为该部门十分保守，所以巴林人都不愿表态。巴林政府曾多次重申司法独立，司法事务不容干涉的原则，同时强调必须保证司法公正。由于在2012年9月4日的一次审判中，法庭的量刑过重，导致国际社会对巴林的负面评论增多。实际上在北约很多国家，对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的量刑都很重，巴林并没有过错。于是，巴林检察机关指出，负面评论的背后有阴谋。

因此，巴林的政治平衡者必须拥有两方面的能力，既要成为沙特阿拉伯的对话伙伴（在沙特阿拉伯的纳杰夫王子去世之后，要根据利雅得的新王储人选进行政策调整），也要成为温和的什叶派的对话伙伴，因为温和的什叶派首先认为自己是巴林人。目前要做的是，既要与什叶派族群保持团结，又要谨慎地反对那些反抗示威行动的组织者。

邻居伊朗

人们会真的以为，自2011年2月以来巴林发生的政治动荡与伊朗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吗？那些示威游行、要求增加什叶派权利的运动不是德黑兰领导的吗？

当然，巴林的什叶派负责人坚持说自己的诉求都是“独立的”。有些人甚至告诉我们，他们也支持沙特阿拉伯对巴林的独特作用。但在这些平静的说法背后，如何解释在伊朗核危机最紧张的那段时期，巴

林国内发出针对欧洲的宣传呢？如何评价巴林与位于波斯湾对岸的伊朗毛拉政权的关系呢？

2012年3月，到访巴黎的巴林议员在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进行讨论时，才发现伊朗操纵什叶派族群特别是什叶派妇女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例如，伊朗怂恿她们反对一项适用于两个族群的家庭法。议员们还明确指出，2011年巴林发生的事情与“阿拉伯之春”没有多大联系，只是伊朗的一次投机行动，试图从“阿拉伯之春”混乱的国际背景下获益。

伊朗在海湾地区的目标不仅仅是巴林。2012年4月，伊朗总统穆罕默德·内贾德访问阿布穆萨岛时发布的言论，曾让所有酋长国感到激愤不已，此后它们就团结起来保护自己，以免受这个什叶派大邻居的威胁。海湾合作委员会当时重申，伊朗占领的海湾三岛必须纳入和平谈判日程，要么是直接谈判解决，要么是通过国际法庭解决，这样就可以避免伊朗进行挑衅。

巴林认为，伊朗干涉其内政始于1979年，那是在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之后。在此不可能一一列举所有可以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我只列举最近发生的。沙特阿拉伯和巴林建立联合体的倡议提出之后，两个阵营都发表了负面声明，这为伊朗提供了机会。伊朗两家电视台不断播放节目，旨在围绕建立联合体的问题，在巴林什叶派民众间煽动敌对情绪。它们成功了，此后巴林的示威游行重新开始，这证明伊朗电视台在巴林国内的影响确实存在。2011年2月，巴林政府要求伊朗停播这些节目，但伊朗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及其领导人并未同意。2012年6月1日后节目中断。这表明，巴林对信息是有限制的。

沙特阿拉伯和巴林建立联合体的计划由来已久，直到2012年5月才被列入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日程。建立联合体可以加强两国的盟友关系，但也使巴林这个中东最小的国家对沙特阿拉伯这个中东最大的国家的依赖关系变得不可逆转。这也将使伊朗控制巴林、操纵巴林什叶派民众的所有希望落空。

2012年5月15日，伊朗重申“巴林是伊朗的一个省”。伊朗的舒拉议会指出，巴林国内的抗议行动表明，巴林人愿意重新归入伊朗。面对这种威胁，巴林理所当然得到了海湾合作委员会、阿拉伯议会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它们全部动员起来支持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的一体化计划。

媒体上最近出现的一次轩然大波，涉及麦纳麦法院2012年9月4日的审判。该法院提供的证据表明，13名犯罪嫌疑人与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与国际上为伊朗服务的组织都有联系和接触。

在欧洲议会上，福特雷领导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人权”也提交了一份报告，没有得出伊朗情报部门煽动巴林2011年和2012年反抗示威的结论，认为巴林当局应当优先关注自己国内的诉求，满足了这些诉求，也就能平息与什叶派的潜在冲突，因为这些什叶派非常尊敬阿里，尊重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未来仍将自己定义为巴林人而非伊朗人。

但对伊朗来说，巴林目前的局势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德黑兰巴不得抓住这个机会。伊朗要是不建立一个特别部门、激活在英国也许还有法国的网络来运作这件事，那会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的国际影响实在是太好了，某种程度上是阿拉伯的“春天”赐予的。我知道这种混乱局面会让德黑兰私下偷着乐。

*

巴林正在寻找自己的平衡。逊尼派不会任由别人剥夺其权力，但他们也确实准备与巴林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的代表分享决策权、共同进行日常社会的管理。巴林目前正处在变革之中，可能会重新制订一个能让所有人都热情洋溢的“全面计划”。但这首先要求各伙伴停止相互惧怕。

有两个关键因素可以让巴林实现复兴：尊重社会规则——这是国际劳工组织承认的，以及承认女性在巴林社会、在所有族群中的地

位。

欧洲应当停止等待，停止漠不关心，停止提出可能会给予伊斯兰教士更多权力的改革，因为这些教士的唯一目标就是限制社会自由。为此，必须保护女性的权利，因为这是巴林社会发展的一项指标，巴林实际上站在了起点上，而且做得十分出色。在阿拉伯国家出现反抗活动两年之后，欧洲应当睁大眼睛，对美国人抱有希望可能是徒劳的，因为美国社会至今都没有处理好自己国内的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巴林政府指定了一位女性担任公关事务部长，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因为她了解在欧洲和美国都非常活跃的网络，而且懂得根据情况采取行动。她所缺乏的是执行现有政策所需要的行动手段。

巴林的平衡人物应该是这样的：他既能让沙特阿拉伯这个大邻居在安全方面和在他本人真正掌权方面放心，同时又能在什叶派族群内建立信任。他可以做出一些姿态，争取什叶派中的温和派，即那些首先认为自己是巴林人，其次才是什叶派的人，对其表示信任，让其参与对话，保证其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种寻求平衡的努力永远没有止境。在这方面，比利时是一个可以用来对比的好例子。现在，有多少弗拉芒人会回答说自己首先是比利时人，然后才是弗拉芒人？人数不多，因为通过50年的逐步征服，弗拉芒人一直处在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因此，对巴林那些要寻求平衡的人来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

应当看到，欧洲和美国在认识阿拉伯世界时存在一种简单化倾向。因此，寻求平衡还应当包括一个重要方面，即在国际上进行充分解释，以便不会陷入目前局势被简单化解读的局面。当人们简单地认为阿拉伯世界发生的动荡全是正面的，并冠以“春天”这个名号的时候，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正截然相反。

我还特别赞成巴林新政府重振与法国的关系，这需要巴林人做出与萨科齐政府发展关系时不同的选择，制订新的优先目标。很多东西实际上都已就位：在健康卫生领域，两国已有联系；女性在这个小小王国中具有显著地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要求提高社会标准。以上是重振巴林与法国关系的三个支柱，这将使巴林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银行业的神话（这是它的一些邻国赋予它的形象）。

我还希望我的这些经验能够对巴林有用。与巴林一样，几十年来比利时一直分裂为两个族群（一个族群在文化上占少数，但人口占多数；另一个族群是人口占少数，依赖拥有同样宗教信仰的大邻国），但两个族群能够共处。我希望巴林能够充分运用好“族群平衡学”，找到共同分享经济增长、尊重每个社会组成部分的道路。

安妮-玛丽·利赞

---

[1] 比利时分为弗拉芒大区、布鲁塞尔大区和瓦隆大区，弗拉芒大区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一直要求独立，最主要的独立组织为弗拉芒集团，现名弗拉芒利益党。

[2] 此处可能指“地中海联盟”的失败。——译者注

第二部分

外国参与者的主要角色



美国、石油君主国和阿拉伯“革命”

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发生“革命”后，各类文章和政治报告此起彼伏，它们认为一些保守的宗教党派和领导团体将会在选举中获胜。事实上，这些国家离解决政治危机的道路渐行渐远，并将成为席卷阿拉伯社会的更严重危机的先兆。2010年12月至今，相关报告相继出台，就一些事件对政府性质、政策及其垮台等问题提出质疑，认为这一危机并非始于本·阿里、穆巴拉克和卡扎菲政权的覆灭，而是在此之前。伊斯兰主义政党或团体取得政权，并在那些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日程中放置宗教议题，是这些国家发生如此严重的深层次政治危机的一大重要因素。

这场危机的形式多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与西方整体上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发生变化。法国和美国在这个复杂地区的危机中所采取的政策均受到质疑。长期以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这些庇护国一直都试图确立一个行动准则，以应对该地区在多米诺骨牌倒塌后对西方表现出来的敌意。自伊朗政权倒台，该地区政治舞台上冒出众多要求将伊斯兰政治化，宣扬不仅要与西方国家决裂，更要与目前实行的继承自去殖民地化的政治模式决裂的政党与集团。这可能是分析家们最关心的问题。

1979年以来，庇护国（尤其是美国）希望应对的问题：基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如何在这一区域与时俱进，推动转型，挑起改革甚至革命？这些老问题引出了一些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行动和战略计划，包括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和奥巴马著名的开罗演讲中提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计划，尽管后者更为低调，但两者同样具有预见性。30多年来，美国在这一与自身差异巨大的战略区域确立行动

模式的过程中，遭遇了缺乏理解、缺乏协调和硬套逻辑三大问题。美国最近遮遮掩掩地对阿拉伯“革命2.0”进行资助就属于这个行动的一部分，与其为东方“颜色革命”提供援助和军事上支持反卡斯特罗主义没什么不同。

无法理解的游戏

“革命2.0”的操作模式暴露出美国对阿拉伯世界所展现出的活力的不协调与不理解。其间有一些理由，本文将讨论主要的两个。

首先，2010年至今的阿拉伯“革命”清楚说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不但与过分强调各国之间的共同点的陈词滥调相去甚远，还表现出一些强烈的差异性：去殖民化后沿袭的国家结构不同；具有差异性的宗教关系；妇女社会地位有别；规范体制带来的活力不一；阿拉伯国家与欧洲国家的特殊关系，双方在政体上虽差异明显，但基于该地区的宗教摇篮地位，欧洲国家在文化上将马什里克[1]认定为双方政治联系的起源。

阿拉伯世界的错综复杂和去中心化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其采取的操作模式的研究，这种模式就是在政治领域运用特别的宗教手段，将宗教手段作为这一政治区域变革的出口。因此，2002年以来美国在与区域内各国民间社会展开的对话中给予了伊斯兰分子过多空间。这种“排他性的会谈”在突尼斯等国适得其反——在此之前，伊斯兰主义政治势力在选举中仅是少数派。（2011年10月突尼斯大选中，不到20%的选民支持伊斯兰主义政治势力。）

其次，华盛顿角色转换失策，误将自己对阿拉伯“革命”的管理和资助等方面的主导权，转给了诸如卡塔尔之类的海湾小国，让它们约束和引导那些反抗者，不是建立民主制度，而是建立具有宗教色彩的强人政权，以此保持国家秩序，但同时这些政权要在更广泛的战略框架内对华盛顿保持最低限度的忠顺。美国的目标是自己不走到前台，但

要阻止“革命”蔓延到海湾地区。这一方针显示出华盛顿对中东、北非地区的复杂局势的极度无知，甚至对那些海湾地区的小王国也缺乏认识——它们对绕开美国的政策有着丰富经验，尽管美国不断对其做出承诺，对确定其内政外交走向举足轻重。

然而，伊斯兰世界的历史适应于后殖民时代的一个核心要素被忽视了。这种忽视影响了2001年以来，一些美国智库和非政府组织领导阿拉伯地区政治变革的努力，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危机几乎演变成“独立闹剧”。各国都抛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本国发展的参照模式；二是如何制定本国发展政策。除经济参照模式之外（因为无论选择何种模式均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国家一旦获得独立，政治参照模式的选择也受到强大反对派的质疑。他们一部分人坚持要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要建立一种与伊斯兰教联系紧密的政体，甚至是哈里发模式。

当然，那些海湾产油国的经济与政治间、宗教与政治间的关系最为缓和。理由有二：一是，它们依靠石油收益的分配保持高消费水平，建立起令各方均感到“舒适”的经济，能将抗议消于无形；二是，它们采用更为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并为此耗资不菲。这些国家在公共服务、公共交通等部门严格执行男女分离，这与坚持拒绝妇女工作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海湾产油国一直保持本地男性的高工资。还有一些材料忽视了突尼斯在2011年10月23日的大选后，也有很多人要坚决执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

以上形势反映了当前阿拉伯这个复杂地区盛行的逻辑，以及该地区的活力、沉重的发展趋势同华盛顿计划间的矛盾。其中，卡塔尔作为美国的助手管理阿拉伯“革命”，以便建立起能让华盛顿和海湾王国同时接受的政权，后者特别害怕“革命”普遍发生。

宏大计划和假设游戏

一些记者和观察家通过观察和研究仓促得出结论，认为阿拉伯地区各国的宗教党派已转向民主政治，但事实恰恰相反：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上台；前“阿富汗人”贝勒哈吉掌管利比亚；穆尔西在埃及胜选。这只是这些国家未来将发生危机的可见一面，将之称为“阿拉伯之春”是不合适的，有争议的。其愚蠢之处在于它与当地历史没有任何关联，也与当前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格格不入。

这也表明，一些宗教党派重掌权力的背后，并不只是简单的政权更迭和民主转型，还是在美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重新洗牌。

本文希望探讨突尼斯、叙利亚等国在后“革命”时代政治转型所需的条件。美国在“9·11”事件后旋即出台的新型操作模式，直接服从于从马格里布到马什里克所发生的地缘政治大洗牌这个日程。美国重新规划阿拉伯世界的计划蓄谋已久，深刻影响着其通过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控制对活动分子的培训、利用和“推出”等进程。时机一到，这些活动分子就会像“橙色革命”中所发生的那样，成为一个新的媒体与政治结合的阶层，这对控制那些“自发”的抗议极为重要。

当然，美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均否认在2010年、2011年及此后的阿拉伯“革命”期间曾进行具体干预或指导。但从各种指标、传记等材料及传媒政治集团的行动中，均能隐约发现三国的大集团、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媒体等留下的痕迹。美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均或多或少地对其援助对象进行了支援，甚至是控制。有三个论据：一是基于政治逻辑学，即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间、阿拉伯世界和美国间具有双重关系；二是基于美国对后“革命”时代的阿拉伯世界的关键性假设，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分割线的方式将对这一复杂区域的认识“正常化”和统一化；三是找到一种控制“革命”的操作模式，并对在后“革命”时代作为“经营者”的三国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其他政治角色进行检查清理。第三个论据或有片面，但足以证明美国确实参与了对“反抗者”实施控制的准备工作，甚至协助海湾国家的保守势力牢牢掌控这些人，保证“革命”不会火上浇油，损害政权的稳定。

无论是在各个利益集团势力范围的划分方面，还是在如何看待世界方面，阿拉伯世界都面临重新规划。这一“伟大蓝图”在穆巴拉克倒台，以及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公开干预叙利亚内战后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在马什里克地区，博弈点是要厘清各个前殖民地在20世纪初因领土被不幸瓜分所遗留的边界线，以及各个种族与宗教群体间的分界线这两者复杂交织的情况；而在马格里布地区，则是要对世界观、政治关系地图与国家、规则及法制原则的关系等被统称为“心理地图”的一切重新进行规划。

事实上，对这两个地区同时进行“重绘”活动的背后，显示出偿清两个遗产，即在马什里克的法、英遗产和在马格里布的欧洲遗产的意愿，尤其特殊的是法式的国家和行政管理模式。后一种情况甚至关乎一种“国家”概念，而这种“国家”概念是被法国移植到马格里布中部国家的：该地区依然坚持后殖民时代的那种公民政府，将国家法律作为权力之本。但现在它既已被打败，又被列入将要被摧毁的名单上。建立公民政府是法国以及欧洲欲在这里实施的政治计划的核心，却被海湾王国视为一种政治恐怖和错误的普遍主义，因为它将直接拷问海湾王国当前权力的运用以及权力与法律、权力与石油红利分配的关系，甚至会威胁君主制度的合法性。

在突尼斯“革命”中，示威者宣称其斗争是为建立公民政府和真正的分权制度，是为反腐和确立政教分离。同样的诉求在埃及、巴林和也门也被明确提出。但这些诉求不但没被倾听，还被海湾的独裁政权诋毁和暗中破坏。起初斗争的核心是采取和平方式，这使示威者的行动在与本·阿里和穆巴拉克政权的较量中显得正义、合理。而海湾王国利用当时的政治真空和开放式的大辩论来支持宗教政党，派它们去攻击在孕育中的新国家政体，直至最终摧毁或者至少攫取它，但不会让斗争波及自身。穆巴拉克一倒台，海湾王国就将这些新国家政体掌握在自己手里，在美国的支持下，抵制埃及这一阿拉伯世界唯一的民主化尝试，并以大量资金扶植宗教政党，阻止民主之火蔓延至海湾君主制国家。换言之，压制阿拉伯世界民主化思想才是“华盛顿-多哈-利雅得

三角”的实质目的。除了宗教政党重掌权力的突变性，我们还须探讨更多内情，因为媒体民主化增强的背后，是“华盛顿-多哈-利雅得三角”遏制欧洲及其他在欧洲周边地区具有传统影响力的角色。

每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独裁和腐败国家，在后“革命”阶段都伴随着为之计划好的各种倡议，助力民主化及国家稳定的大量援助，特别是突尼斯和埃及。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注意如下两点。一是从援助数额上看，美欧等“革命”的幕后发起者所赞助的金额，远低于其为柏林墙倒塌后东欧国家民主改革的资金投入，更是远低于其为前南斯拉夫联邦成员国的投入，让人感到其金额太少，雄心实在有限。究其原因，美欧的经济颓势极大地影响了其在演变进程中的投入水平。然而，悖论很快出现了——一些以厌恶和反对民主著称、维护君主专制的国家，却主动直接或间接地为这种演变提供资金支持。始作俑者便是卡塔尔。该国对突尼斯2011年10月23日的选举极为明确而大方地施加了影响。若没有多哈的资金支持，加之沙特阿拉伯对其提供的支持有限，突尼斯复兴运动党不可能引领选战。这种昂贵的选战有时俨然变成了财力比拼。

据此我们做出第一个假设，即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行为远非在得到美国允许的情况下行事。两国长期配合支持欧洲的一些阿拉伯或马格里布少数派，不仅助其进入东道国的政治体制，还将其打造成“替换大军”，一旦该国变天，就将其投入到被“华盛顿-多哈-利雅得三角”控制的内阁、政党或者意识形态之中。

因此，通过对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智库以及国际媒体，尤其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行动进行社会学梳理、分析，可以发现其已占据制高点，深刻介入到后“革命”时代一些阿拉伯国家新政府的人事选择中。在突尼斯，一些首席政治代理人、内阁成员的人选和任命，在选举前乃至在阿拉伯“革命”之前就已完成。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应看到卡塔尔的作用，它被允许调查与其美国保护伞站在对立面的国家的独立自主程度。例如在2011年10月23日选举中，上台的突尼斯复兴运动党领衔的新政府，是卡塔尔的战略伙伴。而相比美国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

变革中的动作，其在突尼斯的介入程度确实相对较弱。但卡塔尔的介入表明它们之间存在协调和任务分工，至少在为突尼斯复兴运动党提供资金支持方面确实如此。该党长期以来得到美国的支持，这在后文我们对美国智库和非政府组织行动的描述中得到证明。上述一切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假设，可以说它们全程支持甚至遥控了阿拉伯“革命”。

二是“革命”仅涉足了那些在宪法上自称是“共和国”的国家，而对各君主国只造成轻微影响（这无疑印证了第一个假设）。这就是摩洛哥的暴动很快就被扑灭，且自称为“阿拉伯革命频道”的半岛电视台未对该事件进行铺天盖地报道的原因。巴林的情况就让人更为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对变革的构建还是支持，该国都被区别对待。巴林“革命”被沙特阿拉伯军队的流血军事干预阻止，且这并未激起美国的抗议。因为巴林的“革命”“事出有因”：一是邻近伊朗；二是德黑兰和利雅得间的敌对关系；三是境内什叶派少数派在邻国的影响力。

然而，我们注意到利比亚的情况分外引人注目，因为自此作为阿拉伯国家间关系的指导原则——不侵犯他国边界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将不再被尊重。该原则在叙利亚内战中也不会被尊重，这样就创造了一个先例，会产生严重后果。这一构建阿拉伯国家间关系的原则今后只会被某些王国视为合作原则，用于保持其专制制度、保证互不干预。海湾君主国青睐于稳固那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方面，给予目标国人民大笔捐助；另一方面，建立每个人都不再遮遮掩掩的紧密政治联盟——一个共同的情报系统。在伊斯兰合作组织（OCI）峰会期间，沙特阿拉伯国王就重申“永忠君王”的原则。

上述观察让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若这些变革进程以及华盛顿与伊斯兰主义运动间的联系早有预谋，那么有一点将是毋庸置疑的，即变革期间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以及海湾产油国干预目标国对政治解决的抉择，是在美国这一保护伞下进行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长期以来与美国进行联系的人数量众多，尤其是2002年以来，有一帮人特别是突尼斯人经常承担双重任

务：一方面经常光顾美国智库与设立在海湾国家或其附庸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另一方面又是突尼斯复兴运动党的活跃分子或同情者，与被流放到卡塔尔的该党领导机构保持联系。这也证实了美、卡两国和在突尼斯掌权的复兴运动党之间紧密沟通的桥梁是存在的。对海湾地区那些心怀忧虑的阿拉伯-波斯湾国家[2]而言，支持伊斯兰主义政党是对其伤害最小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们上台既不会使民主在阿拉伯世界扎根，也不会发生和平夺权，更不会发生变革甚至制度更迭。

在以社会学方式对前“革命”和后“革命”阶段各参与角色进行标记之前，我们要做第三个假设，即从2010年末到2012年秋的反抗阶段过后，恢复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性和活力是必要的。

“阿拉伯之春”这一表达是不恰当的甚至冒险的，尤其相较其欧洲先例更是模糊的。此外，阿拉伯世界在此期间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也凸显了其在变革中展现出的极端混杂性和差异性。因此，以突尼斯为代表的马格里布地区，关键在于围绕一个良治、反腐和重建政府的框架谋划重建工作。至于国家实体的未来走向，没有人提出质疑，它也不在那些迫使本·阿里出逃并推翻其政权的人的斗争日程上。选举中获得多数的党派——突尼斯复兴运动党的政治日程却并非如此。在这一阶段，突尼斯复兴运动党的一个潜在目标是，在突尼斯的宪法框架和清洗政坛的意愿下，重组突尼斯政体，使人逐渐接受如“伟大的奥斯曼大臣”海雷丁·帕夏那改革时代的新政。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保守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突尼斯复兴运动党似乎也想清偿后独立时代的遗产，当时特别设立了人权法和众多的规章条例。在某些伊斯兰分子眼中，这些都是有罪的，都是照搬照抄法国机构的，甚至直接来自殖民监护者的授意。

这种适应突尼斯国情的原动力在利比亚变革的中心层面并未被发现，在叙利亚或也门也很少。马什里克“革命”期间，不仅涉及国家政体的重建，还有国家实体长久的完整性，因为其所有的构成单位（如省、邦等）均被卷入。在叙利亚，宗教和世俗团体的共存问题似乎因

内战而重回桌面，以致出现了两难局面：到底是要按照旧计划重新划分领土还是促进强力自治，或让那些因势力范围划分而支离破碎的地区重新合并。对照叙利亚变革，马什里克中部地区显示出走向深度改组的趋势。受伊拉克形势影响，人们正在推动宗教或文化语言的多数同政治多数间的一致性。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干预加速了这一趋势。在叙利亚危机中，两大瓦哈比教派王国正跃跃欲试，要将对利比亚的干预模式和人道主义手段运用于大马士革。它们的目标绝不是建立多元民主体制，也不是创建现代化的或多宗教并存的国家，其目标是重绘马什里克中部地区内的政治地图，截断从伊朗到黎巴嫩真主党等什叶派控制的区域。最吸引卡塔尔这个小酋长国的，还有其内心对于油气的考虑，即在没有大国强力控制的情况下建设输油管线。

控制“革命2.0”的小推手和大赢家

正在发生的变革并非仅遵从“革命者”对民主化的渴望，对第一批反独裁人士而言，还遵从两个特殊的外在逻辑。

在本·阿里下台的次日，恐惧在阿拉伯当权者中蔓延开来。本·阿里逃离之日，正值阿盟会议召开，时任阿盟秘书长穆萨明确道出其同僚的恐惧之处：针对阿拉伯国家独裁政体的政治改革将被普遍推行。穆萨还宣称，“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应由阿拉伯人自己来解决”，即是宣布在这场变革游戏中出现的强力教父型人物将是合法有效的。问题是如何控制一场没有领导人、没有框架的“自发革命”进程。故这一过程中所谓的主角、教父，其实就是美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三国组成的干预者，其采用特别合作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发力。正是它们让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进程胎死腹中。

第一招是大量资金的自动流水作业，即假道与海湾君主国有联系的慈善和布施协会操控的政党和政治集团，以物资和后勤方式来实

现。该手段在阿富汗战争，甚至更早的“塔利班”创立时期均已得到应用和进一步呈现。

第二招是资金募集，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或在卡塔尔或在英国，由马格里布宗教政党及其领导班子发起。

第三招是最新和最薄弱的，乃是继承了“9·11”事件后小布什的计划：建立一些专门机构，能够控制民间组织并推动其实现制度的民主化。这一招在“革命”期间率先亮相，但很快让步于其他两招，因为前两招更稳当、更长久，且更敌视“民主2.0”。

本·阿里政权倒台的翌日，各大媒体口径一致，一些政客也不遗余力地颂扬“革命2.0”：这是一场以快速进行信息沟通、连接和交换的力量取胜的“革命”。就这样，突尼斯人表现得让人大吃一惊，靠着博客、脸书上众多匿名者夺取了胜利——通过这种无领导、无定位、无决策中心的方式教训和推翻了专政。

通过观察事实、研究博客和活动分子的传记，人们可以发现：尽管活动分子数量庞大，其运营的博客和网站发挥的作用巨大，但事实上这些“革命”尤其是突尼斯的“革命”早有准备，所有准备工作均出自将主要角色与当地的战术联系起来的同一个战略。

这当然是因为在“9·11”事件后，美国与阿拉伯社会，甚至与生活在欧洲国家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少数派之间，建立了从未出现过的联系和合作框架。正当此时，人们发现美国的“公共外交”要本着更能相互理解的方式开始“重写”了。这涉及要针对一定数量的政治力量、社会角色、艺术家和少数派代表开展行动。通俗地说就是在这些联系背后确实有政治目的。当然，改善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形象是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是扩大美国外交与其他公民社会角色的联系圈，以打碎传统外交关系的封闭状态。我们就曾以服务于美国机构的研究中心的人员和领导者的身份亲历这些事情。我们亲自观察到了这些闻所未闻的事情，并对美国如此重视与那些宗教尤其是穆斯林的“代表”的联系而大吃一惊。这种紧密接触紧随“9·11”事件启动，有了这个突破口，某些政治

与宗教“掮客”蜂拥而入，他们热衷于为伊斯兰主义政党与美国间关系“正常化”服务。在突尼斯，美国当然是在美驻突大使威廉·哈德森的鼓动下，与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建立起最初的紧密联系的，因为当时这种联系为本·阿里所禁止，且突尼斯复兴党很多领袖要么处于突尼斯政府的监视居住下，要么被流放后到了英国或卡塔尔。正是通过一个人和一个研究中心的作用，使得关系“正常化”的活动加速运作起来。这些最初的联系孕育了一个特殊圈子，下文将一一陈述。

除了这些联系，自2006年起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和卡塔尔机构，开始对中东、北非的政治活动者产生兴趣，其行动手段或是如美国所谓的那种“加强公民社会”的培训项目，或是如卡塔尔那样，对半岛电视台提供支持。它们据此预置两个角色连接圈，这两个圈子将在阿拉伯“革命”尤其是突尼斯“革命”中发挥首要作用。

这些圈子的作用是协助全球特别是所在国内政坛反对派传播其观点。它们的出现在变革局势中掀起波澜。在突尼斯，这些来自“加强公民社会”培训项目的活动分子在2011年1月上旬频繁出现，此后将当地主导权让给了包括依附于卡塔尔的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在内的伊斯兰保守派政党。复兴运动党结构更为紧密，更具组织性，获得更多捐助，还深谙地下政治斗争，从而得以排挤掉所有对手，并收买了宣传“革命2.0”的媒体以更好地抵制民主计划，甚至促其流产。许多活动分子和博主在这一局势下无奈离开了政治舞台。

从这一描述中，我们就能找出2011年1月14日前后“革命”形势透露出的反对派的总路线、地图绘制、定位和相关例证，并做出一些假设。

第一个假设涉及博主或脸书等“细胞单位”的激活。它们在突尼斯“革命”中的行动在一些方面与东欧“颜色革命”中的活动相似：

“自发”提出起义设想；

暴动者在一段准备期和游行示威爆发后控制了大城市和首都，警方则对此无能为力；

使用信息技术反复传播“革命”消息，形成自发性舆论；

一批活动分子被逮捕，包括那些确定致力于民主制度建设或民主控制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或者智库派来的组织或个人；

出现一个强大的政党，其具有控制力但并非多数派。

这一纲领也将被应用于诸如从吉尔吉斯斯坦到塞尔维亚、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观察这些事实后，我们发现在本·阿里倒台后，恢复旧体制的进程正在推进，且正通过相同的手段在被称为“Kasbah古堡行动”[3]的框架内迅速外溢。

下列三个表格将指出谁在2011年1月14日前后的两个阶段对突尼斯“革命”的组织工作发挥了作用。

参与突尼斯“加强民间组织”机制的机构

机构名称	所属国家	在前“革命”阶段参与挑选活动分子	在后“革命”阶段参与挑选活动分子
伊斯兰与民主研究中心	美国	是	是
“自由之家”	美国	是	是
“开放社会研究所”	美国	是	未知
青年运动联盟	美国	是	是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美国	是	是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	美国	是	是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	美国	是	是
布鲁金斯学会	美国	间接参与	否
半岛电视台战略研究中心	卡塔尔	是	否

突尼斯活动分子在抗争前后及参加政治过渡进程的活动轨迹的几个示例

姓名	挑选者	前“革命”阶段的直接角色	目前在变革进程中的角色
斯利姆·阿玛姆	“开放社会研究所”、青年运动联盟	被本·阿里政权投入监狱的博主，后成为政府部长，在2011年10月选举前辞职	居于巴黎
丽娜·本·赫尼	青年运动联盟	在国家中心地带保障游行示威的活动分子	无角色
埃玛·本·若马阿	青年运动联盟	在国家中心地带保障游行示威的活动分子	无角色

政治“企业家”轨迹

姓名	通过如下机构参与接触美国/卡塔尔政府	隶属党派	目前职务
拉德万·马斯穆迪	伊斯兰与民主研究中心（2002年在华盛顿发起美国政府和突尼斯复兴运动党间的对话）	突尼斯复兴运动党	伊斯兰与民主研究中心主席（华盛顿）
拉菲克·本·阿布德撒伦	半岛电视台战略研究中心	突尼斯复兴运动党，拉希德·加努西的女婿	突尼斯复兴运动党政府外长
塔里克·哈拉奥乌伊	半岛电视台战略研究中心、美国罗格斯大学	突尼斯复兴运动党	突尼斯总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阿拉伯“革命”，尤其是突尼斯“革命”，是超国家的政治进程，并因外部干预沦为乌托邦和四不像。利比亚的情况与伊拉克类似，采用暴力引导的方式推动变革，重蹈了伊拉克式的混乱。突尼斯的情形则只能作为研究其周边国家和突尼斯复兴运动党教父卡塔尔的失败例证。西方人在此变革中的态度是奇特的，他们竟同意将最重要的角色让与一个海湾小国，它对民主的概念简直一窍不通。我们还将对阿拉伯“革命”的大背景下这一袖珍国家与美国保持的特殊关系进行长期调查研究。作为这些新政权的单一资助人，卡塔尔实际上主导了这些国家的瓦哈比化进程，且其一直在马里的伊斯兰“圣战”小派别中保持存在，这使得相关国家的局势无法达到美国希望的稳定状态。这让我们想起美

国的另一次冒险——阿富汗。的确，出资人决定未来，出资人决定战争走向。

塔乌费克·布尔古

---

[1] 马什里克是对阿拉伯世界东部地区的一种称谓，该词的字面意思为“东方”，更文雅或诗意的称法是“日出之处”。——译者注

[2] 波斯湾沿岸国家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

[3] 按照乌克兰所发生的那样，活动分子采取静坐方式，并占领Kasbah广场。

“阿拉伯之春”中美国的角色

在政治活动中，从来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发生的。

如果它发生了，你完全可以打赌它一定是某种“设计”使然。

——富兰克林·罗斯福

穆巴拉克下台近一年后，2012年2月8日全世界报刊都采用了一条源自开罗的消息——埃及法院指控一些非政府组织从事非法“政治”活动。[1]媒体称：“紧张事态缘于2011年12月29日对当地17家埃及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搜查。其中不乏来自美国的组织，如‘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自由之家’等。”针对搜查事件，包括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美国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在内的3名美国参议员，“周二（2012年2月7日）就这一事件警告埃及，称之为两国间少有的如此严重的‘灾难性的’断交危险”。

在事件发生后几天，媒体披露，“美国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称，19名美国被告中目前仅有7人在埃及，其他人已在‘禁止出境’命令下达前离境。其中一些人，如‘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埃及分部负责人、美国运输部长雷·拉胡德之子萨姆·拉胡德，已经到美国大使馆避难”。[2]

这些新闻明显引出了一系列疑问。这些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它们被控进行非法活动？这些非政府组织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力，让一个美国部长的儿子担任其埃及分部的领导人？这些指控为何如此严重，竟让美国部长之子窘迫地躲入了美国大使馆？是什么飞虫蜇了埃及法院，让它“胆敢”攻击美国组织和侨民，并让埃及冒着

失去美国给予其每年130亿美元援助的风险？为什么麦凯恩参议员要亲自介入，而不将此事提交美外交部或国务院？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重温几年前发生的“颜色革命”。

吉恩·夏普与“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是指21世纪初一些东欧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的重大变革，即先后发生在塞尔维亚（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和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等的重大事件。

这些“民主化革命”的推动者是一些集中了当地青年活动分子的运动组织，他们亲西方，经验丰富，都是民主斗士。这些成功推翻独裁制度的运动都运用了美国哲学家吉恩·夏普的非暴力行动方法理论。

作为美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吉恩·夏普是《从独裁到民主》一书的作者。该书是近20年来非西方世界那些梦想推翻本国“独裁体制”的活动分子的枕边书。这位马萨诸塞大学前名誉教授、哈佛研究员，在1993年编写了这一“持不同政见者的完美指南”的第一版，供身处泰国的缅甸反对派使用。目前，该书已被译成27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并能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电子版。[3]

吉恩·夏普在书中描述了为推翻现行制度简便易行的198种非暴力行动方法，重点是拉拢警方、示威游行、组织抗议弥撒、提供音像设备支持、举行祈祷行动和宗教仪式、利用强力标语和口号（如文字“下台”和握紧的拳头图案）、在游行期间布置死者照片以及掌控后勤组织工作等方面。除了“颜色革命”中这些相关经验外，诸如群发短信、利用社交媒体和清扫游行使用的公共场所等手段后来也被加入。

这些方法的可行性被罗伯特·赫尔维证实，此人是美国前陆军上校、地下行动专家及美驻外使馆武官培训学校校长。[4]罗伯特·赫尔维曾于1983年至1985年在仰光美国大使馆任武官，在哈佛大学一次评定

研究奖学金的会议上结识了吉恩·夏普。此后他初步掌握了哲学理论，并成为非暴力理论的信徒。1992年退休后，他投身缅甸和平反抗教育。同年，他利用吉恩·夏普的船只组织潜入缅甸。“在这里，我们进入这片丛林，点燃蜡烛来阅读吉恩·夏普的著作。”[5][6]他回忆道。这次冒险之后，《从独裁到民主》的第一个译本诞生了。

1992年到1998年，赫尔维15次造访缅甸，其间接触了500多名缅甸联邦议会议员和一个亲民主的缅甸组织，并为他们讲了一些关于吉恩·夏普理论的课程，[7]但徒劳无功。多年来，希望推动“民主”的美国机构做了大量努力，并为缅甸革命运动接连不断地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但均以失败告终。吉恩·夏普就这一彻底失败提出疑问，并找出好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反对派派系林立，甚至每一个派系中又分好几个小派别。他说：“所有这些武装派别都认为它们能战胜政府军，我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判断，因为政府军更庞大、更强势，还有更多武器装备。”[8]

21世纪初，美国“推进民主”的注意力转向了东欧国家和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与缅甸的情况相反，“夏普式”的非暴力运动在这些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功。

正是罗伯特·赫尔维亲自培训出了“抵抗”运动中的塞尔维亚活动分子。在接受《和平》杂志的长篇采访时，他承认塞尔维亚“革命”运动收到了美国机构2500万美元的援助。[9]

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时，塞尔维亚运动人士建立了“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CANVAS），由斯尔贾·波波维奇领导。这一中心由“输出民主”的美国机构资助，[10]专供非暴力斗争培训。它还负责其他“颜色革命”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的培训，以及阿拉伯活动分子的培训，尤其是突尼斯人和埃及人，他们在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垮台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是决定性的。[11]

“推动民主化”的美国机构

众所周知，各类“颜色革命”背后均有诸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IRI）、“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自由之家”或“开放社会研究所”（OSI）等美国“民主输出”机构的资助、指导和支援。[12]

这些“革命”的手法已被多位作家披露，玛侬·卢瓦佐也多次做过详细报道。[13]而来自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的萨斯曼和克莱德，在其2008年发表的一篇很翔实的文章中写道：“2000年到2005年间，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俄罗斯盟国的政府均被不流血的‘革命’推翻。尽管西方媒体普遍将这些造反行为归为自发的、土生土长的和普罗大众的（民权），但‘颜色革命’毫无疑问是经过长期和大量谋划的结果。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友对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施以高压，并运用财政和技术手段推进民主。”还有：“大量外国要素介入了民主变革的进程，其中USAID、NED、OSI（由乔治·索罗斯赞助的研究所）、FH（为饥饿者提供食物组织）以及国际中心等机构干预了这些非暴力冲突。事态发展均被精心设计，就像七国集团凭借其在商贸、军事、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主导作用，在东欧地区推行一些更为广泛的新自由主义开放政策一样。”[14]

尽管被贴上“非政府组织”的标签，但这些美国机构实际上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资助。

USAID是美国一家“正式的”独立事务所，1961年创立。该机构负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人文援助，只要这对美国有利。该机构穿梭于世界各地，从事颠覆活动，积极参与“颜色革命”，前文已广泛述及。[15]此外，USAID在其网站称自己曾在过去20年里花费约90亿美元来“提升逾100国的民主管理水平”。[16]NED于1983年在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授意下创立，号称是一家非营利性的私人基金会。事实上，它的预算须由美国国会投票，其资金由共和党、民主党、美国商会以及美

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LO）代表联合组成的董事会管理。

NED 90%的年度预算来自美国政府。仅是2009年，这一预算就被提高到了约1.32亿美元。NED的创建者之一艾伦·温斯坦如此描述NED的角色定位："当前我们的很多工作是秘密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这已有25年。"

事实上，NED的行动可通过4个不同组织联系："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商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CIPE）以及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

IRI董事会由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参议员主管，克林顿时期的女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则是NDI（"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的首脑。马克·维斯布拉曾在英国《卫报》发文叙述其对IRI的思考："当我看到IRI被国际媒体奉为'推动民主的组织'时，我不禁放声大笑。"[17]他在文中举了大量例子来说明这一组织（单独或与前述其他机构一道）直接参与了破坏许多国家社会稳定的行动。

"自由之家"创立于1941年，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助力自由事业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尽管这是官方描述，但其资金主要来源于USAID、NED和索罗斯基金会。[18]

"自由之家"以囊括美国诸多名人的豪华董事名单而闻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卡特时期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小布什时期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克林顿时期分管财政的副国务卿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以及小布什时期国防部长助理兼世界银行前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

至于NED，这一组织参与了遍布全球的众多旨在破坏目标国社会稳定的资金援助项目。[19]2006年，盖伊·丁摩尔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称，"自由之家""是由美国国务院挑选的为伊朗地下活动接受注资的组织之一"。[20]

美国著名匈牙利裔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也致力于输出“美国制造”的民主，并为此创建了其一干基金会中的一个——“开放社会研究所”。它创立于1993年，起初致力于东方阵营国家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转型。大量文章指出，它积极参与资助“颜色革命”和拉美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21]

显然，这些组织不但不是什么非政府组织，反而极具政府背景。理查德·福尔克曾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文评论其活动属性：“有时，这些单位甚至被媒体冠以‘民间组织机构’：往好里说，是无知；往坏里说，则是一种故意欺骗。不论我们如何看待其活动，但认为它们是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组织都是大错特错的。”[22]至于这些组织“民主推行者”的角色，众多评论家持怀疑态度。我们还注意到，这些伪非政府组织在外国引领的深度颠覆性活动在美国是禁止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姆所说：“我们在国外做着在国内被禁止的事。”[23]

伊朗2009:“阿拉伯之春”的开端

2009年夏天，搅动伊朗的系列事件均富有教育性。其实，“颜色革命”期间已知的和已被应用的操作模式，正因多种可怕且高效工具的加入而丰富起来。

第一，他们小心利用社交网站动员伊朗的活动分子，并即时引导网络信息。推特、脸书、优兔和其他社交媒体点燃了博客世界，显示出其打击力度。

第二，美国政府强烈鼓吹并声言捍卫伊朗示威者使用社交网站的权利，并在媒体上大肆宣传。[24]这种介入甚至上升到对一些美国社交网站直接进行干预，以让持不同政见者最大限度地使用这些工具。美国国务院还曾要求推特推迟其需要中断服务的运行维护工作，因为这将剥夺伊朗反对派的联系途径。[25]而且，基于美国政府与私企间奇怪

的密切联系，推特接受了这一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赋予伊朗人的这种使用社交媒体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甚至是美国公民在游行示威时也未被授予的。[26]

第三，西方常规主流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们大规模传播和灌输多数未经证实的消息，从而使一些有悖真相与伦理的拙劣报道充斥荧屏，并总以此自夸。它们还有一种惯例：将录音或录像中“不和谐”的部分以杂音覆盖等方式进行掩盖，或以视频片段回路的方式通过优质手机传播，以此让人难以发觉。此类作品的质量与行业标准相去甚远，且为避免与其他行动交叉而暴露，难以用天线传输。

这些业余爱好者的“报道”几乎能在瞬间传播开来，且数量极大，明显引发人们对伊朗网络反对派与西方媒体巨头间紧密关系的怀疑。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这些网络反对派都受过CANVAS的培训。正如该组织现任主任斯尔贾·波波维奇宣称的那样：“我们已出现在37个国家的活动分子周围。有一些成功了，如2003年在格鲁吉亚和2004年在乌克兰，但也有失败的，如在津巴布韦、白俄罗斯和伊朗。”[27]再次重申，CANVAS是一个培训尚未成熟的网络反对派的机构，它在塞尔维亚的一些办事处，都是按照吉恩·夏普的理念成立的。特别是，它得到了致力于“民主输出”的美国专业组织的资助。[28]

针对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输出”

根据美国的地理划分，阿拉伯国家分属中东和北非地区。与我们所想的不同，对于阿拉伯“革命”的准备并非始于奥巴马时期，而是小布什时期。此外，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在“民主输出”方面的立场几乎一致。它们都致力开展联合行动，正如我们见到的其在IRI和NDI的行动那样。另一方面，不论美国哪个党及何人当政，都会为这些项目和参与者保驾护航。

我们应认识到，所有触动阿拉伯国家的“革命”都始于非暴力阶段，都在用吉恩·夏普自成一套理论的运动方式。一些人引领着体制变革（如突尼斯、埃及“革命”），或乘总统即将离任之机起事（如也门）。在其他国家，非暴力阶段则仅是昙花一现，变革迅速进入包括多种形式的外国干预的暴力阶段，国家陷入血腥的内战阴影中，这就是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局面。叙利亚政府目前仍在面对由美国在内的一干国家大规模资助、支援和“保护”的反抗军。还应注意，这两国的情况与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的相反，“革命”不是始于首都，而是多发于边境地区。被内战困扰的这两国的另一相似之处是，反抗者打出了“新型复古”的旗帜，作为与现行制度决裂的象征。

在这场通常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中，民众游行示威主要由网络反对派中的年轻人引领和组织，他们热衷于新科技。反对派的年轻化是“阿拉伯之春”与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和伊朗的反政府运动的共同点。与表面现象相反，这些“革命”不具任何自发性。

网络反对派从两种互不相同但又相互补充的培训中获益。一是现实空间中的“领航”技术，二是网络空间中的“领航”技术。其中一部分人会脱颖而出，为领导层所赏识。埃及著名网络活动分子、“4月6日青年运动”发起者艾哈迈德·马希尔指出：[29]“使网络运动活跃与使街头运动活跃是两码事。”这种认知在圈内是常识性的，显示出活动分子及其领导层的现实主义态度。

CANVAS和阿拉伯网络反对派

对示威者来说，现实空间里的“领航”包括如下技术：动员民众的艺术；与警察拉关系的艺术；后勤保障能力；发生暴力行为时的应变能力；政府动用武力驱散人群时的应对能力。网络反对派领导人迫切需要思考如何动员、训练和组织街头示威活动。而这些难题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好几年，就已被CAN-VAS解决。

阿米尼·加利是最早加入的突尼斯活动分子之一。2008年起，他成为“凯瓦基比民主变革中心”（KADEM）的项目负责人。这是一个由“大中东民主计划”资助的中心，由美国国务院直接领导，[30]得到了乔治·索罗斯名下的OSI和NED的资金支持，还与“自由之家”[31]开展密切合作。此前，阿米尼·加利还曾为包括“自由之家”在内的好几个组织工作。[32]

在拍摄一部反映“阿拉伯之春”的纪录片[33]过程中，加利接受采访，承认在2007年11月参加了CANVAS为突尼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持不同政见者举办的一次培训，并展示了培训时的照片。他明确指出，培训在摩洛哥的拉巴特举办，组织者就是CANVAS组织中的塞尔维亚人。

通过突尼斯快报广播的一次播音，我们得知两名突尼斯著名网络活动分子——斯利姆·阿玛姆和艾玛·本·杰玛也参加过此次培训。[34]要知道斯利姆·阿玛姆曾在后本·阿里时代的首届政府中任青年和体育国务秘书，他本人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曾大肆鞭挞本·阿里政权，而这仅仅是短短几个月之前的事情。

突尼斯大学生总联盟（UGET）秘书长伊兹丁·扎阿杜尔在前述的纪录片中宣称：“‘抵抗’运动给了我们一本描述其所有战略的书。”这本书正是由CANVAS出版的，书名是《非暴力行动50点》。这一反对派的完美行动手册大量借鉴了吉恩·夏普的理论，已成为方便实用的必备品，当时被译成了6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还能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电子版。书中提及了199种“非暴力行动手段”，其中一些在阿拉伯大街上被广泛使用，后文将对此进行讨论。在接受《阿尔及利亚焦点》报访谈时，斯利姆·阿玛姆承认其受到了一些美国机构的“帮助”，但他未指明是哪些机构。[35]

埃及人也从塞尔维亚人传授的专有技术中获益。大量参考资料提到，“4月6日青年运动”的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德尔曾于2009年夏在CANVAS实习，比解放广场发生骚乱时要早得多。他本人在索菲亚·阿

马拉拍摄的纪录片中承认此事，并透露是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14名活动分子一起接受培训的。[36]他还宣称经过实习，已非常熟悉组织群众的技术以及该如何应对警方暴力。随后，他也和职业培训者搞起了培训。阿德尔这一夏季实习也被“自由之家”的中东和北非地区项目负责人谢里夫·曼苏尔[37]证实，这也是该组织资助CANVAS培训活动的证据。在此应当指出，“自由之家”和“4月6日青年运动”间的关系早在此次实习前就已建立。在一篇讲述艾哈迈德·马希尔的文章中，作者戴维·沃尔曼强调了“（谢里夫·曼苏尔）多年来与马希尔及其集团的紧密联系”。[38]

正如斯尔贾·波波维奇所披露的，CANVAS不只是训练突尼斯、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活动分子。他确认，全世界共有37国的活动分子从CANVAS提供的培训中获益。朱莉·佐格在其一篇深入研究“阿拉伯之春”问题的文章中证实，“‘自由之家’在中东同样高度存在”。维基解密公布的电报说明了其在叙利亚、巴林和埃及的存在。在埃及，“自由之家”显然支持了“4月6日青年运动”。另有始于2009年4月并已公开的外交文件指出，在大马士革，该组织“领导着好几个非暴力行动工作室”，“这些项目旨在尝试颠覆阿萨德政权”。[39]

CANVAS向阿拉伯活动分子提供的这一培训，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已知发生暴乱的不同城市大街上均大有建树。

首先，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反政府人士在其布告、游行呼吁书和群发的反政府短信中都使用了这个拳头标志。[40]在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也将它作为自己的标志，大量反对派分子在游行时高举的横幅标语上，都有这个斯尔贾·波波维奇领导的名叫“抵抗”的反政府组织标志。

除拳头标志外，其他技术手段也在民众示威中引起关注。我们将CANVAS的《非暴力行动50点》这一教材中非暴力行动的一些招数列举如下：[41]

第7招：使用口号和象征符号。

第8招：拉起横幅标语、布告和广告牌。

第12招：让传单满天飞。

第20招：举行祈祷行动和宗教仪式。

第33招：拉拢敌人。

第34招：在重大事件前夜紧锣密鼓地筹备。

第37招：反复且有节奏地高呼口号。

上述招数不胜枚举，指出了CANVAS慷慨贡献的培训是怎样严格有素，并且具有高度的实用价值。吉恩·夏普就对埃及网络活动分子的行动毫不吝惜赞美之词，称对自己的追随者的执行力感到“特别自豪”，[42]并意识到“穆巴拉克倒台是他所见过的最‘顶尖’的民主革命”。[43]穆罕默德·阿德尔则自诩道：“这是属于我们的革命。CANVAS只是让我们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组织和运用抵抗策略。”[44]

“网络版阿拉伯联盟”

正如此前提到的那样，美国“民主输出”机构为阿拉伯网络活动分子提供的第二种类型的培训便是网络空间中的“领航”技术。

显然，社交媒体和新科技在阿拉伯“革命”的计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工具能够让各国反对派在空前短的时间内联系数量惊人的个人，并在一国内外进行重要资料、信息的数字化交换。美国国务院和各机构对该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使反对派绕过本国审查，提升地理定位技术，并能在其遭到逮捕时传送图像和视频，以显示专制制度的“不人道”面目。

此外，自“伊朗之夏”以来，引人注意的还有美国对新技术的巨大关注。奥巴马总统及其国务卿多次干预以捍卫自由使用互联网，以及要

求正在发生民众抗议的国家不中断互联网浏览，这些都大为可疑。

希拉里·克林顿甚至在2011年2月15日证实“互联网已成为21世纪的公共空间”，“脸书、推特和优兔支持的埃及和伊朗的游行示威映射出，链接技术正是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加速器”。[45]她还宣称，将拿出2500万美元“支持在线表达热爱自由的项目或工具的开发”，并促使推特在开设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服务后增设汉语和俄语服务。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和谷歌之间复杂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媒体热议的话题。这个著名搜索引擎已被看作是“美国外交武器”。[46]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因素是网络反对派频频在媒体上出现，被称为“脸书革命”，他们坚称自己不属于任何政治运动。因此，这似乎只是一些无政治立场的年轻人使用新技术，动摇了数十年来已深植于政治舞台的独裁体制。

但是，这些年轻人来自哪里？他们如何在既没有获得相当程度的培训，又没有与一个明确组织相联系的情况下动员如此众多的民众？事实上，除了资助中东、北非地区的非政府组织，那些从事“民主输出”的美国机构，还用新技术为这些国家的网络反对派提供新技术培训。为此，它们运用青年运动联盟（后发展成为movements.org）等实体组织。青年运动联盟在其官方网站上自称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美国组织，并宣布其使命为：在利益相关地区寻找网络反对派；通过一些民间组织的专家和成员的帮助，在网络反对派间建立联系；通过对网络反对派进行培训、提供建议和建立平台，支持其加强联系和壮大发展。

在movements.org的创建者中，我们发现了康多莉扎·赖斯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前顾问、“谷歌理念”主管贾里德·科恩，以及为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谷歌工作的贾森·利伯曼。[47]另外，青年运动联盟执行总裁戴维·纳赛尔领导了关乎NDI、USAID和IRI利益的中东项目。[48]

特别是，青年运动联盟组织的年度会议是由美国国务院和谷歌、脸书、优兔等公司资助的。它迄今共召开了三次：2008年在纽约、2009年在墨西哥城、2010年则在伦敦。这些参与者和与会者中不乏美国名人，如脸书联合创始人达斯廷·莫斯科维茨、推特创始人兼总裁杰克·多尔西，以及大批来自谷歌、优兔、美国国务院、“自由之家”、IRI、NDI、NED和世界银行的代表，甚至大名鼎鼎的“自由之家”成员谢里夫·曼苏尔也在其中。2009年的会议则因希拉里·克林顿以个人名义参会，被标记为“干预行为”的呼声越发高涨。这些人都与来自5大洲15国的网络反对派青年代表分享了经验。

“4月6日青年运动”中的一些埃及活动分子也参与了青年运动联盟在纽约召开的2008年年会。他们当场与世界各地的网络反对派建立了联系，还参加了一些关于运用社交媒体的研讨会，接受了如何逃避本国网络监督的新技术培训。[49]

美国国务院资助的这类会议，吸引了一些高级别美国名人的参与，还邀请了很多经过身份鉴别、由美国大使馆负责的网络反对派人士，显示出美国政府在这类活动中的利益和牵连。另外，新技术领域全球巨头的参与，也证实了这些企业、“输出民主”机构和美国政府间的密切联系。

2009年，16名埃及青年活动分子在华盛顿参加了“自由之家”组织的为期两个月的实习。他们接受了捍卫人权的相关培训，并会见了美国政府、国会及一些媒体和智库的代表。与我有着相同观点的罗恩·尼克松在一篇载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指出：“很多直接参与了‘地区革命’和激进改革的团体和个人，包括埃及的‘4月6日青年运动’、‘巴林人权中心’和昂特萨·卡迪等一批基层活动分子，都受到了IRI、NDI和‘自由之家’等组织提供的培训和资金支持。”[50]

其他几个培训机构早在“阿拉伯之春”前就开始建立了，这使得各阿拉伯网络反对派间相互接近、相互了解并最终整合起来。基于此，记者皮埃尔·布瓦斯雷将这种网络活跃分子群体命名为“网络版阿拉伯联

盟”。[51]在此举例说明，他们2009年在开罗举办的两次研讨会，就是分别由美国政府和索罗斯名下的OSI组织的，斯利姆·阿玛姆也均有出席。突尼斯和埃及的网络活动分子在长达一周的时间内面对面交换了各自的认识和看法。[52]

另一个促使阿拉伯网络反对派间会面的事件，是2009年12月在贝鲁特召开的会议，该会议是突尼斯网络活动分子萨米·本·加尔比亚发起的。与会名人包括斯利姆·阿玛姆、毛里塔尼亚人纳赛尔·韦德迪、巴林人阿里·阿卜杜勒曼和摩洛哥人希沙姆·阿尔米哈阿（笔名）。[53]斯利姆·阿玛姆在接受《阿尔及利亚焦点》报采访时明确承认了这一点。[54]

还有其他消息提及“网络版阿拉伯联盟”成员间的合作始于2008年。最初是在埃及人与突尼斯人间，随后扩展到阿尔及利亚人、利比亚人、摩洛哥人甚至伊朗人。伊朗人虽然不是阿拉伯人，但同属中东地区。[55]

在这些埃及活动分子中，一些人在穆巴拉克最后的日子里来到了聚光灯下。其中之一便是瓦伊尔·高尼姆。他被投入监狱12天后获释，在接受埃及一家电视台采访时叙述被俘经历，并为之落泪。节目播出后他一夜之间成了英雄。瓦伊尔·高尼姆是一名生活在迪拜的埃及人，曾出任谷歌公司中东和北非方向的市场部主管，并与一名美国人结婚。他在“4月6日青年运动”开始后才变得活跃起来，并与艾哈迈德·马希尔联系紧密。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信息是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曾说，“瓦伊尔·高尼姆的成就太令人自豪了”,[56]仿佛“干革命”就是像任何公司市场负责人的本职工作一样。

网络反对派与互联网自由

对网络反对派而言，在互联网上做到行动完全自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匿名和绕开审查。为达到这两个条件，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

地）资助了一些公司来设计翻墙软件，典型的便是一种叫TOR的翻墙软件。翻墙软件被免费发放给网络活动分子使用，使得互联网上的匿名引导行动得以进行。TOR的一名代表表示，“TOR的使命是允许人们在极权国家能够安全地表达观点或分享信息”。[57]

用户可以免费下载使用TOR（仅2010年下载量就超过3600万次），那么谁在资助这个软件的发展？参考其官方网站，我们了解到TOR拥有众多资助者，包括谷歌和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它的主要出资方并未被证实，但伊夫·厄德让我们了解到TOR曾在数年间获得了联邦基金的赞助。[58]

TOR的一个代言人是雅各布·阿佩尔鲍姆。雅各布·阿佩尔鲍姆曾游历众多阿拉伯国家来推广他的软件，并面向网络活动分子召集关于如何使用该软件的研讨会。在整个突尼斯“革命”期间，他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中，并帮助突尼斯活动分子解决网络迟缓问题。[59]还应注意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他还是维基解密的活跃成员。[60]

2010年1月，希拉里·克林顿发表题为“互联网自由”的演讲时已经表示：“我们（美国政府）同样支持发展能让公民绕过政治审查、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工具。我们为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团体提供资金援助，只要它们致力于确保人们使用当地语言操作相关的软件，或者为需要安全进入互联网的人们提供培训。”[61]

对美国政府来说，开发“反审查”信息系统极为重要，为此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还为开发这类工具的企业提供了超过3000万美元的资金。[62]

目前正在开发的一个视频软件“commotion”,“允许建立100%独立的无线宽带网络；频繁提供Wi-Fi网络；不依赖任何实质器械，无需电话、电缆或卫星连接。它是移动的、水平的、完全分散的，能躲过任何监测，因为它在传输时具有匿名和限定收视的特性”。[63]该项目除了美国国务院资助的200万美元外，还有23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其首

个版本将于2012年底发行。“commotion”软件由美国开放技术研究所（OTI）接纳和资助，其领导人非瓦伊尔·高尼姆的老板埃里克·施密特莫属。另外，雅各布·阿佩尔鲍姆也参与了该项目，曾任“commotion”软件的投放参事一职。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个对研究社交媒体巨头和阿拉伯网络反对派，尤其是埃及网络反对派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性的事件。

在骚乱最盛时，埃及政府认为网络是危险的，决心断网。于是从2011年1月28日到2月2日，埃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隔离博客的国家。为使埃及网络反对派能够继续为国际媒体“提供资料”，谷歌和推特携手推出一款名为“Speak2Tweet”的抢救系统，用户通过拨打固定电话就可以将语音信息转变为“推特”信息。除了这一技术上的“壮举”，还有3个电话号码可以免费拨打。[64]

这证明，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打断“革命”。

美国人的资助

除了培训网络反对派，“民主输出”机构还像为自己的分支机构提供资金一样，资助散布在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但仅有NED每年公开其主要活动报告，有关数据如下表。

2009年至2010年NED面向阿拉伯非政府组织的金援

受援国	2009 年金额/美元	2010 年金额/美元
阿尔及利亚	251 215	145 900
埃及	1 419 426	2 497 457
伊拉克	3 624 991	3 164 009
约旦	1 124 159	1 073 345
科威特	243 200	—
黎巴嫩	741 714	758 788
利比亚	196 700	183 900
摩洛哥	1 426 087	1 206 300
巴勒斯坦	1 644 362	1 263 344
叙利亚	298 800	548 300
突尼斯	191 500	215 294
也门	631 536	1 231 318
中东和北非地区	3 475 913	1 380 633
总计	逾 1500 万	约 1400 万

通过此表我们可以看到，仅NED在2009年对阿拉伯国家非政府组织的补助便超过1500万美元。此外，报告文本中还详细叙述了一些很有趣的信息。

例如，也门非政府组织“无枷锁女记者”在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曾接受NED的补助。这看起来很平常，但该组织是由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塔瓦库勒·卡曼（目前唯一获过此奖的阿拉伯女性）创建并领导的。另一方面，因领导了也门的游行示威活动，她被认为是也

门“革命”的女激进分子。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伊斯兰政治活动分子与美国驻也门大使馆走得很近，不仅得到了大使馆的赞助，还被邀请访美，并在美国和希拉里·克林顿、米歇尔·奥巴马会面，而这些事情远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前既已发生。[65]

活动分子与美国大使馆关系密切绝非也门独有。维基解密公开的大量电报揭露了美国驻埃及大使馆的频繁动作。[66]这些电报有助于证实一些活动分子是美国外交代理的“不懈的”合作者。如网络活动分子巴塞姆·萨米尔，他是NED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埃及民主学院”的执行董事，[67]希拉里·克林顿曾在2010年1月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著名演讲——“互网络自由”中点名嘉奖他，[68]美国国务院也正式向他发出访问邀请。还有一个小细节：以“脸书女孩”和“4月6日青年运动”联合发起人[69]而在埃及闻名的伊苏拉·阿卜杜勒·法塔赫，是“埃及民主学院”的项目负责人。

汉利曾在《华盛顿邮报》发文称，2005年以来，超过1万名埃及人参加了由NDI、IRI、USAID资助的“民主”和“治理”项目，一同参与的还有其他28个国际组织和埃及当地机构。[70]我们还了解到，USAID在2011年曾申请过一笔面向阿拉伯国家的高达1.04亿美元的特别捐款。一些原始资料认为，美国政府“为提升民主和良治”,[71]仅在埃及每年就花费了约2000万美元。这一节奏在穆巴拉克倒台后加快了。2011年6月，美国新任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承认，自2011年2月以来，美国为在埃及“推进民主”至少花费了4000万美元。[72]这一事件引发美埃两国政府间火星四溅的紧张关系。所有其他中东、北非国家也被波及。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之事：除了“中东民主项目”的资助，阿米尼·加利领导的“凯瓦基比民主变革中心”是由NED资助的。[73]

在约旦，活动分子欧莱博·阿尔-兰太维领导的“圣城政治研究中心”则由NDI资助。[74]

在阿尔及尔的大街上，国家变革与民主协调组织（CNCD）引领着社会反抗活动。该运动汇集了各式政党、非政府组织和工会。在它们中，我们能看到阿尔及利亚捍卫人权联盟（LADDH）、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全国自治工会（SNAPAP）及文化与民主联盟（RCD）。NED的年度报告咨询会披露，阿尔及利亚捍卫人权联盟曾于2003年[75]、2005年[76]、2006年[77]和2010年[78]接受过美国的资助。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全国自治工会则与“团结中心”（NED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有着紧密关系。[79]2011年3月4日，“阿拉伯之春”全面爆发之时，“团结中心”国际部主任凯茜·法因戈尔德，给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写了封信。她在信中表达了对阿尔及利亚警方针对“和平示威”采取暴力的担忧：“我们（‘团结中心’）对最近受伤的人，包括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全国自治工会公共部门主席拉希德·马拉维深表关切。”[80]她在信中三次提及国家变革与民主协调组织的领导人拉希德·马拉维。[81]维基解密则披露文化与民主联盟主席曾与美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展开“革命是否会波及他人”的辩论。[82]

在分析了维基解密公开的与叙利亚有关的系列电报后，《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自2006年以来就秘密资助叙利亚反对派，推动被流放的叙利亚反对派在“正义与发展运动”的旗帜下重组，并捐约600万美元助其组建电视台，同时向叙利亚境内输入各式反政府“活动”。这些赞助始于小布什时期，并且至少延续至奥巴马时期的2010年9月。另一方面，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的一封电报披露了一笔金额为1200万美元的资金，曾从2005年到2010年以美国国务院中东伙伴关系倡议项目的名义资助叙利亚。[83]

查利·斯凯尔顿在其一篇由英国《卫报》发表的详细描写“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文章中指出，巴斯玛·库德玛尼、拉德万·齐亚德和奥萨马·莫纳贾德等叙利亚反对派重要人物，与美国“民主输出”机构早在2011年之前就已有紧密联系：[84]“其实，相当一部分被流放的叙利亚反对派重要人物受到美国政府资助，用以破坏阿萨德政权，这种资助在‘阿拉

伯之春’前就已启动。”这篇文章的一个小细节包含极为丰富的信息：拉德万·齐亚德也与NED有着密切联系。[85]

在利比亚，“捍卫人权”的反政府组织“利比亚人道和政治发展论坛”创始人阿里·拉马丹·阿布扎库克、“透明的利比亚”组织创始人阿布德尔·马吉德·比乌克，以及逃到伦敦的“利比亚消息”网站发起人阿舒尔·艾尔-沙弥等人均受到了NED的资助。[86]

“民主输出”机构在“阿拉伯之春”高潮时开展的这一“超级行动”被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注意到，他给予了高度赞誉。除了多次发表灌输民主和军事干预思想的宣言，人们还看到他亲自访问“已被民主化的”一些国家：2011年2月21日访问突尼斯；2011年2月27日访问埃及；2011年4月22日访问利比亚。

但是，究竟是什么让这位美国参议员在“阿拉伯之春”扫过的大地上东奔西跑？当然，这既不是基于其参议员身份，也不是基于其美国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成员身份，否则向他那些参议员同事问这些“无所事事”的问题或许更适合。其合理解释不就是他才是“投资民主”的IRI的“老板”吗？这不就是本文开头部分所提的问题之一的答案吗？

我们可以打赌，约翰·麦凯恩现在正梦想着被反对派的绿白黑加三颗星旗帜的海洋包围，在叙利亚霍姆斯、德拉和伊德利卜的大街上耀武扬威。

*

尽管缘于糟糕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但阿拉伯街头“革命”也不像表面上那样是自发的。显然，存在某种造成不稳定的“沃土”，它让“推动民主者”的工作容易得多了。

早在“阿拉伯之春”之前的那些年，大量“输出民主”的美国机构就已将数百万计的美元花在了培训和资助阿拉伯国家反对派身上。效力于CANVAS的塞尔维亚人、社交媒体和新技术的专家们利用其专业知识技能为反对派，尤其是突尼斯和埃及的反对派提供了高效服务。

在所有这些行动中，美国国务院及其位于阿拉伯国家的使馆网络，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此次改写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大规模战役。在此框架下，谷歌、脸书、推特和优兔等新技术的“巨头”们与美国国务院展开了协调一致的合作。

美国称赞那些反民主的海湾君主国的“教育有方”，这一殷勤态度让人对民主在阿拉伯世界“春天化”进程中究竟有多大分量充满疑问。更重要的是，美国对麦纳麦政府血腥镇压巴林示威者一事无动于衷，甚至支持麦纳麦政府，显示出“民主”和“人权”仅是其虚伪的借口。

难道那些阿拉伯君主国的人民，就不能和那些阿拉伯共和国的兄弟姐妹一样，拥有享受“民主之春”的权利吗?

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美国外交政策从来就不是慈善事业的典范。因此，美国毫无疑问将继续对“已民主化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事务说三道四。这再一次说明了美国在外交上具有双重标准：对一些人睁眼，而对另一些人闭眼。

艾哈迈德·本萨阿达

---

[1] AFP,《Égypte:la justice accuse des ONG d'activités“politiques”illégales》,Le Point.fr,8 février 2012,http://www.lepoint.fr/monde/Égypte-la-justice-accuse-des-ong-d-activites-politiquesillegales-08-02-20121428827_24.php

[2] AFP,《Égypte:début du procès de membres d'ONG égyptiennes et étrangères》,L'Express,26 février 2012.

[3] G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98ce.html

[4] Ahmed Bensaada,《*Libye:les limites de la théorie de la non-violence de Gene Sharp*》,*El Watan*,2 octobre 2011,http://www.calameo.com/read/000366846d13cad04ca46

[5] Sheryl Gay Stolberg,《*Shy U.S.Intellectual Created Playbook Usedin a Revolution*》,The New York Times,16 février 2011,www.nytimes.com/2011/02/17/world/middleeast/17sharp.html?_r=4&pagewanted=all

[6] David Caviglioli,《*Le gourou des révolutions arabes*》,*Le Nouvel Observateur*,11mars 2011,http://bibliobs.nouvelobs.com/essais/20110311.OBS9521/le-gourou-des-revolutions-

arabes.html

[7] John Bacher, 《*Robert Helvey's Expert Political Defiance*》,*Peace Magazine*,avril-juin 2003,p.10,http://archive.peacemagazine.org/v19n2p10.htm

[8] Simon Roughneen, 《*Gene Sharp*:*Why Burmese Resistance Has Failed So Far*》,*The Irrawaddy*,22 mars 2011,http://www2.irrawaddy.org/article.php?art_id=20981

[9] Metta Spencer, 《*Training Pro-Democracy Movements:A Conversation with Colonel Robert Helvey*》,*Peace Magazine*,Janvier-Mars 2008,p.12,http://archive.peacemagazine.org/v24n1p12.html

[10] Ahmed Bensaada, 《*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le cas de l'Égypte*》,*Le Quotidien d'Oran*,24février2011,http://www.calameo.com/read/000366846fa8fa32bacd5

[11] Ahmed 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Éditions Michel Brûlé,Montréal（2011）,Éditions Synergie,Alger（2012）.

[12] *Ibid*.

[13] Manon Loizeau,*LesÉtats-Unis à la conquête de l'Est*,2005.Ce documentaire peutêtre visionné à l'adresse URL suivante: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2248625849494744048

[14] G.Sussmanet S.Krader,*Template Revolutions*:*Marketing U.S.Regime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London,vol.5,n°3,2008,p.91-112,http://www.westminster.ac.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1/20009/006W PCCVol5-No3-Gerald_Sussman_Sascha_Krader.pdf

[15] A.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op.cit*.

[16] USAID,*Initiatives to Improve Evaluation of USAID DGAssistance Programs*:*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Research Agenda*（*SORA*）,http://www1.usaid.gov/our_work/democracy_and_governance/technical_areas/dg_office/sora

[17] Mark Weisbrot, 《Why American'democracy promotion'rings hollow in the Middle East》,*The Guardian*,31 janvier 2012,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cifamerica/2012/jan/31/american-democracy-promotion-rings-hollow

[18] F.William Engdahl, 《Géopolitique et"révolutions des couleurs"contre la tyrannie》,*Horizons et débats*,n°33,octobre 2005,http://www.horizons-et-debats.ch/33/33_16.htm

[19] D.Barahona, 《The Freedom House Files》,*MR Zine*,3 janvier 2007,http://mrzine.monthlyreview.org/2007/barahona030107.html

[20] Guy Dinmore,《Bush Enters Iran'Freedom'Debate》,*The Financial Times*,31 mars 2006,http://www.ft.com/intl/cms/s/48d26298-c05211da-939f-0000779e2340.html

[21] A.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op.cit*.

[22] Richard Falk,《When is an'NGO'not an NGO?Twists and Turns beneath the Cairo Skies》,Foreign Policy Journal,15 février 2012,http://www.foreignpolicyjournal.com/2012/02/15/when-is-an-ngonot-an-ngotwists-and-turns-beneath-the-cairo-skies/

[23] RTAmerica,《*Taxpayer billions promote democracy hoax abroad*》,*op.cit*.

[24] Ahmed Bensaada,《Téhéran-Gaza:la différence médiatique》,*Géostratégie*,3 juillet 2009,http://www.geostrategie.com/1724/teheran-gaza-la-differencemediatique/

[25] Technaute,《*Iran*:*Washington intervient auprès de Twitter*》,18juin2009,http://techno.lapresse.ca/nouvelles/internet/200906/16/01-876173-iranwashington-intervient-aupres-de-twitter-.php

[26] Ahmed Bensaada,《L'Occident,les réseaux sociaux et les révoltes populaires》,*Le Quotidien d'Oran*,18 août 2011,http://www.calameo.com/read/000366846190634f1c2ca

[27] Julie Zaugg,《A l'école de la révolution》,L'Hebdo,11 mai 2011,http://www.hebdo.ch/a_lecole_de_la_revolution_102803_html

[28] Voir,par exemple,le documentaire《Les nouveaux révolutionnaires de la démocratie》de Marie-Laure Gendre et Sofia Amara.Émission《Printemps arabes:Un an après》,Spécial Investigation（Diffusée sur Canal+,le 9 janvier 2012）.Elle peutêtre visionnée à l'adresse URL suivante:http://docandfiction-tv.fr/printemps-arabes-un-an-apres-special-investigation-canal-plus-zoom.php

[29] Radio-Canada,《*Ces jeunes qui défient Moubarak*》,1er février 2011,www.radio-canada.ca/nouvelles/International/2011/02/01/004-Égyptemouvement-jeunes.shtml

[30] Project on Middle East Democracy,*MEPI's structure*,http://mepi.state.gov/structure.html

[31] A.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op.cit.

[32] *Bertelsmann Stiftung*,《*The Arab Spring*:*One Year After*,*Transformation Dynamics*,*Prospectsfo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Arab-European Cooperation*》,Europe in Dialogue 2012,http://www.bti-project.de/uploads/tx_jpdownloads/Europe_in_Dialogue_2012_Arab_Spring.pdf

[33] The Revolution Business-World,juin 2011;Ce documentaire peutêtre visionné à l'adresse URL suivante:http://www.wat.tv/video/the-revolution-business-world-3s4f1_31wod_html

[34] *Express FM*（Tunisie），《Les blogueurs s'expliquent sur leurs rapports présumés avec les USA》,Émission Net Show,20 novembre 2011 à 14h.Cette émission peutêtre écoutée à l'adresse URL suivante:http://www.youtube.com/watch?v=KXKLULz Isu Y&feature=player_embedded

[35] *Algérie-Focus*,《*Interview de Slim* 404,*le blogueur tunisien devenu ministre*》,28 juin 2011,http://www.youtube.com/watch?v=t9nr-TMKx1c&feature=player_embedded

[36] Sofia Amara,《*Monde Arabe*:*l'onde de choc*》,Spécial Investigation,（Émission diffusée sur Canal+,le 21 février 2011）.Elle peutêtre visionnée à l'adresse URL suivante:http://interobjectif.net/specialinvestigation-monde-arabe-l-onde-de-choc/

[37] Documentaire《*Les nouveaux révolutionnaires de la démocratie*》de Marie Laure Gendre et Sofia Amara.op.cit.

[38] David Wolman,《Did Egypt Detain a Top Facebook Activist?》,Wired,2 février 2011,http://www.wired.com/dangerroom/2011/02/leading-egyptian-facebook-activist-arrested-friends-say/78757_

[39] Julie Zaugg,《A l'école de la révolution》,op.cit.

[40] A.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op.cit.

[41] Ahmed Bensaada,《*Le printemps arabe*,*un an après*:*révolte*,*ingérence et islamisme*》,Conférence organisée à l'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20 janvier 2012,http://www.ahmedbensaad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52:conference-q-le-printemps-arabe-unanapres-revolte-ingerence-et-islamismeq&catid=46:qprintemps-arabeq&Itemid=119

[42] Aimée Kligman,《*Why is Gene Sharp creditedfor Egypt's revolution*?》,*Examiner*,5 mars 2011,http://www.examiner.com/article/why-is-gene-sharp-credited-for-egypt-s-revolution

[43] Samuel P.Jacobs,《Gene Sharp,The 83 Year Old Who Toppled Egypt,14 février 2011》,The Daily Beast,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1/02/14/gene-sharp-the-egyptian-revolts-prophetof-nonviolence.html

[44] Julie Zaugg,《A l'école de la révolution》,op.cit.

[45] Le Monde,《*Hillary Clinton milite pour la liberté sur Internet*》,16février2011,http://www.lemonde.fr/technologies/article/2011/02/16/hillaryclinton-milite-pour-la-liberte-sur-internet_1480855_651865.html

[46]《*Google*,*lesÉtats-Unis et l'Égypte*》,Le Monde,3 février 2011,http://www.lemonde.fr/technologies/article/2011/02/03/google-les-États-uniset-l-

Égypte_1474508_651865.html

[47] Movements.org,《About》,http://www.movements.org/pages/about/

[48] Alliance of Youth Movements, 《*Attendee Biography*》,Sommet 2010,http://www.movements.org/page/-/Bio%20Book%20AYM%20Summit%202010.doc

[49] Jenny O'Connor,《*NGO:The Guise of Innocence*》,The South African Civil Society Information Service,17avril 2012,http://www.sacsis.org.za/site/article/1269

[50] Ron Nixon,《U.S.Groups Helped Nurture Arab Uprisings》,The New York Times,14 avril 2011,http://www.nytimes.com/2011/04/15/world/15aid.html?pagewanted=all

[51] Pierre Boisselet, 《La"ligue arabe"du Net》,Jeune Afrique,15 mars 2011,http://www.jeuneafrique.com/Article/ARTJAJA2617p052-056.xml0/internet-facebook-hosni-moubarak-zine-el-abidineben-alila-ligue-arabe-dunet.html

[52] Evgeny Morozov,《Facebook and Twitter are just places revolutionaries go》,*The Guardian*,7 mars 2011,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1/mar/07/facebook-twitter-revolutionariescyber-utopians

[53] Pierre Boisselet,《La"ligue arabe"du Net》,*op.cit.*

[54] *Algérie-Focus*,《*Interview de Slim 404,le blogueur tunisien devenu ministre*》,*op.cit.*

[55] David D.Kirkpatrick et David E.Sanger,《A Tunisian-Egyptian Link That Shook Arab History》,The New York Times,13 février 2011,http://www.nytimes.com/2011/02/14/world/middleeast/14egypttunisia-protests.html?pagewanted=all

[56] AFP,《*Égypte:le PDG de Google"très fier"de ce qu'a accompli Wael Ghonim*》,15 février 2011,http://www.france24.com/fr/20110215-Égypte-le-pdg-google-tres-fier-qua-accompli-wael-ghonim

[57] Laura Onstot,《*Jacob Appelbaum,Wiki Leaks Researcher Detained By Feds,Defended by His Employer*》,*Seattle Weekly*,3août2010,http://blogs.seattleweekly.com/dailyweekly/2010/08/employer_defends_seattlebased.php

[58] Yves Eudes,《Washington défend l'Internet libre…mais sous surveillance》,*Le Monde*,21 février 2011,http://www.lemonde.fr/international/article/2011/02/21/washington-defend-l-internet-libremais-sous-surveillance 1483056_3210_html

[59] Damien Leloup,《Les Tunisiens osent enfin parler,et cela,aucune censure ne l'arrêtera》,*Le Monde*.fr,10 janvier 2011,http://www.lemonde.fr/technologies/article/2011/01/10/les-tunisiens-osentenfin-parler-entre-euxet-cela-aucune-censure-ne-l-arretera_1463210_651865.html

[60] Laura Onstot, 《*Jacob Appelbaum,Wiki Leaks Researcher Detained By Feds,Defended by His Employer*》,*op.cit.*

[61]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Washington,DC,21 janvier 2010,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519.htm

[62] Yves Eudes,《Washington défend l'Internet libre…mais sous surveillance》,*op.cit.*

[63] Yves Eudes, 《Commotion,le projet d'un Internet hors de tout contrôle》,*Le Monde*,30 août 2011,http://www.lemonde.fr/technologies/article/2011/08/30/commotion-le-projet-d-un-internet-horsdetout-controle_1565282_651865.html

[64] Google Blog,《Some weekend work that will（hopefully）enable more Egyptians to be heard》,31 janvier 2011,http://googleblog.blogspot.ca/2011/01/some-weekend-work-that-will-hopefully.html

[65] Ahmed Bensaada,《Mais qui est donc Tawakkol Karman,la première femme arabe nobélisée? 》,Le Quotidien d'Oran,13 octobre 2011,http://www.calameo.com/read/0003668468e60f04bc483

[66] A.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op.cit.*

[67] NED, 《*Egypt*》,2010 Annual Report,http://www.ned.org/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0-annual-report/middle-east-and-north-africa/egypt

[68] 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op.cit.*

[69] Egyptian Democratic Academy,《About us》,http://egyda.org/blog/about/

[70] Charles J.Hanley, 《US training quietly nurtured young Arab democrats》,*Washington Post*,13 mars 2011,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1/03/12/AR2011031202234.html

[71] RTAmerica,《*US dollarsfight tofundpopular movements abroad*》,14janvier 2011, <http://rt.com/usa/news/usa-funding-movements-abroad/

[72] Cam McGrath,《EGYPT:Military Rulers Clamp Down on Civil Society》,IPSNews,5 janvier 2012,http://www.ipsnews.net/2012/01/egypt-military-rulers-clamp-down-on-civil-society/

[73] NED, 《*Tunisia*》,2011 Annual Report,http://www.ned.org/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1-annual-report/middle-east-and-north-africa/tunisia

[74] Charles J.Hanley,《*US training quietly nurtured young Arab democrats*》,op.cit.

[75] Sourcewatch, 《*Algerian League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s*》,http://www.sourcewatch.org/index.php?title=Algerian_League_for_the_Defense_of_Human_Rights

[76] NED, 《*Algeria*》,2005 Annual Report,http://www.ned.org/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05-annual-report/middle-east-and-north-africa/description-of-2005-gra-1

[77] NED, 《 *Algeria* 》 ,2006 Annual Report,http://www.ned.org/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06-annual-report/middle-east-and-northern-africa/description-of-2006--1

[78] NED, 《 *Algeria* 》 ,2010 Annual Report,http://www.ned.org/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0-annual-report/middle-east-and-north-africa/algeria

[79] Solidarity Center, 《 *Algeria* 》 ,www.solidaritycenter.org/content.asp?pl=863&sl=407&contentid=861

[80] Cathy Feingold, 《*Letter from AFL-CIO International Director Cathy Feingold to Algerian President Abdelaziz Bouteflika,* 》 *,4 mars 2011,www.solidaritycenter.org/files/algeria_cflettertobouteflika030411.pdf*

[81] Cathy Feingold, 《 *Letterfrom AFL-CIO International Director Cathy Feingold to Algerian President Abdelaziz Bouteflika*》,14octobre2011,http://www.solidaritycenter.org/files/algeria_cfletter101411.pdf

[82] Ahmed Bensaada, 《*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op.cit.*

[83] Craig Whitlock, 《*U.S.secretly backed Syrian opposition groups,cables released by Wiki Leaks show* 》 ,*Washington Post*,17avril2011,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us-secretly-backedsyrian-opposition-groupscables-released-by-wikileaks-show/2011/04/14/AF1p9hw D_story.html

[84] Charlie Skelton, 《The Syrian opposition:who's doing the talking?》The Guardian,12 juillet 2012,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2/jul/12/syrianopposition-doing-the-talking

[85] NED, 《 10 years of the Reagan-Fascell Democracy Fellows Program》,2012,http://www.ned.org/docs/Reagan Fascell Democracy Fellows Progra m Tenth Anniversary Tribute.pdf

[86] Christophe Ayad, 《Quand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mesys aidait Kadhafi à traquer les opposants libyens 》 ,Le Monde.fr,2 décembre 2012,http://www.lemonde.fr/afrique/article/2011/12/02/quand-la-societefrancaise-amesys-aidait-kadhafi-a-traquer-les-opposants-libyens_1612924_3212.html

美国非政府组织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

——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例

最让人感到尴尬的，莫过于思想本已明确，却偏要在言辞上含含糊糊、飘忽不定。

——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

每年，美国政府都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和加强民主的有关项目上花费超过15亿美元。华盛顿拥有与此相匹配的人力、后勤资源和手段来支持那些寻求民主改革的人。这一充满睿智的步伐始于里根总统的第二任期（1984—1989年）。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创建了大批企业，政府担心出现投资回流热潮而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同时亦使其避免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样太过张扬而引发诸多争议。

此后，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就得到了美国私人及公共基金的大量资助，并成为美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协调行动的一部分。美国私人基金会借此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些基金会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其极好地代表了超越美国各党派的政治共识——美国国家利益至上，只要能够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政治生活施加影响。

美国的一个新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推动民主的计划进行大幅调整，将施加国家间影响（自上而下战略）的传统战略束之高阁，转而实行在具有“高战略价值”的国家大举资助“公民社会”以推动“民主革命”（自下而上战略）的新战略。

之所以重新定位，主要目标是确保制度的稳固，其方式是赋予军队关键角色，让它在某种程度上确保制度的延续性。其次是积极支持“公民社会”，保证民主化的可控性，发挥好非政府角色的作用，甚至采用“由下层”提出协商的做法。“这是为了对那些被认为不稳定的政治制度进行深度变革”，使之走向自由的现代化，即从遗留的专制制度走向“开放社会”模式。

达成这一目标的首要任务是进行一项长期工作，不仅仅是优先致力于颠覆政府。若一些独裁者陷入当地活动分子的猛烈抨击，活动分子已经成功发动了群众，那就再好不过，但大多数情况不会如此神速。在华盛顿的战略家看来，更重要的是一点一点地建设成稳固的“开放社会”，并将其完全融入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共同体中。

“开放社会”的特征在于政府能注意到街头的呼声，并不为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创举性改革设置障碍。它是一种非独裁的社会模式，该模式下的政治机制是透明的，建立法治国家，实现媒体的自由与多元化发展，开展市场经济。

我们将在下文看到，NED及其他美国基金会建议的推动一些国家在政治上改旗易帜的方法，在每一个国家的做法和模式都极为相似。这已被世人察觉，不论是2000年强迫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放弃权力，2003年驱赶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85年至1990年任苏联外长，1992年至2003年任格鲁吉亚总统）下台，还是2011年2月推翻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

在这些国家中，我们每次都能观察到一个相同的经过精心设计的场景。那就是和平示威的人群开始行动时，总会使用统一的简单标语，远离任何党派意志，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从而在运动中避免

了民众分裂。这一非暴力战术尤其多见于家庭中的年轻人或母亲，他们迫使警方妥协，快速彰显出这一“为人不齿”的政权具有显而易见的脆弱性，下一步就是将其推翻，或者利用选举发力（塞尔维亚、伊朗），或者加速独裁者下台（突尼斯、埃及）。

仔细回望，我们可以确定这些绝对是有组织的街头动员，它们抹杀了民主革命的几分政治色彩，人们不会再误以为这些“革命”完全出于自发。

为阐明最近在中东、北非地区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件中美国基金会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将提出一些问题，以明确怎么给美国对该地区的普遍民主计划定性。我们还将详细研究NED的本质、资助模式及其当前在该地区所支持的计划的类型。换言之，我们要探寻NED想在这片区域推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它为何将大部分建设民主的工作交由当地的政治派来做，自己只为其提供培训和资金支持。

为阐明华盛顿在中东、北非地区国家内部事务中所做的具体承诺，我们将列出时任美国国务卿兼“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会长的希拉里·克林顿的两段讲话摘要。这些讲话是希拉里于2011年11月7日在美国国务院内的晚会上为NDI颁奖时发表的。

> 我们不能忘记：当阿拉伯城市的街道还安安静静的时候，NDI已来到这片区域，忙着建立关系，支持那些致力于将阿拉伯从漫漫严冬带向新的春天的人们，让他们的声音能够顺利表达。我们无法得知那些勇敢的人们下一次将在何时何地呼唤其权利的回归，但我们打赌，NDI已到达了那个区域，因为它是自由最好的卫道士。成立超过了25年，NDI及其在NED内部的盟友已成为美国向世界做出的承诺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
> ……

> 我们恭喜NDI所做的工作，它建立了一套行为规则，适用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政党。我们应推进这些民主规则，让那些人遵守规则，负起责任。

细细品味这些语句，我们就会发现存在“一整套”民主模式，所有开展“革命”的人士可以随取随用。

我们来看NED，它通过传播“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此处意味着推进市场的民主化，通过当地角色建立起这种效应，并使之上升为政治意志，从而完美完成其传播华盛顿乐见的根本政治思想的任务。它深知目标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其无法回避的政治前景，但不具任何论战精神，并从实质上混淆“民主”一词本身在政治上的细微差别。

换言之，基于美国的经济和社会计划，NED希望在全世界各处建立起敢闯敢干的“公民社会”，并依靠因各类自身原因被收买的精英进行去意识形态化工作，而这完全是去政治化和非党派化的。我们观察到，在美国官方演讲中，如2012年7月NED旗下日报《民主日报》的一些文章称，华盛顿已准备好与当地任何政治对话人达成妥协，只要后者不离开美国所能接受的民主框架并与美国利益兼容。

NED，一个独立机构？

NED创立于1983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美国法律机构，由美国国会资助，并由私营部门管理。自成立起，它便开始资助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项目。这些项目涵盖从当选官员的培训到提升媒体的独立性，并获得了一些政治集团组织和人权保护联盟的帮助。它平均每年向当地个人、参与其行动的美国组织授予1000份奖金。2013财年，该组织预计得到1.04亿美元预算。

NED由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党人士联手创办，以理事会治理方式在两党间达成平衡，并由美国国会支持。尽管其95%的资金来自国务院，得到了美国国会的许可，但由于法律给予的自由行事权，它在法理上成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美国政府无须直接监督它的行动。

因此，NED的运作具有高度的透明性和责任性，也反映出其创始人的深厚信仰，即海外民主的推进应以可见的方式领导。它优先发表的文件，同其预算和其对目标国的捐赠一样，在其网站上是公开的、可见的。此外，成立时的法律文本明确规定：它每年应向美国国会提供一份活动报告，并应服从“政府会计室”领导的独立审计评估。

在里根政府的促进下，美国国会通过创立NED表明“民主干预”的时刻已到，如NED一般的基金会可以向对华盛顿推崇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理念持开放态度的伙伴，提供经济和后勤帮助。

创建NED的法案禁止其直接干预外国选举。任何基金均不得由NED及其分支用以资助政治活动。[1]然而，NED 1984年就干预了巴拿马总统选举，其间向巴军方支持的尼古拉斯·阿迪托·巴尔莱塔提供了15万美元资助。尽管巴尔莱塔赢得了选举，但随后又被军队赶下了台。里根政府一开始还为NED大量出资的行动辩护，称其是为推动极权国家或民主基础尚脆弱国家的民主事业。

与NED相同，美国还动用“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其作为“推动民主”的工具。USAID从未排斥通过渗透、去稳定化等手段在大型产业、经贸领域进行秘密政治操作。

USAID于1961年由肯尼迪政府创立，是接受美国外交国务秘书指令的联邦机构。这一机构负责大部分对外非军事援助。其使命包括支持经济增长、助力美国长期外交政策，尤其是推进农业、经贸、公共健康项目、民主，预防冲突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它还承担减少贫困、救济自然灾害受害者的使命。自1961年以来，它在大量不同项目

中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谋求解决国家发展的束缚性问题。因此，它的使命和目标较NED更为庞大，后者更集中于政治和短中期任务。

1995年克林顿政府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简要地指出：“推进民主方面的工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令人满意。它发展了我们的利益。”华盛顿在柏林墙倒塌后重拾其青睐的民主和平理论，抛弃了中央情报局从前的粗暴做法，改变了行事方法及形象，转而优先运用“软实力”，在年轻人那里找到了新的拥趸。

NED的理论基础

在有关NED的著作文献中，我们经常发现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跨国理念的进步，这一进步又能成为推动民主的媒介。由于对这个因素的复杂性缺乏预期，我们先做出一个假设，即民主将由非政府组织、私人基金会推动，其活动不利于那些被认为是低效、腐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主权国家。“跨国性”在于它是在超越国家框架的全球化空间中被构建的，很大程度上在国家控制的范围外实现。

用几句话来总结跨国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

搁置完全的国家主权，立足于促进全球化。

承认多中心的现实。

拥有高效沟通方法和广大财政手段的非国家角色（非政府组织及各类基金会）大量存在。

超越国家领土框架，推进经济、外交和文化等的世界一体化。

为建成“开放社会”而进行社会和政治空间重组。

非政府组织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质疑国家的作用已成为惯例。例如在东欧新诞生的民主国家和独联体的“新兴民主国家”中，非政府组织完全靠“超国家的理想”来服务于具体利益，组织超越主权国

家边界的政治活动。总之，就是在不推崇自由市场的主权国家发展自由市场，也就是扶植起自由选择其政治和社会方向的政府。

同理，还要颠覆那些任人唯亲的腐败专制政权，因为这种国家难以完全融入超国家的框架。此处我们可以联想到突尼斯和埃及。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非政府组织填补了国家缺位、治理不善留下的空白，尤其是在一些独联体国家。正是在这些区域，NED资金一拥而上，意在建立“公民社会”。

据美国官方言论，“推动自由民主”应允许民间组织在“小国家”内部充分发展，国家只负责保障内部安全，保障创业权，发展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间的伙伴关系，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但同时，正如其他跨国投资者一样，务必要全心全意服务于美国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NED的目标在《民主杂志》上曾有过清晰的表述。

我们能将美国人的目标概括如下：“所谓‘软实力’，就是能主导规则。”“软实力”是一种通过既有模式的吸引力来施加政治影响的技术。确切地说，所谓良治，就是推进市场的民主。现在，我们来了解NED所用的方法有哪些主要特色。

透明度。NED对外的资金、后勤援助是公开运送的，从不将其活动神秘化。它也向一些遭遇财政窘迫而难以继续完成任务的第三方机构及NED的受益者提供帮助。如2011年NED为IRI在叙利亚的任务提供了多达50万美元资金。

独立性。NED在援助民主时会精心运用无党派色彩的手法，以确保其决策是由独立于美国政府的委员会做出的。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两党在NED董事会有很多代表。

尊重多元化。NED旨在建立或加强民主，常在受援国资助多个政党。因此它并不寻求在目标国操纵选举结果，而是建设一个政治竞争体系。

关于这最后一点，现实毫无疑问离理论很远。美国公共基金通过NED或USAID捐出的资金支持一个阵营来反对另一阵营似乎才是准则，尤其是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和中东欧的塞尔维亚（2000年），甚至更久远的保加利亚（1990年选举）。正如在突尼斯那样，我们能想象NED资助埃及的工人政党或新马克思主义工会吗?

NED资助机制的源泉

在美国，非政府组织享有税收优惠，其出资人亦可减税，如为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或其他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都可享受这一待遇。按照章程，美国非政府组织有权在境外开展活动、资助他国的非政府组织。

NED的资助行为每年须由美国国会针对国务院提供给USAID的预算项目进行投票。NED还得到了几个协会的资助，这些协会本身也通过签订联邦合同直接或间接地接受政府资助，如“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约翰·奥林基金会”及“林德和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

美国国会给予NED年度捐助，随后将这笔资金转移至4个与之有联系、致力于实现其社会目标的基金会。这4个基金会再负责将资金分发给外国受益者，这些受益者通常是一些非政府组织，还有工会、政党、媒体等。这4个基金会分别是：

（1）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活跃于全世界工人和工会当中，领导人为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总书记约翰·J.斯威尼。

（2）美国商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负责商业和工业事务，领导人是被称为“老板中的老板”的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

（3）“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领导人为参议员约翰·麦凯恩，200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

（4）“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领导人为美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NED向一些转向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直接提供金援（“酌情补助”），或通过前述的4个机构间接提供。如是，它向不同领域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工作、经贸和工业事务以及政党发展。

NED官网指出，2011年其基金被注入100多个国家，“正式说法”是投入超过1.18亿美元，分散在当地数以千计的项目上。我们看到其资助的机构均很特别，都有“精准的政治目标”，且必须符合清晰的政治和战略目标。

NED在中东、北非“革命”中的行动

从东欧到独联体，以及当前从阿拉伯世界到伊朗的一系列“革命”，民众动员之风日盛。这里有对选举结果非法性的争议，也有对当权者合法性的纯粹和直接的疑问。在所有情形中，掌握交流新技术（推特、脸书、带照相功能的手机等）的年轻人，成为大量非暴力游行示威的发起者和坚定的执行者。

在北非和中东，尽管自2000年初以来革命就规律性地时隐时现（反食品价格革命、大学生革命等），但直到2010年底，街头压力才显著增长。但这一次，不同于警方，军队没有做出反应。与前些年不同，军队选择放任示威者的行动，在突尼斯和埃及，这导致人们一直相信必将“永存”的领袖和政党被推翻。

但是，这一变革没有改变现行政治制度的深层次结构。深入那些政治“革命”尚未完成或部分完成的国家就能发现，即使到2012年秋，这些政治体制仍极不稳定。在这些民主转型的国家，公民社会被发动起来，而军队、警察及那些或多或少即将放弃特权的阶层也是如此。

大量当地或外国非政府组织现场向网络反对派提供后勤和资金支持，并持续给予政治和经济建议。

在局势持续动荡、仍极不稳定的背景下，与其他积极从事“推广民主”的美国基金会一样，NED继续进行实质性工作，这项工作在2010年底大动乱之前好几年就已开始。

回想起21世纪伊始，东欧发生“颜色革命”并取得成功。自2003年以来，众多记者、研究人员和政治分析家，找到了“公民社会”以及大量当地或外国非政府组织在“颜色革命”中所扮演决定性角色的证据。它们全部或部分由美国的公共基金资助。

尽管每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要经过长篇论述，才能发现各国局势实际存在很大区别，但它们有如出一辙的推翻政府的框架，先后在中东、北非地区迅速推进。本·阿里（突尼斯，2011年1月）、穆巴拉克（埃及，2011年2月）和卡扎菲（利比亚，2011年8月）纷纷下台。到处都是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有时能动员超过100万人。这些示威游行在数周内充斥着荧屏，显示长久以来被剥夺的话语权终重获，被过分侵犯的尊严得到挽回。一些城市和乡村变成了发泄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怨念的场所，这在西方民主眼中其实是极令人惊讶和难为情的。

此前的伊朗

在此，我们首先提及伊朗2009年的政坛大骚动。当年6月12日，伊朗人走向投票箱选举新总统，时任总统内贾德的支持者与反对派对垒，后者希望不再由保守派掌权。但是，投票的结果却是内贾德以超过85%的得票率当选。反对派候选人立即大呼选举不公正。社交网站即刻采取动员行动，大量公民走上大城市街头示威游行，要求当局宣布此次选举结果无效。该事件被称为“绿色革命”，被认为是“网络革命2.0”的第一次实战。民众用英文写的一些简单标语，包括最有名的“我

的选票哪去了？”在德黑兰街头飞舞，引起西方媒体在数周内大规模报道。

尽管这些事件震动了体制，但伊朗今天依然存在，被怀疑选举舞弊的总统依然在台上。尽管2004年以来华盛顿通过“自由之家”、USAID和NED等途径采取了各种技术、金钱手段，试图在当地赞成民主的组织的帮助下，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但互联网这一表达抗争的工具也没能推翻阿亚图拉（对什叶派领袖的尊称）制度。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丹尼斯·罗斯主导着华盛顿的伊朗政策，其在小布什时期显得非常积极。美国对推进伊朗民主项目的资助从2004年的1500万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6000万美元。此后由于2009年6月12日选举期间发起的“绿色革命”失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中止从小布什时期就发起的推进民主项目，因为美国不希望给伊朗一个放弃核问题谈判的借口。

奥巴马时期，伊朗人权文献中心、“自由之家”、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IFES）等机构，争相向“拥有参与自由和公正选举权利”的公民提供支持，但NED的主要组成部分IRI的2011财年的财政预算却被美国国会驳回。至于2012财年，据NED官方网站数据，其在伊朗仅资助了5个项目，总预算为1 345 285美元，其中957 800美元“用于支持保卫新闻自由的机构”。自那时起，尽管震惊阿拉伯世界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但德黑兰街头仍然陷入沉默，伊朗政权依旧稳固。

“阿拉伯之春”的活力

好几个问题浮出水面，既有关于这些民众运动的自发性的，也有关于权力转移的程度的。如此真切的“革命”形势是否引领了“革命”的完成？遭受专制主义压迫的民众是否获得了完全自由，并在洗清了凌辱之后重拾骄傲？

产生“革命”的过程、“革命”对日常政治的影响和美欧的外交姿态让我们困惑。2010年底以来，民主在中东、北非地区急速推进。但它涉及哪些形式的民主转型？尤其是NED等非政府组织如何干预政治变革?

正如NED在其官网“我们在哪儿工作”一栏中所指出的，这些年来，NED在所有“重点国家”的存在感都极强，尤其是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政治机构和媒体。因为显然对华盛顿来说，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制度濒临破产，不再能承担起确保美国战略和能源利益的安全阀功能。即使华盛顿确实不知道断裂点怎样，何时，在中东、北非何地出现，但承认了该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已让人无法忍受。因为美国观察到了太多问题：人口变革（低出生率）、技术变革（新交流、信息技术）、越来越高的失业率、高涨的食品价格及日益猖獗的腐败。一切都被贴上如下标签：当局不尊重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经过一年多的和平抗议，“革命”行动通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一些交流、信息新途径，在这一地区的家庭中持续传播，但2010年底的那种情况再难回归。

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并非存在政治体制变迁，而是政治体制变迁后的机能缺失。奥巴马政府一直深知此事。正是这些情况让NED、“自由之家”及USAID等非政府组织加速培养精英以成为体制稳定的基石。

在潜在的不安全背景下，积极的公民社会而不是正处于加速解体阶段的专制政府，成为“推进民主”机构更可靠、更稳定的合作伙伴。因为公民社会更希望参与交流，更愿意提出社会倡议，比陷入绝境奄奄一息的政权的态度更为缓和。显然，对NED来说，更希望合作的民间组织能以更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帮助讨论和弥合社会分歧。公民社会希望通过选举向新领导人摊牌，它能引导民意，寻求建立“政治和公民参与”，限制极端主义：这正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赌注。

基于这些原因，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开放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问题，而且成为一个战略需要，因其旨在确保一种必要的政治稳定性，从而确保地方、地区和国际安全。当然，民主转型的危险也确实存在，奥巴马政府也了解，但这不会妨碍NED继续其支持建立开放和民主社会的行动。关键目的是要平稳地实现这一转型，其基石是开展政治改革，举行具有政治代表性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但只有“程序性”的民主是远远不够的，倘若它只带来一个新的独裁政府，或许会对一些少数族裔、宗教少数派及少数人种不利。长期的民主依赖于稳定的民间组织、国家对法制的尊重、独立机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华盛顿面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其政治代理人能接受多元化选举结果。在华盛顿还希望新政府，不管是埃及穆兄会还是突尼斯复兴运动党，能以清晰的思路实施改革，要意识到没有人相信改革能一蹴而就。这就是为什么通常用“民主转型”来为当前这一时期归类。

对于最近突尼斯和埃及的选举中伊斯兰政党的获胜，美国政治领导人对原则上是否将这些政党作为有效对话者尚未表态，但NDI已在第一时间拒绝与埃及穆兄会接触。

为说明美国在面对自2010年底打响第一枪以来的阿拉伯“革命”时，秉承的实用主义思想，我们首先摘录了几段希拉里于2011年11月7日，在美国国务院内的晚会上为NDI颁奖时发表的演讲。

> 理性的个人会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对一些东西，包括所有各方，不论是宗教的抑或是世俗的，应该达成一致。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给他们提供支持，更有助于为这一地区的人民和相关国家的人民建立自信，使之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其艰难取得的权利。介入民主事业的政党应抛弃暴力；它们应尊重法制，尊重言论、宗教、结社、集会自由，尊重妇女和少数群体的权利；一旦其选举失败，它们就应放弃权力；在宗教和人民内部存在深刻分歧的区域内，它们不应擦起引发新动乱的火花。

换言之，各政党发表的演说没有其在这片土地上的日常政治态度重要。

没有人希望看到另一个伊朗的出现，没有人希望看到一些政党有军事分支或其外交政策受到好战主义的影响。当一些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镇压其同胞或颠覆民主原则时，我们将站在那些反对他们和保卫民主的人的一边。

无独有偶，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于2011年2月3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采访时，毫不隐讳地向记者雷切尔·玛多透露：NED已存在于埃及，并致力于基层政治的建设，尽管当时穆巴拉克尚未下台。当天奥尔布赖特在受访时，还提及了在不久的将来，伊斯兰主义者赢得选举并成为美国伙伴的可能性，她说：“有很多组织表达了其愤怒情绪，其中就有伊斯兰派别，它们希望参与和平政府。”她还说：

而我想起了一个例子，那就是我们经常忘记提及的，20世纪90年代末印尼独裁者苏哈托被推翻，而后由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府代之。

……

你们看，有“伊朗模式”，但同时也有“印尼模式”。我相信埃及人将开放地谈论未来的政府，并吸纳那些承认妇女选举权的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

我们长久以来与埃及一道致力于发展完善的公民社会，而且与准备好参加自由和公正选举的反对派组织了讨论、谈判。

……

若包括穆兄会在内的伊斯兰组织放弃了将暴力作为表达方式的做法，我相信它们将被吸纳成为温和的世俗政府的一部分。

自打奥尔布赖特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在卡特时期（1976—1980年）负责外交政策后，她就成为美国政坛的一个关键人物。她宣布支持“印尼模式”，允许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掌权，掌握实权的军方亦退居幕后。美国前国务卿的这一访谈难道没有挑明美国已试图在中东、北非地区打破“零记录”，清除挡路甚至危险的领导人，且不论选举结果如何，都希望军方确保权力延续吗?

“颜色革命”的经验

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其政治进程具有相似性。那么，从塞尔维亚到埃及，从乌克兰到突尼斯，它们在政治进程上又有哪些不同阶段?

接下来，我们将列12个方面来介绍自2000年米洛舍维奇倒台以来，我们在很多国家观察到的政治进程规划：

（1）家族统治日趋不稳，传统盟友只提供口头保护。

（2）年轻活动分子（大部分是网络反对派）中的一小部分精英，在“自由之家”、NED、CANVAS、USAID、NDI、IRI、OSI等外国组织内接受较长时间的非暴力抵抗技术培训。

（3）这些活动分子再接着从公民社会的关键部门内吸收、培训积极分子，以支持、壮大其行动。

（4）设计一些简单的拥护联邦制的标志和标语，随后以小册子、胶黏物、传单、网站和博客等形式大量传播。

（5）通过首都内外的社交网站号召以和平方式示威，以扰乱警察工作。

（6）为示威者配备经过非暴力抵抗技术培训的骨干，在上街游行时，在摄像机和手机镜头前大量展示其统一的标志、标语和口号，并利用手机将相关图片上传至社交网站。

（7）在街上围观或收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节目的民众，很快深信力量对比对现政权不利，并被煽动起来推翻政府。

（8）受到侮辱的领导人面对广泛动员和越发增强一致性的游行时心慌意乱。他们会进行反击，警方则或多或少地使用暴力镇压。

（9）随着时间推移，军队会放弃支持现政权。

（10）在民众运动的坚决要求下，领导人常面临国际舆论压力，甚至来自其从前的盟友或朋友的压力，然后可能发生三种情况：一是领导人放弃权力（埃及、突尼斯）；二是平息民众的愤怒情绪（伊朗、白俄罗斯）；三是在外国军事干预下被推翻（利比亚）。

（11）临时政府在那些“已被解放的”国家中被组建起来，并在“民主转型”的号召下开创新时期，美国希望这个时期越短越好。

（12）组织自由选举，通常一些保守政党将上台，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将民众运动的发起者如最激进的社会和社团力量（左翼党派、萨拉菲派等）排除在外。

让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历史。1998年10月的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一伙学生创建了“抵抗”组织。2010年至2011年，该组织的标志（黑色背景上的一个握紧的拳头）突然出现在伊朗、埃及和突尼斯街头。因为自米洛舍维奇倒台以来，“抵抗”已成为非暴力青年运动的榜样。这一组织随后改组为政党，后又自称是独立的非政府咨询组织，现在则被称为CANVAS。

在2000年11月26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2]美国记者罗杰·克恩披露“抵抗”大量接受美国的援助。他提到了USAID为推翻米洛舍维奇启动了一笔2500万美元的款项。USAID副署长唐纳德·普雷斯利宣称，还向“抵抗”组织捐赠了数十万美元直接用于落实“示威必需品”，如T恤、小册子和印有拳头标志的粘贴物。而IRI通过NED给“抵抗”的资助高达180万美元。

2002年，一些“抵抗”成员建立了CANVAS，开始致力于为非暴力抵抗的阿拉伯、古巴或玻利维亚的年轻活动分子，提供美国政治理论家吉恩·夏普倡导的非暴力理论的培训。当时该理论已被翻译成25种语言。[3]

CANVAS还向非暴力政治反抗运动和大量东欧、独联体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青年组织提供培训。其中包括格鲁吉亚的“够了”、乌克兰的“是时候了”、白俄罗斯的“牛仔”、阿尔巴尼亚的“够了”、俄罗斯的“保卫”、吉尔吉斯斯坦的“站起来”、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锤”和黎巴嫩的“自由脉冲”等。2011年，大量青年活跃分子完成了在贝尔格莱德的CANVAS总部的实习后，“4月6日青年运动”在埃及诞生。

“抵抗”的标志是黑色背景上的一个握紧的拳头，首先被CANVAS采用，随后成为通行标志。从此前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塞尔维亚，再到2010年底以来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这一象征符号背后始终隐藏着“革命”的自发性问题，以及面对华盛顿时的国家政治主权问题。

被操纵的“革命”?

2011年6月7日，瑞士记者伊娃·格林在《日内瓦论坛报》披露了2011年2月前后，即埃及“革命”发生之前和期间，促使穆巴拉克下台的埃及青年示威者同贝尔格莱德的联系及其所获的建议。以下是文章摘要：

> 2011年5月16日，在刚从独裁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埃及首都，“4月6日青年运动”与塞尔维亚的“抵抗”举行会议，商讨苏丹问题，就是在那里启动了一个青年运动组织。和“抵抗”一样，“4月6日青年运动”决定不组成政党和推选候选人参与选举。和塞尔维亚人一样，埃及人也在培训未来的革命者，他们与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也门等国的青年人均保持着联系。埃及人充当着联络先锋。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德纳塞在法国《论坛报》2011年6月1日的采访中表示，[4] 多国首脑发生变动应归因于“阿拉伯之春”：“我不相信这些准备了多年的革命是自发的。2007年到2008年，在‘自由之家’、IRI和CANVAS等美国非政府组织的主导下召开过多次会议，与会者大多为博主及相关运动的领导者，他们种下民主的种子，并为革命创造了良好的土壤。苏联解体、塞尔维亚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与格鲁吉亚‘玫瑰革命’等事件如出一辙。”

外国政治影响有条不紊地隐藏在有身份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背后，这些组织的引领者常接受“自由之家”、IRI及NDI等组织的培训，而所有上述机构的资金均部分或全部由NED，事实上就是美国国会赞助。

“阿拉伯之春”期间，这些“革命”最具迷惑性的一面就是所有国家的示威者均使用无党派和有争议的标志和标语。毫无疑问，“阿拉伯之春”的核心口号是“人民希望政权垮台”，这意味着现政权难以控制和反对这种一致性。但从2010年底到现在，还有大量其他标语也已为世人所知：

2011年1月25日“革命”的18小时中，数千埃及人有节奏地高呼的“离开”，成为“阿拉伯之春”期间最强势的口号；

另一个不论在利比亚还是在叙利亚均被反对派齐声高喊的口号是“人民希望推翻政府！”；

在叙利亚，为回应建议拿起武器的人们，“造反者”毫不犹豫地回答“和平，和平！”，以宣示他们对让其有机会在街头付诸实行的非暴力革命理念的忠诚；

在叙利亚登场的著名标语“不再要部落制度：我们是同一个大部落”，将市场营销手段暗地引入政治，企图将所有民众集中到一个没有丝毫意识形态色彩的民主计划上；

其他经常出现在街头的关键词或表达还有“尊严”、“结束了”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都具有支持联合和易于发动民众的特点。

非暴力行动作为推翻政府的一种技术，它替代了武装反抗和传统的城市冲突策略，后两者常逐步升级为暴力并最终失败。它以推动权力关系改变、颠倒国内力量对比为目的。特别是非暴力行动的关键目标是改变反政府人士的观念，通过激起民众行动的一致性使推翻现政府成为可能。同时，通过诋毁和嘲笑现政府，非暴力运动将成功抑制公民的恐惧心理。

但最具效率的口号岂不是“阿拉伯之春”这种简单的表达？它超越了各国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所蕴含的一致性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还超越了国界。这个口号使民主成为一种政治前景，但不会引发任何关于政治前景的争议，这正是华盛顿倡议并被美国基金会传播的模式。我们认为，这些基金会的行动正是为杜绝出现另外一种政治思想表达，以防其演化成一种不能被美国接受的不稳定局势。

凭借着无处不在的简单标语，我们注意到相当一部分传统的、更为政治性的和社群性的标语未出现在阿拉伯世界的街上。没有围绕泛阿拉伯主义、乌玛（穆斯林最早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反美主义（没有美国国旗被烧）等进行大规模动员的标语，也没有关于巴以冲突或抨击西方帝国主义的标语。此外，所有民众示威开始时，均有工会、行业性组织、特定群体（农民、穷人、无稳定职业者等）等民间请愿行动大量出现，但统一口号后，这些示威要求统统消失了。

获公共基金资助的“私人”基金须具备两大前提：

一是对社会政治学有内在深入的认识。这样才能动摇政权，同时在当地培训出一批社会精英阶层，作为良治以及信息、沟通新技术的基础。

二是指出一种超越任何分裂的统一政治前景。分裂妨碍所有国家对“一致”精神的追求。一开始反对派可能会有分裂，但民主活动分子

将进行任何尝试，将它们团结到清晰而简明的目标上：短期目标是改变现有的政治秩序，推翻现政府；长期目标则是建立一个开放、和平、能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社会。

确切地说，NED是一个传播简单的讲话、统一的口号的非政府组织，简单地说就是“在全世界支持自由”。该口号让两种人相互认识：一是世界上所有曾遭受或仍在遭受高压和反民主政权极度折磨的公民；二是（几乎）所有相信并希望美国总统经常在演讲中自诩的救世主姿态降临（“美国就像山顶上的灯塔”）得以实现的美国政客。

NED在中东、北非的优先行动领域

目前，“阿拉伯国家发生的系列革命是纯粹自发的”这一假设引发质疑，因为存在众多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已是明显事实，尤其是在埃及，NED资助了众多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源自公民社会的机构。其《2007年战略》对其优先目标表述如下[5]：促进“极权国家”（伊朗、古巴）政治领域的开放；助力“半极权国家”（独联体）的民主人士和民主进程；助力新民主国家出现（塞尔维亚、独联体）；支持武装冲突后的国家（伊拉克、阿富汗）的民主建设；推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民主化。

其《2012年战略》使上述5个优先目标在2007年至2012年得以实施。我们能从该文件中获知什么？我们了解到，当阿拉伯系列“革命”于2011年初开始时，NED迅速对埃及和突尼斯民主变革中的信息传播媒介集中开展额外援助。我们还了解到，它是首批资助班加西公民社会的机构之一，很快该城市就被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控制。

通常来说，尽管NED的预算仍保持不变，但其资源已被优先转向并集中于中东、北非地区的民主项目。这份14页的报告还指出，它的预算远未满足支持所有可能或正在发生民主变革的国家。它不能同时

以同样的高效帮助所有国家。因此，像摩洛哥这样被认为是稳定国家的就被削减预算，以便更好地支持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也门等情况紧急的国家。

NED针对中东、北非地区的全部做法在该文件中被归纳为四点：

第一，进行自我动员，向那些国家的民主活动分子提供政治和精神支持，保护当地公民社会。

第二，建立和发展超越国界的社交活动网络，主要由“世界民主运动”（WMD）秘书处承担。“世界民主运动”是一个由NED部分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其打造的活动分子的“网络中的网络”，使活动分子聚在一起交流在各自国家的政治经历。

第三，加强致力于“推动民主”的各机构间的合作。因在“推动民主”领域内具有约30年的经验，NED成了这些机构的表率。

第四，利用科研改善世界各地的民主实践，以在民主研究和实践间建立起有效连接，尤其是通过研讨会、论坛、碰头会和报告会等途径。这还得感谢包括《民主杂志》在内的期刊和研究津贴等项目的发展。

隶属于NED，尤其活跃的“国际媒体援助中心”（CIMA）在报告中占有重要地位。自2004年成立以来，它几乎穿梭于世界各个角落，当前尤其是在中东、北非地区。它在当地致力于促进有能力实时交换信息的媒体间的合作，以此构建亲民主的媒体网络。这说明NED对美国而言具有两大优先作用：一是发展和利用媒体来推动民主自由；二是扶植听从美国建议的精英人士。而美国所钟爱的两大支柱不是创业自由和媒体自由吗?

*

NED的情况解释了公共基金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资助引申出的问题。通过其活动，我们认为它很好地代表着美国的“软实力”，即通过非军事手段继续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美国的影响。

尽管NED在政治领域开展的行动产生了一些政治后果，包括其在选举过程中运用资助手段（金额难以精确评估），但其2012年动用的总金额和2013年的预算证明华盛顿的政治意愿并未下降。涵盖了开放和多元化的政治体制真的会更好吗？让我们做两项研究。

一是，非政府组织特别是NED的“民主推进”项目尤其侧重民主援助的普遍化。这涉及跨国的政治控制。

二是，美国企图用“软实力”影响白俄罗斯、缅甸、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及伊朗等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其失败带来两大危险：第一，这些国家的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反感加剧；第二，这些国家将长期保持最低限度的（非自由的或程序化的），甚至是有名无实的民主模式。其结果是，民间组织循规蹈矩，以及名声不佳的非政府组织被断然拒绝，从而导致民主缺失。

NED全部或部分赞助的“公民社会”及其他同类性质的机构，能否被认为是民主可靠的中立的（诚实的）伙伴？像NED这样的“私人”组织资助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及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并助力当地的政治棋盘翻转，这是否可以接受？

当然，华盛顿通过NED直接或间接资助当地非政府组织，用不着向任何人汇报。但是否应对那些招募本国雇员但雇员工资却由外国支付，通过外国资助来进行民调或控制媒体（电视、广播或报纸等）的非政府组织抱有信心呢？

包括NED在内的所谓独立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情况，与源自欧洲持有同样目的的基金会组织没有任何不同，它们与自己的来源国政府保有的联系，与当地接受外国资助的民间组织的间接相互依赖关系，都不会让人产生疑问。但这事实上将接受援助的世界各国民间组织，变成了通过“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的政府的盟友，因为这些所谓独立的机构实际上完全依附于政府，靠其资金生存。

如何理解“独立的”机构这一头衔？NED之所以能就其自身情况确定预算，而不必受到政府或媒体的压力，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半民主党半共和党的、平衡的、无可非议的机构，且其推进民主的宗旨能获得美国国会的广泛认同。除对其捐赠的年度投票外，该组织不会引发特别关注。基于此，它才不受政治游戏的拘束，被称为“独立的”机构。

经过分析，我们能做出三项论证：

第一，NED在中东、北非地区单独或合作资助的项目均带有明显的政治特性，那些由NED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均缺乏中立性是成立的。

第二，随着在伊朗和仍在进行的大马士革战役中较小程度的失利，其对影响现存政体走向的尝试将会放缓。

第三，NED的行动通常让人认为是在干涉他国内政。

NED还参与一些非政府组织进行的，有时被认为是适得其反的行动。那些非政府组织自“颜色革命”开始以来，就在“革命”进程中干涉他国内部事务。2010年在伊朗的失败导致埃及的大量非政府组织被驱逐出境，其中包括目前正在开罗审理的由华盛顿资助的43名外国非政府组织活动分子诉讼案。俄罗斯亦通过一项新法案，迫使受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以外国事务所的名义注册。更严重的是，这些行动并未建立起稳固的能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民主。

我们来看看1984年NED关于原则和目的的宣言：“民主意味着人民自决的权利。行使这一权利需要一个确保言论、宗教信仰、结社自由及自由、平等选举的社会，该社会需要尊重个人和少数群体，需要保障媒体自由和法律的至高无上。”鉴于现实，我们难道还不能总结说NED宣称要在全世界传播民主，却使美国介入他国内政，包括干扰了选举进程？或者换句话说，NED不是正应验了拉罗什福科的一句老话——伪善是邪恶向美德的致敬吗？

奥利维尔·吉尔曼

[1] 《The Early History of a Worldwide Nuisance》,James Bovard,*in Future of Freedom Foundation*,2009,www.campaignforliberty.com/article.php?view=307

[2] Roger Cohen.“Qui a vraiment fait tomber Milosevic?”,*The New York Times*,26 novembre 2000.

[3] G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Boston*,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1993.

[4] Cf.www.latribune.fr.,1er juin 2011.

[5] NED *2007 Strategy Document*（www.ned.org.）.

阿拉伯“革命”中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交网站

推特名为“#State-Dept”的用户说道：“我们希望加入你们的对话。”“革命”期间，这种在推特上被网络反对派广泛传播的简单而直接的信息，来源于美国战略神经中心——美国国防部。其作者亚力克·罗斯迅速从名不见经传蜕变为奥巴马政府实施新外交的象征。其实，希拉里的这位年轻顾问是“单一经济”组织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创新处这一国防部“新技术”之极的首脑人物。他在数月之内从幕后走出，随后被称为“用推特革命的人”。其行动证明，如有需要，美国政府将以控制论为阿拉伯反对派提供帮助。在亚力克·罗斯看来，这一新技术既能用于监视公众又能用于解放公众。这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多亏它的帮助，阿拉伯“革命者”才能拿下夺取最终胜利的决定性技术，即沟通交流。没有它，“革命者”什么声音也传不出，只能被公共舆论遗忘，最终在一片漠不关心中消逝。

谁能预见到本·阿里、穆巴拉克抑或卡扎菲的下台？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政府多年来深知要压制反对派言论，却没能靠审查制度达成扑灭最近这些“革命”的目的。毫无疑问，“革命”的源头绝不仅仅在街头，更大的力量在网络。互联网和社交网站显示出其已成为一种新力量，且是决定性的力量。

新型活动分子与新型行动模式崭露头角

自阿拉伯“革命”开始以来，第一批网络活动分子便在网上引人注目。那些新闻博主、黑客、翻墙专家在各自国家成为“革命”的全方位英雄。突尼斯反对派博主斯利姆·阿玛姆甚至在本·阿里倒台后成为青

年和体育国务秘书。一些人甚至不顾性命，如死于狙击枪下的利比亚博主穆罕默德·那不斯，就曾携带摄像机到处记录卡扎菲军队的袭击事件，并将视频直接上传至其博客。

然而，仅靠这些国家的已被关注的网络，反对派并不足以取得成功。其实，非政府组织、信息技术活动分子和媒体“论坛”等组成的众多外国网络起了决定性作用。从开罗反政府游行示威开始以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通过其卫星网络对这些事件进行了大量直接的连续的报道。尽管埃及政府禁止传播与政府相悖的内容，但半岛电视台仍在城市各处的摄像机的爱好者的直接帮助下跟踪新闻，并进行覆盖报道。这些画面不是通过需要政府审查的埃及“尼罗河”卫星转播的，而是网络反对派翻墙后通过欧洲的“热鸟”卫星传播的。此外，好几家运营商，包括“开放天空”在内，建议通过“热鸟”卫星、欧洲通信卫星组织、西班牙卫星等目前正在运行的卫星连入互联网。这样，只要卫星天线和微型电脑间连接调制解调器就能上网，而不用屈从于国内运营商。

与此相似，一些信息活动分子的网络也在介入。这里必须提到“电子公社”组织，该组织以向“革命”提供多项指向性帮助而闻名。无国界记者组织还以多数通过决议，邀请其参加2012年3月的世界反网络审查日活动，分享阿拉伯“革命”期间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伦理的和战斗的”黑客行动经验。“电子公社”组织的主要行动之一就是帮助造反者利用国外的互联网接入商，通过调制解调器将大量视频“有控制地外渗”，或用加密方法和工具将交流“匿名化”。在埃及“革命”期间，“电子公社”组织还召集广播爱好者建立无线电交流。

著名黑客组织“匿名者”也全程参与了阿拉伯“革命”。在突尼斯西迪布济德“革命”爆发后的两周内，“匿名者”就发起了“突尼斯行动”。这些初始行动是针对突尼斯政府网站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短时间内发起大量面向服务器的请求以阻塞服务器）。出于安全考虑，大多数操作是从境外发起的。尽管如此，突尼斯仍成了黑客积极培养人才的地方。如2007年建立的“突尼斯黑猫”组织，在“匿名者”发起攻击前的准备

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事实上，这个突尼斯黑客组织能够从多家政府网站上获取信息基础设施的详细信息。此外，突尼斯信息安全部门的一个人员，曾在“匿名者”组织当卧底，他承认有好几个突尼斯黑客曾在“革命”开始前的几个月在其部门实习过。种种惊人的“渗透”也证实了“匿名者”组织的言论：“我们已渗透进了你们的军队、警察和计算机人员中。”2012年2月，美、英、法三国情报机构秘密电话会议的会议记录“神奇”地落到了“匿名者”手里，并在网上被大量下载。

阿拉伯网络反对派还得到了美国非政府组织全球民间行动的重要援助。全球民间行动组织总部位于纽约，同时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日内瓦和里约热内卢设有办公室。它于2007年由联合国前法律顾问、英裔加拿大人里肯·帕特尔创立。同时，里肯·帕特尔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成员。它是致力于跨国公民运动的“公共事务”组织以及致力于在互联网上进行社会动员的美国“前进”组织的分支。这两个组织均大力支持全球民间行动组织的行动，包括全球民间行动组织希望集中“全世界的公民”，使之产生强烈反应并做出影响世界的决定，以及“面对包括气候变化和冲突加剧等威胁是我们未来的新挑战”的主要宗旨。在里肯·帕特尔看来，“应缩小理想与现实世界的差距”。

全球民间行动组织在政界获得了大量支持：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宣称这个非政府组织推进了世界的理想；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认为它是灵感的源泉，并已做了大量改变局面的事情；塞拉利昂前外长扎伊娜卜·班古拉则将它描绘成，一个为带来真正改变而聚集全世界各处不被优待的人的联盟。

截至2011年4月，全球民间行动组织在193个国家拥有超过800万的成员，到2012年7月成员更是发展到了1500万。其行动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和社交网站传播请愿书或让网民对重大全球性问题变得敏感。然而，在其收到捐赠（据其称，这是其融资的唯一方式）的开始阶段，该组织还派遣队伍组织非暴力主题（环境、人权、全球化等）示威游

行、发送信息材料以绕开审查，或资助大型广告宣传活动。例如，其在缅甸、津巴布韦、伊朗、海地及近期在阿拉伯国家“革命”中，为民主和保卫人权运动提供技术（信息、网络、卫星电话等）支持。

全球民间行动组织利用收到的捐赠支持阿拉伯政治异见势力，曾向利比亚、也门及叙利亚派遣起义人士，提供卫星、微型照相机和摄像机、便携式无线电发送器，甚至还提供培训示威者使用这些器材的专家团队等，来打破政府对新闻、消息等的封锁，建立互联网联系。这一行动的目的在其官方网站中清楚地昭示：使“视频信号直接流通、传播，甚至在互联网和电话被切断期间也能照常运作；确保持续新鲜的国际注意力，以维持它们为变革而开展的勇敢运动”。在叙利亚，全球民间行动组织证实“只有网络能同时秘密引入医药物资和记者，以及送出图像和消息”。该非政府组织甚至宣称为保护反抗者和记者，其在叙利亚边境上设置了一些“安全之家”。

好几个来自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黑客也见证了维基解密作为动员源头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阿拉伯“革命”开始的数月前，维基解密就已大范围参与揭露、传播多个能够引发“革命”的关于阿拉伯政权内部暴行和腐败的外交电报。关于突尼斯的是，“腐败同时是政治和经济问题，透明度和责任感的缺乏致使突尼斯政治体系在经济上犯下巨大错误，即毁坏投资环境、维持腐败文化”；关于埃及的则是“酷刑和政治暴力是经常性和普遍化的”，还有关于穆巴拉克的是“诸如人权这样的伟大理想并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在“革命”的前几个月，维基解密又为接下来的“革命”提供了反政府的全部论据。就这一事实，我们还能探讨维基解密为美国政府外交电报最终发挥出的作用。此外，一些人毫不犹豫地推进秘密外交信息的“泄密”，披露美国情报部门为破坏多个阿拉伯政权稳定所进行的操作。对此，细数那些参与维基解密“镜像”工程（为确保信息的持续性和广泛传播，将其转到另一个网站）的组织，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是，该工程意在支持被称为“慷慨的捐助者”的美国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索罗斯与亨利·基辛格关系

亲密，是遍布全世界的非政府组织网络的领袖。该网络的成员包括在阿拉伯“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开放社会研究所”。

事实上，自2009年以来，美国政府的伙伴“开放社会研究所”，就组织了针对培训埃及和突尼斯活动分子如何绕开审查的报告会。索罗斯慈善基金会则在20年来深入众多革命，甚至其在多个国家的行动被认定为“颠覆性的”。俄罗斯、伊朗等国还控告其是美国中央情势局“推进美式民主”的隐形触手。我们不仅要关注维基解密从索罗斯慈善基金会获得的“间接”支持，还应注意到马克·史蒂文斯是朱利安·阿桑奇的律师之一，同时也是“开放社会研究所”的律师。

另一个美国基金会“全球之声”则为阿拉伯博主提供了细致的帮助。该组织隶属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由前CNN记者丽贝卡·麦金农和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成员伊桑·朱克曼创建，以支持博主和“公民记者”的国际网络、关注世界“博客”时事为宗旨。2011年10月，“全球之声”在突尼斯城合作组织了阿拉伯世界博主第三次见面会，并确认其协助推动“人们在网络上自由表达民主权利”的意愿。

我们看到，中近东的这些“受到外部影响”的“革命”准备工作中的要素，其实早在多年前就已一点一点地被“孵化”了，这就不免引起人们对“革命”自发性的质疑。此外，若按时间推算，“阿拉伯之春”的摇篮应是突尼斯，其起源则应是2009年6月的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阿拉伯之春”的实验室和后方基地

穆罕默德·阿德尔，一位在穆兄会中授课的埃及年轻人，是“4月6日青年运动”的领导者之一。“4月6日青年运动”在网络上诞生，由年轻的网络反对派组成，其名称参考了2008年4月6日的总罢工。但这并非真正的自发行动，要相信穆罕默德·阿德尔的话：“在塞尔维亚，我们接受了非暴力方法的培训。他们让我们学到了如何和平动员民众，如何控制军队，以及如何有效组织起示威活动和大型事件。”

2009年6月，他与埃及、阿尔及利亚的14名活动者一起奔赴贝尔格莱德。在那里，他们连续两周接受了以阿拉伯语授课的培训。这次培训的目的是训练一批“革命学徒”。他们还与塞尔维亚活动分子交流，并与一些非政府组织和记者会晤。

此次“革命者”培训是由CANVAS保障的。该组织事实上是塞尔维亚“抵抗”运动的辐射机构。其公开承认的宗旨是运用“抵抗”这个非暴力运动的专业技术。其“咨询者”的活动轨迹：

出现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中。

乌克兰“橙色革命”中非常活跃的“波拉”（乌克兰语，意为“是时候了”）组织，曾在2004年4月派遣18名成员到塞尔维亚北部的诺维萨德参加一个研讨会。我们还注意到，在乌克兰选举前，一名CANVAS的成员被乌克兰驱逐出境。

在白俄罗斯，CANVAS还曾与亲西方的公民权利组织“野牛”运动保持紧密关系。该组织创建于2001年，旨在推翻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政权。

2002年，CANVAS出现在委内瑞拉反对派的视野里。

2011年1月至2月，CANVAS的标志在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中被开罗大街上的示威者挥舞。

为进行这些运作，一个庞大的资助机制是必要的。“抵抗”组织的创始人、CANVAS现任主任斯尔贾·波波维奇，自称组织仅接受私人赞助，而没有任何政府补贴，但事实似乎恰好相反。据一些内幕消息，有两大美国机构为其提供大规模援助，这两大机构是“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和“自由之家”。

在这些研讨会期间，参与者还学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运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这些人后来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穆巴拉克倒台前6个月，曾出现一个名为“我们都是赛义德”的脸书页面，该页面号召向一位被政府拷打致死的年轻网民致敬，原因是他将一段揭

露警察腐败的视频上传到网络。这个页面的创始人就是时任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的中东和北非方向的市场部主管——埃及人瓦伊尔·高尼姆。

“革命”的蔓延

这股“革命”之风还试图吹向非洲和中东的其他国家。

埃及邻国苏丹也未能幸免。在南苏丹独立后，损失了3/4石油收入的喀土穆正面临着剧烈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2011年1月30日，苏丹首都的大学生们在脸书上好几个组织，尤其是在“1月30日，用一个词描述苏丹青年”组织的号召下走上街头。由于被强力镇压，运动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奥马尔·哈桑·巴希尔总统并未简单地下令镇压示威者，而是派出一些网络“圣战者”在网上与示威者针锋相对。这些“圣战者”的任务是在其祖国的土地上，与几乎拥有2万同情者的两大活动组织（“青年交流”和“我们已厌倦”）做斗争。这个方法卓有成效，因为如果有零星的苏丹大学生走上喀土穆大街，进行示威游行来挑战政府，政府是有能力及早驱散这些麻烦制造者的。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成功影响其他人群。

2011年初，一个匿名网友在脸书上创建了“也门革命”页面，上面有一张勇敢举起了“抵抗”标志性“拳头”的图片。2011年2月3日，也门发生了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数万名示威者以玫瑰色为标志。但在也门，仅有1%的人能连上互联网，文盲的比例仍很大。此次也门“玫瑰革命”影响长远，一年以后，萨利赫总统下台，也门重新组织选举，虽然大选只有一名候选人——副总统，但“南部独立”引发的众多事件导致大量投票所关闭，也门进而成为第一个靠谈判解决暴动问题的阿拉伯国家。但是，也门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南部独立”人士与“基地”组织在当地的大量存在，使该国局势难以稳定。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强势介入反恐斗争的美国特殊力量，虽不引人注目但积极地

存在着。一种经常性的支持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美国无人机进行空袭。

同一时期，一个脸书小组创建了“和平的阿尔及利亚”网页，在其上可见“抵抗”的拳头标识和意思为“在一起，一切皆有可能”的标语。但阿尔及利亚政府对网络的监控极为频密，其安全力量既能大量展开部署又能迅速集中，从而能有条不紊地驱散示威者，故“革命”只初具规模。

在其邻国摩洛哥，早有准备的国王为避免卷入“阿拉伯之春”，组织了一次关于修宪的全民公决。2011年11月末，汇集了伊斯兰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的公正与发展党（PJD）成为立法选举的大赢家。国王别无选择，只能任命这一激进主义政党的领袖为首相。

*

面对2011年初以来，震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之风，采用何种方法才能在不同国家同时造成系列事件、完成对计划的操控，很难让人不去一探究竟。

若我们在这些被看作是自发的行动中寻找一个共同点，除了被认为能推翻暴君并建立民主这一值得赞扬的目标，就是“伊斯兰主义+美国+互联网+社交网站”。众多活动分子，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德尔，就在穆兄会完成了攻击首秀，随后前往由美国组织赞助的CANVAS接受培训。其他人，如瓦伊尔·高尼姆，则在互联网巨头谷歌旗下，与美国情报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基于这些事实，很难否认美国的操控动作，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政府的操控，何况这不一定是奥巴马政府所做的唯一事情。

令人好奇的是，通常作为阴谋揭发者的西方媒体，对这一主题仍十分谨慎，甚至保持了令人惊异的沉默，除少数外，它们有意忽略了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这些事件与CANVAS之间的联系。

关于“革命”的这些阴暗面将被一点一点揭开，尽管一些人会心甘情愿地“拒绝作证”。而这些“革命”深刻改变了我们已知的阿拉伯世界的面貌。“阿拉伯之春”也展示了今后将成为全球战略博弈核心的新力量，即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它将是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伊夫-玛丽·佩里
阿兰·夏莱

“危机弧”与媒体：媒体对“阿拉伯之春”的解读

媒体进入“危机弧”地区的时间，实际上远早于其对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进行新闻评论的时间。它们每次都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受到操纵，都发誓金盆洗手，但每次又都迅速地回归“看门狗”的角色。但无论如何，它们对“危机弧”国家进行新闻报道时，都会根据该国有没有美国军队而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情况是，连篇累牍地宣传、发挥影响，直到动用军队为止。另一种情况是，只希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新闻报道。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基地”组织在亚洲和非洲发展恐怖主义的事件等，都是电视新闻媒体的主要报道目标，而且报道都是仿照2001年“9·11”事件的模式。

用媒体的话来讲，连“危机弧”这个概念都变得更富有弹性了。战略上定义的“危机弧”，包括从摩洛哥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的广大区域。由于这里上演着“文明的冲突”，因此国际大型纸媒与视听媒体，就把发生在一小段时间内具有相似性的所有热点问题串在一起，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自2010年10月以来，这一地区发生了一连串危机，包括政治危机（科特迪瓦、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也门、埃及、巴林、利比亚、叙利亚）和环境危机（福岛核泄漏事故），这些危机中有一部分被命名为“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这个叫法最早是新闻媒体提出的，用以概括自突尼斯事件以来发生的所有事件。事件的源头是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发生的动荡，马格里布国家（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北部）和马什里克国家（包括埃及在内，往东直到伊朗西部边境为止）很快被牵扯进来，直至整个地区都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更广泛地看，“危机弧”还应该包括科特迪瓦的政治和军事

危机、“窃电门”事件[1]和发生在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正是这些事件才让媒体的报道多样化，不仅仅集中在利比亚问题的解决上。国际媒体对这一连串危机的报道，无不带有纯粹的西方文化印记。

本文所用的研究资料都紧跟事态发展，时间限于“危机弧”地区各类事件发生后的48个星期，截至卡扎菲政权垮台，研究对象主要是法国媒体。研究媒体如何应对国际危机，尤其是它们面对一连串陌生事件时的态度，足够让我们看到媒体立场。在报道新闻时，不论是报纸、杂志，还是电视、网络，都采用大量新技术来拍摄视频。它们的目的不是要告诉公众什么信息，而是要应对媒体间的竞争。因为此时公众更关心的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自己的购买力持续下降的问题。实际上，媒体已将国家空间和国际空间打乱，重新创造了一种世界新闻，以凸显“危机弧”的存在，并自认为已经变成其中的一个行为者。

媒体对新技术的迷恋

自2009年6月，伊朗选举后发生抗议事件以来，传统媒体都意识到数字技术为其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数字网络”大幅报道伊朗年轻人抗议选举结果，让美国CNN在信息传播方面的领先优势荡然无存。

伊朗事件时，传统媒体就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了。伊朗示威活动刚一出现，外国记者就被驱逐出境，摄像器材被没收，[2]与外国新闻台有互联网联系的当地媒体都受到审查。只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还能继续报道，但也只能播放那些对伊朗政权有利的新闻。面对不符合西方思想[3]（推崇人权和民主）的新闻局面，传统媒体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使用短信和社交网站，如脸书网站、各种博客等，特别是微博客平台——推特，它是唯一不受伊朗当局审查的网站。“记者们当时都转向使用这些替代的消息来源，特别是伊朗的博客。”[4]

记者缺少事件发生地的现场情况时，会优先使用这些工具。由此，在2009年伊朗危机中，“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出现了一种共生的复杂的生态系统”,[5]削弱了CNN自1980年成立以来所创立的模式的优势。[6]大型媒体不再重复过去的经验，记者将从伊朗危机中学到的东西运用到了“阿拉伯之春”的报道之中。首先是发生在突尼斯的抗议活动，让互联网的介入达到了高潮，西方大型媒体开始使用互联网，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电视台也开始使用新的通信手段。英国路透社和美国联合通讯社（简称美联社）这两家新闻社，早已和网络媒体建立了伙伴关系：路透社于2006年4月14日[7]与英国“全球语音在线”——一家涵盖全世界博客的网站建立关系；美联社则于2007年2月9日与加拿大“公民新闻网”——一家加拿大的记者-公民网站建立关系。美联社的战略规划主任吉姆·肯尼迪讲述，此次联合“能够更好地覆盖新闻，能够对我们的记者所不知道的事情起到雷达式的补充扫描作用”。[8]在诸如阿尔及利亚这样网络不太畅通的国家，半岛电视台甚至还瞄准了移动电话，认为这是一个理想方式，可以依靠它与这些国家中的一些民众保持“同谋”关系，绕过当地政府的新闻监管。2011年2月，阿尔及利亚安全部门缴获了一些印有半岛电视台标识的电话，这些电话专门被用来拍摄和即时传递图像。[9]

“众包”模式（众人采集图像与信息）就是要在充分信任信息提供者的前提下，发布其采集到的信息。大型媒体中，将这种模式推广到极致的是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该电视台于2006年12月6日成立，进行了模式创新，缩小了传统电视台和互联网之间的边界。[10]除了与每日影像和优兔这样的社交平台建立伙伴关系之外，自2009年起，它还打造了欧洲电视一台的《热线电话》栏目的现代版——《观察家》。它可以通过直接采用处于事件中心人物的直接言论来报道国际局势，也可以采用视频、文章和图片等各种形式。当然，虽然没有一个报道是由专业记者提供的，但所有信息都是经过挑选和检查确认的，由电视台人员翻译并进行解说。

“众包”模式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即必须核实信息来源。对此，BBC在报道孟买恐怖袭击事件时深有感触。确实，“众包”新闻通常来自活动分子的采集，包括来自国家的（如印度）、活动分子的（如维基解密发布的美国外交电文）[11]或平民的（“阿拉伯之春”中就是如此）信息。各大媒体所追踪的“危机弧”地区都能使用互联网，因此也就能找到人提供信息。媒体最需要的信息就是冲突画面，特别是维护秩序的警察部队攻击示威者的画面。一般来说，不管是本国记者还是国际记者都很难目睹这样的画面，他们即使没有受到当局的监视，也难以接近民众运动，在突尼斯和叙利亚就是如此。在巴林、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国际记者由于不能成为政府的工具而被驱逐出境。[12]在利比亚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因形势急转直下，抗议运动演变成了内战。那些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久经考验的国际媒体及其记者，又都来到了利比亚和叙利亚。一些人是活着离开战略“危机弧”国家的，却为媒体的“危机弧”而死。从2010年10月23日到11月28日，他们当中有10人丢掉了性命，其中一半是在利比亚死亡。[13]

传统媒体必须核实“众包”信息的另一个原因是，互联网没有国界，很难把控视频资料的有效性和来源。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的《观察家》栏目为与其有联系的博主提供帮助，[14]可是如果电话通信被监控就不那么幸运了。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很了解这一点，因为它曾播出了一条错误消息，称叙利亚驻法国大使拉弥亚·夏库尔女士叛变祖国。当事人马上予以否认，而且消息是其竞争对手——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该台主要播放法国新闻和国际新闻）播出的。

此次事件表明，所有的信息不可能都得到核实，尤其是当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时候。网络的“去国家化”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信息被操纵。如在2011年2月8日前，脸书网站上、有关叙利亚的某些博客上，[15]都有呼吁示威的帖子。实际上这些帖子是美国人在美国撰写并发布的，或是居住在中东的叙利亚移民撰写并发布的！[16]那么当时有些法国博主，后来跑到利比亚，在米苏拉塔受伤该怎么说呢？[17]在阿尔及利

亚，政府甚至在脸书建立大量僵尸账户，以堵塞网络或者欺骗外国记者。[18]在其他国家，又有多少活动分子成为美国国务院及其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资助的民主培训的学生呢？2008年春天，美国国务院为恢复自己的国际声誉提出了多个培训计划，那些“半国营”的组织至少可以对阿拉伯国家使用它提供的两个杠杆。

第一个杠杆属于美国公共外交范畴。公共外交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机制性沟通方式，旨在更好地配合国家总体政策的需要。为此，2008年12月3日至5日，在谷歌、脸书、优兔、推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和CNN的赞助下，美国人在纽约成立了一个青年运动联盟。[19]在阿拉伯世界，主要呼吁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和突尼斯的年轻人采取行动。奥巴马政府也提出了同样的呼吁，一次是2009年10月14日至16日在墨西哥，另一次是2010年12月3日至5日在伦敦。召开这些峰会的目的是让网络活跃分子与公民社会的专家建立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培训年轻人，这些人都是美国驻外代表在目标国家中挑选出来的。这些峰会的与会者还有来自美国多家媒体的代表，这些媒体在阿拉伯国家都是十分活跃的，是西方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2008年和2009年，萨勒赫与美国驻埃及大使的关系一般，[20]表明美国外交官未能在埃及取得任何政治成果。这位埃及人向美国大使提出“在2011年总统选举前以议会民主替代当今政权”的行动计划，但是美国认为该计划“完全不符合现实”。[21]美国在意的只是，“他采用的方式与公民社会内其他规模更大的组织所采用的不同，那些组织积极主张通过策略性的手段进行逐步变革，例如加大公共宣传、制定法律草案、加强自身能力等”。[22]

第二个杠杆则属于另外一个情况。美国“自由之家”、“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和“开放社会研究所”共同提出倡议，呼吁使用在塞尔维亚民主过渡时期（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和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曾使用的战略——开展公民抵抗运动。美国不是要争取什么新闻自由，而是要通过信息战直接引发战争。2009

年，“4月6日青年运动”大约有15名干部被送到贝尔格莱德的CANVAS组织接受短期培训。这些埃及活动分子所学到的方法后来被运用到了埃及的抗议运动之中。“埃及万岁”组织撰写的文件就是证据，该组织2011年1月26日发表的长达26页的文件，详细介绍了将“革命”引向埃及首都的技术和战术。[23]

新闻报道之竞争

媒体参与美国国务院的公共外交政策计划，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一意识形态在作祟，让这些公关企业纷纷加入。但它们这样做，也可能是因为新闻行业内的竞争气氛越来越浓。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危机已经扩散到新闻领域，新闻行业也在发生变革。从这方面看，使用脸书或者优兔这样的数字平台，能够将生产成本压到最低，同时又能及时做出报道，而且可以使用被禁播的画面，不用派全套人马到当地去，也不用在当地雇用固定的工作人员。还有部分原因是时间不够，全世界电视台包括连续播放新闻的电视频道不得不这样做，如2004年它们必须实时报道印尼大海啸。

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配备一个受到监督的新闻窗口（《观察家》栏目）是另外一个解决方式。这个创新的模式让它在全世界只有36名记者，以及300多名在其媒体伙伴（法国电视台、法国电视一台、法国新闻社、法国国家广播电视台、全球广播网等）工作的“分包”人员。但该电视台体系的灵活性由将近700名公民记者来保障，他们可以随时上传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实时”新闻。因此，在报道突尼斯事件时，只需要利用“那瓦特”网站上的活跃分子和几名博主就足以了。

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不仅能比它的法国竞争对手更早宣布突尼斯危机开始（2010年12月30日，它就在自己的《观点》栏目中播放“青年人的愤怒”的新闻），而且它的网站（France24.com）2011年1月的访问量创下新纪录，达到1040万次，法语、英语和阿拉伯语三个语言版

本的网页浏览量共达到5200万次。它的流量也疯狂激增，宣布“革命”即将到来：来自突尼斯的流量增加1000%，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增加240%，来自摩洛哥的增加140%，来自埃及的增加80%……[24]

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已经很好地扎根于从摩洛哥到埃及的马格里布国家，它甚至已经与自己的竞争对手半岛电视台并驾齐驱。但自2010年12月18日以来，半岛电视台超越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对西迪布济德（位于突尼斯中西部）失业问题严重而引发社会动乱的抗议事件进行大幅报道，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也是如此。而此时法国记者在非洲主要报道的是法国军队参与解决科特迪瓦危机，大力插手该国正在进行的民主过渡。后来，突尼斯成为新闻报道的主要目标，法国各媒体接踵而至，首先是广播（法国文化台，2011年1月4日报道），随后是模拟信号的电视台（法国电视五台，2011年1月11日报道），最后是数字电视台（法国专业新闻台，2011年1月13日报道）。自2010年12月初开始，纸媒主要刊发各新闻通讯社的电文。法国所有新闻机构都已做好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的准备。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果然提出放弃总统权力。各家媒体制作了大批节目包括特别节目来报道此事，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星期。

媒体就是这样置身于“危机弧”地区的。当媒体报道集中在科特迪瓦、突尼斯以及蔓延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时，这些国家也就成了记者的关注重心。突尼斯总统下台是新闻报道的一个突破，也是一个起点，各家媒体都会确定自己的主要报道对象。这也适用于埃及发生的抗议事件，正是这些抗议导致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然后是2011年2月15日，将穆阿迈尔·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推向战争。只是3月11日日本发生福岛核泄漏事故才打断了这一日程。因为当时利比亚的拉斯拉努夫地区（利比亚精炼石油中心）的起义即将被卡扎菲的军队镇压下去，所以媒体才有时间竞相报道位于太平洋岸边的日本核电站事故。在经过这一段没人能解释清楚的多米诺游戏高潮之后，媒体才回归正常的工作日程。

确实，“阿拉伯之春”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化身”，即那些从“革命”中“冒头”的人物（通常是为纸媒工作的博主），这是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手段。自2011年2月22日起，法德合资的网络电视台欧洲艺术电视台（ARTE）就开始介绍这样一批人物，他们分别是大学生、商人、教授、家庭主妇、医生，甚至是总统候选人。这些人来自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和也门，还有一些是来自德国和法国的移民。2011年10月23日之前（这一系列节目到2012年2月24日终止，共播放202期），共有103位目击者（占63%）出现在121期节目（占60%）里，每期为5分钟，其中一大部分目击者都是经过选择的，包括埃及的（占30%）、突尼斯的（占18%）、利比亚的和也门的（各占10%）。欧洲艺术电视台通过这一系列节目，在每期不足2分钟的时间里，与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共同分享“他们冒着巨大风险用自己手头的设备拍摄的节目，旨在传达他们的希望和疑问”。[25]

其他的事情还包括针对外交部长米歇尔·阿利奥-玛丽策划的“令人可笑的、不体面的片段”[26]，以及在日本海啸和核事故后发生的大论战，让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演变成了法国国内事件。米歇尔·阿利奥-玛丽于2011年1月11日发表声明，建议“在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合作的框架内采取行动，保证人们有示威的权利，但同时又要保证安全”。这引发众怒，最后让她名誉扫地，她于2011年2月27日辞职。不久，另一件事接踵而至，那就是自5月14日起，围绕有意竞争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的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的性丑闻，而引发媒体连篇累牍报道，最终让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步了外交部长后尘，被送进了美国监狱，他竞选总统的事随之被人们丢到了脑后。这些事件给人的印象是，2010年至2011年的国际新闻简直就像是“连续剧”。日本海啸则具有另外一种意义：推动人们提出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内议题，并使之变成了选举战中的本质议题，这个议题也反映了整个欧洲都在担心的事情，那就是未来法国核能将走向何方。在这个问题上，某些政治团体也没有放过机会，充分利用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27]

媒体广泛报道上述问题，几乎达到了“人尽皆知”的效果，导致“危机弧”地区发生的事件更贴近了法国公共舆论关注的问题。媒体更重视策划兴趣点，并使之更符合自己的指导方针。《十字架报》也不得不跟踪国际时事，尽管这不是它的第一要务。它所做的与其他纸媒和视听媒体没有什么不同，不仅刊发新闻通讯社的电文，还添油加醋。为了赢得读者，它不得不发表描写博主（如突尼斯的索菲亚纳·贝尔哈吉、黎巴嫩的沙基卜·阿勒贾布里等）以及一些勇敢的女性（如也门的塔瓦库勒·卡曼）的文章。这家发行94 163份的天主教日报当时的兴趣点就是要制订一项新的刊行计划，加强与其读者的联系，适应新的媒体手段。

所有媒体都遵从“诱导”的原则，以便投放的信息更能符合公众的期待（这些期待本来就是媒体设立的），以确保得到更多的广告来维持生存。它在进行“自我操纵”，“内容千篇一律，不是对当天的新闻等做出分析，而是根据读者的理解来选择出版什么内容”。[28]为此，《十字架报》《解放报》《世界报》《费加罗报》《观点》《快报》《现代价值》等，这些一般不刊发同一新闻的媒体，在面对阿拉伯“革命”的问题时，立场也随着民众运动的压力在几天内悄然发生变化（一致报道这些事件）。但对关注时事的电视台来说，新闻都保持了多样性，首先是那些连播新闻的大型电视台，如法国专业新闻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法国iTELE电视台、欧洲新闻台和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等。自2010年6月1日起，欧洲新闻台就拥有了由谷歌提供的可以分辨出公众新闻需求的技术。下表中所说的“欧洲新闻趋势”就是一个捕捉流行词汇的工具，它对互联网上的搜索请求汇总后分析出结果，其目的是捕捉搜索引擎最高流量峰值的检索请求。这里的“公众”不是指一个电视台的观众，而是在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北马其顿、摩尔多瓦、黑山、俄罗斯、塞尔维亚、土耳其、乌克兰等国，所有能使用互联网的欧洲公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可能才是公众真正的兴趣点，它的特点很明显，就是“杂乱”。以2011年4月1日为例，检索词形形色色，不仅可以说明民众的关注点多种多样，而

且因国家不同民众的忧虑也有所区别。此外，公众搜索最多的并不是“危机弧”问题，即使搜索最多的“核辐射”，也是媒体对日本海啸大幅报道而使人们产生关注所致。

公众的兴趣点与2011年4月1日的危机

根据“欧洲新闻趋势”确定的公众搜索词汇	维基百科列出的“危机弧”地区发生的事件
nuage radioactif France（法国核辐射阴云）	忠于卡扎菲的部队继续攻击米苏拉塔
nuage radioactif（核辐射阴云）	巴林当局释放博主马哈茂德·尤塞夫
reading festival（节日阅读）	多名叙利亚人死于席卷该国的示威游行
isharegossip	萨那发生亲政府和反政府的示威游行
censos2011. in. pt	约旦警察试图将在阿曼的亲政府和反政府的人群分开
123people	奥马尼的警察杀死了一名在苏哈示威的人
criirad	沙特阿拉伯发生支持巴林反政府示威的游行
skatteverket	洛朗·巴博和阿拉萨内·瓦塔拉的支持者之间发生战斗
firefox4	土耳其军队杀害了4名叙利亚库尔德人
knut	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军队寻找日本海啸中失踪的人

欧洲新闻台的检索工具还揭示，欧洲各国报道的新闻也不尽相同。与人们认为的存在诸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称的“地球村”相反，[29]

在国际新闻方面，存在的只是“地区村”。由于没有真正的全球媒体，每家媒体都认为自己属于特殊的文化实体，按照自己的文化行事，即使在被认为是“统一的”欧洲也是如此。[30]由此，每个国际问题都是被重新定位过的，媒体的“危机弧”也避免不了这一点。比利时更关注科特迪瓦发生的事情，因为它对科特迪瓦的邻国刚果（金）更有感情。意大利对突尼斯和利比亚所发生的事情更关心，因为其国内移民主要来自这两个国家。法国更关注的可能是更具体的事情，一方面是法国的经济利益或旅游，另一方面是害怕恐怖主义升级和非法移民涌入。

全世界媒体几乎一致庆祝所谓的推特革命，因为自2011年1月17日以来，人们对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产生了信任。人们也可以发现，这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及其他地区对网络活跃分子进行培训而发挥的作用。切断互联网（特别是在埃及）让新的行为者进入了媒体空间，其中就包括不断披露美国外交文件的维基解密网站。媒体对此次事件的迷恋性报道让朱利安·阿桑奇声名大噪，[31]他是这家号称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数字网站的领头人，宣扬“保护言论自由和媒体传播自由的普遍原则”。[32]但他所获得的媒体威望很大部分归功于国际上对该网站施加的压力（即使是报复性的压力）。[33]该网站还取得了另外一个成功，那就是全世界人民对它的巨大关注，2010年12月，它在脸书网站上的粉丝达到了1 404 337人。媒体庆祝“推特革命”还有一个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密电门”事件中所公布的文件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爆发。维基解密网站的一个原则是要让传统媒体都加入它的事业中，为此它与半岛电视台建立了联系。但是，它披露的内容只被“那瓦特”网站采用过，而且传播范围只限于突尼斯。“那瓦特”网站自己也建立了一个新网站，名为“突尼斯解密”，该网站后来也名声大震，足以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和半岛电视台确实从“那瓦特”网站的人员中找到了可以提供信息的人员，以便为自己在2011年1月的“茉莉花革命”期间播放的新闻增加新内容。在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网站的信息也同样被法国媒体采用。

自“阿拉伯之春”开始，另外一些行为者也成功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突尼斯和埃及政府切断互联网后，这些行为者吸引了很多网络活跃分子为其服务，如美国国务院及其下属机构建立的与阿桑奇的网站类似的组织——“匿名者”。该网站称，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都“单方面宣布要开放言论自由、推动民主、面向人民……‘匿名者’听到了人民的呼声”。但是，我们很难了解这个2008年诞生于美国的抗议组织的成员和目标。唯一勉强知道的是，它集中了所有相信互联网有益，并准备为捍卫言论自由、分享知识而斗争的人。[34]他们的行动或是将某些政府或官方网站的首页改头换面，或是制造网络拥堵，导致网站无法浏览。另一个行为者是2009年出现在瑞典的Telecomix网站，它对传统媒体来说可能更有用，哪怕网络被切断或被限制（如1月25日至27日在埃及，1月17日至18日、2月19日、3月3日至6日在利比亚），它也能保证让民众看到国际上发生的事情。[35]Telecomix网站可以通过“网络入侵”获得起义者拍摄的视频。

这些技术支持最终让全世界媒体相信，它们所面对的“革命”现象几乎可以与伊朗革命相提并论。由于能够通过社交网站获取信息，于是记者们就认为，起义者开展示威活动是通过这些信息手段的指引。但并非全然如此，2011年1月26日在开罗散发过的一些小册子，规定不能使用“受到监视的推特和脸书网站”。小册子提醒得很及时，因为埃及警方在2011年1月1日至4月1日进行了网络监视，针对目标是与突尼斯、埃及、巴林和利比亚的抗议活动有关的关键词：突尼斯的是“西迪布济德”，埃及的是“1月25日”，巴林的是“2月14日”，利比亚的是“2月17日”，还有推文涵盖的“bit.ly”[36]所提供的网络链接。

第一个观察，埃及和利比亚发生的事件在推特这个新媒体上都得到了体现。“警察”自己的分析表明，他们也会根据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主要关注发生的特殊事件。推特在埃及和利比亚特别受宠爱，使用者可以通过它及时获得突尼斯和巴林的抗议事件的最新消息。使用量最高峰一般是出现戏剧化场面时，如突尼斯的本·阿里下台，珍珠广场上的纪念碑被摧毁，2011年3月18日在巴林麦纳麦出现镇压，特别是埃及

主要的几次示威游行，尤其是穆巴拉克下台，等等。但同纸媒和视听媒体的某些特殊网页一样，高峰时刻很快过去。即使在推特上，也是一个信息迅速取代另一个信息。

第二个观察，互联网访问的地点问题会让“推特革命”的说法失效。也就是说，要发生“推特革命”，访问必须集中在某个地区，这种信息消费才会在示威动员方面发挥作用。但是，这种消费毕竟还是地区性的而非全球性的。因此，推特更像是一个传声筒、一个桥梁，它仅表明，传统信息的来源因受到政府的监督、暴力和镇压的影响，而不太好控制。但新媒体有其重要性，这在于可以获得相对偏远国家的信息。在也门，大型媒体在那里设立的办事处很少，在叙利亚也是如此，由于国内镇压和暴力活动都很激烈，外国记者很难在那里开展工作。只有巴林例外，那里37%的警察来自邻国，他们证明阿拉伯半岛东部地区的互联网使用率非常高。

国家不同，新闻报道也随之不同

在冲突局面下，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只是一种形式上的革命，这在2010年11月至2011年5月解决科特迪瓦危机时表现得十分明显。表面上看，媒体的“危机弧”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高度即时性，各大新闻通讯社都使用推特或脸书社交网站，如法国媒体所采用的有关也门消息的64%来自这些网站；二是“超级信息”功能，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可以群发信息。但是，它不能产生“真正的国际新闻”，只是一些媒体噪声的综合，先通过互联网广泛扩散，然后再通过视听手段传播，最后使纸媒只能对之亦步亦趋。好像人们总是处于一种特别的局势之下，如战争、选举、体育赛事或丑闻等。结果是，媒体尽管发挥了其过滤功能，却也出现了分析能力饱和的情况。

因此，网络直接跟踪埃及和利比亚的“革命”形势发展17天后，法国媒体及其他西方媒体才开始对突尼斯的事情感兴趣。那些对国际时事

不太感兴趣的纸媒和视听媒体一向很少提及马格里布国家，直到2010年冬天，它们才将该地区的时事列入报道日程。当时，媒体报道都聚焦在科特迪瓦危机上，因为法国军队正在那里作战。但是，法国媒体没有报道法国“独角兽行动”的情况，对它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当地法国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局势恶化的威胁。这就是媒体“分人”和“分国”进行宣传报道的例子！

突尼斯局势变得明朗化尚缺少某些鲜明的证据。媒体却欣然接受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相继发生的“革命”。但是突尼斯和埃及“去殖民地化”后建立的政权瓦解，这种表面上喜气洋洋的气氛却并未延续到利比亚，反而出现了糟糕的结局：温和的抗议最后演变成了内战。法国军队在英国、卡塔尔、美国的支持下进行军事干预，人们担心法国会像在阿富汗那样陷入泥潭。而就在此时，从2010年11月22日到2011年10月23日，喀布尔陆续传来了25名法国士兵牺牲的消息；2011年7月19日，就在利比亚起义者占领布雷加时，法国媒体都在报道萨科齐总统为在阿富汗阵亡的法国士兵举行全国哀悼的新闻。媒体在报道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时陷入泥潭，也就是说在报道整个冲突时缺乏具有震撼性的画面，或者缺乏具有重要意义的新闻，导致人们对“阿拉伯之春”逐渐丧失了兴趣。这种状况在2011年4月和7月达到最低点，直到卡扎菲死亡才重新回归平衡。英国一位专栏作家2003年时曾说：“别跟我提战争的事！”[37]同样，当叙利亚也被内战折磨时，无论是媒体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出现了漠不关心的状态。

第一个观察，新闻报道要晚于当地发生事件的时间。它的反应迟钝只能用日程逻辑来解释，因为法国国内热点问题（不论是政治、经济、安全还是体育方面的）的报道都要优先于国际问题。

第二个观察，该栏目对“危机弧”地区的新闻报道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妥协的结果，通常都缺少社会意义，这种情况是媒体制造的。也就是说，媒体事先就将这些事件设定为负面的，报道时只空洞地配上几个画面即可。所有不符合这个框架的都不能播出。结果是这一时期每家

媒体都在进行“地理性描述”,[38]新闻节目最关心的主题是利比亚（占25%）、恐怖主义（占17%）、“阿拉伯之春”（占15%，重点是内战和独裁政权的镇压）、科特迪瓦（占13%）、日本（占10%）。也就是说，媒体最关心的是法国首要参与的两次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以及对于法国国家安全来说的两个威胁。其中之一是本·拉登于2011年5月2日被杀，让媒体兴趣大增，与5月30日至6月5日（第29周）媒体对“阿拉伯之春”的报道水平同等。至于另外一个核威胁，则直接让位于法国正在酝酿中的选举大战。

最终只剩下7档节目讨论“阿拉伯之春”，主要内容是民众抗议事件、示威的规模和密度等，而且只有突尼斯（2010年1月，占6%）、埃及（1月底至2月初，占4%）和叙利亚（断断续续地从3月到6月，占4%）被提起。对所有引发当地政权垮台的事件的报道媒体都是一笔带过。尽管如此，定位于整个欧洲文化的欧洲艺术电视台总编，在阿拉伯危机的报道上表现得十分积极、富于创造性。它的《报道》栏目在每周六19点播出，还有一名为《热点》的栏目在每周二和周日的晚上播出，两个节目一直报道“阿拉伯之春”。尽管节目主题形形色色，但只有7次报道突尼斯，6次报道利比亚，5次报道叙利亚和埃及，2次报道也门，1次报道巴林。很多报道特别是报道巴林事件时使用的都是德语。该电视台主要针对精英阶层，新闻报道显得与众不同，符合该台的特色。

从这方面看，法国对“危机弧”地区的以“阿拉伯之春”为核心的新闻报道呈现碎片化。这样就导致人们在认知上出现了较大偏差，同时媒体的描述与当时发生的事件不符。回顾“阿拉伯之春”这个词出现的顺序就可以表明这一点。这一表述首次出现在2011年1月16日《世界报》记者吉尔·帕里斯，对“阿拉伯民主的春天”的未来发展提出质疑的文章中。随后，法国文化台和法国电视五台的《报亭》栏目在1月30日采用了这一说法，《C dans l'air》栏目直到2月23日才开始采用。在此期间，互联网广泛使用这一称呼。2月2日，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分析家罗杰·哈迪在BBC新闻台宣布：“这不是什么‘阿拉伯之春’的开始，而是

某些最肮脏的东西长期发酵的结果。”[39]但西方的想象足以使人们想起两件事，一件时间距今较久，而另一件时间距今较短。第一件事是1848年春天的民众抗议，它动摇了欧洲的旧制度，为民主的到来做好了准备。第二件事则是1989年秋天的各国获得自主，将中东欧国家重新带回到民主之中。这种丰富的想象也被人们运用到了对马格里布国家局势的分析之中，因为此时该地区人们最关注的就是西方媒体。

因此，“阿拉伯之春”首先是意识的觉醒。特别是该地区的一部分年轻人，如埃及“4月6日青年运动”的年轻人，还有这些国家在外国的移民，如在柏林的突尼斯人萨米·本·加尔比亚。他们意识到了现代通信工具的力量，也意识到西方原来对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民主不太感兴趣。从这方面看，维基解密公布美国外交文件确实是一个转折。该事件让“那瓦特”网站的网络活跃分子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国家体制的最终目的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这些突尼斯人在恢复它的名誉方面做得足够多了吗？”[40]这种向民主进发的方式肯定会取悦西方媒体，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和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为此异常喜悦。

因此，自2010年12月17日以来搅乱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的抗议运动不是“CNN效应”，而是“半岛电视台效应”（从地区层面看）和“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效应”（从全球层面看）。这两家电视台从“阿拉伯之春”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声誉。“半岛电视台效应”中也有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和BBC国际新闻台的贡献，“半岛电视台效应”表现在该媒体在将反抗之风吹向整个阿拉伯世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报道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埃及的新闻时充满批评意味，而且都是用阿拉伯语，阿拉伯观众对此已习以为常。但在西方，它的形象却截然不同。因为它总自以为已经公正地报道了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的问题，而它一旦披露突尼斯政权的腐败行为，并使用新媒体进行肢解突尼斯政权的宣传时，欧洲和美国媒体就认为它十分虚伪。半岛电视台变成与其他媒体没有区别的国际媒体的同时，突尼斯示威抗议的画面引起了该地区其他国家的青年人纷纷效仿。尽管半岛电视台不是“阿拉

伯之春”的源头，但它的新闻报道还是让“阿拉伯之春”在整个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地区的传播变得更为容易。[41]

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也有自己的责任，也有自己的阿拉伯语节目且开播时正值2010年9月，而它的节目传统上用法语和英语制作。它对科特迪瓦危机和“阿拉伯之春”的报道最终使它赢得了声誉，而这是它开播5年来一直缺乏的。与半岛电视台一样，它也曾因形象问题导致人们对其信任不足，当然这也与“法国声音”的国际影响不够有关。

如果说各电视台在传播（地中海两岸国家）人民反对当权的精英领导人的思想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如西班牙青年在2011年5月15日和6月12日发起“愤怒者”行动，采用的就是埃及模式，而且是以名为“现在需要另外一种民主！”的网站为核心，还应当看到这些电视台围绕法国支援起义的利比亚人的军事干预行动，也策划了一个信息战，否则就没办法解释法国某些广播电台为证明法国“热风行动”有理而耍的把戏了。当联合国安理会还在讨论对利比亚进行武器禁运时，法国国内广播电台一名很幽默的主持人就邀请国防部长阿兰·朱佩到场做节目，大声高呼“向利比亚开战！”。4天之后，法国文化台的专栏主持人亚历山大·阿德勒也严肃地讨论起这个问题。当时被邀请的国际关系专家，在谈到法国军队已经在阿富汗、科特迪瓦和黎巴嫩作战，是否还有理由在地中海危机中再制造一场冲突时，所言甚少，倒是该台的主持人们喋喋不休。

当时法国媒体还披露贝尔纳-亨利·莱维自月初以来的外交活动（受萨科齐委派前往利比亚调查干预的可能性），认为他和萨科齐总统的行动简直就是密特朗在1992年6月的萨拉热窝行动的翻版。贝尔纳-亨利·莱维不时在媒体上露面，除3月1日至24日在电视上露面22次之外，还在纸媒上发表了一系列专栏文章。

法国意图“充当媒介”，即希望在冲突中扮演角色，可以从法国各广播台对利比亚问题的报道中发现，也可以从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对利比亚开战后的4月和5月的新闻报道中发现。但法国并不是真的要参与

到危机之中，只是要“充当媒介”,[42]也就是说，要吸引那些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打击卡扎菲独裁统治的各国的注意，推动它们共同反对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该电视台就组织5场《讨论》节目，还安排了《焦点》和《今日问题》节目，主题是“叙利亚是否已经被国际社会遗忘”。直到2011年10月23日利比亚内战即将结束时，该问题还没有答案！然后，媒体的“危机弧”就逐渐从记者关心的问题中消失了，在法国只存在了一个季度而已。因为在利比亚内战之后，法国本土还有另外一场“内战”——2012年5月的总统大选。

至于“阿拉伯之春”，它还会像幽灵一样时不时地出现在媒体上，那也都是符合民主选举需要的，或者是伊斯兰分子即将掌权，或者是发生了针对西方外交代表处的袭击，等等。而所谓对民主化的描述，实际上只是媒体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所演奏的乐曲的一个小片段而已。

*

所谓的危机弧不过是媒体在一段时间内设计的结果，是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环境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仅仅限于48周之内。但是，从科特迪瓦政治危机出现之初到卡扎菲死亡，法国媒体真正关心的只是前18周。突然大密度地出现的突尼斯和埃及“革命”以及日本海啸，很快让位于利比亚、巴林和叙利亚政府镇压示威者后所导致的失望情绪。与民众之前的欢乐情绪相反，利比亚内战在媒体中的分量很小，因为内战总是断断续续发生且十分不确定。在联军开始行动前几天，各电视台就不断发布军事行动即将陷入泥潭或者遭遇失败的预言，因为当时的行动还仅限于空中打击。

法国媒体都进入了“危机弧”，自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1991年）以来就一直如此。[43]它们在一些关键节点制作长时间的直播节目或者发行加刊，然后不断重播通讯社的电文或从博客中选取的新闻。它们让专家站出来讲话，尽管有些专家在这些方面根本就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它们都使用新媒体特别是推特和脸书网站的消息作为新闻来源，

但也派遣一些记者前往各个战场。它们认为自己在传播新闻时保持了中立立场，目的是支持当地民主化。它们在这方面也许受到了法国政府的影响。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法国没有发生“愤怒者”行动，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却行动广泛。而且在法国，叙利亚局势的变化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激动情绪。

每次大幅报道世界事务，记者都会被一些新玩意儿拉入幻想之中。这次“危机弧”报道中的新玩意儿，不是什么新军事设备，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出现的猎鹰飞机，而是推特和脸书这种新媒体。与面对新武器一样，它们都会对自己的新发现欣喜不已，甚至说那是一次革命。媒体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运作的，大量冗长的信息也让全世界与它们一同坠入幻想。而如今，似乎不使用互联网，一场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而且总会有一些匿名的活动分子或者某些“被祝圣的”网站，抓住时机站出来捍卫互联网的使用权。此外，美国政府还以媒体应当捍卫信息自由为借口，为其提供支持。那些已经丧失记忆或观察意识的记者甚至被提供一种“速食思想”、一些尽可能远离事实的新闻。与往常一样，记者都会说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是，只要叙利亚问题不结束，他们就会一直保持这种谨慎的沉默。

杰拉尔德·阿尔布瓦

---

[1] “密电门”事件是指，自2010年11月28日起，维基解密网站公布了一些美国的外交文件。——作者注

[2] 《*Les médias internationaux muselés*》,*Le Monde du* 14*juin* 2009 *et Reuters*,《L'Iran annule l'accréditation des médias étrangers》,16 Juin 2009.

[3] Hartmut Wessler,Manuel Adolphsen,《Contra-Flow from the Arab World?How Arab Television Coverage of 2003 Iraq War Was Used And Framed on Western Information News Channels》,*Media Culture&Society*,2008,n° 30,pp.439-461.

[4] *Sylvain Mouillard*,《*Iran,la révolution Twitter*?》,*Libération* du15juin 2009.

[5] Jeff Howe,*Crowdsourcing*,New York,Crown Business,2008,p.246.

[6] Marshall Kirkpatrick,Readwriteweb,《Dear CNN,Please Check Twitter for News About Iran》,*The New York Times* du 14 juin 2009.

[7] http://globalvoicesonline.org/2006/04/14/announcing-our-alliance-withreuters/ (consulté le 21 septembre 2012).

[8] http://www.nowpublic.com/ap_and_nowpublic_com_announce_a_collaboration (consulté le 21 septembre 2012).

[9] Mounir Boudjema,《Le jeu dangereux du Qatar en Algérie》,*Liberté* (Alger) du 21 août 2011.

[10] Gérald Arboit,《La chaîne d'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France.L'année detouslesdangers?》,*Annuairefrançais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2008*,9,Bruxelles,Bruylant,2008,pp.872-873.

[11] Gérald Arboit,《Quelques réflexions autour de l'affaire Wikileaks》,*CF2R*,*Note de réflexion*,Janvier 2011,http://www.cf2r.org/fr/notesde-reflexion/quelques-reflexions-autour-de-affaire-wikileaks.php

[12] Cf.le témoignage du grand reporter du *Figaro* sur son expérience en Libye en février 2011,Delphine Minoui,*Tripoliwood*,Paris,Grasset,2011.

[13] http://fr.rsf.org/barometre-de-la-liberte-de-la-presse-journalistes-tues.html?annee=2011 et,http://fr.rsf.org/barometre-de-la-liberte-de-la-pressenet-citoyens-tues.html?annee=2011

[14] Olivier Herviaux,《Les observateurs de France 24 au coeur de l'histoire.Le sited'informationdonnelaparoleauxcitoyensquitémoignentdes événements》,*Le Monde*,supplément Télévision du 28 février 2011,p.4.

[15] 《Après la Tunisie et l'Égypte,crainte d'une contagion en Syrie》et《En Syrie,un appel à manifester contre la"monocratie"pas suivi》,*AFP* des 3 et 4 février 2011,《Les Syriens reconnectés à Facebook et You Tube》,Le Monde.fr du 10 février 2011.

[16] 《Syrie:la blogueuse gay était imaginaire》,*AFP* du 12 juin 2011.

[17] Elodie Auffray,Quentin Girard,《Qui sont ces blogueurs partis à Misrata?》,*Libération* du 28 avril2011,Rory Mulholland,《Equipée tragique pour six jeunes blogueurs français à Misrata》,*AFP* du 30 avril 2011,Nolwenn Le Blevennec,《Un goût de Tarnac chez les blogueurs français en Libye》,*Rue 89*du 5 mai 2011.

[18] Martine Gozlan,《L'Algérie peut-elle exploser?》,*Marianne* du 12 février 2011,p.48.

[19] Governmental ONG

[20] Cf.09CAIRO468 du 18 mars,09CAIRO580 du 6avril,09CAIRO591 du 7 avril,09CAIRO695 du 23 avril,09CAIRO1464 du 30 juillet,09CAIRO1819 du 17

septembre,09CAIRO2022 du 22 octobre et 09CAIRO2155 du 17 novembre 2009.

[21] 08CAIRO2572,op.cit..

[22] 08CAIRO2431,op.cit..

[23] Tomas Lundin,《Revolutionär plantskola（pépinière révolutionnaire）》,*Svenska Dagbladet*（Stockholm）du 2 mars 2011,Ron Nixon,《U.S.Groups Helped Nurture Arab Uprisings》,*The New York Times* du 14 avril 2011,Nicholas D.Kristof,《The Power of Mockery》,*The New York Times* du16avril2011et Ahmed Bensaada,*Arabesque Américaine.Le rôle desÉtats-Unis dans les révoltes de la rue arabe*,Montréal,Michel Brûléinc.,2011.

[24] Olivier Herviaux,*op.cit.*.

[25] Chapôde la série sur le site d'Arte,http://www.arte.tv/fr/4063920.html（consulté le 21 septembre 2012）.

[26] 法国反对派指责米歇尔·阿利奥-玛丽接受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的亲信提供的私人飞机度假。——译者注

[27] 指绿党、社会党部分成员提出废除核电。——译者注

[28] Laurent Gervereau,*Inventer l'actualité.La construction imaginaire du monde par les medias internationaux*,Paris,La Découverte,2004,p.103.

[29] 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New York,McGraw-Hill Book,1964.

[30] Arboit Gérald,《Journalistes européens et espace public européen》,Gilles Rouet（dir.）,*L'Europe et les journalistes*,Bruxelles,Bruylant,2009,pp.165-174.

[31] Sur ce personnage,cf.Daniel Domscheit-Berg,*Inside Wiki Leaks.Meine Zeit bei der gefährlichsten Website der Welt*,Berlin,Econ Verlag,2011[trad.angl.:*Inside Wiki Leaks.My Time with Julian Assange at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Website*,New York City,Random House,2011].

[32] http://www.wikileaks.ch/About.html（consulté le 21 septembre 2012）.

[33] Gérald Arboit,《Quelques réflexions autour de l'affaire Wikileaks》,CF2R,*Note de réflexion*,Janvier 2011,http://www.cf2r.org/fr/notes-de-reflexion/quelques-reflexions-autour-de-affaire-wikileaks.php

[34] Frédéric Bardeau,Nicolas Danet,Anonymous,Limoges,FYP éditions,2011,pp.149 et 115;《Blocages de sites:Internet au centre de la contestation en Tunisie》et《Après la Tunisie,les Anonymous s'attaquent à l'Égypte》,*AFP* des 5 et 27 janvier 2011.

[35] Alberto Dainotti,Claudio Squarcella,Emile Aben,Kimberly C.Claffy,Marco Chiesa,Michele Russo,Antonio Pescapé,《Analysis of Countrywide Internet Outages Caused by Censorship》,papier présenté à l'Internet Measurement Conference,Berlin,2 novembre 2011,http://conferences.sigcomm.org/imc/2011/docs/p1.pdf（consulté le 21 septembre 2012）.

[36] bit.ly是一个网址缩短服务，在推特等微博网站上非常流行。——译者注

[37] http://www.france5.fr/c-dans-l-air/presentation

[38] Concept fondé par Laurent Gervereau,*Inventer l'actualité.La construction imaginaire du monde par les médias internationaux*,Paris,La Découverte,2004,pp.113-120.

[39] Roger Hardy,《Egyptprotests:an Arab spring as old order crumbles?》, BBC News du 2 février 2011,http://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12339521 （accédé le 21 septembre 2012）.

[40] 《Tuni Leaks,les documents dévoilés par Wikileaks concernant la Tunisie:Quelques réactions à chaud》,https://tunileaks.appspot.com/?p=37001 （consulté le 21 septembre 2012）.

[41] Hugh Miles,《The Al Jazeera Effect:The inside story of Egypt's TV wars and how Saudi Arabia could be next》,*Foreign Policy* du 8 février 2011,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2/08/the_al_jazeera_effect,et Sherry Ricchiardi,《The Al Jazeera Effect》,*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march&april 2011,http://www.ajr.org/Article.asp?id=5077（consultés le 21 septembre 2012）.

[42] Héctor Borrat,*El periódico,actor político*,Barcelone,Pili,1989,pp.28-29.

[43] Gérald Arboit,《Les médias français dans le conflit du Golfe.De la crise à la guerre:2 août 1990-28 février 1991》,Michel Mathien（dir.）,*L'information dans les conflits armés.Du Golfe au Kosovo*,Paris,L'Harmattan,2001,pp.83-114.

第三部分

“阿拉伯之春”的国际影响



利比亚危机对马里北部安全局势的影响

西方坚持不惜任何代价尽快推翻卡扎菲，事实上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促使伊斯兰部族发动了对马里的进攻。巴马科从一开始就曾向其伙伴指出，推翻卡扎菲应该考虑得更为妥善，因为无论是从军事还是从人口（尤其是图阿雷格族）的角度看，其最后可能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不稳定因素。但这些警告没有了下文。突然之间，马里面临着来自北部的难民潮，加剧了这个国家的贫困。而这些人之后，很快第二拨儿到来的是不计其数携带精良武器的原卡扎菲士兵。

国家和领土统一瓦解的推动因素

当地形势使马里政府丧失了权威

在马里，滋生分裂的土壤是肥沃的。北部人，其中一部分是图阿雷格人，这些年来觉得自己被中央政府的发展规划遗忘了。那里所有的族群都感觉自己被忽视，甚至被抛弃。巴马科宣称自己物质手段匮乏，曾向国际社会申请援助，用于对当时的政府来说还太过昂贵的庞大发展项目。管理松懈、政策缺乏连续性以及族群内部和相互间的敌对使得情况越加恶化。

在北部沙漠地区，除了少数人能成为政府雇员，还有什么其他成功的途径？这个国家的政府很穷，只能提供有限的职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还能继续无视当地的“英雄人物”吗？那些黑商以及强盗拿着“萨拉亚”卫星电话，开着漂亮的四驱车，带着武器，多年来为所欲为地走

私香烟、酒类、毒品、武器，进行非法移民，与各种各样的恐怖网络相互勾结，掌控着所有的非法交易。

近几年来，马里的伊斯兰势力确实在增强，而且立场渐趋激进。人们都知道，北部的武装运动与南部的“平民”地区之间存在诸多关联。在2012年1月的阿盖洛克战斗中，除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还出现了“伊斯兰后卫”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这很清楚地说明，这些势力征服马里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随着对基达尔、加奥和通布图的进攻正逐步实现。

但这一离心趋势的推动因素却是北约对利比亚的入侵，其结果对整个萨赫勒和北非地区都是灾难性的。

快速的进攻和征服

原卡扎菲雇佣军大量涌入马里，其结果首先就是促使一些图阿雷格族部落的立场更趋激进。原来的“阿扎瓦德民族运动”也由此变身为“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并且变更了军事和政治领导层。该组织的新领导人以前是利比亚上校，指挥着一些曾在的黎波里军队服役的士兵。而且该组织也改变了自己的诉求和方式，宣称要通过军事手段为北部地区的独立而斗争。

与军队的分崩离析相伴而来的是国家的解体和北部各地方政府遭到驱逐，因此将阿尔及利亚、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边境超过8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置于伊斯兰势力手中。

不过，国际媒体很快关注到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抗分子，隐约观察到其中还存在着某些势力的支持。事实上，西方情报机构曾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隔断卡扎菲与图阿雷格族大本营的联系。那么代价呢？这还需要考察。矛盾的是，第一批难民自称是为了躲避战争和暴力，而实际上他们不是正在进行武装暴力活动吗？情况显然就是如此，尽管并不能确定西方政府曾给予他们保证。

周边同盟并不能坚持到“胜利”

开始的时候，由于并不具备独自发动进攻所必需的资源，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便同伊斯兰分子联合，共同进行军事行动。2012年初在阿盖洛克，它们残忍地处决了上百名马里士兵。伊斯兰分子逐渐在联盟中占据重要地位。现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已经直接控制了一部分团体，剩下的也变成了其附庸。

事实上，“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软弱已经得到大大缓解，“伊斯兰后卫”充当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掩护。除马里军队的逃兵外，伊亚德·阿格·加利所指挥的“伊斯兰后卫”成员均来自“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核心，其与后者并无太大区别。

于是，“伊斯兰后卫”与“西非圣战统一运动”一样，成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实际分支，即便它们并不主张国家分裂。因此，应该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它们行动遵循的是，与原“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及其他萨赫勒地区盟友一样的扩张逻辑，试图从马里开始，将该地区变成“圣战者”的地盘。

然而，民众的抵抗很快加剧了占领者们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赶出了加奥城。尽管面临暴行和缺乏相匹配的斗争手段，民众仍坚持抵抗。在加奥城，民众同杀害当地民选官员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斗争。人员的死伤也引起了各方立场的激化，并使“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的伊斯兰分子转而站到了民众这一边，同其他组织对立起来。

但是，马里的形势依然混乱。因为“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被赶出加奥，将该城及其民众置于无政府状态，政府和主权重建的问题至今仍丝毫未得到解决。

萨赫勒：地区和国际不稳定的新策源地

马里军队的崩溃和国家体制的完全倒塌，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其他从事走私贩毒的黑社会团伙控制整个北部地区提供了条件。“圣战”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后卫”、“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博科圣地”）开始在萨赫勒拥有较大的自由，并以该地区为基地从事各种非法活动甚至恐怖活动。

“圣战”组织的活动范围也因此从毛里塔尼亚扩展到乍得，从阿尔及利亚扩展到尼日利亚，以及所有与萨赫勒接壤并且情况类似的国家，如塞内加尔、贝宁、科特迪瓦等。

对西非和北非的威胁

利比亚危机和马里北部形势导致了两个灾难性的后果。

一方面，该地区所有国家未来都可能出现渐趋激进的“伊斯兰高级委员会”之类的宗教组织，温和派将被最激进和极端的势力压制。不仅是在马里，在萨赫勒地区和西非所有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前途迷茫且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都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这将导致激进主义的复苏及人员招募。

另一方面，如果不改变当前的状况，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可能在当地产生“圣战”组织，就像“伊斯兰后卫”、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以及“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在毛里塔尼亚、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贝宁等国的分支一样，进而形成反对异教徒和“叛教者”（指当地政府和外国公司）的全球“圣战”。

因此，所有西非国家都成了目标。那里的侨民纷纷加入不同的组织，这也符合“圣战者”的教义，即个人完成自己本地“圣战”（针对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同时，攻击远方的敌人（该地区所有国家的西方人员和投资）。

由于边界的疏于管理和民族的同质，每个西非国家包括乍得都需要当心。贝宁北部存在与尼日利亚同样的问题。尼日尔的民族成分与

马里一样，但有关图阿雷格族的问题却有所不同，那是因为尼日尔的经济更为繁荣。

国际影响

在萨赫勒和西非，地盘、活动和人员的组织网络化，以及非法活动和恐怖行动的国际化，使得这块新的“灰色区域”成为该地区所有国家甚至外围国家的危险因素。事实上，它同时是通往其他地区的通道，也是后勤基地，可以招募、培训和汇集萨拉菲派组织及马格里布、撒哈拉以南非洲乃至世界“圣战者”运动的成员。

利比亚危机导致的武器（特别是可能威胁民用飞机的防空导弹）扩散范围临近地中海（靠近欧洲）的战略要冲。萨赫勒地区和西非经济共同体国家在能源矿产方面对西方的重要性，发展计划安全阀作用的上升，对投资和人身安全的威胁，这一切使得该区域以外的国家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及其盟友越发无法忍受，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在阿富汗的干预。

如何走出危机

在军事上重新征服马里北部是否可期？是的，必须重新夺回马里北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接受本来完整的领土却被那些强人所难的武装组织侵犯。此外，为国家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与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是分不开的。

伊斯兰团伙占领马里北部被证明是对该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威胁，这还涉及西非经济共同体协定的落实问题。也正是基于该协定，人们才提出向马里派遣军事力量，帮助该国重建国防和安全部队，并恢复其领土完整。

很明显，向该国部署地区部队需要国内团结。但此时，马里还无法完全实现这样的团结，这也是为什么马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必须结束无益的对抗，并切实实现整体和解，才能在国际协助下重新收复北部。

苏梅卢·布贝耶·马伊加

重提“撒哈拉身份认同”问题：“阿拉伯之春”的次效应

部分族群根据“撒哈拉身份认同”模式提出自己的要求，是“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意想不到的附加现象。许多冲突出现在国家领土的外围，是专制主义和保守主义长期肆虐的结果，也是一些平时被无视、远离反抗中心的族群希望加入全面解放进程的结果。而这些旧有冲突的再现，突然又将身份认同问题凸显出来，使其成为民族国家以及地区和国际关注的焦点。

撒哈拉-萨赫勒死亡地带横跨多国，自古就是各方势力争夺之地，是北非国家对自己及邻国的南部地区施加影响力的焦点，也是南北关系传统上长期不平等的体现。事实上，马格里布国家自独立以来，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跨境地缘政治规划，但其中共同的最根本的还是涉及跨撒哈拉边境问题。边界划分存在争议或处于未完成状态所导致的长期不稳定，这意味着双方可以在任何时候根据国内政治需要重启争端或对邻国施压，也可以对其他国家的敌对意图和行为保持暧昧。边界地区往往生活着很多族群，这里是他们蒙受伤害的前线，也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利比亚在撒哈拉争霸及夺取势力范围的冲突焦点。

在各国地理和政治始终存在分歧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利比亚主张的撒哈拉逻辑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推崇的阿拉伯或地中海逻辑，在领土划定方面一直存在冲突。不同种族间的接触层面总是越来越被忽视，一些族群最终背离中央政权，更加内倾化，他们更看重的是商品的非正式交易，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人文地理因素也在其中扮

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族群遵循的是氏族或家庭逻辑，而这些氏族或家庭决定了交易的形式，以及归属、团结和皈依的类型。

由于汇聚了各霸权国家的领土和政治利益，这些地区的市场可以被北非国家利用，以扩大对抗邻国的行动空间。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在西撒哈拉冲突，或者阿尔及利亚与利比亚在图阿雷格族问题上表现出的敌对就证明了这一点。现状是这些地区被排挤在历史进程之外，各个族群的愿望不仅受制于敌对邻国的看法，也受那些认为其历史使命已经过时的外国势力的冷落。

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革命”给这些族群提供了机会，他们对一直以来禁锢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枷锁提出质疑。目前，这些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被边缘化的族群开始表达摆脱长期控制的渴望，追求社会公正，重提自身特殊性，并要求重新平等分配开发自然资源所得。

身份认同和领土问题的重新凸显，将成为该地区今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持续影响转型进程和地区平衡。国内和地区层面经济、政治与安全挑战的错综交织，将成为影响撒哈拉跨境区域前途的关键。

卡扎菲把利比亚及其邻国的众多少数族群当作工具。在多国人民看来，他不是和平的维护者，而是麻烦的制造者，特别对利比亚的柏柏尔人和图布人、对马里的图阿雷格人和尼日尔人来说更是如此。在东部，西奈半岛的贝都因人被排除在旅游业的经济收益之外；在西部，撒哈拉人则被地区和国际社会遗忘了将近40年，现今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柏柏尔人

卡扎菲的泛阿拉伯主义言论衍生自纳赛尔主义，是其统一阿拉伯世界计划的基础。萨勒姆·沙克尔和马森·佛卡尔在《利比亚柏柏尔

人：不被重视的变量和意想不到的入侵》一书中指出："人们可以认定这是一种阿拉伯'种族主义'，那些非阿拉伯穆斯林明确地被认定为更低等，属于伊斯兰世界中的'次级圈'。对于柏柏尔人，这位利比亚独裁者就参考中世纪阿拉伯传说，多次肯定他们的阿拉伯血统和身份……因此他即便算不上种族主义者，但本质上还是属于种族主义的，其言论是建立在阿拉伯本体优越的基础上。"[1]

人们在此可以发现其他马格里布国家所鼓吹的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实际上无视其他非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语国家群体的存在。

聚集利比亚

利比亚的柏柏尔人数量大约为70万，主要生活在该国西部的纳福沙山（因富森山）及沿海城市（祖瓦拉），属于伊巴德派；利比亚的图阿雷格人目前主要生活在西南部，在加特（横跨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图阿雷格族阿杰尔联邦）、贾奈特（阿尔及利亚西南）、吉达米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交界）、阿加德兹（尼日尔中部）也有一部分，这些地方都是往来于地中海沿岸和撒哈拉之间商队的中转站。

卡扎菲时期，柏柏尔语在教育体系、公共场所和伊巴德派的宗教活动中是被严格禁止使用的。坚持柏柏尔文化的人都受到利比亚当局的威胁。因此，一些"革命委员会"和"利比亚明天运动"（忠于卡扎菲的组织）的成员，在2009年12月攻击了柏柏尔人的城市耶弗朗，以报复柏柏尔人所提出的身份质疑。但这未能阻止利比亚柏柏尔人行动主义的发展，及与北非其他国家柏柏尔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每年在提济乌祖（卡比利）纪念"柏柏尔之春"时。直到的黎波里政权倒台，柏柏尔族的许多艺术家和斗士仍被囚禁或流放。

因此，2012年2月，许多西部城市很快加入了反抗运动，并在利比亚“柏柏尔之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并不令人惊奇。利比亚边境重镇纳卢特在动乱一开始就发起了抗争活动，虽然卡扎菲曾想给那里的每个居民1200美元以换取其归顺，但该城居民予以拒绝。利比亚柏柏尔人在战争期间及战后为捍卫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性进行了积极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这将对该国政治格局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正如萨勒姆·沙克尔和马森·佛卡尔在书中所指出的：“柏柏尔语的作用从动乱开始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即便在2011年春最困难的时期，在卡扎菲军队的炮火下，柏柏尔语仍被利比亚的士兵和突尼斯的众多难民使用……许多柏柏尔士兵已经在自己语言文化的基础上来思考利比亚和柏柏尔的前途。”[2]

同沿海的柏柏尔地区相比，利比亚图阿雷格地区（加特和乌巴里）一直在卡扎菲控制下，处于结构性的欠发达状态。对这位利比亚领导人来说，图阿雷格地区的人是阿拉伯人，并不存在承认或提倡其语言文化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利比亚的图阿雷格人积极地参与2011年1月底的动乱和柏柏尔人的示威。

在纳福沙山地区的一些城市，如纳卢特、耶弗朗和吉卡拉，忠于卡扎菲部队的败退极大激发了民族认同，柏柏尔语“革命”的字样出现在墙壁和民兵的车辆上，柏柏尔语报纸开始出版，柏柏尔人的旗帜开始出现在公共建筑物上。2011年春，地方议会开始成立，并向全国过渡委员会申请给予其语言官方地位。但2011年8月的临时宪法提案并没有涉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权利，而是重申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2011年11月，祖瓦拉地方议会宣布将停止与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一切合作，利比亚柏柏尔国民大会也宣称将抵制阿卜杜勒·拉希姆·凯卜政府，因为后者没有给予该国的柏柏尔人任何地位。

柏柏尔国民大会主席费蒂·布扎卡在2011年9月的黎波里召开的首次会议上宣称：“将我们的语言定为官方语言是政治问题，我们希望以政治而不是军事的方式来解决。因为现在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国家，我

们需要民兵来保证安全，但我们对自己的年轻人说，要期盼我们的诉求能够得到政治解决。”[3]2012年5月，该地区形势再次趋于紧张，因为里格达朗的阿拉伯部落抓捕了柏柏尔大本营祖瓦拉的29名民兵，还焚烧了他们的店铺，将其驱逐出该城，以此加强对跨境走私的控制。

卡扎菲政府的独裁只维持了这一多民族国家的表面稳定，不同的种族构成在今天仍是促使该国分裂的部分原因。

图阿雷格人问题

图阿雷格人是马格里布和南撒哈拉国家分歧的焦点之一。2012年1月，他们的暴动从强度、范围、组织、规模（大约1000名士兵）和物质手段（利比亚武器）上都与以前的反抗有所区别。但最重要的还是其强调的目标：不再仅通过发展经济加大图阿雷格人的融入度，而是首先要取得自决权和独立。

100万—150万的图阿雷格人分布在利比亚、阿尔及利亚、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之间2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马里和尼日尔的干旱，1990年至2000年的反抗运动，导致了数千图阿雷格人逃向邻国，特别是利比亚，因为该国政府一直鼓励其定居，当然还有阿尔及利亚。

2007年起，图阿雷格族聚集地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占据，成为越发不安全的地区。由于动乱不断、危机频现、政经废弛，这一地区显得尤为脆弱。2006年的《阿尔及尔协定》和2009年的《利比亚协定》，都规定要将图阿雷格人纳入警察或宪兵的管辖下，并创立主要由原反抗军构成的部队。但该目标没能实现，一直到2011年，地区安全框架被重新提出，要招募5000名图阿雷格人加入反恐特别部队。[4]由于其在所在国的政治和行政机构中没有多少代表，图阿雷格人经常被本国政府指责为强盗或不法商人。尽管的黎波里针对他们的

政策比较暧昧，在文化歧视和支持其抗争之间左右摇摆，但仍有许多图阿雷格人流亡利比亚，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

利比亚领导人的下台，也对那些30多年来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利比亚的，以及2011年冲突中逃亡到利比亚的图阿雷格人产生了直接影响。经过长期严重干旱等灾害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移居利比亚，其中有一些加入了“伊斯兰军团”（1987年解体），这些人开始否认自己的世袭首领并攻击原来的政府。受到卡扎菲1998年在的黎波里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成立时，所提出的建立大撒哈拉自治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南部、马里北部、尼日尔北部和利比亚南部）的言论诱导，他们中有5000人加入了利比亚正规军。2011年利比亚内战期间，马里和尼日尔的图阿雷格族青年仍有机会参加泛非伊斯兰军团特别部队，来换取利比亚国籍、永久居留权或奖学金。对于那些希望入伍的人来说，只要联系利比亚南部的乌巴里（图阿雷格族地区）军营就可以了。[5]

根据尼亚美和巴马科的估计，2011年尼日尔和马里的图阿雷格人有20万人回国。考虑到他们对当地的熟悉并掌握了游击战术，尼日尔和马里政府担心这些装备精良的“难民”被伊斯兰分子或非法交易团伙招募。为了与这些回国者缓和关系，尼日尔总统穆罕默杜·伊素福任命布里吉·拉菲尼为总理，因为后者是伊费鲁安的图阿雷格人，而伊费鲁安所在的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动乱。

马里政府则意识到了分裂的危险，其目标是阻止原利比亚士兵和“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武装分子联合。2011年10月，马里的显贵和议员为此与“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负责人碰面，提出向其提供金钱支持以换取其解除武装。一部分团体拒绝了该提议，例如阿尔及利亚边境附近的穆罕默德·纳吉姆领导的团体就宣称要取得马里北部的自决权。

原利比亚军队中的许多图阿雷格族士兵仍然忠于卡扎菲，后者仍很受他们欢迎。例如在阿加德兹，就像在一些图阿雷格人的营地一

样，卡扎菲的肖像仍然到处可见。2011年7月，支持卡扎菲的示威在该城被禁止，且好几个清真寺仍然为他举行祈祷仪式。图阿雷格人仍然感谢这位利比亚领导人给予他们工作和合法身份，而且曾为他们1990年至2000年的反抗说情，以及2009年在尼亚美促成了和要求分享部分铀矿开发的反抗军实现停火。

2012年1月中旬，在马里北部的叛乱，恰巧发生在这些图阿雷格自治主义分子返回利比亚的时候。

2011年秋，多个政治派别包括利比亚的许多图阿雷格人又聚集在一起。2011年10月16日，利萨·阿巴盖勒领导的易卜拉欣·阿格·巴汉加武装运动与其他政治团体联合，建立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就包括“阿扎瓦德尼日尔解放运动”“阿扎瓦德自治民主阵线”“阿扎瓦德阿拉伯爱国阵线”。该运动的两个主要目标是：拥有该地区的自决权；消灭毒品等非法交易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武装分子，也使后者很快从伊福拉斯高原的基地撤出了自己的人员。

“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得到了原利比亚卡扎菲部队图阿雷格族分支负责人阿里·坎纳将军的支持，但其内部在领导权上一直存在纷争：一方是伊弗哈斯和夏马纳马斯地区；另一方则是伊姆加德地区，由哈吉·加穆上校领导，此人曾组织了利比亚图阿雷格难民回归庆典。

从2012年1月17日开始，重要的边境地区和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被反抗军占领。1月18日至26日，反抗军在攻打梅纳卡、基达尔、莱雷、安德兰布坎和阿盖洛克时与政府军进行了激烈交火。在这些城市的战斗中，有数千名马里士兵是被“伊斯兰后卫”消灭的。该组织的领导人为伊亚德·阿格·加利，曾挑动20世纪90年代的图阿雷格人叛乱。作为图阿雷格人之父、安萨尔撒哈拉阵营的领袖，他鼓吹恢复伊斯兰教法。

2012年2月8日，阿尔及利亚边境塔曼拉塞特的大门——廷扎瓦滕落入反叛军之手，也标志着特萨利城被逐步包围。该城中的马里军队自3月初开始陷入重围，但仍能得到美国的补给。由于在物资和军事力

量上占优，一部分图阿雷格人拒绝了马里总理发起的对话。而此时“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时间接受了毛里塔尼亚、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阿尔及利亚支持的谈判，后两个国家尤其担心它们治下的图阿雷格人也跟着闹独立。

在此期间，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受到了“伊斯兰后卫”、“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排挤。这些组织主张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法并对民众实行恐怖统治。当前，马里国家的分裂和崩溃使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后殖民秩序完全失效，由于缺乏解决政治或军事纠纷的可能，该国将长时间为极端组织和犯罪组织提供温床。

利比亚的图布人

利比亚的图布人大约有80万，同柏柏尔人一样长期受卡扎菲政权压迫。现在他们希望借机使自己的语言和权利重新得到承认，通过取得石油、外交和内政这三个最核心部门的部长职位中的任何一个来获取政治地位，并统一费赞和塞兰纳伊克之间的利比亚南部地区，使其成为由地方控制的自治区。卡扎菲一直对图布人实行双重政策，给予他们边境管理权，以此换取对非法交易和跨境走私的垄断。图布族全国委员会创始人若莫德·艾利·格蒂称：“图布人虽然担任了一些低级军官，但从未到达国家层面，包括南部最大城市塞卜哈的热门军事长官位置。”由于靠近产油区和地下含水层，图布人一直等到政府已经足够衰弱时才公开反抗。利比亚南部、乍得北部和尼日尔东部的这片区域被提贝斯提高原环绕，也是图布人的历史发源地，因此他们希望重新探讨自己的战略地位。

2012年2月，图布人与祖瓦亚部落在库夫拉地区（利比亚东南）发生了流血武装冲突，造成了数百人死亡。这不仅说明了利比亚内部边界问题的紧张程度，也反映出地方势力对乍得、苏丹和埃及跨境非法

活动收益控制权的争夺。乍得西北部同样也受到图布人的骚扰，因为该地区正处于从马里北部经埃及和利比亚通往欧洲和中东的毒品交易线上。

自2012年4月以来，塞卜哈周围又发生了图布人和阿拉伯部落之间的冲突，但很快得到了政治解决。图布人宣布成立由阿拉什·迈赫迪领导的“南利比亚政府”，威胁要破坏一条石油管线，并向其在乍得和尼日尔的“兄弟们”发出呼吁。由于自己是黑皮肤，图布人谴责利比亚过渡政府和地方部落首领发动的“种族净化”运动。图布人还被其他部落指责招募尤其是来自乍得边境地区的外国士兵。

这一切源自2012年3月26日图布人的领导人阿哈马特·艾利·加勒马伊及其两名助手被刺杀，当时在塞卜哈旧人民宫正举行民兵首领会议。凶手可能是属于乌来德-苏莱曼部落的阿拉伯人。1000万利比亚第纳尔（约合600万欧元）安全预算的分配似乎是冲突的起因，当然也包括被视为财源的边境控制问题。2012年6月，就在大选初选前夕，图布人和祖瓦亚部落又爆发了新的暴力冲突，导致50多人死亡。

卡扎菲倒台后，毒品、军火、建材、各种消费品的走私活动和偷渡交易成为各部落争夺的焦点，他们都试图独自控制非法活动的收益。为结束紧张局势，的黎波里政府向库夫拉派遣了一支主要由原班加西反政府武装组成的维和部队。但这一号称“利比亚盾牌”的部队却进一步激化了该地区的紧张形势，图布人更将其视为听从祖瓦亚部落号令的部队。库夫拉的图布人要求撤走的黎波里派遣的阿拉伯部队，以此作为和平谈判的前提条件。

卢克·马修在《利比亚——撒哈拉的弃民》一书中称：“图布人在巴尔卡·瓦都古的治下一直垄断着跨境走私线路，但近来这一权力却被的黎波里当局转给了阿卜杜勒·瓦哈布·沙桑，此人正是6月初在巴基斯坦被美国人除掉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阿布·叶海亚·利比的兄弟。图布人对这个伊斯兰分子将拿到1700万利比亚第纳尔（约合1000万欧元），并控制由卡塔尔提供的一整船四驱越野车表示反对。当前，阿

卜杜勒·瓦哈布·沙桑掌控着阿尔及利亚边境，同样将掌控尼日尔和乍得边境，但这遭到图布人的拒绝。情况陷入了僵局。”[6]

西奈半岛的贝都因人

西奈半岛面积为6.1万平方千米，在地中海、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交汇处，是连接非洲和亚洲的三角形半岛，也一直是尼罗河谷与埃及邻国之间的战略要地。该地区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梅夫塔”，意为“门闩”。

西奈半岛有埃及最赚钱的海边度假地，那里的大部分居民是贝都因人，但长期以来被穆巴拉克政权边缘化。自2011年2月埃及动乱以来，该地区的安全形势急剧恶化。1979年《埃以和平协定》将西奈划为非军事区，导致那里缺少足够的军队，也使紧张局面愈加难解。因为贝都因人已被赶出了西奈的旅游业，开罗必须雇用民兵来保障那里的旅馆和村庄的运转。贝都因人仍处于游牧状态，但现在他们提出自己的村庄也应该连通水电，与治安部队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

埃及政府一直以来就很难将其政令推行到贝都因人部落。在穆巴拉克倒台后，开罗似乎不再能掌控西奈半岛，通过各种渠道运往加沙的建材、汽车和武器的交易已经是公开进行的。西奈半岛的被忽视暴露出“阿拉伯之春”的离心效应。

那些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人使西奈半岛变成了庇护所和发动袭击的基地，尤其是对以色列的攻击。这些人正不断扩张非法活动以及萨拉菲恐怖主义网络。穿过西奈半岛北部供给以色列和约旦的天然气管道一年内遭到了14次攻击（平均每个月一次）。

此外，该地区遭绑架的外国人数量也在增加：

2012年1月31日，“团结与圣战”组织绑架了一家水泥厂的25名中国工人，要求释放被指控在2004年至2006年攻击旅游点的5名成员。

2012年2月初，在一个贝都因人与警方交火丧生之后，19名警察被绑架。

2012年2月13日，2名美国游客及其埃及导游在圣凯瑟琳修道院被绑架。

2012年3月，贝都因人数日围攻多国观察部队（负责监督《埃以和平协定》实施）的营地，并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释放一些被指控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部落成员。

2012年5月初，多国观察部队的6名斐济士兵被拘押近1小时。

2012年5月30日，贝都因人直接在红海的宰海卜绑架了2名美国游客，以抗议一名贝都因人被捕。

2012年7月13日，又有2名美国游客及其埃及导游被绑架。

自2011年起，贝都因人越发胆大妄为，甚至在开罗进行活动，为非埃及的组织服务。1月，他们袭击了开罗北部的马格监狱，救出了被监禁的哈马斯领导人伊曼·努哈尔，以及真主党小组行动策划人萨米·塞哈比。

除了各部族的抗争诉求外，更棘手的问题是自开罗发生"革命"以来，西奈半岛成了伊斯兰武装分子的乐土。年轻人越来越激进，并开始乐于听从伊斯兰极端运动的召唤。早在2003年成立的"圣战统一运动"，曾在2004年至2006年制造多起死伤事件，现今又重新开始活动。

安全真空使上千名哈马斯战士得以进入埃及城市拉法赫。它与加沙之间的通道被一个加沙伊斯兰运动组织掌控，该团伙招募了大量年轻的贝都因人。2012年1月30日，哈马斯武装组织"卡萨姆旅"的一些成员进入西奈半岛，并攻击了阿里什附近的埃及军队和一个警察局。

成立于2011年12月的"圣战拥护者"组织，于2012年1月23日公开投靠了"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除了捣毁天然气管道，该组织还于

2011年8月18日袭击了驶往埃拉特港的公共汽车。该组织还宣称，将开罗军政府、美国人和埃及科普特人作为攻击目标。

2012年8月，“伊斯兰军”对埃以边境的一个哨所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造成16名士兵丧生，标志着西奈安全局势正在迅速恶化。9月21日，3名身缠炸药的恐怖分子试图强行进入以色列，并向保护边境隔离墙施工人员的部队开火。驻扎在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大约1000人）由于缺乏训练、装备和积极性，自然就成了“圣战者”及其当地同伙的袭击目标。

尽管西奈半岛从1973年开始就有埃及部队驻扎，与加沙地带之间的关卡也已关闭，但“圣战”组织在该地区沙漠地带的活动依然猖獗。穆罕默德·穆尔西作为国家元首，对暴力极端活动态度坚决，号召一些贝都因部落领袖协助政府恢复西奈半岛和平。埃及情报部门的新负责人，同时也要求哈马斯安全负责人参与针对加沙和西奈之间“圣战”组织的围剿活动，以此作为重新开放2006年以来被关闭的拉法赫哨所以及封锁两地地下通道的条件。[7]

正是因为恐怖分子和贝都因人合作，大量越来越精良的武器源源不断地从西奈半岛经苏丹、利比亚流向加沙地带。乌来德·阿里和塔拉宾部落的跨境武器走私并不新鲜，但利比亚军工厂被盗使得数量庞大的武器（其中就有利比亚的2万件SA-7防空导弹中的一部分）落入了那些唯利是图的非法商人手中，然后这些武器被卖给需求巨大的巴勒斯坦人。作为利比亚和埃及之间的主要商业枢纽、合法和非法商品传统上的中转地，埃及边境城镇塞卢姆的贸易量大幅剧增。

撒哈拉人

摩洛哥长墙的建立阻断了西撒哈拉与马格里布的连通，也防止了战火重燃，使那里成为“被冻结冲突”的地区。近几个月以来，阿尔及

利亚西南部廷杜夫地区难民营的一些撒哈拉青年，因经济无望以及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简称西撒人阵）的政治封锁而发起了抗争活动。

西撒人阵一直缺乏合法性，近些年不断被质疑。它已经失去了唯一的代表地位，近来又有大量显贵逃往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北部。

2004年，该组织内部发生了分裂，由此产生了“殉教者阵线运动”。分裂的主要原因不仅是西撒人阵领导人的腐败，更涉及难民的权利和生存条件问题，而该问题已经成为撒哈拉领导人借机炒作的工具。[8]“殉教者阵线”要求与联合国就其“撒哈拉部分民意的内外代表资格”进行谈判。2005年5月开始涌现的独立要求，反映出西撒人阵对年轻一辈的吸引力下降。2012年3月，该运动发言人马哈古卜·萨勒克提出“更换腐败领导人”的口号，以此迎合青年人的要求，使他们摆脱营地的封闭和孤立。[9]

“撒哈拉革命青年运动”是最近针对在位35年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齐兹再次参选发起抗议活动，标志着出现了不再承认旧权威的新一代人。抗议者所高呼“离开”一词恰恰反映出“阿拉伯之春”对年轻人的影响。他们要求社会公正，反对领导人收买人心和实行部族主义。

2012年2月，一个撒哈拉青年组织围攻了位于廷杜夫的西撒人阵总秘书处，要求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齐兹辞职，释放在争取拉马达营地自由、民主和尊严的请愿静坐活动中被逮捕的3名同伴。

该组织一些成员从事武器、毒品交易和绑架活动而引发的安全问题，加剧了西撒哈拉领土上的政治争夺，也使西撒人阵的营地成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招募目标。2010年12月，西撒人阵的数名首脑因牵涉最大的贩毒网络而在马里和毛里塔尼亚被捕；一个月之后，摩洛哥安全部队在缓冲区附近的阿姆加拉，摧毁了一个有27名成员的恐怖组织，并发现了多个藏有大量俄制武器的仓库；2011年10月，“西

非圣战统一运动”在拉布尼难民营（廷杜夫）绑架了3名西方人道主义组织成员，而且很可能与西撒人阵内部成员有勾结。

西撒人阵成员出现在马里的加奥城（“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的地盘，该组织发言人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赫拉维），表明了廷杜夫营地的松散状况。犯罪团伙经常为争夺走私生意发生冲突，也使得该地区形势几乎一直处于危险状态。

在独立问题上，政府采取了强硬措施，否定地方和地区层面的民族本位主义。对身份认同的重新质疑以及古老的领土收复主义的觉醒，完全属于政治上的博弈。中心与外围问题仍是未来形势发展的重心，因为人们无视其结构特征，也没有将造成领土分裂的族群冲突当作完整的危机来看待。

在地区层面，从地中海到几内亚湾沿岸，脆弱地区扩大，紧张和不稳定因素增加。这种形势要么通过政治上的反抗，要么通过非法收益的争夺以及极端主义暴力网络抬头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都是“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挑战。除了多种多样的威胁层出不穷，各国经济也日益脆弱，导致安全形势不断恶化，政治转型进程日趋复杂。

借助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正在发生的变化，也许认真解读伊斯兰政党异军突起所带来的政治紧张局面，仔细分析北非和撒哈拉社会普遍性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该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洛朗斯·阿伊达-阿穆尔

---

[1] Salem Chaker et Masin Ferkal,《Berbères de Libye:un paramètre méconnu,une irruption inattendue》,*Politique africaine*,n°125,mars 2012.

[2] Salem Chaker et Masin Ferkal,*op.cit.*

[3] Yidir Plantade,《A Tripoli,les Berbères réclament leur place dans la Libye nouvelle》,*Le Monde*,29 septembre 2011.

[4] Il s'agit du plan établi par le Comité d'état-major opérationnel conjoint （CEMOC） basé à Tamanrasset et comprenant l'Algérie,le Mali,la Mauritanie et le Niger,qui prévoyait la mise en place de bataillons dont les effectifs auraient du tripler en 2011,passant de 25 000 à75 000 hommes et incorporant 5 000 Touaregs,mais qui n'ont jamais vu le jour.Voir Laurence Aïda Ammour, 《La coopération de sécurité au Maghreb et au Sahel:l'Ambivalence de l'Algérie》 ,*Africa Security Brief*,n°18,Africa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Washington,février 2012.

[5] Voir Laurence Aïda Ammour,《Mains-d'oeuvre africaines:un instrument au service de la politique intérieure et de la diplomatie libyennes》,*Tribune libre* n°16,Centre Français de Recherche sur le Renseignement（CF2R）,juillet 2011.

[6] Président du conseil militaire de Mourzouk,fief des Toubous.

[7] 《Gaza:le pacte secret des RG égyptiens》,*Intelligence Online*,n°672,20 septembre 2012.

[8] Voir Laurence Aïda Ammour, 《A qui profite le gel du conflit du Sahara occidental?》,*Research Paper* n°30,Collège de Défense de l'OTAN,Rome,novembre 2006.

[9] Voir Julien Dedenis,《Au-delà de l'espace clos:l'enfermement vécu dans les camps de réfugiés sahraouis du Sahara ouest algérien》,*Cahiers ADES*,Maison des Sud,université de Bordeaux,mars 2009,pp.71-88.

走出萨赫勒危机：应重建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关系

最近萨赫勒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属于地中海“危机弧”的传统范畴。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考察这个“灰色地带”。

其一是阿以冲突的破坏效应，一切总要归结到这一问题，新近发生的就是黎巴嫩领海的天然气争端；其二是塞浦路斯问题，1974年土耳其和希腊通过著名的“阿提拉线”将该岛一分为二；其三是西撒哈拉问题，该地区虽然并不直接属于地中海，但却隔断了统一的马格里布联盟的出现；其四是大量的有组织犯罪及毒品、军火走私和人口交易，其中丹吉尔港是主要的通道；其五是突尼斯、埃及、也门和利比亚的阿拉伯“革命”衍生效应，这一威胁相当于是阿拉伯“革命”的“售后服务”，并将对其他国家产生催化作用，成为问题重重的地中海地区的主要矛盾。

萨赫勒地区北起撒哈拉北部，南至苏丹南部热带草原，西起大西洋，东到红海。除了在地理上十分复杂，萨赫勒地区在安全层面上也正在搅动地中海，因而成为我们当前最为关注的地区。

因此，认真研究这一地区地理和地缘政治形势的混乱因素，才能找到最终走出危机的可能。

三个层次的威胁[1]

首先，萨赫勒地区存在着有组织犯罪、叛乱和恐怖主义三重威胁，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三种相互叠加的地缘政治病态和混乱因素：一是存在所谓的失败国家，已成为滋生多种形式有组织犯罪的温床；二是反叛活动和领土收复主义对国家边界提出质疑；三是萨拉菲派武装分子活动频繁。这三种地缘政治现象相互影响。

其次，就是著名的"利比亚伤口"，它是阿拉伯"革命"和最近班加西的后殖民战争带来的，而且后者还过早地被冠以"人道主义战争"。

最后，这些威胁所带来的新变化，特别是出现在马里的政变。对这三种地缘政治病态应当从危机管理的角度进行考察，而不是去批驳。

确立有效国家主权的困难

非法商人以及萨拉菲分子将部分图阿雷格人、哈拉廷人（源自毛里塔尼亚阿拉伯化黑人）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视为自己的工具，其所造成的萨赫勒的安全问题，与社会和经济秩序，即当地的政治治理是分不开的。

毛里塔尼亚、马里和尼日尔都是欠发达国家，它们的情况类似，都很难为分散在广袤领土上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基本保障。这三个国家各自的领土都是100万平方千米左右，相当于3个德国的大小，其中靠北边的一半是沙漠。北部地区是非法商人、反叛者和恐怖分子的活动区域。那里的居民缺少与政府合作的积极性，反而对从与政府竞争的其他政治势力那里获取物质好处更感兴趣。

就像在马里和尼日尔，南部定居居民的逻辑和北部游牧民的是完全不同的。在多数情况下，游牧社会的变化必然招致那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的不满。这种被遗弃的现象随处可见，例如2007年毛里塔尼亚边境小镇就悄然竖起了马里国旗。

对萨赫勒国家来说，未来风险还在于社会领域被伊斯兰分子侵袭。例如尼日尔的“伊扎拉社团”就瞄准了文教卫生问题。这些问题一直被政府忽视，因为政府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无能为力。

事实上，最重要的还是尼日尔、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的能力和意愿问题，即如何在卫生、司法、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发挥国家安全和社会职能。换言之，就是保证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以及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否则国家将很难保持稳定，外围沙漠地区的人也没有渠道进入上流精英社会。

在当前的情况下，主权的有效性涉及两种类型的问题：一个是萨赫勒国家的行动能力，包括物资上的、财政上的和人力上的。另一个是政治上的，由于多元化，任何国家政治事务的管理都应建立在保障各方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这一问题又涉及中心与外围，即马里和尼日尔的“南部黑人”与“北部白人”之间，或者毛里塔尼亚的部落与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析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施政条件，可以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央政府对外围地区的投资不足，这也是无法建立稳定的中央集权结构的原因之一。这一中心与外围的矛盾及国家固有的脆弱性导致了第二种地缘政治病态。

有组织犯罪和叛乱

由于政治上无所作为，萨赫勒地区失败国家必然腐败滋生，从事非法活动的势力集团和商业网络屡见不鲜。传统的走私物品主要是油料、香烟、汽车、武器和弹药，现在又增加了毒品转运，其活动范围遍及整个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沿线，一直延续到非洲之角，甚至邻近的也门。

在毒品交易的全球化中，萨赫勒地区已成为主要途径之一。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的可卡因，通过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的港口运进来。亚洲金三角和金新月的海洛因，通过非

洲之角进行中转。这两条线路汇聚在萨赫勒，毒品从那里转向马格里布，最后到达西欧南部。

近些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西非作为毒品交易中转站和分销点的地位不断上升，主要是沿着几内亚湾的加纳、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亚，以及西面的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由于哥伦比亚的毒枭试图开拓新的市场，北大西洋国家尤其是西班牙加利西亚海域对毒品交易打击力度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线路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

这些毒枭开始将西非作为毒品交易的贮藏仓库，并开通了海空直接联系，如在几内亚比绍就设立了众多的秘密着陆点。同样还应该提到摩洛哥作为交易终端的巨大作用，欧洲的大麻主要来自该国，其交易网络同样适用于可卡因。

在众多叛乱中最让人关注的还是马里的。该国由两个差异较大的地区构成，只因尼日尔河和伊斯兰教（穆斯林占全国人数的95%）这两个因素才结合在一起。南部气候湿润，主要是班巴拉人（在科特迪瓦和几内亚称马林凯人），倾向塞内加尔、几内亚和科特迪瓦。北部气候干旱，但地下资源丰富，偏向阿尔及利亚南部和尼日尔。该国既有白人（图阿雷格人、阿拉伯人、贝拉必什人），也有黑人（索加伊人、索宁克人、普尔人和贝拉人）。

马里政府是在获得独立和法军撤退后才开始派军队占领北部的。1962年至1963年的叛乱虽然通过军事手段得以解决，但也给北部甚至南部人民心中留下了暴力的阴影，并使部分图阿雷格人逃亡。

1991年至1992年叛乱结束后签订的《国家公约》给予了北部省份特殊地位，其中的安全条款（2006年第三次叛乱结束后签订的《阿尔及尔协定》又进一步予以强化）规定北部实行非军事化，但允许建立以图阿雷格人为主的特殊混合部队。然而，这少量部队的装备非常差，可见南北之间的极度不信任。

对北部来说，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阿尔及尔协定》事实上未被执行，这成为北部再次反叛的由头。北部就在2012年4月和6月的总统与立法选举前夕又爆发了危机。利比亚的冲突磨炼了那些支持卡扎菲的图阿雷格士兵，的黎波里政权倒台后，这些在利比亚军队中服役的图阿雷格士兵撤退到了马里北部，他们携带着大量从利比亚军火库劫掠的装备。

这一危机还伴随着图阿雷格人内部领导权的斗争。以伊姆加德部落为主且亲利比亚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汇集了不满的北部白人及黑人团体，受到马里政府的高度重视。伊亚德·阿格·加利领导的“5月23日联盟”则与该运动并存，但并不加入其中……

在每次叛乱中，图阿雷格人都与其他部族（如索加伊人和阿拉伯人）有着复杂的关系，一会儿结成联盟，一会儿暴力对抗。政府也在利用北部的其他部族，比如一直鼓动建立索加伊和部族武装。

对此次危机，政府使用同样的策略。但反抗运动似乎从以往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即不再只代表图阿雷格人，而是作为马里北部所有部族的代表。因此，反抗运动进行了历史性的重组，以强力对抗政府，于是，2011年11月诞生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

这就是为何它们声称要建立“阿扎瓦德伊斯兰国家”。我们谈谈第三种地缘政治病态。

武装的萨拉菲主义

作为1988年至1998年阿尔及利亚流血十年的产物，“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萨赫勒萨拉菲主义的主角。该组织到底有多少人呢？大约有2000名战士。这些人都是阿尔及利亚流血十年留存下来的，之后逐渐被“伊斯兰拯救阵线”和“伊斯兰武装集团”控制，主要由阿富汗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构成，他们曾去阿富汗反抗苏军入侵，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回国。

1998年，原“伊斯兰武装”集团成员哈桑·哈塔卜建立了“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从1998年到2003年，该组织几乎联合了阿尔及利亚的所有伊斯兰分子，并逐渐向南扩展到尼日尔、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由于伊拉克战争，“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于2003年发生了第一次大的分裂，变成了两派：一派是地方主义，致力于推翻阿尔及利亚政府；另一派是国际主义，鼓吹全球“圣战”。2003年9月，以阿卜杜勒·马利克·德鲁克德尔为首的新一代人物开始执掌“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2006年9月11日，德鲁克德尔宣称“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皈依“基地”组织。但之后双方很快在萨赫勒地区发生了利益冲突。

撒哈拉地区的“圣战”组织一直由穆赫塔尔·贝尔穆赫塔尔控制，此人原为阿富汗人，掌控着香烟、武器和弹药的非法交易。在其东部地区，则是阿布·扎伊德领导的规模相对较小的组织。由于并未参加阿富汗战争，阿布·扎伊德试图通过攫取西部地区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声望。他想排挤掉德鲁克德尔和贝尔穆赫塔尔，成为萨赫勒地区唯一的“埃米尔”。这种竞争关系就解释了为什么扎伊德治下又出现了一个新角色——阿布·阿卜杜勒·克里姆，此人是马里人，拘押了一部分法国阿海珐集团的人。

如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其他首领一样，阿布·扎伊德娶了图阿雷格族女子。近来该组织一些成员进入尼日利亚，特别是在其北部的卡诺建立了古兰经学校，更印证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非洲化”趋势。

经历了严重的军事失败之后，这些组织在萨赫勒进行了重新组合和部署，在图阿雷格地区建立了庇护所，并在那里逐渐扎根，也因此弱化了图阿雷格部落的根基。

2011年初，受突尼斯事件的影响，一部分图阿雷格族年轻人建立了“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力图实现马里北部政权的“民主化”。利比亚危机则进一步激化了这一反抗行动。因为一些忠于卡扎菲的图阿雷格人带着武器返回该国，却与马里的现实状况格格不入。

“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坚持武装斗争，要求马里的临时总统下台。2012年1月17日，反抗军占领了东部的梅纳卡，并逐渐扩展到整个北部地区。在此背景下，又出现了以伊亚德·阿格·加利为首的“伊斯兰后卫”组织，此人出身于外交官，并曾在沙特阿拉伯吉达的穆斯林学校接受过伊斯兰运动培训。

伊亚德·阿格·加利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各头目均有联系，其中就有“图阿雷格人”阿卜杜勒·克里姆。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帮助下，2012年1月他在阿盖洛克制造了流血事件。2012年5月，在加奥和谈三个星期之后，“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和“伊斯兰后卫”组织达成协议，宣称要建立独立的“阿扎瓦德伊斯兰国家”，并成立“阿扎瓦德伊斯兰国家过渡委员会”。在加奥和通布图，以对空鸣枪的形式庆祝该协议……

萨赫勒地区萨拉菲主义武装的另一组成部分就是“西非圣战统一运动”。该组织由毛里塔尼亚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构成，都是从“伊斯兰武装集团”和“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营地中死里逃生的人，与穆赫塔尔·贝尔穆赫塔尔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唯利是图有所区别。“西非圣战统一运动”攻击塔曼拉塞特的阿尔及利亚基地，并在2012年5月绑架了7名阿尔及利亚外交人员。

可以这样描述萨赫勒萨拉菲派组织：“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图阿雷格人的烙印，“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有历史渊源，“伊斯兰后卫”组织与“西非圣战统一运动”遥相呼应。它们又都从属于统一的指挥链。起初是由“基地”组织总部三号人物——阿布·叶海亚·利比指挥，此人为阿富汗的埃及人扎瓦希里的助手。由于利比在巴基斯坦边境被无人机轰炸身亡，指挥权落到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德鲁克德尔和纳比勒·马克卢夫手中。后来，该组织又进一步分化为三股势力，即“阿布·扎伊德”、“穆赫塔尔”及“西非圣战统一运动”。需要指出的是，利比的兄弟阿卜杜勒·瓦哈布·卡耶德是利比亚旅的前线指挥

官，与当前的黎波里的军事首脑阿卜杜勒·哈金姆·贝尔哈吉（纳福沙山区的柏柏尔人）关系密切。

“利比亚伤口”

“利比亚伤口”是两种原因造成的：阿拉伯“革命”的灾难和北约的最近一次的“人道主义战争”。

关于阿拉伯“革命”，应当扭转其类似“1789年阿拉伯革命”的错误认识，才能还原其在“革命”盛名下的真实面貌。在突尼斯，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拒绝对示威人群使用武力，最终本·阿里下台。埃及在美国的推动下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2011年2月4日，奥巴马宣称：“我认为穆巴拉克总统占据着这个国家。目前他最应该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如何能留下帮助埃及顺利实现过渡这份遗产。我希望他能做出正确的决定。”2月10日，穆巴拉克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之后，白宫又再次呼吁穆巴拉克离开。[2]次日，元首打包走人了……人们可以用托马斯·迪·兰佩杜萨描述“猎豹英雄”的谚语来形容阿拉伯“革命”：“改变了一切却又什么都没改变。”

第1973号决议的影响

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时期的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称：“关于干预利比亚的第1973号决议是法国的胜利，正是阿兰·朱佩贯彻了我们坚定的外交意志。”[3]仅此而已……也许未来历史学家将会说，为了保护陷入昔兰尼加动乱的2万人，法国承担起巨大责任发动了战争。根据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估计，战争伤亡有5万—10万人。至于说坚定的外交，看看吧……

除了米歇尔·阿利奥-玛丽在突尼斯所做的蠢事以及对埃及外交的无所作为，北约在利比亚部署英法部队还导致了三个严重的政治后

果：遏制了非洲联盟；的黎波里建立起了伊斯兰制度；利比亚陷入分裂。除了明确设立禁飞区以及保护平民的第1973号决议，英法发动战争明显破坏了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的第1970号决议。法国向驻扎在纳福沙山区由前“圣战者”指挥的柏柏尔人空投了军事物资，造成了该地区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

马里的军事政变同样是一场灾难：图阿雷格人领土收复主义的重新兴起不仅影响了马里，同样也波及了尼日尔、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中曾为卡扎菲效力的一部分图阿雷格人，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后卫”这些伊斯兰团伙勾结，控制了阿尔及利亚边境的廷扎瓦滕、特萨利特和阿盖洛克这三个城市。在阿盖洛克，数十名被俘的马里士兵被白人武装枪杀或割喉。

这些推翻了马里总统阿马杜·图马尼·图雷的反抗分子，开始在卡提（距巴马科十几千米的磁锰铁矿城）的营地举行示威，要求得到武器装备，以便更有效地对付图阿雷格人的反叛。

马里的这种不稳定并非北约干预利比亚的唯一后果。除了图阿雷格人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后卫”的勾结，还活动着的另外一股势力，一直向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的伊斯兰分子提供后勤支持。“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本·拉登一伙有所区别，主要进行绑架人质的勒索活动，成了完全不同的谋利集团。该组织的阿尔及利亚首脑娶的是马里人，他们正在重新布局，除了通过与尼日利亚北部卡诺的古兰经学校和“博科圣地”的其他武装组织合谋以实现“非洲化”外，还直接与“索马里青年党”保持联系。“索马里青年党”中的一些成员曾在苏丹受训，并在厄立特里亚得到了一些由卡塔尔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支持……

无论如何，西方阵营（美、法新保守主义者）对利比亚的战争，将进一步催生从塞内加尔沿岸到非洲之角的恐怖主义和非法活动。除了“基地”组织给图卢兹和其他地方带来的威胁，按法国对外安全总局前局长的话来说，从大西洋到非洲之角的这部分地区“近乎成了新的阿

富汗”。这一现实的威胁要求我们认真对待，不仅是在情报和回击手段上，还包括外交方面，特别是要在机制上重建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双边关系，与非洲联盟委员会进行更好的协调。巴黎应当进一步承担在该地区和非洲大陆的责任。

正如阿米·艾蒂安·佩洛2012年3月13日在法国《解放报》发表文章中所说[4]:“这些问题与主流的政治正确无关。应当停止用那些可笑的长篇大论来阐释我们的外交，不应自大地无视法国在全球地位的下降。是时候建立新的振兴法国外交的原则了，应该在地缘战略分析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到现实情况、我们的行动手段、我们的利益，以及欧洲、地中海和非洲邻居的利益。”

与于贝尔·韦德里纳的乐观背道而驰，关于马里形势的争论，让该地区的政府领导人以及法国外交部门的新负责人都感到如芒在背。

利比亚的混乱

昔兰尼加地区的德尔纳至今仍存在着三座训练营，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的萨拉菲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图阿雷格人，还有从索马里和也门来的巴基斯坦教官。这三个营地通过数个非政府组织得到了卡塔尔的资助，其中就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共同组建的非政府组织“穆圣逃亡”。

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希望将该国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引向尼日尔，这当然要依靠尼日尔东部那些醉心于与乍得做生意的利比亚阿拉伯部族的支持。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结盟的图布人，希望保证利比亚南部的萨尔瓦多通道的安全，那里是萨赫勒萨拉菲分子的关节要害。

图阿雷格人则掌控着三个萨赫勒走私路线：图阿雷格人在尼日尔北部（萨尔瓦多），沿阿尔及利亚边境、加特以南；图阿雷格人和布

基纳法索的图布人向北沿伊尔库之路（乍得南部）；阿拉伯部落，与乍得进行武器交易。

他们在各地区以通婚、金钱和设置取水点来换取当地民众支持，以保证通道站点的安全。在尼日尔和利比亚，他们就设置了20多个通道站点。

孔波雷的王牌则是其萨赫勒问题的代理人穆斯塔法·查菲，这是一个言论能被伊斯兰分子接受的人物。查菲，父亲是毛里塔尼亚人，母亲是尼日尔人，曾多次企图推翻毛里塔尼亚总统，孔波雷给予他政治庇护。他曾参与解救2名西班牙人质，甚至还从中讨价还价地抽取佣金。这个人同时也是科特迪瓦总统阿拉萨内·瓦塔拉的固定代理人。法国对外安全总局至今仍对此人高度重视，认为他可能有办法接触到我们的人质，只是因为他在提供人质存活的新证据时要价太高，法国最后不得不放弃。

如何做？危机管理与回击手段

与最近一期《青年非洲》杂志上蛊惑人心的标题“明日之战争”所体现的意思不同，阿尔及利亚并不愿意接受非盟主席、贝宁总统博尼·亚伊所希望的深度军事干预，后者竭力主张在非盟和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干预。

在这一点上，阿尔及利亚人担心会使问题出现“阿富汗化”，认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后卫”以及“西非圣战统一运动”正等着机会建立新的“圣战联盟”来对抗西方的“十字军”。

阿尔及利亚在坚持边界和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同时，提出愿意根据解救加奥被绑架外交官的谈判情况，予以“适度”的军事响应。而“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则要求释放被关押在阿尔及利亚的“圣战者”。阿尔及利亚安全情报局非常清楚绑架团伙头目及其妻子身在何

处。他们威胁说，如果外交官没有被释放，就要发动针对“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的全面战争。此外，阿尔及利亚武装直升机刚刚击毙了20余名渗透到边境地区廷扎瓦滕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员。相对于大规模军事行动，阿尔及利亚更倾向于采取特种部队的形式，甚至进行重点清除。

在南撒哈拉国家之间存在对立并与北非存在密切关联效应的情况下，在该地区行使主权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区域历史上曾存在诸多古老的萨赫勒帝国，如加纳、马里、索加伊以及卡内姆-博尔努帝国，受过沉重的殖民统治，也曾短时间存在过博瓦尔·乌弗埃的“萨赫勒地区共同组织”（OCRS）。

从20世纪60年代起，当时新独立的共和国就遇到了这一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在马里和尼日尔的叛乱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图阿雷格人的反叛活动有关，甚至可以追溯到1916年萨努西亚领导的抗法斗争。

今天面对同样的问题，应当重建展望未来的有效的法阿和阿法关系。在中长期上，阿尔及利亚可能将面对萨拉菲—瓦哈比势力（突尼斯、利比亚、萨赫勒国家甚至摩洛哥）的包围。萨赫勒作为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叙利亚战争的延伸，可能成为新的全球冲突的舞台。正如阿兰·若克斯在《全球帝国的战争：金融投机、机器战争和民主的抵抗》一书中所说：“这些战争并非以反对一个民族为政治目的，但战争的标准却是由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或者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为来决定的，更确切地说，这是全球帝国警察权力的变形。除了这些表象，对于2011年开始并导致本·阿里、穆巴拉克和卡扎菲倒台的‘阿拉伯之春’，华盛顿的政策就进一步说明了问题。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美国无力再维系这些独裁政权的存在，于是试图在那里推行腐败的警察式的民主，在当地建立起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当然这也是以屈就那些不反对富人从政权中获益的保守伊斯兰政党为代价的。”[5]

于是，这种不安全的治理代替了国家主权……

里夏尔·拉贝维埃尔

---

[1] Cette analyse reprend l'essentiel des éléments de la contribution de Jérôme Spinoza, 《Anatomie d'un espace sous tension》,parue dans la revue *Défense*,n°149,janvier/février 2011.

[2] Communiqué de la Maison-Blanche du 10 février 2011:《*LesÉgyptiens ont reçu l'assurance qu'il yaurait une transition du pouvoir,mais il n'est pas encore acquis que celle-ci soit immédiate,significative et suffisante*》.

[3] *Le Journal du Dimanche* du18mars2011.

[4] Étienne Pellot,《Pour un changement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Libération* du 13 mars 2012.

[5] Alain Joxe,*Les guerres de l'empire global.Spéculations financières,guerres robotiques et résistances démocratiques*.Éditions La Découverte,Paris,2012.

“基地”组织：阿拉伯“革命”的大赢家

许多观察家存在疑问：2011年5月2日，本·拉登在巴基斯坦阿布塔巴德被美国海军特种部队击毙之后，“基地”组织到底跑到了哪里。该恐怖组织似乎正处于重组阶段。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该组织并未随着首脑被击毙而消散。尽管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的影响陷于停滞，甚至有所下降，但该“圣战”组织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大变动后，今后将利用阿拉伯“革命”带来的动荡在非洲和中东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基地”组织即便之前并没有发动“革命”，也没有参与，但今后将试图在其中发挥作用。

“基地”组织新头目——扎瓦希里博士

艾曼·扎瓦希里博士，埃及人，2011年6月16日正式出任“基地”组织的新首脑，是本·拉登的接替者。他是该组织的创始成员，此前是二号人物，并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

扎瓦希里的性格与本·拉登的有很大区别，让人感觉“基地”组织的战略可能会有所变化。当然这一过程会很缓慢，除了从利比亚获取更多武器外，该组织的后勤和人员并未有太大改观。

本·拉登是极度虔诚、传统、冷静和自省的，较封闭，对外部世界了解有限，而扎瓦希里则显得更“现代”和更有国际视野。得益于埃及、苏丹、中亚等地的历练，扎瓦希里在秘密战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曾两次入狱，刑期分别是在埃及三年和在达吉斯坦半年。而他的报复心则与其前任一样强。事实上，他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怀有

刻骨的仇恨，将其视为堕落和不道德的叛教者。他的妻子阿扎·艾哈迈德·诺瓦里及3名子女，在2011年11月阿富汗的一次空袭中丧生，这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美国的仇恨。他尽管是医生出身，却表现得十分冷酷，甚至直接参加暴力流血行动。然而，他并未拥有本·拉登的超凡魅力，尽管这种魅力是当时为了成就传奇人物而故意为之。

尽管没有受到信徒的吹捧，扎瓦希里仍在继任后获得了多数依附于“基地”组织的团体的效忠。他被公认是在协商委员会和六个专门委员会（军事、情报、政治、宗教、信息、行政与财政）所有成员中最适合担任该职务的人，这些委员会构成了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基地”组织总部指挥系统。

2011年6月19日，索马里谢巴布族发言人阿里·穆罕默德·拉格酋长称：“艾曼·扎瓦希里是因学识和经验被任命接替本·拉登的……我们赞同这一正确的选择，我们支持扎瓦希里，我们将像以前对他的兄弟一样忠诚于他。”同年7月7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发言人阿布·奥拜达·尤素福·阿尔阿纳比也在一段录音中重申：“在追求安拉的真理和‘圣战’的道路上，您（扎瓦希里）将长期指引我们，我们保证将服从于您。我们就是伊斯兰‘圣战’的一支箭，而您作为安拉的仆人就是射手，可以将我们射向您所希望的任何目标。”

“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发行的英文版《启示》杂志第六期指出，该杂志同样承认扎瓦希里的权威。该杂志负责人阿布·巴希尔·纳赛尔·瓦赫希，随后又在2011年7月底发布的一段录像中再次确认了这一信息。在该杂志的同一期中，巴基斯坦“塔利班”头目哈基穆拉·马哈苏德，也对扎瓦希里所指挥的为本·拉登复仇的行动表示赞赏。确实，在本·拉登死后，巴基斯坦大规模袭击的数量剧增。然而，本·拉登其实并不赞赏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行动，他认为其造成了过多的穆斯林被杀害，特别是什叶派。扎瓦希里在这一点上似乎不会有什么禁忌。

“基地”组织与阿拉伯“革命”

在新领导人的推动下，“基地”组织的指挥权很大程度上归了埃及人。事实上，在扎瓦希里的影响下，埃及人已经占据了该组织重要职位的一半，而从事行动的则主要是沙特阿拉伯人、伊拉克人、也门人和马格里布人。埃及的“革命”未来可能也将受到这种“毛细作用”的影响。对逊尼派来说，马格里布人和埃及人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并不像沙特阿拉伯人一样被认为是顶级的穆斯林，只有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的后裔才算，而这部分穆斯林大都愿意在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附近生活。

扎瓦希里清楚地知道，当前“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的形势十分不利，原因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无人机频繁地在该区域进行定点清除行动。许多骨干被消灭，换上的都是没有经验的人。此外，“基地”组织的国际“圣战分子”与“塔利班”之间的关系，可能没有一些人想象得那么好。事实上，“塔利班”更多进行的是国内斗争，而不是追求国际主义。“塔利班”的目标是取得喀布尔政权，若有可能再占领伊斯兰堡。“塔利班”的首任领袖毛拉·奥马尔清楚地知道，正是外国“圣战者”的存在才招来北约部队对阿富汗进行干预。他并没有改变这一认识，特别是在“塔利班”占据喀布尔时，当时的外国“圣战者”在阿富汗人口中仅占很少的部分。因此，扎瓦希里不得不尝试更多支持世界上其他地区归附于“基地”组织的那些团体。这种支持主要是后勤、训练和宣传方面的。不应忘记，这位曾经的埃及医生是沟通方面的大师，尽管由于安全原因，他不再经常出现在媒体面前。他不想像其前任一样被干掉，至少不是马上！即便并不害怕殉教，他也会认为自己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然而，“基地”组织开始严重缺乏资金支持，因为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的富有捐赠者，虽然曾大力支持本·拉登，但对扎瓦希里却没有那么慷慨。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埃及国籍，另一个就是某些捐赠者不再相信为建立“世界伊斯兰埃米尔国”而进行的“圣战”。事实上，十多年杀戮活动的受害者大都是穆斯林，“基地”组织在打击美国方面没能取得大的进展，尽管这一直是本·拉登的最大心愿。

在捐赠者看来，阿拉伯“革命”正在逐渐地、相对和平地在北非建立起萨拉菲政权。事实证明，西方所期望的前独裁政权民主化也为它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暗中支持的一些逊尼派激进分子，得以通过民主选举在突尼斯、埃及掌权，在利比亚和摩洛哥也获得了一定的权力。

扎瓦希里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也试图渗透到阿拉伯“革命”当中，不仅是在其故乡埃及，还包括马格里布地区和叙利亚，以便引导这些新政权更符合“基地”组织的目标。事实上，“圣战者”只是将民主化和个人自由的口号作为工具，当时那些喊着这些口号参与“阿拉伯之春”的大部分示威者，在现在看来不过是“滑稽剧中的小丑”。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非洲的活动

从2008年到2010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失去了北非的部分地盘，阿拉伯“革命”又给它带来了新的冲击。总体上，西方越来越视恐怖主义组织为风险，尤其是法国。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源自“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自2012年初成立以来并没有达到自己原来设定的目标。事实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埃米尔阿卜杜勒·马利克·德鲁克德尔，没能将该组织的活动转化成汇集众多激进分子和同情者的全民运动。该组织没有能力真正深入到阿尔及利亚以外的北非地区，其在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利比亚和撒哈拉-萨赫勒地区的尝试并无多大成效，建立“伊斯兰马格里布哈里发”的企图也严重受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试图招募外国人，但这些人效忠只是为了得到培训和物资，以便继续在伊拉克、阿富汗或其他地方继续活动，而把非洲的“圣战”抛在一边。结果，该组织的骨干一直只是阿尔及利亚人。特别是利比亚和摩洛哥的伊斯兰组织对该组织仍基本保持独立，这说明民族主义情感仍存在于这些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头脑中！

今天，形势开始变得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越来越有利。由于感到针对异教徒（美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英国人等）的“圣战”，要比反对马格里布国家的现政权更有号召力，这个阿尔及利亚恐怖组织开始改换自己的言辞。该组织呼吁“将异教徒和‘十字军’赶出伊斯兰国家”，并用武力夺取这些国家的政权。“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坚信，那些“叛教”的政权早晚会垮台，就像熟透的果实一样会自己落地。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可能还包括未来的叙利亚，这些国家的例子都证实了这一观点。因此，该组织并没有放弃反对现政府的斗争，只是将当地安全部门的人员指责为异教徒的同伙，行动也更集中于西方目标。一段时间以来，这一地区的恐怖活动，如炸弹攻击和人质绑架等都大幅增加。除了为其活动进行宣传，他们还用获得的绑架赎金给“圣战者”发放津贴。由于赎金的数额十分巨大，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武器，并且过得像贵族一样。

“圣战者”将赎金和非法所得（包括交易毒品、贩卖人口、走私香烟、偷盗汽车等）的一部分给了当地，使其赢得了部分地区特别是撒哈拉-萨赫勒地区民众的好感。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仍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他们以前还能从西方旅游者和移民那里获得一部分收入，而现在这些人也不再去沙漠探险了。国家已无力满足当地人的哪怕是最基本的需求。

由于没能成功掌控原“萨拉菲呼声与战斗”组织在欧洲的全部网络，“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转变了政策，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其周边地区，即北非。它的攻击活动主要集中在阿尔及利亚，特别是在阿尔及尔以东卡比利的伊斯兰分子的地盘上。在撒哈拉-萨赫勒地区，不同阵营间存在着严重的恶性竞争，特别是阿布·宰义德和穆赫塔尔·贝尔穆赫塔尔的组织。不应忽视的是，该地区广袤无垠也给了这些组织独立活动、互不干扰的可能。此外在马里，各个组织开始联合起来对抗政府军，而西非经济共同体国家却没能有效地予以回应。

最后，尽管阿拉伯“革命”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挑战，但仍然有更多的新成员愿意加入进去。阿尔及利亚当局也承认，“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人数已上千，而2011年时才只有数百人。该组织人数剧增主要是由突尼斯、利比亚的政治动荡、萨赫勒国家各自为政而没能扩大安全合作造成的。这种错误一部分应归咎于阿尔及利亚，该国坚持保有打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领导权，把摩洛哥以及其他国家的直接协助排除在外，尤其是法国的帮助。此外，受到独立战争时反法意识的影响，阿尔及尔拒绝法国对其边境进行公开干预。马里的情况也是如此。

萨赫勒-撒哈拉地区的不稳定

利比亚军火库中所存武器已经丢失的消息流传已久，其中就有482枚SA-24防空导弹，可以装在轻型车辆上使用。这些导弹是2004年莫斯科提供给卡扎菲政府的，现在可能已落入“黑手”。此外，以卡扎菲的儿子名字命名的“哈米斯旅”部队的仓库中，存放的老式SA-7和SA-14防空导弹也已经不见踪影。此外还有数量惊人的120 mm迫击炮弹和125 mm炮弹、7万枚地雷，以及大量反坦克导弹从利比亚的军火库中被盗走。令人担忧的是，利比亚存储的军火要比被美国“安全控制”之前的伊拉克军队的多得多。其中一些武器已经被伊拉克反叛分子用在了非传统战争中。当然，这些武器并未全部落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员手中，还有部分武器落入了许多不受控制的伊斯兰组织手中。可以想象，利比亚未来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索马里，陷入各武装团伙和部族的内战中。

在利比亚解体的影响下，撒哈拉-萨赫勒地区一直到尼日利亚都陷入了不安定之中，甚至可能波及布基纳法索，使整个区域成为真正的火药库。结果，现在北非成了巨大的军火市场，吸引着全世界的激进分子。

在这种背景下，马里的形势就具有标志性意义。在马哈茂德·阿格·加利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的鼓动下，图阿雷格人进行的叛乱使整个国家一分为二。马哈茂德·阿格·加利为前利比亚陆军上校，却是个马里人。而“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很快又被伊斯兰激进分子取代，并控制了该国的北部。这些伊斯兰激进分子包括“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苏丹·乌尔德·巴迪的“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和马里人伊亚德·阿格·加利领导的“伊斯兰后卫”。这一次，国际主义“圣战者”开始与当地部族和帮派联合起来。尽管一段时间以来撒哈拉-萨赫勒地区出现了黑帮化倾向，特别是穆赫塔尔·贝尔穆赫塔尔因走私活动被冠以“万宝路先生”的称号，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所追求的政治宗教目标再次成为主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非法交易会终止，制造财源是进行斗争不可或缺的。

事实上，马里北部正在产生一个激进的伊斯兰政权，而且其触角有可能会延伸到尼日尔，甚至向东到乍得，向西到毛里塔尼亚。此外，它征服整个马里的企图仍然存在。它与伊玛目阿布巴夫尔·谢考领导并控制尼日利亚北部的“博科圣地”进行联合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隶属于该组织的数百名成员已经加入了加奥方面。同时，该恐怖组织也非常乐意接受资金援助和源自利比亚的武器，这使其能够在尼日利亚发动反政府和反什叶派的内战，从而将该国一分为二。

最后，自2012年3月政变以来，巴马科政府已经陷于内乱，无法很好履行自己的使命。如果不是政府在2012年夏天武力介入，反叛分子很可能向南一直推进到布基纳法索了。尽管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其中一些只是临时招募的娃娃兵，叛军在人力上仍明显不足。虽然叛军依然控制着所占地盘，但已无法进行长途奔袭，更不用说组织有质量的攻击行动。因为缺乏强大的后勤保障，他们难以维持对马里北部的控制。而且，不同派别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也开始显露出来，很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内讧，其后果目前仍很难预料。

也门和索马里，“基地”组织的新中心?

也门在2011年至2012年爆发了“革命”，虽然成功将萨利赫总统赶下了台，但也给国内局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本·拉登前私人秘书、也门人阿布·巴希尔·纳赛尔·瓦赫希领导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利用该国的混乱“解放”了南部地区，但其根基主要在北部的马里布和焦夫省。该组织试图建立一个“伊斯兰哈里发”，但在阿布塔巴德发现的一些文件显示，本·拉登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反叛者并没有足够的手段达成这一目标，因此他要求该地区的信徒更多去针对美国的利益。

然而，伊斯兰分子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而且还以此为依托开展恐怖活动。2012年5月，一架飞往美国的班机遭到袭击，幸好在沙特阿拉伯情报机构、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五处帮助下才得以幸免，腰缠炸药的袭击者被抓。此人是卡利德·易卜拉欣·阿斯利，沙特阿拉伯裔，曾多次参与企图袭击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室的行动。由于被美国人精确地甄别出来，这名“圣战者”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索马里仍然是谢巴布民兵同过渡联合政府及其盟友埃塞俄比亚、尼日尔政府和索马里联合国维和部队之间暴力对抗的舞台。“基地”组织也将该国视为优先目标。但是，该组织与当地萨拉菲派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圣战者”在2012年初遭受了重大军事失败。事实上，他们因企图正面进攻对手而犯了战术上的错误，不得不再次转入游击战和进行恐怖活动，以保证自身的安全。

在该地区未来数年的主要风险中，有一个是很少被提及的，那就是不能排除“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可能已经获取了利比亚的化学武器，特别是芥子气。激进分子可能尚需一定时间来熟悉掌握，以获得有效使用该武器的能力，并很可能正在马里北部地区悄然地进行着训练。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很可能会尝试进行远途袭击，如将目标放在西欧！当然，就像那些防空

导弹一样，这些化学物质是有保质期的，而且撒哈拉沙漠的存储条件也并不理想。这类物质的保存可能是个大问题，这也是令人庆幸的。

因此，“基地”组织的未来尚存变数。许多分析家认为该组织必将终结。当然，如果扎瓦希里能够着眼于建立新的后方基地，特别是在萨赫勒地区，没有人怀疑该恐怖组织今后能够重返前台。法国的核心利益，特别是在尼日尔的铀矿，未来可能会受到严重威胁。

“基地”组织在撒哈拉-萨赫勒地区、索马里和也门的活动我们还是可以搞清楚的，当然这不包括叙利亚、利比亚特别是埃及的情况。因为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更复杂，以至于很难进行评估。但不应忘记的是，这些伊斯兰分子的时间观念与西方的是不同的。他们会更长期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其战斗可以延续几代。

阿兰·罗迪耶

从“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之冬”

人们在2011年上半年对阿拉伯“革命”运动最悲观的预测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已经在许多著作和文章[1]中都给予了阐述，这些与西方普遍兴致勃勃甚至一派天真地持有的主流观点并不相同。如果我们相信，在这些经历了半个世纪独裁统治、早已消灭了任何自由和多元化的国家，只要有了互联网（尽管只有极少数特殊的人能使用），民主和自由就能像灯神一样突然冒出来，那就过于幼稚了。

对自由的狂热和脸书迷们的躁动一旦过去，一切就都变得明了了。政权只会落入有组织的政治势力手中，这些势力之所以可以在民族主义独裁者倒台后继续存在，是因为在财力上得到了与其价值观一致的石油君主国的支持，在政治上则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因为它们可以充当对抗东方政治影响的工具。“阿拉伯之春”仅6个月之后就变成了“伊斯兰之冬”。

被侵蚀的民主

突尼斯和埃及的伊斯兰政党，如穆兄会和萨拉菲极端派，在“革命”后的政府和议会中占据了多数。而且危险的是，伊斯兰势力各组成部分有多元化的倾向，温和民主的种子可能会被极端势力集团排斥在外。萨拉菲分子几乎都来自穆兄会，他们尽管只是其中少数的激进分子，却因鼓吹民粹主义使得整个组织变得激进。

多数派通过军事手段维持当前的局面，但也不得不考虑重要的经济因素，却忽视了那些将其推上台的民众的诉求。而多数派仍然实行

双重标准，与之前所声称的正好相反。在埃及，2011年春，它们曾在解放广场上声称无意夺权，今天却宣称公开选举出来的总统应完全掌控权力。在突尼斯，它们曾公开宣称放弃把伊斯兰教法写入宪法，却在远离西方媒体注意的乡村和重要的中等城市组织了宗教警惕委员会，实行伊斯兰教法，并且已经逐渐地渗透到了更大的城市，甚至地区首府。这些地方各种各样的禁令变得越来越多，包括对演出和新闻进行控制，削减基本自由，当然还有剥夺妇女以及非逊尼派少数族群的权利。

然而，这些反动政治势力并不担心未来的选举更替，其管理方式就是弱肉强食的、灾难性的和铁血的，就像1989年苏丹的穆兄会掌权一样。由于得到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大规模资助，这些势力已成为使阿拉伯世界保持顺从的保障，它们可以用各种手段去收买人心。因分裂而束手无策的民主政治无法阻止其继续进行统治，因为民主政治很容易被指认为外来思想，是大逆不道的。

掌权的“圣战者们”

利比亚和也门在混乱中倒下了。就在北约部队超出联合国的授权，摧毁了不怎么受尊重的卡扎菲政权之后，利比亚陷入了各部族和团伙的对抗中，它们纷纷用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地盘和收入来源。本来就不稳固的全国过渡委员会，虽然受到贝尔纳-亨利·莱维的吹捧，但还是被一些伊斯兰匪帮头目们逐渐破坏。这些人中就有原“基地”组织的成员，得到了卡塔尔的资助。而卡塔尔则试图在任何问题的解决上都插上一手，更希望在利比亚的油气资源开发上分一杯羹。

在也门，总统萨利赫的黯然离去，为分离主义势力敞开了大门。它们从未停止过在该国捣乱，使得这个国家始终未能享受1990年南北统一的成果。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由于担心这个动荡邻国会一时冲动，它一直资助该国激进主义者的颠覆活动。今天，该国南部和东部

的逊尼派部落的部分首领，依仗“基地”组织和萨拉菲分子，给首都萨那周围带来了无休止的动荡。该地区是什叶派的反对派分支“扎义德”组织的传统政治领地，一直不肯承认沙特阿拉伯王室的合法性。

火的一部分

阿拉伯传统君主国摩洛哥和约旦，似乎躲过了眼下这场广泛的抗议运动。首先是因为这两个君主国的宗教渊源，它们都传自先知家族，其合法性避免了被直接质疑。其次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伊斯兰政党和政治势力做出了很多让步，让这些势力在议会中具有了相当多的发言权，但同时也潜移默化地使这两个国家的公共生活朝着宗教激进主义方向转化。最后是因为其一直尊重西方以及海湾君主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正因为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两国才得以维持国内的和平，但其环境仍十分脆弱，颠覆活动随时都可能戏剧性地发生。

令一些观察家吃惊的是，阿尔及利亚并未直接卷入“阿拉伯之春”。因为该国早在1988年至1991年就经历了自己的“春天”，而且已经付出了代价。由于当时东西方仍然处于对抗之中，西方并未在该国实行“哥白尼式”的革命，以更符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利益，也没有实行所谓的大炮政策，仅把政治伊斯兰运动视为一种危险。让人如释重负但又稍感羞耻的是，欧洲特别是法国，竟然对破坏“伊斯兰救国阵线”选举胜利的军事政变持赞同态度，甚至拍手叫好，而对萨拉菲“圣战者”令人怀疑的泛滥的暴力镇压，以及导致上万人丧生的真正内战，虽然可能内心里厌恶，却始终保持着缄默。

阿尔及利亚政府相比其他国家并没有那么专制，因而赢得了时间来组织起自己的防线，构建某种“模糊”的寡头体制。外界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负责这个国家。该国政府力图避免出现任何危险倾向，在公共生活的规则制定上向政治伊斯兰势力做了很大让步，将自己的国际扩张野心也精心隐藏起来，甚至昨天还认定萨赫勒地区是自家的后

院，而今天却对那里“圣战者”的泛滥视而不见。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通过牺牲民众的利益得以独享权力。但“阿拉伯之春”已经使这些民众清楚地认识到，在残酷的镇压和激进主义的蒙昧之间，自己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痛苦中的叙利亚

只有叙利亚抵挡住了全球伊斯兰运动，代价是不被外界理解和遭受国际社会的指责。这里并不是要对该国的野蛮镇压进行评判。叙利亚的安全机构和特种部队使用了奥斯曼帝国在400年占领期间所用过的所有手段。该国的安全机构和特种部队是由1920年到1943年法国统治时期的殖民地军队发展而来的，从1945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由前纳粹逃亡者担任顾问，直到1990年得到了苏联克格勃顾问的指导。可以说，这些部门没有任何人权的概念，行动仅注重结果。单从行动效果来评判，其源于同一文化的对手真的技不如人。

不可否认的是，叙利亚政府是一个专制的、粗暴的和封闭的政权。但叙利亚政权并不是个人独裁，也不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伊拉克那样的家族独裁。如同其父亲一样，巴沙尔·阿萨德只不过是这个复杂社会的冰山一角，他的离任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在他身后还有200万阿拉维派教徒，这些人势必要为自身的生存而坚持斗争。更有数百万非穆斯林、非逊尼派和非阿拉伯的少数族群，他们将会因伊斯兰分子掌权而失去一切。而西方似乎正在这一地区鼓励和推动伊斯兰势力的上台。

1943年叙利亚独立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外国军事占领压迫的逊尼派有产者，犯了典型暴发户常犯的错误。他们认为军人职业是没有前途的，军事组织只不过是保持社会进步的一般工具，自然也就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参军。这样就使穷人有机会在这个年轻国家取得军队官员的职位。

20世纪70年代，出身于阿拉维派一个普通家庭的哈菲兹·阿萨德成为空军司令，进而出任国防部长，而后又在基督徒和德鲁兹派的少数族群联盟帮助下，通过武力夺权上台，并开始对少数族群进行保护，当然他自己的家族也属于这个联盟。然后，他开始使用各种手段确保少数族群能够控制这个国家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2]

面对宗教激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带来的阿拉伯世界的混乱，哈菲兹·阿萨德的继任者巴沙尔·阿萨德就像以色列的犹太人一样，只能背水一战，要么胜，要么死。

普通人听到的宣传是“如果不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涉，这个国家将陷入内战”，这只能说明对该国形势的完全无知。叙利亚并不会再陷入内战，最好的解释是，自1980年以来该国就已经处于全面内战中。

叙利亚政府并不太习惯进行沟通，而是选择对反对派进行压制，当然并不是对每个反对派都这样。因为叙利亚有全世界众所周知的自由民主人士，这些人无法容忍该国的专制主义，希望巴沙尔·阿萨德能够实行政治开放。但是，这些自由民主人士只从总统那里争取到了经济自由，同时放弃实行自由改革的正当要求。这些人太过分散，没有什么手段，也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他们没有话语权，西方媒体也不关注。这是因为他们并不能像利比亚的那样，可以被当作攻击独裁者的工具。

西方媒体只关注“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或者其他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关于当地情况的信息，但这些非政府组织本身可能就存在问题，“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也是一样。这个人权组织的名称在西方很响亮，也成了一些西方媒体优先的甚至唯一的消息来源，但该组织与国际人权联盟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该组织源自穆兄会，受伊斯兰势力领导，其中一些人曾被指责为暴力分子。20世纪80年代“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成立于伦敦，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情报机构的支持，几乎完全依赖沙特阿拉伯的资金进行运作，后来则靠卡塔尔。虽然不能说来自该组织的信息是伪造的，但考虑到该组织的创始经过和信仰导向，西方媒

体特别是法国媒体，竟然将其作为唯一的消息来源，而不去探究消息的出处，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被视为集中了该国所有的反对派，也被西方使节认定为有效的沟通者，但它只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民众抗议组织。2011年该组织确立于伊斯坦布尔，仿照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模式，是在土耳其当权的正义与发展党的推动下建立的。建立伊始，“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就很快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色彩。确切地说，叙利亚国旗由三种颜色的平行长方形组成。黑色的代表从9世纪到13世纪统治阿拉伯世界的阿拔斯王朝，白色代表从7世纪到8世纪的乌玛雅德王朝，红色则代表该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建立之初，“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就用伊斯兰的绿色代替了国旗中的红色，正如人们在反政府示威中高喊的“Allahou akbar”（真主至高无上），而非民主的口号。

穆兄会之所以能在“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中占据优势，是因为得到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但这也激怒了几乎所有人，特别是库尔德人，虽然他们也是逊尼派穆斯林，但不是阿拉伯人，命中注定在宗教派别中要低人一等。叙利亚不是利比亚，少数族群占全国人口的1/4，也要有发言权，即便是在反对派内部。“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因此变成了大杂烩，不同的诉求和利益在此相互碰撞，使它很难符合国际社会的设想，甚至还不如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而且一旦该国政府倒台留下政治空间，它是否有掌控局势的能力。

最近几个月各方达成的唯一共识，就是完全忠于穆兄会的首任主席伯翰·加利昂下台，由库尔德人阿卜杜勒·巴塞特·西达接替，此人正极力避免失去土耳其伊斯兰分子的友善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支持，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财力支持。这两个国家还承诺将给予叙利亚“自由军”武器和金钱。叙利亚“自由军”主要由原正规军的逃兵组成，并得到了聚集在伊拉克、利比亚、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的“圣战者们”的支持。这必然会导致动荡。但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所支持的伊斯兰国家试图引导阿拉伯世界的抗议运动。这自然无法让叙利亚的少数

族群安心，或促使他们进行和解和保持克制。这些少数族群，特别是拥有国家强力机器的阿拉维派，对自己的生存感到忧虑，并不惜为此使用暴力。把叙利亚总统赶下台，在关键时刻可能具有象征意义，但这并不能改变问题本身。因为这一切针对的不是总统，也不在于总统的问题，而在于其背后的族群将因失去了方向和自己的领袖，而变得更加暴力和富有侵略性。未来，国际社会越是对受到威胁的少数族群施压，那么事态就越会朝着1975年至1990年黎巴嫩流血内战的方向发展。

如果解读该国最近发生的冲突，很明显那里正发生着某种形式的族群清洗，以便将阿拉维派与其邻居逊尼派隔离开来，并为撤退做好准备，因此该地区形成了新的冲突点，尽管事实上可能并不需要如此。其他少数族群，特别是那些构成叙利亚基督徒主体，却又没能解决地盘问题的希腊东正教徒，如马龙派，不得不在逃亡和臣服于“伊斯兰祈祷团”之间做出选择。“伊斯兰祈祷团”是穆兄会的武装“圣战”组织，“基地”组织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国际社会2010年本来有机会改变这种状况，即要求叙利亚政权进行自由改革，使受到威胁的少数族群得到有效保护。既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这两个支持瓦哈比主义的神权政治君主国，在理论上属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要求它们废除伊本·泰米叶的裁决，从而使事态得以平息，但是我们并没有。对于叙利亚少数族群受到威胁，西方国家首先是法国，只是做了不点名的批评和一些可笑的谴责，却在事实上促成了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攫取政治和部分军事权力，并使那些实行神权统治的国家继续支持政治萨拉菲主义。

被神权政治嘲笑的民主

那些名声不太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如萨达姆·侯赛因、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的下台，加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陷入了内部

冲突，使得石油君主国可以毫无阻碍地用石油美元控制阿拉伯国家联盟，并借此对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施压，同时还鼓动激进主义政治运动并给其披上民主的外衣，以确保自身的合法性。

君主国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激进主义政治势力想要夺取觊觎了近一个世纪的政权，这些并没有什么让人惊奇的。奇怪的是，西方急于到处推动那些比独裁者还要不民主的激进主义者上台，并将反对者枭首示众。西方国家一边谴责自己内部的伊斯兰主义，一边却又鼓励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活动。法国为了“圣战者”毫不犹豫地出兵剿灭卡扎菲，还号召国际社会以同样的方式把巴沙尔·阿萨德赶下台，并对被犯罪团伙搞乱了的马里进行军事干涉。在马里的这些犯罪团伙之所以自称是伊斯兰主义，只是因为其政治对手不是伊斯兰。

西方的媒体和政府，同样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巴林用坦克血腥镇压抗议者闭口不谈。巴林这个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小国，却是由对立的逊尼派君主统治的。此外，“博科圣地”伊斯兰民兵对尼日利亚基督徒的屠杀也不大受媒体关注，我们的政府也并未予以多少谴责。至于国际刑事法庭4名成员被利比亚“革命者”长期扣押的事件，也被低调处理，在我们的媒体报道中几乎见不到。可以想象，如果该事件是叙利亚、伊朗、阿尔及利亚或其他尚未归入“民主”范畴的国家所为，那会引起多大的愤怒。只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伊斯兰独裁者得到了西方政治军事支持和君主国的资助，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尽管缺乏逻辑引导，我们还是尽可能去探究我们政府和媒体这种奇异分裂症的心理及其根源。未来将证明我们迷恋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民主主义是否幼稚，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对我们处在危机中的经济给予大量投资是否值得赞扬，以致让我们对野蛮行径视而不见，还盲目地相信自己已经避免了这一切。

阿兰·舒埃

[1] 《Révoltes arabes:l'envers du décor》in《Outre-Terre》,n°29,Revue de l'Académie européenne de géopolitique,ouvrage collectif sous la direction du Pr.Michel Korinman,Paris,10/2011.《Au Coeur des services spéciaux.Menace islamiste:fausses pistes et vrais dangers》,entretiens avec Jean Guisnel,La Découverte,Paris,09/2011.《Le printemps libyen sera orageux》in《Marine et Océans》,n°231,2e trimestre 2011,Paris.

[2] Alain Chouet,《La désintégration par le politique》in《*Tribus,tribalisme etÉtats au Moyen Orient*》,Maghreb-Machrek n°147,（Paris）,03/1995.

作者简介

埃里克·德纳塞（Eric Denécé），法国人，曾担任情报分析员，现任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最新作品《法国的秘密机构真的一无是处吗？》2012年出版。

梅兹里·哈达德（Mezri Haddad），突尼斯人，记者、作家、哲学家和外交官，曾担任突尼斯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最新作品《突尼斯“革命”隐藏的一面——伊斯兰与西方，高风险的联盟》2011年出版。

洛朗·阿尔图·杜普莱西斯（Laurent Artut du Plessis），法国人，地缘政治问题方面的记者和随笔作家，著有多部作品，为博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持者。最新作品《从危机到战争：精英的垮台》2011年出版。

萨伊达·本哈比莱斯（Saida Benhabylès），阿尔及利亚人，曾任阿尔及利亚团结部长和参议员，参与创建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获得过联合国支持公民社会奖。

伊夫·博内（Yves Bonnet），法国人，荣誉省长，曾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法国领土监护局局长，担任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主席，以及IDES咨询公司的战略委员会主席。最新作品《大阴谋》2012年出版。

德克·博格斯（Dirk Borgers），比利时人，拥有独立身份的专家，精通石油问题，曾参加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救中心和法国情报研究中心有关利比亚问题的研究。

安德烈·勒梅尼昂（André Le Meignen），法国人，拥有独立身份的专家，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副主席，曾参加该中心与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组织的利比亚观察团。

亚历山大·伊菲（Alexandre Ifi），法国人，记者，曾担任法国Canal Plus传媒集团驻外特派记者（先后驻伊拉克、科特迪瓦、美国），现在柏林任记者，自2012年起研究西方在利比亚的干预问题。

莉迪·博卡（Lydie Boka），拥有法国和科特迪瓦双重国籍，StrategiCo（战略）机构的领导人，该机构专攻非洲政治、经济和金融分析及风险预测。出版多部有关非洲国家研究的专著，最新作品《贝宁》2009年出版。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拥有法国与埃及双重国籍，经济学家，著有多部作品，现任"全球替代论坛"主席，该论坛是1997年创立的世界级智库网络，他还是"世界社会论坛"的成员之一。最新作品《历史长河中的阿拉伯世界，阿拉伯革命？樱桃时代》2011年出版。

安妮-玛丽·利赞（Anne-Marie Lizin），比利时人，担任比利时参议院的荣誉议长、欧安组织全体代表大会的副主席，还曾担任欧洲议会议员、欧洲事务国务秘书、众议员、参议员及参议长。

里夏尔·拉贝维埃尔（Richard Labévière），法国人，瑞士法语电视台的著名记者，《非洲-亚洲》月刊的合作人，提供国际关系咨询。他曾出版过10余部作品，最新作品《当叙利亚醒来》2011年出版。

马耶德·尼赫梅（Majed Nehmé），拥有法国和叙利亚双重国籍，曾任《非洲-亚洲》杂志的主编，用阿拉伯语撰写过多部作品，特别主导出版了《政治百科全书》第七卷（1980—1986年）。

塔乌费克·布尔古（Taoufik Bourgou），突尼斯人，政治学讲师，美国政治和体制研究中心主任，在里昂第三大学法学系任教。最新作品《恐怖主义，"9·11"后的考察》2011年出版。

艾哈迈德·本萨阿达（Ahmed Besaada），阿尔及利亚人，物理学博士、教师、教育家、随笔作家。作品多次获奖，最著名的是由于教学突出而获得加拿大总理奖。最新作品《美国在阿拉伯街头动乱中的角色》,2011年在加拿大出版，2012年在阿尔及利亚出版。

奥利维尔·吉尔曼（Olivier Guilmain），比利时人，政治学家，曾获得比利时自由大学学士学位，在比利时选举比较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最新作品《公民社会是特洛伊木马吗？》（合著）2012年出版。

伊夫-玛丽·佩里（Yves-Marie Peyry），法国人，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阿兰·夏莱（Alain Charret），法国人，曾担任情报机构干部，担任电子刊物《情报人》的主编，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最新作品《摩纳哥的恐怖现象》2010年出版。

杰拉尔德·阿尔布瓦（Gérald Arboit），历史学博士，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研究员。最新作品《圣约翰·菲尔比对阵阿拉伯的劳伦斯》2012年出版。

苏梅卢·布贝耶·马伊加（Soumeylou Boubeye Maïga），马里人，曾先后担任马里总统的特别顾问和办公室主任，还担任过马里国家安全（马里情报机构）总长、马里军队和老干部部长、马里外交部长（2011—2012年），现任马里民主联盟（非洲团结正义党）的副主席，人道组织“母亲，生命之源”组织的主席，以及“萨赫勒-撒哈拉地缘政治和战略观察团”的主席。

洛朗斯·阿伊达-阿穆尔（Laurence Aïda-Ammour），拥有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双重国籍，现任Geoplo Sudxonsultance机构的国际安全与防务顾问，并在“世界上的非洲”实验室任客座研究员，曾在罗马的北约大学任教。最新作品《对话中的阿尔及利亚》（合著）2009年出版。

阿兰·罗迪耶（Alain Rodier），法国人，曾担任法国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现任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研究员。最新作品《伊朗，下一场战争即将来临？》2007年出版。

阿兰·舒埃（Alain Chouet），法国人，曾任法国对外安全总局安全情报处主任。最新作品《走入特别部门核心——伊斯兰的威胁：虚假的线索和真正的危险》，与让·吉斯内尔合著，2011年出版。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简介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依据1901年的法律于2000年成立，是一家独立智库，专门研究情报和国际安全。其目标是：

开展学术研究，出版研究情报和国际安全的作品；

为有关公共政策部门的各方（包括决策者、政府、议会、媒体等）提供专业支持；

为大众的情报观念“去神秘化”，解释情报的作用。

中心的组织结构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分三个专业部门，有15名左右的研究人员，分别研究：

一、情报史，主要研究历史上的情报活动，包括情报与反间谍工作，秘密与特别行动，情报拦截与密码破译，心理战，欺骗与计谋；

二、情报政策，主要研究现代情报的运作，包括情报部门的组织和协调，预算和人员，行动分析，情报技术，情报交流与伦理，议会监督；

三、新威胁和风险，主要研究情报和安全部门的利益界定与后续发展，包括恐怖主义，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冲突，经济间谍活动，国际非法活动，网络威胁，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激烈的颠覆活动。

中心的活动

围绕上述议题，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开展如下活动：

开展研究活动，收集论文。中心每年都颁发两次奖学金，奖励那些法语学界致力于情报研究的出众作品，一个是“青年学者奖”，主要授予为获得专业文凭而撰写的学术论文，一个是“大学生奖”，主要授予博士论文。

从事专门教学，特别是授予高级研究学位——情报与安全机构管理。

举办研讨会与晚餐讨论会。

与法国和外国的情报研究中心开展学术交流、伙伴单位交流。

情报处理和分析活动。

为企业、政府和政治、经济决策者提供建议、研究和培训。

根据媒体、议会、大学及政治、经济决策者的需求，开展相应的活动。

对国际冲突进行评估。

出版供大众阅读的作品。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将其专业知识分享给记者、编剧、小说家、出版商、翻译家，帮助其理解情报学方法（帮助他们构思资料收集的工作、为电影编剧提供建议等）。

情报中心与SPYLAND计划建立了伙伴关系，这是一个面向情报世界的园区，2015年在法国成立。

中心出版的作品：

——研究报告、情报通告、新闻记录、历史记录和思考等，由专家定期编写，在网站上可以查看；

——每周出版《情报人》电子刊物，收听面向外国的法语广播电台的节目并进行汇总；

——每月出版《I-source》电子刊物，统计最近出版的所有与情报有关的作品；

——出版《情报与特别行动》季刊（每期180页，由法国阿尔马丹出版社出版）；

——出版《情报与战略》月度信札，解析世界地缘政治和国际重大问题的幕后牌局；

——出版另外一些与情报有关的作品（在《西部法兰西报》出版《间谍口袋书》，在椭圆出版社出版《法国情报中心》文集，在阿尔马丹出版社出版《情报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个人或集体撰写的作品。

自成立以来，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从事了大量工作，就是为了让人们对法国及法语世界的情报有更深入的认识。截至2012年，它已出版了70部书、60篇研究报告、300篇文章、350篇分析报告和700期广播收听通报。中心出版4种杂志和电子信札，组织了40次晚餐讨论会和10多期研讨会。中心研究人员做过150多次讲座，主持过多次研讨会，接受过2000余次媒体（电视、广播、纸媒）的采访。

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简介

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在阿尔及尔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建立一个专门收集有关暴力颠覆的公开信息的组织的想法被提了出来。两位发起人分别是阿尔及利亚前团结部长萨伊达·本哈比莱斯夫人和比利时参议院前荣誉院长安妮-玛丽·利赞夫人。2003年7月，国际恐怖主义研究与受害者援助中心（CIRET-AVT）在巴黎警察总部备案。

该中心主任由法国国民议会前议员兼领土监护局（DST）前局长伊夫·博内荣誉省长出任，汇集了来自多个国家的人士，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美国、俄罗斯、比利时。CIRET-AVT的任务是在公开文献的基础上，对所有涉及恐怖主义的问题，包括其根源、发展及后果进行研究。

起初，获取、传递和利用的这些相关信息被设定为仅限于内部，也不用进行严格处理。然而，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涉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一个公民，与其斗争并不会因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CIRET-AVT认为公民有权获得真实、完整和可访问的信息，并希望通过其网站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CIRET-AVT的目标是向公众提供准确的经严格道德规范印证的，且相对较新的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数据。这项工作的首要要求是严谨，更需要相关研究人员具备多学科知识及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因此，CIRET-AVT的活动包括三个互补的方向：

掌握与抗击恐怖主义或暴力活动有关的最新资料；

细化事实认定标准；

对话及思想、知识和研判交锋。必须强调的是，CIRETAVT绝对不会干涉主权安全，更不会为此类目的服务。

CIRET-AVT自创建以来就进行了许多具体行动：

数次组织有关此类攻击性活动的严重后果的国际专题讨论会；

与法国和国外其他专门研究中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其成员参加冲突评估行动，包括2011年春季在利比亚和2011年冬季在叙利亚进行的评估。他们在随后的18个月内就提供了包含重要材料的报告。

最后，CIRET-AVT通过其成员的众多出版物为思想辩论做出了贡献。

因此，CIRET-AVT在没有外部帮助且遵纪守法的情况下赢得了毋庸置疑的信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 （法）埃里克·德纳塞，（阿尔及）萨伊达·本哈比莱斯，（突尼斯）梅兹里·
哈达德著；王朔，周谭豪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5
ISBN 978-7-5217-1768-6
I . ①阿…II . ①埃… ②萨…③梅…④王… ⑤周…III . ①阿拉伯国家－国际问题－研究
IV . ① 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61681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
La Face Cachée des Révolutions Arabes by CF2R & Eric Denécé
Copyright © CF2R 2012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www.divas-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
著者：［法］埃里克·德纳塞 等
译者：王朔 周谭豪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64千字
版次：2020年5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9-7295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1768-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